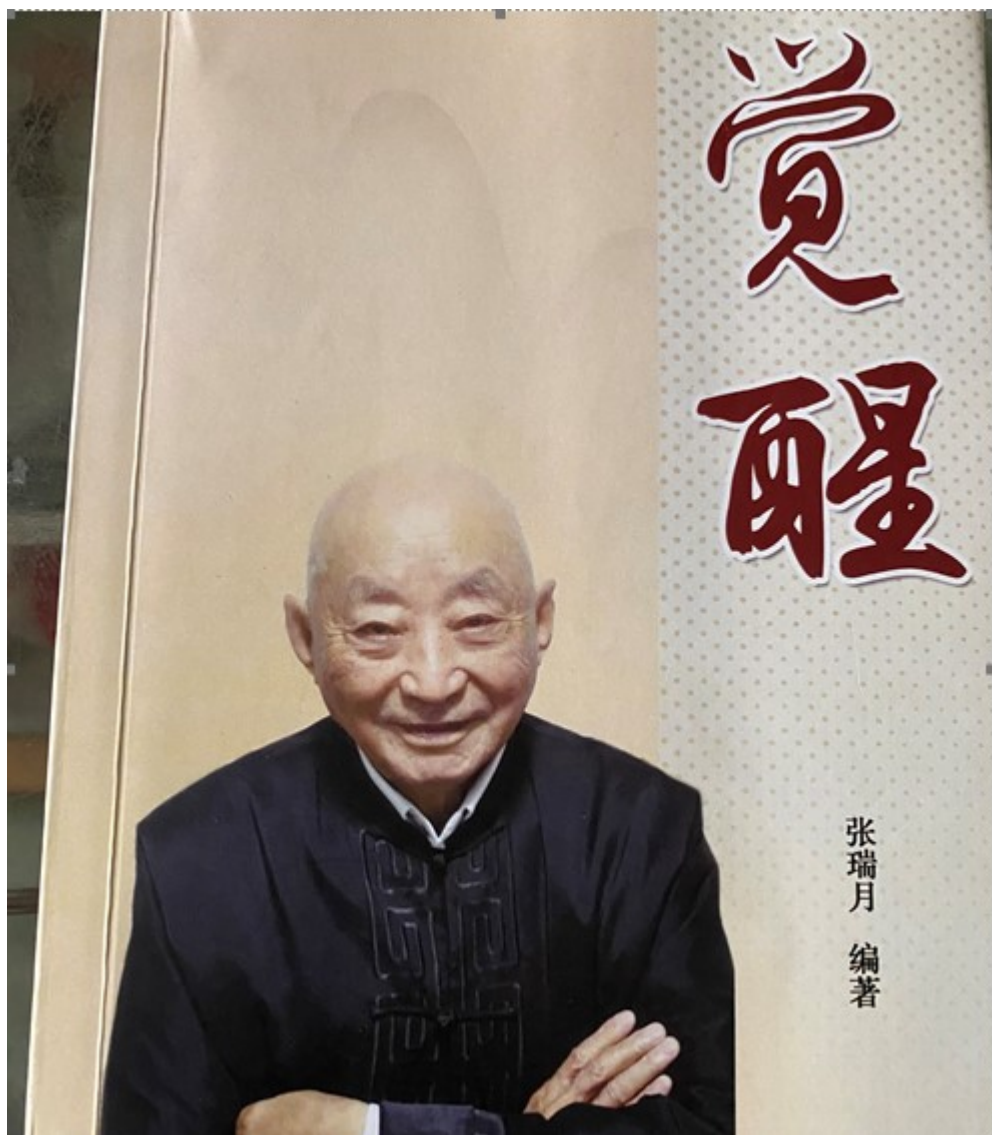




第一章：七古诗 言志	1-7
第二章：生命大劫难(及读后感)	7-53
第三章：习近平高层内部讲话及读后感	53-67
第四章：毛泽东雄文《民主颂》及读后感	67-69
第五章：毛泽东控制百姓的罪恶手法及读后感	69-76
第六章：毛泽东控制大臣的罪恶手法及读后感	76-95
第七章：原载《报刊重点文摘第 61 期》十二、毛泽东“雷语”大集结！	95-118
第八章：毛泽东的绝密文稿《我的自我评价》(2014-08-12)	118-120
第九章：一段论	120-123
第十章：盖棺定论	123-128

第一章：七古诗 言志

壮有所学，老有所为。烈士暮年，壮志犹存。

京都唯我最清闲，一年四季在林园。

伏天终日坐茂树，“三九”对日和衣眠。

动时飞身舞刀剑，静时引气沉丹田。

怒发冲冠千夫指，日月流光换新天。

耄耋老人离休干部张瑞月，2019 年作于北京

我知道的收藏我出版的《风雨人生录》的单位如下：

- 1、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
- 2、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献资料中心；
- 3、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资料中心。
- 4、南京大学图书馆；

任何出书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书能流传下去。我出书的目的是揭发毛泽东的罪行，批判毛泽东的罪行。当然也希望我的书，能在中国社会“改制”的伟大事业中，起一点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直到毛泽东的罪行，刻在中国的耻辱柱上，写在中国的教科书里。我的书才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烧掉了。

我认为：现在中国，出不了司马迁和史记。将来改制后，肯定会出现《现代司马迁》和《现代史记》。

有人问：若改不了制呢？请读者放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比任何核武器力量都大。苏联比中国的力量大得多、核武器数量多得多、质量好得多。不也改制了吗？台湾蒋介石和大陆毛泽东，都顽固的坚持绝对独裁专制制度，坚持一党专政。蒋介石死后，大太子蒋经国世袭了皇位，蒋经国说：“过去，我们国民党用暴力实行独裁！实行一党专政！现在，我要用暴力实行民主，实行多党制！”。台湾不也改制了吗？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绝对独裁专制国家。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进入到自由民主社会了。上世纪初，全世界只有 3 个民主国家（总统制国家）。一百年后的今天。180 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国家总统是公民选出来的，不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皇帝。暴力夺取政权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绝对独裁专制国家。这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如：主席、总书记、领袖、委员长什么的。他们统统都是大政治骗子，残害老百姓的刽子手。其目的是永远当不穿龙袍的皇帝！

我经过多年反思，在政治生活中，我上当受骗的过程，和中国老百姓上当受骗的过程大同小异：

我自幼生长在河北省农村，没有见过蒋介石军队，只见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我七岁就接受毛泽东的宣传教育，后来成了儿童团团员，站过岗，放过哨，查过路条。给日本鬼子修过铁路（注：德州至石家庄铁路，是日本鬼子强征中国民工建的，建铁路的目的是把中国的

物资和山西的煤运到日本去)，挖过“界县沟”。“挖界县沟”的目的是阻止毛泽东的游击队逃跑。给毛泽东的游击队挖过交通沟和地道洞，这两项工事都是为了游击队逃跑用的，不是为了打鬼子。电影上的地道战，是电影演员演的，不是毛泽东的游击队真打鬼子。是宣传，不是战地实录。因此，老百姓给敌对双方做了那么多工事，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敌对双方打过仗（注：毛泽东作了那么多歌颂战争的诗，都是歌颂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诗，没有一首是主动打日本人的诗，这就证明毛泽东只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老百姓哪里知道这是毛泽东给他的部队下的死命令，严禁他的部队和日本鬼子打仗（注：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林彪搞的平型关大捷，都是未经毛泽东许可打的。因此，毛批判了彭德怀一辈子，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时，被毛泽东批斗致死为止）。

待到日本鬼子被美国打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毛、日双方才开了枪。因为日本鬼子只向蒋介石部队投降，不向毛泽东部队投降（注：详见日本靖国神社记载：二战在中国战死名单）。蒋介石部队打死日本鬼子318883人，毛泽东部队打死日本鬼子851人，其中，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打死鬼子302人；林彪平型关大捷打死鬼子167人。这两次主动出击，打死日本鬼子共469人，占851人的55.11%。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动出击打鬼子。少数是毛泽东的游击队被鬼子包围，突围逃跑时，打死日本鬼子的，如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打死鬼子27人；40年春反扫荡，打死11人，115师，陆房突围打死鬼子16人等，共计165人，其他零星战斗217人，占44.89。总计851人。

那时，我在童年，为什么发生这些怪事？根本不懂。1946年，我16岁，去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根据地参加了革命。那时不叫参加工作，叫参加革命。革命当什么讲？根本不知道。不过，我在懵懂中认定当八路就是干革命。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也是从心里喊毛主席万岁的，谁说毛主席不好，我敢和他玩命。

毛泽东张口革命，闭口革命，把神圣的革命二字都庸俗化了。当八路的人，身上都有虱子，大官也有。毛泽东就给虱子另起个名字，叫“革命虫、光荣虫”。久而久之，我们这些文盲和半文盲们，也就不以身上有虱子为耻，反以为荣了。又如，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出来的大量鸦片，叫“革命鸦片”或“革命特货”。凡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一律定为干革命。谁还去追求“革命”的真谛呢？于是庸俗化进一步扩大：打内战，争皇帝宝座。打倒蒋介石，先破后立，改朝换代，把蒋介石这个残害老百姓的皇帝，换成毛泽东这个更加残害老百姓的皇帝，也叫革命。可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封建专制法西斯社会。甚至毛泽东时代比蒋介石时代，封建专制法西斯统制的力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把他想做的一切，统统叫革命。这就完全玷污了光荣、伟大、神圣的“革命”二字。尤其是换皇帝的内战，也算是革命战争，解放战争。这纯属是骗人的、忽悠人的鬼话！我年到半百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马克思高度赞扬过美国内战（即南北战争），说美国内战是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因为美国的内战，是改变美国社会制度的革命战争，不是换皇帝暴乱。

美国黑人原是美国白人的奴隶。因此，黑人的聪明才智、积极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为此，美国总统林肯要解放黑奴，主张白人、黑人平等。南方种植园主反对，打起了内战。结果北方胜，南方败。胜方也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把败方赶尽杀绝。胜方也没有当皇帝，败方也没有当奴隶。双方的文官武将都成了国家公民，社会地位、社会待遇完全一样。黑人由奴隶变成了国家主人，和白人一样，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才智和能量，促使美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改善，致使全民受益（注：不仅仅是胜利的一方人受益，而是全体美国人都受益。毛泽东打的内战和林肯打的内战不一样。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人，老了“离休”，没有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人，老了“退休”。一个离休干部的养老金，比一个退休干部的养老金高一倍。这不就是封建专制社会“胜者王侯败者贼”制度的延伸吗？）。美国是通过社会制度的革命战争（内战），给国家、给民族、给全民带来了极大好处。中国的内战是换皇帝暴乱。胜方对败方说：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我是皇帝，你是奴隶。通过换皇帝内战，加深了人民之间的不平等（注：毛时代，红五类和黑九类，社会待

遇能平等吗？毛绝对不允许这 14 种人平等）。这就给国家、给民族、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马克思严厉批判了太平天国和大清帝国争皇帝的内战，马克思说：“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的产物，也只能出现在中国。”毛泽东和蒋介石争皇帝的内战，也是停滞社会的产物，根本不能称为革命，只能称为换皇帝暴乱。毛大皇帝只是个不穿龙袍的土匪皇帝而已。但权力比穿龙袍的皇帝大万倍。达到了随意草菅人命，随意开动阶级斗争绞肉机，绞死几十万人、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注：毛时代，毛发动 56 次群众运动，冤杀 4700 万人。饿死 9600 万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最准确的数字。详见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著《全国大饥荒年代》）。毛随意强奸妇女、随意欺男霸女，把有夫之妇张玉凤抢到中南海一组，做了毛泽东的“压寨夫人”，并和毛生了儿子。随意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大臣。毛说刘少奇是叛徒，查无实据。毛说是，不是也是。毛泽东完全忘了他亲口说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刘少奇当了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说他是叛徒，把他杀了（注：毛死后，党给刘少奇平了反）。潘汉年和杨帆上书毛泽东，说江青是叛徒，查有实据。毛说不是，是也不是。还想让江青接他的班，当女皇。这还是一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吗？！像毛泽东这样的罪人，作共产党员不够格，只配做土匪、大当家的。必须把毛泽东永远开除党籍。结果毛死，江青入狱、自杀身亡，共产党为民除一祸害。

我 6 岁时，在本村上过一年左右的初小，又跟我村秀才爷爷读过几个月的私塾。我 7 岁时赶上“七七事变”，日本鬼子飞机炸了束鹿县城，村里的初小和私塾停办。我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后来在“儿童团”学习，那更是“瞎胡闹。”（注：村里没有小学校，没有教室。区政府就派来一个老师。这老师把农民的孩子登记在册，分几个组，每组 5、6 个孩子，老师指定一个组长。每天组长到老师宿舍上课，然后回组里传达，这叫小先生制。这几个孩子在一起，除了打架，就是摔跤，哪里知道这就是上学哩。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儿童团上课也是两天打鱼五天晒网。若听说鬼子出城扫荡了，老师早跑的无影无踪了。这种办学形式，根本就读不了书）。

待到日本被美国打的无条件投降后，毛、蒋争帝的暴乱，双方都准备就绪：真是弓上弦，刀出鞘，阵势都摆好了，我到太行山根据地参加了“革命”。领导考试我的文化水平。当时，我大概认识 2000 字左右，这还是我的强项。“小九九”只能背到六，七，就背不准了。那时，中国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领导让我用阿拉伯数码写出来，我不会写。

我的文化水平，说高一点，也就是半文盲。这样的文化水平，哪里知道“革命”当什么讲呢？大家都说革命好，我也跟着说革命好。其实大家都是“鹦鹉学舌”，“东施学颦”，滥竽充数而已。

但经过实践，实践出真知。全国解放后，读了一年初中补习班，考上了三年制的《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分配工作后，又学了 6 年半的业余“电视大学中文系”。电视大学，校长是吴晗，学者治学非常严谨。电视大学中文系用的教科书，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我听过名教授王力给我们讲的《古代汉语》课。那时，我学习非常刻苦。6 年半没有礼拜天，礼拜天去大礼堂上“面授课”。礼拜三、五在单位上“电视课”。

随着文化知识的提高，学到了一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对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的所谓革命事迹和他革命实践的社会效果。我总觉得毛泽东说与做总是相反，毛说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说的马克思主义正相反，对不上号。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觉悟到毛泽东是个大政治骗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真反马克思主义者！推而广之，毛泽东一生所言所行，完全可以用“假真”二字代表之。

古代帝王或大臣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叫“谥”，如诸葛亮谥“忠武”。根据毛泽东生前事迹，我认为给毛泽东谥“假真”最合适。说明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反马克思主义者；假共产党员，真非共产党员（注：详见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 1920 年 8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与下，由 8 位发起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8 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其中没有毛泽东。以后入党的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均有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手续。唯毛泽东没有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手续。为此，张戎夫妇查遍了莫斯科档案馆、共产国际档案馆

和英国等大国，各大图书馆，均查不到毛泽东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手续。所以，我认为毛是机会主义分子，是“牛绍司马的历史重演”，的确确毛是没有入党的假共产党员。);假主席，真皇帝;假为人民服务，真饿死9600万老百姓的罪魁;假抗日，真汉奸;假革命，真反革命;假土改，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假统一战线，真独立自主;假“共同抗日”，真联日灭蒋;假整风，真“杀不同政见者”;假百花齐放，真“毛花独放”;假百家争鸣，真毛家独鸣;假自由，真螺丝钉;假民主，真独裁;假选举，真任命;假宪法，真废纸;假平等，奴隶和奴隶平等是假平等，奴隶和奴隶主平等才是真平等，毛泽东时代有吗?;假共和，真阶级斗争绞肉机。毛泽东硬把国民分成红五类、黑五类。文革时期，又把黑五类扩大为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叛特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知识分子）。毛泽东把这14种人，极其惨无人道的扔到他自制的“阶级斗争绞肉机”中，让红五类残害黑九类。仅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死伤一亿二千万人，其中：死二千万人，批斗、伤害一亿人（叶剑英语）。全国有七个地方，红五类把黑九类全部杀死，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二十多天的婴儿，统统杀死。这就是毛泽东要求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假工会，真毛大皇帝的御用工会。假“开发南泥湾”，真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假红军飞渡泸定桥，真毛泽东伪造历史。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红军飞渡泸定桥和文革中的“516反革命组织”这回事。炎黄子孙专信假话，不信真话，毛泽东也不许说真话。林彪总结出一句话来：“谁说真话谁完蛋!”。中国当时十亿人，都说的是假话，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假抗美援朝，真侵略大韩民国。

古语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是对的。我从童年到离休，我也没有搞明白革命的“真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上说：“革”当“改变”讲，命当“命运”讲。改变人类命运的书是《八大宣言》，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革命的真谛——让人类全部上天堂。毛泽东所谓的革命，是让人类全部下地狱。毛是反《共产党宣言》的最大的反革命。

苏联十月革命，后又发展到第三国际。这些可以说都是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吧。但经过70年的实践，按毛泽东的说法，苏联“变修”了，所以解体了。十月革命的发起国俄罗斯政府宣布：“十月革命不是革命，是反革命”。这说明改变人类命运的十月革命，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十月革命”经过70年的实践，人类命运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了。打个比方说：人类的命运，在“十月革命”前，有近一半人，生活在九层地狱里。十月革命进行了七十年，这近一半人的命运不但没有提高一层地狱，反而下降到十八层地狱了。十月革命是假革命，是“越革越穷”的革命，是“越革越反动”的革命。这种革命能要吗?坚决不能要!苏联搞集体农庄，饿死几百万人。中国毛搞的人民公社，饿死9600万人。

苏联人民觉悟了，坚决要求“变修”、“解体”、走马恩老年大力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把在18层地狱里生活的人民，统统提高到天堂来。

人类的共同愿望是在公民社会里生活，不愿在臣民社会里生活。这是人类社会规律，势不可挡。无论大独裁者怎么狡猾!打什么样的旗号，如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主义的旗号。也不管独裁者怎么高唱革命万岁。最主要的是要看高唱革命万岁的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马克思、恩格斯脑子里没有一个想当皇帝的细胞。华盛顿、孙中山，坚决不当世袭皇帝，只当任期总统。这都是好人，跟着好人干革命就对了。毛泽东的全部细胞都是想当皇帝、家属当世袭皇帝的细胞。这是坏人，跟着坏人干“革命”就错了。就会“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形成恶性循环，残害老百姓。”

还有一个小国可以和中国比一比，按毛泽东的说法，苏联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搞“暴力社会主义的”，中国毛大皇帝更是搞“暴力社会主义的”。所以，二者一拍即合，大杀起人民来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搞“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声炮也没有响，就给瑞典共产党送来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就给人类社会造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欺骗、忽悠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暴力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共死两亿中国人，（其中饿死9600万人，

为争做皇帝，双方战死 5700 万人和冤杀黑九类 4700 万人)。

死两亿中国人的代价，才打出一个毛大皇帝来。这位毛大皇帝一生倒行逆施，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倒退到“奴隶社会”。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百分之百复辟了帝制，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者奴也）”。中国人民的命运，真正被打入了 18 层地狱。

再看看瑞典这个小国，瑞典没有听到苏联的一声炮响（注：十月革命是政变，根本就没有打炮，瑞典人无法听到。毛泽东听到了，这纯属造谣），而是在第二国际影响下，静悄悄地干“民主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清明和谐、人民生活富足。过得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冤杀的人，没有饿死的人，更没有人吃人的现象。全国找不到一个红五类的人，也找不到一个黑九类的人，更找不到一个被“毛制阶级斗争绞肉机”绞死的人。全民过得是天上人间的生活。

这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这个小国，真正建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国民都过上了幸福生活。据说：瑞典法律规定，总统出差，只报住三级宾馆的差旅费。如果总统，住的是五级宾馆，五级和三级的差价，总统自己掏腰包。

毛泽东一生，搞得是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人人为我，我为我。他对中国人民的唯一“贡献”：就是撂在中国大地上的两亿中国人的尸体！（包括夺取政权双方至少死 5000 万人）中国人民过的是“穷死、饿死、累死、斗死”的悲惨生活。

林彪元帅给毛泽东冠以不实的四个伟大称号（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都是无耻的吹捧。其实，真实的毛泽东，只有一个伟大，那就是伟大的杀人魔王。他为了当终身皇帝；家族当世袭皇帝，一生杀死、饿死至少两亿中国人！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皇帝杀死、饿死的人，加在一起，也没有伟大的杀人魔王毛泽东杀人多。

我带着这些问题，研究“革命”二字。常言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是愚者，最底层的老百姓。但我总觉得“革命”、“鸦片”、“刀子”这些词，在字典里它们没有优劣好坏之分。但是，只要一通过人使用它，用阴谋家的手段掌握了它的话语权，就有天壤之别了。好人用它做好事，全人类受益。坏人用它做坏事。全人类受害。

鸦片是毒品，又是药品。如果掌握在华佗、李时珍和各大名医手里，就能治病救人，起死回生，做好事。如果掌握在以杀人害人为天职的毛大皇帝手里，就会把他在延安生产的大量鸦片，运送到国统区毒死、害死人。中国人被毛大皇帝生产的鸦片，毒死、害死了多少人？谁能统计清楚？毛泽东只要对他当皇帝有利，毒死、害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

刀子也一样，掌握在外科医生手里，就能救死扶伤，做好事。掌握在土匪手里，只能杀人越货，干尽坏事。

革命更是如此，它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美国内战（又名南北战争），双方共死伤 115 万人。可是，在伟大的林肯总统领导下，不许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南方人赶尽杀绝。美国地分南北，人不分南北。只要是美国人，一律平等。黑人和白人平等，胜方的人和败方的人平等，总统和百姓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特权，都在法律之下，受法律管辖。总统违宪，照样拿下。一切的一切，法律说了算。至高至大的、法律上难以决断的国家大事，用全民公投解决，全民是老大。就算是美国华盛顿、英国女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建国理念和建政原则。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建国理念和建政原则，毛泽东能同意吗？同意了就不能当终身皇帝了，对毛泽东来说，不能当皇帝，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毛大皇帝是皇权主义者，党政军、一切法律，都在他之下。按一般常识说，宪法应在皇帝之上吧。不！独在中国，宪法在毛大皇帝之下。新中国建立第一部宪法时，毛对党政军高层讲话说：我从来不相信法律能治国，可是世界上有好多国家有宪法。国民党蒋介石也搞了宪法，有时还真当回事办。结果，还不是被我们打败了，跑到台湾去了。鉴于人家都有宪法，咱们也搞一个。至于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党说了算（注：毛泽东说的“党说了算”，这是骗人的鬼话。党，狗屁权力也没有，毛是阎王，党是小鬼，党必须听毛的。绕一个大弯子，还是毛说了算）。

“宪和限”其含义是一样的，都有限制的意思。不过“宪法”的宪，是宪制有权力的人，尤其是宪制皇帝权力的。宪制皇帝不能滥用国家权力、草菅人命、做伤天害理的坏事。毛泽东是极权主义者，他决不能执行宪法、干“作茧自缚的事！”

所以，毛泽东又说：“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都归党管”。党归谁管？不言而喻，几千万共产党员都是毛泽东的奴隶、机器人。都要按照毛大皇帝编制的程序说话、办事。否则，轻则劳改，重则枪毙。毛泽东的宪法是“聋子耳朵”，骗人的摆设。

总而言之，毛泽东一生，在公共场合没有说过一句真话，统统都是骗人的假话。他为了当皇帝这个总目的，根本就失去了人性，没有做人的资格，没有做人的底线，更没有道德底线。只要能当上皇帝，杀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简直是为当皇帝走火入魔了，杀人是他的天职。他在位 27 年，共杀死、饿死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平均每天杀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人。这个数字，绝对准确无误。哪个共产党员愿意饿死老百姓、饿死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呢？没有。只有毛大皇帝一个人，亲自写了坚决制止“瞒产私分”的指示。毛泽东说：“就是强迫命令，也要完成征购粮食的任务！”。

结果，把老百姓的口粮都征购了，卖了 71 亿美元，放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高兴的说：“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可是，毛泽东这一“其乐无穷”，就饿死了 9600 万老百姓。其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家属，谁能统计清楚。我一直认为：几千万共产党员都是毛泽东的奴隶，不但无罪，而且万岁！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穷人究竟有什么贡献？我想，只有毛泽东撂在中国大陆上的两亿人的尸体，是他对中国人民的唯一“贡献”。这些尸体，包括夺取政权时死的人。

夺取政权死了多少人？我没有准确数字，只能根据国家副主席、国家副总理王震说的数字推算出来。上世纪“六四”闹学潮时，中央通知王震开会。在会上，王震听说学生要闹事、要夺权。火冒三丈，大吼道：“我们的政权是 2800 万人头换来的！这小兔崽子们要夺权，把手枪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摔道：咱们就这上头见！”。

这说明夺取政权，毛方牺牲了 2800 万人。可是，毛是胜方，蒋是败方。按常理说，败方应当比胜方多死一点人。姑且算作 2900 万人吧。那就是夺取政权，双方共死 5700 万中国人。

把蒋介石这个害国害民的皇帝，换成了毛泽东这个更加害国害民的皇帝了，这一换皇帝，就死了两亿中国人。

然而，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性质一点也没有变好，反而变的更坏了。被冤杀、被饿死、人吃人的现象更多了。这也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最大悲哀。

二战中，日本鬼子杀中国人 2000 万（江泽民语）。中国皇帝宝座上，由蒋介石换成了毛泽东，就杀了两亿中国人，是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 10 倍。

毛泽东一生杀的人。待中国改制后，中国人口专家和学者，一定要对死在毛泽东屠刀下的两亿人进行考证。但我坚信，考证结果，只会比两亿人多，不会比两亿人少。

自由民主的美国和独裁专制的中国，都有“开国”元首。美国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胜利了，战功赫赫的将军们，全都拥护他当世袭国王。华盛顿坚决反对。他说：我只当任期总统，总统任期 4 年。下一届选举总统时，你们认为我这 4 年工作的不错，你们还可以选我连任一次总统。再下一次选总统时，我就没有参选资格了，必须回家为民，这是宪法规定的（回家为民，在民主国家是真的。“垂帘听政”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在民主国家行不通）。将军们一听勃然大怒，吼道：“你不当世袭国王，我们当世袭将军！”。华盛顿说：“你们也不能当世袭将军。如果美国军事将领，都是世袭将军了，就不能打仗了，美国必亡！”。

美国开国总统是好样的，中国的开国总统也不含糊。那就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上任后视察工作时，有个马屁精，高呼：孙大总统万岁！万万岁！孙中山对喊他万岁的人说：我是打倒万岁的人，你喊我万岁，是不是也想打倒我呀？你想打倒我，你也得让我明白一下，我犯了什么罪？喊万岁的人，低下头，无以为答。孙中山说：看你是初犯，今后改了就行了。如果今后你还喊我万岁，我就要起诉你！此后，再没有人敢喊孙大总统万岁了。

孙大总统还有一个故事让人敬佩。他说：中国就好比一个大客车，坐满了乘客。我这个临时大总统，就是这辆大客车的司机。如果乘客中许多人说我开车技术不好、不稳、有时还走错路。乘客中有开车技术比我好的，乘客们推荐他开车。那我们俩就换换位置，他当司机，我当乘客。所以，有人誉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

毛泽东也是开国皇帝，他登基后，在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就亲笔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像毛泽东只有低级趣味的坏人，当上皇帝后，谁敢不喊他万岁！不喊者，必打他一个反革命，处以极刑！

打反革命比打地主容易，打他一个地主，他起码得有半亩地、一间房子。如果他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是个穷光蛋，硬打他一个地主，就显得太霸道了，太说不过去了。

反革命无边无沿，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这里没有霸道不霸道的问题。无论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压迫者，被压迫者，剥削者，被剥削者，忠臣，奸臣，有功的，无功的，天天用力喊毛主席万岁的和喊毛主席万岁不那么卖力气的人。只要把毛泽东亲手制作的“反革命”魔术帽，给他戴上，没有一个不合适的。

你看毛泽东这个大恶人大坏蛋，掌握了革命的话语权，杀了多少“反革命”。还钦定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老百姓都有了经验，不认你是什么牌子的革命家，只认你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孙中山一生干好事，流芳千古。毛泽东一生干坏事，对不起，遗臭万年。

现在，难以令人理解、难以令人接受的是：毛泽东死了 40 多年了，毛泽东残害老百姓的罪行，还一直捂着，不让人知道，绝对保密。继续欺骗群众，忽悠人民。还强制老百姓信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逆天道而行，逆天道就是逆人心，这是犯罪！为什么不实事求是的告诉老百姓：“196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

1、全国共有人口是 7 亿 3 千万人。

2、非正常死亡人口是 9600 万人。这就是说，饿死的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13.15%。饿死这么多人，百分之百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都是骗人的鬼话。气象专家说：三年困难时期，气象正常，不能列为灾荒年。（注：中国这么大，年年都有闹天灾的地方，但绝大部分是正常年景，甚至是丰收年。）毛说的人祸，是说农村革命不彻底，国民党特务钻进了农村党组织搞的破坏。这是毛泽东把饿死人的罪责，强加给“老天爷”和农村党组织。我认为，任何人（包括四人帮）对饿死这么多人，都没有责任。因为毛泽东是绝对独裁专制分子、一个人说了算的极权主义者。大臣们提了不少饿不死人或少饿死人的好建议，毛大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把刘少奇、彭德怀处死。把邓子恢投入监狱，毛死后才平反。毛泽东的罪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亘古罪人。可是中国掌权者还把毛奉为图腾。误导老百姓说：毛泽东是红太阳、大救星。

所以，天安门上挂的毛主席头像，一时是摘不下来的。不要说老百姓反对吊死人像，还有不少大人物，如组织部长陆定一，国防部长刘华清，也反对吊死人像，全无效。这说明中央毛粉势力浩大，还是柯庆施这类人掌权。柯庆施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盲目程度；我们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毛主席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把柯庆施的官职和权力，由上海市委书记提高到大区书记。

中华民族腐朽了，堕落了，跟不上时代了，更跟不上俄罗斯民族了。俄罗斯民族，上当受骗快，觉悟的也快。列宁和斯大林给俄罗斯民族带上的手铐脚镣，70 年就砸烂了，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只能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没有饿死的人了。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仍被历史罪人毛泽东统治着，不见改善多少。在政治层面上，中国人民的命运，仍然是：炎黄子孙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第二章：生命大劫难

大跃进大饥荒六十年祭 作者王长才

目录

- 一 “超英赶美”是为了赶超苏联
- 二 鞭子驱使的苦役和蛮干
- 三 千奇百怪的发疯折腾
- 四 “反瞒产”逼出大饿毙
- 五 酷刑打压，索命罗网
- 六 厚赠外邦，饿死家奴
- 七 天府饥魂逾千万
- 八 空前绝后“人相食”
- 九 人居、生态全遭殃
- 十 旷世大难的演变和反思

没有异常天灾，没有瘟疫流行，没有战争，没有内乱，完全由极权暴政的人祸造成了超过以前 2000 多年，饿死的总人数、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亡总人口的超大规模饿毙——打死、逼死、饿死几千万人，并出现了惨绝人寰、大范围的人相食……然而事后总是极力回避、掩盖这一生命大灭绝悲剧，更不待说追查责任、总结教训，匡扶正义、慰藉亡灵，从而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发生、善恶是非的混乱和人伦道德的失落，并且始终无法真正走出混沌、迷茫、愚昧、落后。不忘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也是为了彰显人性良知和天理公义。在大跃进-大饥荒这一旷世大难发生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秉笔直书、揭示真相，是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是为了现代中国的健康发展和民主进步，并藉此祭奠那只剩下了一个冷冰冰概数的魂无所归的冤魂们！

一、“超英赶美”是为了赶超苏联 1957 年 11 月苏俄十月革命 40 周年，全世界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 60 多个共产党、工人党领袖隆重聚会于莫斯科。中共领袖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也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一次国际活动：唯一安排住进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帝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鞍前马后为其效劳；各国共党工党领袖走马灯似的前往毛下榻处朝拜；赫鲁晓夫的讲话稿，没有毛的同意绝不能发，没有毛点头的文章绝不敢发；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表面上这个会是在苏联召开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领袖，实际上背后的导演是毛泽东，赫鲁晓夫只是个跟班的。

聚会期间，赫鲁晓夫请毛泽东看芭蕾舞，刚看一半，毛突然站起来说：“演的什么呀？为什么他们总是垫着脚尖蹦蹦跳跳，我实在受不了！”其实毛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也曾请他看芭蕾舞，毛不仅耐心看完，还向女主角献了花。在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兴高采烈谈起当年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情景，毛泽东擦了一下嘴巴，把餐巾一扔，不耐烦地奚落道：“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吃完了，你那西南战线的故事还有完没完呀？”

毛的大会讲话如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目空一切，语惊四座，令各国党首侧目仰视，似乎高深莫测却摸不着头脑。毛豪言要不断革命，表达了对苏共 20 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外交方针的不满；他说巴不得再打世界大战，如打核战争，世界死一半人中国死三亿人最好，吓得所有人大惊失色，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会后拿着咖啡杯直哆嗦，说中国有六亿人我们才二千万啊。期间毛还直接对赫鲁晓夫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在中国展开，待我们将美军引入纵深后，请苏联向我们投原子弹，一举全歼美军主力。可能因此死亡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换来一个世界大同还是值得的。”

那时候东欧各国有什么争论不下的问题常常就一句话，我们再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结果东欧国家认为毛的主张太激进太冒险太恐怖，怕被毛绑上与西方对抗的战车而不想再跟着中国走，因为他们跟苏联一样不愿打仗，也不愿没完没了地“革命”。

1957 年，中国“反右派”大获全胜六亿国人彻底臣服，苏联也于当年在世界上率先发射人造

卫星，社会主义阵营似乎占了优势，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共产世界威望不足、资历不足，处理东欧、波匈事件手段不力，他认为自己的资历、能力、智慧、威望和处理世界问题的水平都比赫鲁晓夫强，只有自己才能担当世界共产领袖的大任。但当赫鲁晓夫两次主动提出由中国共产党当全世界共产党的领导党，由毛泽东担任共产世界的领袖时，毛口头推辞不受，宣称仍然要“以苏联为首”，但却在斯大林问题、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过渡还是战争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并一再羞辱、欺负、打压赫氏，甚至不顾及基本的外交礼节，一再将赫氏狠踩脚下。一次赫鲁晓夫到访北京，毛组织林彪、彭真等党国大员围攻赫氏，其中陈毅指着鼻子骂得最厉害，赫鲁晓夫愤怒回应：“我知道你是元帅，但我是总书记，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毛泽东坐在一旁看笑话并冷言相讥：“赫鲁晓夫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

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后，突然单方面公布赫氏到访消息并下令炮击金门，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认为是赫鲁晓夫同毛商量后故意制造紧张局势，试图挑起战争。一心想同美国缓和冷战冲突、害怕引发战争的赫鲁晓夫极其恼火却有口难辩。同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一友好国家不难合作且对两国都有利的要求，毛却小题大作、故意发难，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扬言伤害了中国主权和他的自尊心，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作解释，毛却穿着睡衣在游泳池会见赫氏，要求赫到泳池中边游边谈，不会游泳的赫氏在游泳池边手忙脚乱围着游水的毛XX转……赫鲁晓夫被如此戏弄，终于意识到再次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

1959年，美国送给台湾几枚响尾蛇导弹，台湾在温州上空成功试用，却有一枚未爆炸，苏联当时正在研究空对空导弹，一些关键技术尚未过关，遂请中国将那枚未炸的响尾蛇导弹送给苏方，中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不给，引发苏方强烈不满：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全是苏联援助的还在帮你发展核武器，现在我们要一个哑弹却不给况且还是别国的。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下令停止向中国提供钱学森等正在进行的导弹研究技术，毛泽东方才同意将这枚响尾蛇哑弹给了苏联。苏方专家收到后开箱一看傻眼了，导弹被拆得乱七八糟已无法还原，苏联最想要的红外制导系统的传感器却不知所踪……

中苏关系从亲密盟友到最大仇家，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语“一升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当年毛泽东像奴仆一样乞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时常一毛不拔还没好脸色，毛却视斯大林为“伟大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赫鲁晓夫继任后主动放弃中苏条约中有损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归还了旅顺基地，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工业和技术援助；斯大林援助的丁点军火几乎全是过时的二战武器，赫鲁晓夫却提供苏军现役装备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跨入了现代化；赫鲁晓夫还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与中国签订了制造核潜艇和原子弹的援助协议，并从1956年就已开始实施。可毛却居高临下傲视群雄，一再向苏联要军工技术、工业装备还老是狠踩赫鲁晓夫，两个共党巨头歧见日深中苏关系也不断降温。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不但是社会主义阵营要压倒西方世界，而且是中国党要压倒苏联党，好名正言顺当共产世界领袖。还在莫斯科聚会期间，毛就在大庭广众下随意评论苏联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起立表达强烈不满，旁观者也感到吃惊，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当场给本国代表团传了一张纸条：“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当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然而，中国虽然是政治大国、人口大国还成了敢于与美国叫板的军事大国，但中国经济极度落后，却成了毛的最大心病，因为当世界领袖可得要付出代价要花钱的啊。所以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提出苏联要用十年时间赶上美国时，毛泽东立即提出，中国可用十年时间超过英国。毛“十年超过英国”的豪言当晚即电传到北京，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辉煌亮相，以后又演变成为“十五年超英赶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开始了鼓吹及发动大跃进。

毛泽东搞大跃进“超英赶美”是假，其真实目的是赶超苏联、压倒赫鲁晓夫。毛宣称“中国

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他时常要官员们将大跃进的经济指标与苏联对比，看相当于苏联哪个年代的水平，比苏联还有多大的差距，中国的钢产量距离赶上苏联还要几年，以便在经济上尽快赶上苏联，理直气壮压倒赫鲁晓夫，当上真有资格的共产世界领袖。薄一波还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传达了毛的异想天开：“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在毛泽东大跃进臆症的狂想中，美国似乎真成了一扎就破的纸老虎，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要变成四个美国，还相当于苏联老大哥的两倍！

但苏联方面进行认真调研分析后，认为中国搞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且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向共产主义过渡还为时尚早，也不应该搞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为了不得罪毛和中国党，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官方一律不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态。

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残酷大清洗，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和不满，人民日报连发两篇重磅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点名批评苏共20大的做法，

苏方不但未予反驳，还主动在国内发行了20万册、100万册予以宣传，给足了中国面子。但当毛沾沾自喜于大跃进狂飙突起许多国家莫名惊诧议论纷纷时，苏联所有的报纸和官方文件全都保持沉默，包括电贺中国国庆，也只字不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令毛泽东深感失望。1959年7月，中国大跃进搞了一年多后，鉴于其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思想混乱，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遭记者逼问时，不得不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具备时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苏联1920年代集体化时也搞过公社，有过失败的教训。正在庐山会议上狠斗彭德怀的毛泽东，看到外交部送来的情报后极度震怒，他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他为共产世界开辟的发展新路和创造的最佳组织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但没等来苏联的支持还要说三道四、大泼冷水。毛怒称要向赫鲁晓夫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行为宣战。他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上批示“是不是苏联失败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失败？”并下令印发全体与会人员，同时要求手下查找马恩列斯的论述以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正确的，并责令人民日报刊发赫鲁晓夫讲话予以批驳（不知何故未刊发）……进而成为了毛坚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搞到底，并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反目成仇及至大举“反修”的主要原因。以至后来赫鲁晓夫做出撕合同、撤专家的激烈反应引发举国震惊、纷纷谴责时，只有毛泽东默不作声，未置一词，因为他最清楚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

毛泽东1958年向中共高层打招呼，大跃进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事实很快证明，大跃进的荒唐足以令全人类耻笑一万年，大跃进的残忍、野蛮和血腥令人毛骨悚然，短短几年打死、逼死、饿死的中国人超过了以前2000多年饿死人口的总和，几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于战争的总人口。人们不禁要问：如此荒谬绝伦、惨绝人寰的一场几亿人参加的运动，为什么没有受到抵制？何以能在中国顺利实施？

毛发动大跃进的冲动由来已久，为了排除阻力，早就开始了降服异己，迫使党国大员臣服。土改刚结束便以合作化名义开始收缴农民土地，接着以敲打刘少奇、批判高岗等大员推行极左的农村政策。1955年，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共元老邓子恢委婉劝说，搞合作化不可太激进，被毛痛骂为“小脚女人”而靠边站。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针对不断“反右倾保守”逼出来的高指标造成的全面紧张，提出“反冒进”、削减投资的稳健发展主张，正在不断反“右”的毛泽东，立即针锋相对地“反‘反冒进’”，开始痛批刘、周、陈的“反冒进”，并在短短几月内实施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1958年初，毛在“反右派”大获全胜后，接连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以一己之力擅自推翻中共八大决议，并把刘、周、陈经济上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指斥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了”，一再当众羞辱周，迫使周一次次作检讨，还明令要周自己写不准秘书代笔；接着又令周在八大二次会议（全国党代会）上面对1360名代表当众检讨，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

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周恩来被整得痛苦不堪，几近崩溃，从此彻底臣服于毛，以后一直冲锋在为毛当差的最前列。毛对周的整肃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相当于自己打自己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 1956 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毛泽东组织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陈云和李先念也就“反冒进”反复作了检讨，陈云不久即称病退隐江湖。毛同时激烈指责刘、周手下管经济的人，搞得许多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一机部部长黄敬，在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受不了毛的压力突发精神病，语无伦次大叫“饶命”，不久就死在医院，人称“被毛吓死了”，年仅 46 岁。毛的“大跃进”主张得以顺利实施，全国很快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热潮。

而从全国范围和社会背景看，那场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大饥荒之所以会由荒唐的人祸而起，则完全是在极权暴政的重压下一步步酿成的——通过建政初期土改、镇反等大举“杀人立威”的强烈震慑和社会恐怖，已没有人敢对毛的“指鹿为马”表示异议而甘当顺民了；通过大批判、三五反、肃反、反胡风、三大改造等接连不断整人害人、思想改造、人身控制和谎言洗脑，人们已不得不承认“鹿”就是“马”的专制逻辑，而甘愿跪地为奴、三呼万岁了；通过以“阳谋”、“引蛇出洞”再行反右派，把说真话的人一网打尽，全民“封口”，从此绝对没人再敢对毛泽东带领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从而把所有中国人“逼良为娼”，全都改造成，只能吹牛撒谎、互相残害的奴才和暴民。“大跃进”，在种种集中营式的管控、农奴式驱使、强迫服苦役和强制共产、举国浮夸、人身打压的滥施淫威中。才能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高产卫星、公共食堂和各种“发明创造”等，痴人说梦的疯狂蛮干。一场场企图把“鹿”变成“马”的全国瞎折腾——“大跃进”，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鞭子驱使的苦役和蛮干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央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有了几亿国人不能不当奴隶的盲从，1958 年，“大跃进”的战火迅速燃起。当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一夜间建成工业化的超级大国，所需资金和物资来源则是广大农村和农民；大跃进的核心内容是多产粮食，以便征购更多的粮食换取更多工业设备、技术，迅速实现工业化。随着全国发疯似地广建工厂、大上工业项目，为了多产粮多征购以满足工业建设大干快上的物资和资金需求，全国由上而下不断鼓吹“放卫星”，粮食产量层层拔高，并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全民大办”。全民诗歌运动、壁画运动、大表决心、互相挑战等各种造势，则把大跃进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江苏邳县一下冒出 15000 个“美术骨干”，一个月完成壁画 183000 幅；官湖镇 70 个整天下地劳动的人，一夜间就画了壁画 500 幅。河南南阳县 168000 多人投入这一运动，五天内写出诗歌、文章 550 多万篇。不少地方“歌成海洋诗成山，跃进歌声飞满天；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

大跃进狂飙突起，权力鞭子的驱使、整人政治的恐怖加上乌托邦天堂的诱惑，冲毁了一切理智和良知的堤坝，干部们一夜间似乎全都变成了疯子、骗子、暴徒，变成了用鞭子驱赶奴隶的流氓、恶棍、打手，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风靡全国——共产风几乎吹掉了所有农民的私人物品，包括大肆拆毁农民住房，砸掉灶台炊具只能在公共食堂喝大锅清汤；浮夸风如高产卫星、虚报成绩、“发明创造”等形形色色的吹牛撒谎造成暴力高征购等可怕的后果；强迫命令风使得各级干部可以任意惩罚甚至活活打死人，以强制农民无休止的苦力劳动；瞎指挥风，造成劳民伤财、败光家业的蛮干及生态环境破坏；干部特殊化风使各级干部能够随意残害农民及享受生活的特权……“五风”交织在一起，相互作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犹如世界末日来临。

大跃进留给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把各地农村搞成了一个一个强迫下苦力的奴隶劳动营。陈伯达把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概括为“一天等于二十年”，得到了毛的赞同，成为大跃进中与“超英

赶美”媲美的口号。为了完成人力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任务，以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指标，注定了以原始工具为主的中国农民首先要吃尽拼命劳动的苦头，甚至要付出活活累死的代价。

为了更加方便地驱使农民服苦役，各地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组织形式。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消灭家庭，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主张，各地闻风而动，“消灭家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形成风潮。许多地方拆散家庭，按男劳力、女劳力、老人和孩子重新组合，分别住在不同连队，分配不同的劳动定额和食堂定量，不到规定时间不能见面。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许多民房被强制拆毁，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四川日报记者石韞玉撰文感1958年：“这一年，四川农村像是一个大战场，每个农业社又像一个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人民公社成立后，这个大战场更是厮杀得日月无光，所有的农村劳动力几乎成了不眠不休的永动机，人民公社成了强迫劳动的集中营，老百姓被驱赶着没日没夜、没有轻重的苦力劳动。有的地方甚至在每个人身上缝个数字编号代替这个人，硬是把人当成牲口一样驱使。我当年还是上初小的城市学生娃，也亲身参加过“挑灯夜战”服苦役。

“大办工业”、“大办水利”抽走了精壮劳动力，中国农村人口密度最高的四川温江地区（现成都市区县）劳动力突然紧缺。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10多岁的小孩到70岁的老人全都被编入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征战东南西北，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驱使劳动的方法是没有人性甚至兽性不如的打压。一夜间，中国社会猛然跌落进变相囚禁、强迫劳动的野蛮时代。四川荣经县年轻妇女周国勋因子宫脱垂无法出工，被生产队长丁永全用锄把从阴道活活捅死。垫江县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出工致其死亡。长宁县农村私设监狱强迫劳动，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大队）劳改队11岁女孩陈玉秀连续干活五天五夜，口鼻流血活活累死。河南商城县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党支书手持木棍强迫王天福、蔡振礼等7人在冰田里拉犁，结果当场致死3人。重庆江北县冯银山家有人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一家7口人全部死绝。

大跃进中各种“大办”在全国刮起一阵阵飓风：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粮食，大办养猪场，大办商品生产基地，大办集体新村……“大办”的资金和物资都是无偿没收农民财产甚至强拆农民住房得到的。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晚上站在山头上督战，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得最好。

【“”】“这”种“大兵团作战和强制劳动，不仅造成窝工浪费、劳民伤财，还使得各级干部的瞎指挥、强迫命令、欺压群众造成的打人、体罚达到了极致。大跃进中河南邓县裴营公社共打死逼死累死社员2535人、开会斗争2840人、体罚劳改1842人，房屋损毁11000多间。四川合川县南坪公社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打死、活埋42人；打残、打伤62人；患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392人。河南虞城县李庄、吕楼两村80%的群众挨过副队长代明扬的打，代明扬并一次毒打斗争17人。湖南澧县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干部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当面通知女方父母，如不答应就要遭受做重工、服苦役、扣饭，等处罚。

为了最大限度虐待苦力，河南永城县要求所有人大冬天都得脱光上衣劳动，一个叫窦兴智的农民脱衣慢了被打断脊梁骨。湖南平江县东方红公社东安大队要求干活时“男人要打（赤膊），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年轻媳妇和姑娘们不肯脱光上衣打赤膊，就立即被戴上破坏分子帽子，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强行把她们的上衣扒光。此“经验”推广到公社，立即开展了“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和打赤膊“拔白旗，插红旗”评比活动，有的队干部手持棍棒和绳索，围着打赤膊的妇女们督战。有几个姑娘媳妇，羞急，大呼“救命”，包

括其家人没有一人敢挺身救助。平江县石塔公社三和大队，李月莲来月经，请假不出工，竟被要求脱裤子检查，队长李玉良强行把手伸进姑娘裤子里摸。三和大队的“摸一把”成为先进经验在干部中间传播，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等纷纷效尤，有的摸起来就没完。三阳公社石坪大队，洪笑英在水库工地，来例假经血流到了脚背上，找大队总支委员唐绪普请假，唐不但不准假还狠狠抽了她两耳光。

下放改造的右派分子们更是被迫昼夜干苦力。云南红河州劳教农场经常将右派等赶出去连续一个“苦战八天八夜”又一个“苦战八天八夜”，当劳教人员用雨点般的汗水培育出各种农作物时，当局又命令将这些禾苗通通铲掉，改种产量高的红薯，以确保卫星上天。于是又强迫劳教人员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又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去铲除上千亩禾苗，重新翻整土地。如此折腾了大半年，“高产卫星”没看到却整死累死了多少人。接着又奉命开采铁矿，再放“钢铁卫星”，没有任何安全防范，坑采右派非死即伤。炼钢铁，没有炉子，就到处去刨人家的祖坟，不管是现代的古代的，见坟就刨，取出砖来，造土炉子；没有燃料就去乱砍滥伐森林，把一片片茂密森林通通送入炉子烧为灰烬，使一座座青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坡。

1958年与人民公社同时兴起的，首先是共产风和公共食堂。河北徐水县一马当先，率先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先后到这里视察，高度赞扬并向全国宣传，中央也派人到这里试点，全国32万多人到徐水参观，共产风在各地猛刮起来，很快出现了一批赶超徐水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做出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莒南县提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11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包括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湖北当阳县跑马乡的公社书记1958年11月7日当众宣布：今天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明天进入共产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也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造成大量民房毁灭和牲畜死亡。集中后往往几家同室，异常拥挤，如同囚犯监牢。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子盖一条被，孩子把被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共产风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大量住房被强制拆毁，私人物品收缴一空，生产队的东西也被任意“一平二调”。四川仁寿县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在出工之前集合，强令所有社员交出家里的钥匙，社员下地后，干部们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等统统搜走。与此同时，生产工具大量丢失，生产力大受影响。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件，到1961年仅剩515件，丢失率达82%。该区四生产队原有晒席110床，丢失了93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晒席不够，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0000多斤。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架，丢失96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亩、地60亩，减少粮食产量30000多斤。

强迫大办公共食堂，更是消灭家庭、掠夺农民的过程。农民粮食被收缴一空，灶台被拆被砸，铁锅投进土高炉，私藏粮食者受到捆绑吊打等严厉处罚。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吃，使干部拥有了一个致命的权力——可以任意“扣饭”，剥夺社员的吃饭权、生存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重庆江北县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干部扣饭，两个月，活活饿死；社员蓝权患病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不久就饿死在挖野菜的山坡上。荣经县不少社队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日夜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便冲上门去没收食物，砸锅砸灶，甚至对户主进行捆、绑、吊、打、罚跪等折磨。

新华社老记者李锦回忆，其家乡江苏射阳县兴桥大队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全部收到食堂，又把所有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不准自己做饭。公共食堂建立一个多月，饭里就看不到米了，接着吃用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淀粉圆子，后来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到1959年初便开始饿死人了。

当年我在原籍四川西充县城，由于城镇人口有国家定量供应，总体感觉比农村好得多，一般不致山穷水尽饿死人，但干部的多吃多占却使普通居民能吃到口的大打折扣，并亲眼看到城关镇及地、县等上面干部或什么“检查团”“观摩团”时常来到街道食堂大吃大喝、白吃白拿，普通居民却只能喝大锅清汤还不敢说什么。食堂炊事员亦因之成为干部的帮凶和既得利益者，饭瓢也是长了眼的，吃亏的自然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莫言描述农场炊事员张麻子大饥荒中利用掌握饭瓢的权力，以食物为钓饵，几乎把全场女右派诱奸了一遍。河南一位十五六岁女生享有每月 23 斤供应粮，为省下点粮食救济农村的家人，她每天只吃二三两。极度的饥饿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走路打晃，难以正常上课，被退学回家，23 斤供应粮没有了，回家不久就活活饿死。

大跃进还未开始，全国就按毛泽东的号召搞起了“大办水利”。“大办水利”肇始于 1957 年 10 月。1958 年开始，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那时全国总人口 65994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55303 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 2.65 亿人。一亿农民搞水利，相当于每 2.65 劳动力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更多。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陷在水利工地上。到 1958 年 4 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水利的劳动日达 130 多亿个，完成土石方 250 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石方铺成 1 米厚、66 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时我还上初小，同城镇大人们一起时常被派各种“义务劳动”，下乡“大办水利”是干得最多的活，大多是挥舞锄头、铁锤、钢钎，建“蓄水池”。山坡地薄薄的土层下面全是岩石，全凭下苦力拼消耗，一点点打碎了挖出来……后来发现那些千辛万苦建成的蓄水池及沟渠，由于胡乱选址及缺乏配套等原因，几乎全都成了无用的废石坑还损坏了自然生态。

全国四年“大办水利”移动的土石方，相当于建造 950 条苏伊士运河。主力军自然是农民，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扁担、箩筐，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也得自己出，经常在露天搭起棚帐安营扎寨，长年累月变相劳改在工地。肚子空空的农民们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摧残，打死饿死累死等各种死人司空见惯，毛泽东也时常把劳动量同死人多少挂钩。1958 年 4 月，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两省第一书记）：“吴芝圃讲搞 300 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 200 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被打成了右派反党集团。1958 年 6、7 月，上海奉贤县在“大办水利”中，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该县在水利工地有 4 人被活活打死，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 95 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 131 人，生病不准就医而致死的 205 人，不准父母回家照看致使生病儿童死亡的 411 人，其他因严重强迫命令造成死亡的 114 人。另有被各公社私自劳改的农民 4000 多人，还举办了变相劳教的“儿童集训班”，受“集训”处罚的儿童最小仅 6 岁。

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致全国进入饿毙高潮后，在各水利工地上变相劳改的农民基本上是饿着肚子服苦役。中央调查组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1960 年 12 月在河南省的讲话中披露，仅固始县三个水利工地上就累死打死饿死了 17000 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极多。固始县七一公社上元大队 200 多精壮劳动力上水利工地，结果死了 160 人，有一家父子兄弟 6 人都去了，全部死光。

付出如此巨大牺牲，搞的“大办水利”，并未收到应有的效益。大跃进初期上马的 500 多座一亿立方以上大型水库，一年多即减少到 200 座，建成的也大多成了隐患工程，不少水库后来相继垮塌。除了公社化、大办水利和放高产卫星，1958 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安排的战斗任务还多着呢：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制定更大的增产丰收计划，掀起更大的生产高潮；要把土地全部深耕一遍，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要突击积肥、造肥，分层施肥；要继续除“四

害”，创造出更多的四无乡、四无县、四无省……

样样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样样都必须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幻想和热情，强大的政治压力、暴力逼迫扫除了障碍，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每个人都大跃进的鞭子驱赶得团团转。

创造人间奇迹的方法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战斗，是不分白天黑夜、通宵达旦强迫下苦力。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仅修建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成灌铁路，温江地区就调集了 10 万民工。一批批男劳力离开了田土，妇女、儿童、太婆、大爷以及残废人、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被赶起来，一路上娃儿哭，女人叫，在冬季的凄风苦雨中“奔赴战场”。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地方工业，后来又炼焦炼钢铁，劳力十分缺乏，所有妇女、老幼被驱使到生产一线，庄稼勉强种了也收不回来，更没法干家务照顾家庭。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生产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成了家常便饭。四川温江县农民龚明通出工慢了被党支部书记罚扣饭 15 天，龚挖了些红苕充饥被打成重伤逼死。大明管区党支部书记强令病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有根走得慢了些，就以“磨洋工”罪名暴力折磨，致肖有根上吊自杀，肖父活活气死，肖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周玉明得了肿病，管区主任仍强迫其出工，周昏倒在地，被指抗拒劳动，遭毒打后致死。荣昌县，李洪英，患了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不要派李下田，结果被干部打耳光，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几天，即命丧黄泉。广东南雄县始兴公社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

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七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180 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拼命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 60 斤，最后的收成还没有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他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四队共有田 129 亩、地 172 亩，1959 年小麦只种了 40 多亩，而且是在农历 11 月种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 1958 年减少了 63%。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把这个队的人调到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致使大片土地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荒芜土地 5400 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 1000 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 4000 多亩。上海奉贤县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 78891 亩统统翻掉。四川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一些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整齐好看”要求，命令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粒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43 亩，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地，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插秧则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整齐划一要求的一律返工。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 11000 斤。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结果霜降过后气温骤降，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量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错过了水稻直播季节。170 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 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仅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 40000 多斤。

毛泽东说：美国无非是钢，多一点，外加几百颗氢弹，他认为钢产量上去了经济就上去了，于是提出“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在 1958 年 6 月底突然提出当年钢铁产量 1070 万吨，要比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

正规钢铁厂日夜加班连轴转，还是远不能完成指标。到 1958 年 8 月底，眼看时间过了一大半，离 1070 万吨还远着呢，于是发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被“强制性”（毛语）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 9000 万，全国农村、城市包括机关、校园甚至中南海里，到处都建起了小高炉。

四川省一夜之间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上千万炼铁炼钢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成都周遭的温江地区缺煤缺铁矿，全区抽调 50 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向西部山区进发。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

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

炼钢需要废铁，便逼着人们把家里的金属制品交出来，“有铁交铁，没铁交头”，从文物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铁锁，做饭的铁锅铁铲，宝贵的家具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陕西富平县驱使老汉、老太全都到野外找矿石，只要发现哪个石头或山土是红色或像铁锈的颜色，就当矿石背回来。有个小脚老太背不动，就用手帕包上一块石头提着走。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优质合金钢，也被某地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土高炉。中医们还大胆创造用中药炼钢，向土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中药，据说能提高炼钢能力。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岭被砍秃，农民的房屋被扒掉。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新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抬去报喜。我上初小时被卷入“大炼钢铁”，和孩童们一起钻过老坟洞，搬砖块、捡铁钉，在县城炼钢集中地为土高炉拉过风箱。农村的男人们则是一天 24 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和儿童，大片庄稼收不回来，烂在地里。彭德怀感叹：“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

1958 年，全国风调雨顺，虽经一系列疯狂的折腾，仍然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但青壮年农民全都抽去大办水利、大炼钢铁了，许多地方庄稼烂在地里没有劳动力收割。山东郯城县部分庄稼收割后运不到场院，堆在地头发霉变质，或拉到场院无人脱粒而沤烂。甘肃秦安县好劳力都上了洮河水利工地，做庄稼的全是七八十岁的老汉，他们一边打场一边不分昼夜往乡上大粮站送。四川温江地区秋红苕逾百万亩，长得极好，但到挖红苕时，腾不出劳力，从省到县又是开会又是发紧急通知，结果无济于事，红苕要么烂在地里，要么挖起来堆在地边烂掉。

如此折腾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 1070 万吨炼钢指标达到了。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炼出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

全国一窝蜂兴起的“大办工业”，也几乎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从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到年底短短几个月，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达 1639 个，最终只有 28 个建成投产，浪费的设备许多是大量出口食品、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配套产业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1959 年 6 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访华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遭蹋了。”

正常生产的各类企业也像人一样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接连发生，几个月内最少有 30000 多任务人死于严重工伤，产品质量更是毫无保障。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非常亲华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忆：“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三、千奇百怪的发疯折腾

1957 年“反右”打断中国人脊梁骨致全民“封口”后，偌大中国说假话、听假话、做假事、歪曲事实、竞相吹牛成为社会风气，“大跃进”便成了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大表演。几亿中国人顶礼膜拜皇帝的新衣拼命跟着裸奔，名贯中西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竟然三次“科学论证”亩产万斤不成问题。在从上到下的大施淫威和从下到上盲从跟风中，一出出搞得人心力憔悴，直至榨干人生命力的荒唐闹剧。

毛泽东开初主要是想尽快实现军事工业化。1953 年，毛泽东首次推出这个计划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后来又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随着大跃进调门越来越高，毛看到一呼百应、全国火热的“大好形势”，似乎通过搞大跃进统治世界也不在话下。1958 年，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不久又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

中共建政后，开始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搞工业化，以统购统销和建立合作社等方法向农民征购粮食以积累工业建设资金。为了获取更高的粮食产量从而征购到更多的粮食，然后大量出口换取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使得大跃进的农村首先就是为了创造粮食丰收的奇迹。为了创造这个“奇迹”，毛泽东农业“八字宪法”中的深耕、施肥、密植三大“高产措施”，搞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土地大翻身”运动如火如荼，土地一尺又一尺深挖下去，“深耕卫星”一个又一个冒出来，二尺三尺已不稀罕，四尺五尺不算冒尖，四川蒲江县东北公社玉红大队挖到了七尺，超过篮球巨人的身高。如此艰巨的深耕任务，畜力望尘莫及，拖拉机也无能为力，各种深耕工具便应运而生。温江地区普及最广的是所谓“绳索牵引犁”，数人、数十人拉着犁头深耕；或者在田头支上绞盘，由许多人推磨似地转动绞盘，带动绳索拉犁，其场面恍若奴隶时代。人民日报报道，温江地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至今依然记得 1958 年在原籍西充县城郊看到的巨幅标语：“良田万亩，深耕十丈，高产卫星，到处发放”；旁边则是农民站在肩及地面的深沟里，将一米多深的泥土和石渣从一侧向另一侧、由下向上一锹锹翻过去。“深耕”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为了把川西坝子（成都平原）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个身，温江地区规定了翻“表土”、“生土”，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烧柴火“熏土”，在熏土上泼粪水，再在上面施、渣肥、堆肥，“深耕”等操作程序。“深耕卫星”放得蔚为壮观，深耕的土地上到处挖起战壕似的深坑，叠起一列列土墙似的土埂，修起一座座碉堡似的熏土窑。一时间，成都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花费了多少劳动力，烧掉了多少林木柴草，却搞成了毁灭性的生态破坏！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也参加过“熏肥”，在学校旁边的农田里，跟着大家把大个头的土块逐一垒成中空的土堆，然后陆续填入随便哪里弄来的木料、柴草，将这些土块烧黑，熏成“肥料”。与此同时，农业部出台抓紧积肥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鼓起劲来，大量积肥”，各省、地、市、县也出台了天文数字的计划指标。牲畜粪、人粪，一粒不掉，杂草铲来沤堆肥，各种河沟水塘的沟泥、塘泥挑完了，稻秆麦秆玉米高粱杆子烧成了草灰……埋死人的坟头是肥，老土墙是肥，小路、院坝、屋里屋外经常有人走动的地面也要刮起一层“千脚泥”当肥料。

人民日报告诉人民，农村的土墙经长期风吹日晒雨淋后，在墙根常发现许多像碱一样的白霜，这就是硝酸盐类物质，用老土墙做肥料，比河泥肥效高两三倍；每天煮饭所烧的柴草中的植物蛋白燃烧后放出氮气，灶土，已吸收氮气，就成了好肥料。于是到处都在挖土墙，砸灶台。温江地区一夜间就办起几千个土化肥厂，见老墙就挖。土专家们只须一把铲子、一张筛子、一只铁锅，就制造出种种“高效化肥”。四川日报报道，新翻一块一亩二分“卫星田”，施老墙泥 40 万斤、堆肥 5 万斤，以及人粪、水粪、草木灰、鸡鸭粪数百挑。有的试验田甚至“每亩施碴肥 170 万斤”，相当于每平方米堆上 1.28 吨肥料。

著名作家李准在人民日报上感慨万端：“当你看到一块红薯地里堆满 10 万斤粪，又深翻一丈深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之所以能获得这些丰产，主要是人民树立了共产主义的风格——毛泽东的风格。”

毛泽东一个“密”字——密植，经各级层层放大，也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密植的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播的种，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拔掉重插重播。不仅重新返工，还要受政治处分，当作“白旗”拔掉，作为“右倾保守”批斗，甚至丢掉性命、家破人亡。华北一位极受农民欢迎的村支书、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1958 年上级要求用三条腿的耨播种以提高种植密度，但这个村支书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耨播种，结果遭到“拔白旗”，站在板凳上挨斗争，被狠狠踢下打翻在地。

四川省委宣传部选编的一首“跃进诗”：“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四川荣经县指导县中学生在河滩上选了一亩试验田，深耕五六尺，翻起河沙、卵石，挖出一个大深坑，回填后再施肥 200 担，然后按密植要求密密麻麻撒种 100 余

斤，结果长出的秧苗细如牛毛还日渐枯萎，只好全部割掉做了牛饲料。郫县红光公社密植的油菜地，有的菜籽还未开花就干了，无花更无果，有的花开后，没有角心，或颗粒，同时出现大面积的油菜黑菌病，叶子发黑后生霉，然后全部干掉。有的一亩地就播下几百斤种子。由于过度密植，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庄稼长不起来，长起来也要倒伏。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温江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是党中央规定的，“密植”来自毛的最高指示，必须执行，谁也不敢反对。直到交够了学费，吃够了苦头，最后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了句“不可太密”，方才逐渐松绑。

种种稀奇古怪、不计本钱、劳民伤财的蛮干，都在大跃进中一一创造了出来。四川崇宁县（后分别划归灌县、郫县、彭县）强行推广的几十万亩双季晚稻，直到9月份还未抽穗，全县召开保晚稻丰收誓师大会，各社组织劳动大军日夜守护在田间。灵圣乡用草木灰、鸡、牛屎等“热性肥料”提高地温；君平乡每人“自动节约菜油三至五两”混合粪肥施到田里；万寿乡给几十亩“晚稻大卫星田”抽排水沟、拦腰搭架、分厢梳头；金星社在田埂四周生火，用竹筒把暖气输入田中，在田埂四周放火盆“抵抗低温侵袭”，或用牛骨头熬油喷射促进提早抽穗扬花。

为达到高产目标，有的地方给高产田安上煤气灯增加光合作用，有的在田边安鼓风机向田地吹风。有的发明了煮狗肉汤做肥料，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狗肉汤撒到田地里，说是庄稼喝了能增产。陕西富平县把狗全部打死后，熬成精制肉汤泼到田地里。有的地方发明了给小麦打“葡萄糖”，在小麦地里用木棍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粪汤，说是庄稼会长得快，谁知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原因是小麦根系遭受破坏，难以吸收过多的肥料，烧死啦。为了早出粮食，湖南湘阴县号召农民吃过年夜饭浸禾种，结果因为土地还很冷，播下去的9.42万公斤种子全部烂掉了。

高产的大话说绝了，荒唐的方法用尽了，几亿农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实际的粮食产量却远远赶不上当局的跃进指标，做假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最常见的做假方法，是把已成熟的庄稼全部移到一块地里，应付上级验收，或请来各方领导和媒体“现场收割”，并且常常通过细致的安排重复过称。为防看出破绽，一些地方把还没抽穗扬花的水稻提前移栽到一起，结果全部沤烂在田里。

人民日报，这家代表党中央“喉舌”的权威报纸，自从1957年按中央规定没有及时刊发毛泽东的讲话被毛斥为“死人办报”并换了总编辑后，就突然生猛、强悍起来，先是在“反右派”中冲锋陷阵，1958年又引导全国人民在“放卫星”的比赛中一路狂奔：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6月18日，河南高丘县，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4535斤；6月30日，河北安国县，5103斤……7月12日，已放出29颗小麦卫星的河南省又一颗超级卫星升空：西平县和平社亩产7320斤！

当北方小麦产区卫星如云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果然，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湖北劳模，官木生的“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早稻亩产15000斤”。

中国青年报也不示弱，刊发了钱学森亩产万斤的雄文，并发表社论《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多少》，“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了完全的答案，这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事实证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是无限量的，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出多少。”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自此成了放高产卫星的“名言”和“依据”，高产吹牛也节节攀高，牛皮一个比一个厉害。人人都知道是假的，人人都不敢说破，人人都要参与吹牛还得一个比一个厉害，不然挨整的肯定是你。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在河南挨了批，回北京后又挨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成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联合调查组深入河南等地调查，搞了一个《问题汇编》向中央反映农村浮夸吹牛瞎折腾及农民深受其害的实际情况，被指为“疯狂反对三面红旗”，负责这件事的中共北

京市委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一副书记邹鲁风，被逼跳湖自杀。

不说假话或说假话的份量不够而挨整，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吃皮肉之苦。那年西充当局在我居家附近召开农村大队支书以上干部大会，逼着大家表态放高产卫星，然后当场揪出报产量最少吹牛皮最小的几个官员，由壮汉打手们扯起四肢，被向上架在空中，再由与会人等各执组织方事先准备的竹板雨点般一顿暴打。这打法西充俗称“打软板”。打“右派”整“右倾分子”斗“坏分子”开什么斗争会等也常是这打法，当场打死的时有所闻。浮夸吹牛成了人人不得不为、不敢不为的社会风气，人民日报上的“高产卫星”则随之水涨船高：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亩产43075斤；9月18日，四川郫县亩产82525斤……人民日报上的“高产卫星”，一直放到广西环江县130434斤、河北小站公社152533斤。亩产13万斤、15万斤！想想若把这10多万斤稻谷平堆在一亩地上，没有一人高也至少有几十厘米厚吧。难怪毛泽东一再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忧。

大跃进还有一个好听的叫法：“生产革命和技术革命。”自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讲破除迷信，又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后，“卑贱者”们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声浪中恍然大悟，原来“科学”不过如此：科学发明大多是没有文化、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所为。各种各样吹出来、夸大了的“发明创造”及成果，于是纷纷见诸报端。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农大黑”母鸡下的蛋一个有三两还多。河南遂平县和兴管理区社员用谷子和高粱嫁接培育出“高粱谷”，穗像蒲棒，籽粒像谷子，吃起来又甜又黏。山东省园艺科学研究所的王立治将苹果的幼果，嫁接在正在生长的南瓜上，苹果的果形、色、味和大小都与树上所结无异。山西省，解虞县，卿头小学，六年级学生尚马朝，把番茄与马铃薯嫁接成“两层楼”植物，又把棉花接在向日葵幼苗上，培育出黑色的棉花。

自古以来都是母鸡孵小鸡，而公鸡除了打鸣外，既不会下蛋，也不会孵鸡娃，然而陕西蒲城县林吉村农业社社员试验由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大。

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个学生组成“卫星突击队”，为改善饲料管理方法，搬进猪棚和猪同住，他们最初采用群众创造的割猪的甲状腺、割猪耳和猪尾，继之再割去猪的部分胸腺，这样使猪的日增重量大大提高。试验的结果据报载，“20头猪在5天内平均每头增重6斤半，其中一头最高日增19斤”。

为“解决全面丰收与劳动力不足的尖锐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迅速在农村开展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人人当工匠，户户是工厂”北京开办农具革新展览，展出数以千计的“新式农具”，大部分为木制手动，有一人操作的“手动式联合收割机”，有数十人才能启动的巨型人力提灌装置，还有类似永动机一类的玩意儿，整个露天展场犹如中世纪博物馆，一批又一批各级官员和各地代表来这里洞开眼界、激发灵感。36名“最聪明的”文盲、半文盲被吸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会员，据说他们创造的各种人力机械，可提高工效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比畜力高几十倍”。

名气最大的新式农具，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双轮双铧犁。这种带轮子、有前后两个铧刀的全金属结构的家伙，其重型的有300多斤，最轻的也有180多斤。这个傻大粗笨的家伙，当年作为新式农具从东欧引进，在平原地区很难用，在山区和水田里完全是个劳民伤财的废物，名声奇臭。1956年强行推广160万部，农民大呼上当，纷纷要求“退犁”，但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全国农村都得推广，不然就得以“右倾保守”挨批。大跃进中四川在农村使用后全部厌弃的情况下，又买下强行摊派的40000多具新犁，结果还是废铁一堆，除了偶尔向上级表演外，没有一个农民愿意用。

急于向全国调运粮食的四川省，要求交通运输实现“七化”：农村运输车子化，水上运输机械化，车子胶带化，山区运输驮运化、轨道化，渡口桥梁化，搬运机械化……成都平原的40万部鸡公车，要求将轮子加大，轮上加胶带，轮轴上装弹子盘，还制造出载重一吨的“三轮鸡公车”。

当科学被作为迷信扫荡以后，许多离奇荒诞的“科学发明”纷纷亮相，成为大跃进中的一大奇观，也浪费了无数的人财物力，荒废了工农业生产。如一辆汽车拉几十个拖车搞“汽车列车化”，全民打滚珠搞“轴承化”的“机械化”。河南吹嘘说，全省七个地区 108 个县，1958 年“基本上做到了县县办轴承工业”。浙江发誓在 10 月底之前，把一切改良农具装上轴承。北京还办起了滚珠轴承展览会。和“汽车列车化”媲美的一绝是“铁路木轨化”。四川大邑县安仁区雄心勃发，动手修木轨，土火车“区环线”，修出一段后，温江地委就去开现场会，于是砍树子方便的地方纷纷效法。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县胃口更大，已动工修建“全川第一条县办铁路”，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修路的人们正在山岭中架云梯、搭天桥、修路基、架桥涵。他们用矿山的轻便铁轨辅上线路，铁轨不够就用木轨包铁皮的办法架设铁道复线。”

挖坟运动，也掀起了高潮。为了平整土地、改造土壤、扩大耕地面积，全国到处“动手把祖先的坟墓翻掘起来”。因为那些棺木和石碑，可以“用来筑桥、铺路、搭瓜棚、修猪圈，稍微坚固一点的棺木，更是造车轮子的好材料。”到公社化以后，成都平原坟墓里的树木和棺材，几乎全部喂进了炼铁土高炉和公共食堂的大柴灶。

所有对科学的“迷信”扫荡一空，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创奇迹的竞赛一浪高过一浪。农业展览会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王”：树一般的油菜王、棉花王，一窝结几斤谷子的小米王，挂五六个包包的玉米王，头上分叉的麦子王，南瓜般的红苕王，两人抬的南瓜王，半人高的冬瓜王，扁担长的丝瓜王，河马似的肥猪王，硕大无朋的鸡王、鸭王、兔王……

新华社报道：66 岁老农把棉花嫁接在椿树上，“有四株已经开始长芽”；有人通过小麦和玉米杂交的办法，培育出在当地一年两熟的小麦……流行的观点是，蕃茄和红薯杂交的品种就会上边结蕃茄下边长红薯，羊和牛杂交羊就会长得和牛一样大，猪和象杂交就会长得和象一样大。却没有人想过或者想过也不敢说：牛羊杂交后，牛是否会变得和羊一样大，象猪杂交后，象是否会变得和猪一样大？

“发明创造”高潮迭起、万箭齐发，样样都跟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需要，样样都必须跃进再跃进，畜力不够就来个配种大跃进。四川日报报道，广安县大良乡齐行一社等四个农业社，“短短十天中生猪由 600 多只增加到 6000 多只，每户平均 30 只”。洪雅县将平乡春光三社一只母猪 20 天内连续产仔两窝，头窝 8 只，每头重 8.6 斤，2 窝 8 头，每头重 2.4 斤。可见只要掌握好母猪的排卵期，就可以大大缩短产仔周期，“目前正在推广这种办法。”人民日报报道，陕西省井泉县出了两个配种女英雄，一个 20 左右，一个年 25，她们昂首阔步拉着公畜，在县城的集市上找个宽敞的地方一站，认真地从事着配种工作，“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有时挑战性地环顾一下四周，好象是在探询，倒要听听谁敢说什么。”男人们“惭愧地低下了头”，老封建们吓得吐舌头说：“这两位姑奶奶胆子可真不小啊”。作者赞扬说：“两位姑奶奶”的胆量比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还大，在她们的鼓舞下，“陕西省赵寿山省长也亲自拉种畜配种了。”

四川仁寿县的妇女也不是好惹的，康乐社，女社长，周文彬为首的七个女青年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妇女授精点”，不顾旁人耻笑和家庭责难，搬到牛房住，采取打针、吃药，“公牛诱情”等办法，使 11 头漂沙牛全部发情配上了种。沙牛即母牛，漂沙牛就是无生育能力的母牛，只用来出力。要漂沙牛怀孕，如同要骡子下崽。但是仁寿县不信这个邪，在“改造漂沙牛，实现全配县”的呼叫声中，采用“综合性催情、人工授精、早期配、热窝配、多次配和月月配的办法，破除了漂沙牛不能生育的迷信。”

仁寿县委书记杨汝岱、副县长熊俊超在四川日报上介绍《仁寿怎样实现耕牛“全配县”》的经验。县委的口号是：“政治挂帅，书记上阵，搞运动、抓突击，常年配、月月配，叫就配、多次配，人工授精配、改造漂沙牛。”“母牛不配完，运动永不休，全配要全孕，争取上北京。”于是，“一个闪电般的耕牛全配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县展开了。”

安岳县的母牛十有八九是漂沙牛，为了让漂沙牛发情，全县办起“催情院”798 个，以喂“催情药”、打“催情针”、用公母牛混牧等办法“诱情”，县上还介绍说：“由于种水牛不足，我们

打破迷信，大胆用黄公牛与水母牛交配，已配上了 22 头。”

大跃进中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地压下来。圣上的旨意主宰一切，高层的意志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层层压制，真实的情况一层一层被封锁，各级干部的胡作非为登峰造极，谁敢不这样做谁敢说真话谁就要挨整还得连累家人亲友，从而使错误的政策越走越远，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并且注定了这种后果将主要由农民承担。

四、“反瞒产”逼出大饿毙

中国那场惊煞世界、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源于“解放后”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压、运动整人、愚民洗脑及至右派们被一网打尽全民“封口”后，凡是说真话，就要挨批挨整，全社会没有任何反对、制衡力量甚至连杂音都没有了后，一切唯圣上旨意行事的皇权专制。

“大跃进”毁灭天文数字人命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以暴虐的强权、野蛮的打压驱使广大农民和下放的右派分子们，持续进行高强度、超极限的强迫劳动，造成严重体力透支又极其缺乏营养补给从而造成生命衰竭的慢性死亡；甚至以打死逼死多少人的暴力手段搜尽农民保命的口粮而又不准逃荒要饭。互相救助，有的甚至不准上山挖野菜或贴封条封门，被强行限制在村子里活活饿死。

在那个极其苦难的年代，大多数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饥饿和恐惧之中，特别是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月，广大农村几乎倒退到了 2000 年前的农奴时代，中国社会俨然成了一个大监狱——严密的户籍制度及疏而不漏的社会控制，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自由尤其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人民公社对农民像牲畜一样，圈养圈管的集中营式管理，加上深入到每个人最私秘心灵的思想钳制，哪怕只是一句喊肚子饿的话，也可能动辄得咎惹祸上身，抄家、批斗、游街、跪罚、毒打、强制劳动、私设监狱变相劳改，许多农村干部都能随便抓人关人甚至活活打死，严厉限制通讯、言论甚至截留外发的信件封锁死农民同外界的联系，没有权力机构开具的证明休想外出，甚至逃荒要饭也要作为“盲流”、“流窜犯”来抓，一旦发现有农家冒炊烟必遭批斗严惩，像劳改犯一样强迫劳动、昼夜下苦力还只能翻山越岭到集体食堂喝大锅清汤，稍有不满意或冒犯还要遭受“扣饭”等一系列惩罚……甘肃秦安县一个学生说吃不饱肚子饿，被抓捕判刑劳改八年。河南光山县农民吴德桐饿得受不了说了句不满的话被活活打死。商城县一个姓王的农民，饿极偷麦吃，被队长逼着自己把手剁掉；该县观庙南洼，大榨屋文小湾一位妇女，被队干部一个倒煤油一个划火柴活活烧死。

尤其是 1959 年秋至 1960 年春，在集中打击彭德怀等正直党人的庐山会议后，结合“反右倾”进行的“反瞒产私分”，是直接导致农民，大规模饿死的，一场极其残忍、血腥的暴力运动。起源于砸锅砍树炼钢铁、吹牛高产放卫星、亿万农民修水利和一拨拨以迷信扫荡科学的疯狂蛮干造成惨烈的大破坏也造成粮食大减产，上方根据浮夸虚报的高产量进行的高征购和外调粮，无法完成就责怪农民“瞒产私分”拒不交粮。也是毛泽东在位 27 年唯一走上前台亲自抓经济工作所搞的大跃进中，继一言九鼎主抓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放高产卫星、办公共食堂等等伟大创举后，为了在吹破牛皮、丢人现眼时搜刮到更多的粮食以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正确、皇上不容置疑的伟大和满足大规模出口之需，所高度关注及亲自督办的一场“面子保卫战”。尽管谁都知道，“高产卫星”是由上至下层层放大逼出来的，各地的粮食“大丰收”也是逼出来的，但上方按地方虚报的高产量搞高征购却毫不含糊。没有实际产量的高征购极其困难，毛就指责农民私藏粮食“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亲自起草了中央“反瞒产私分”文件，下令“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还挖苦嘲笑“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事实上那时农民的生活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加速下滑，个人做饭属于违法，只有公共食堂的大锅清汤保命，所谓“瞒产私分”纯属子虚乌有，可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怕了的各级干部谁也不敢说真话。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施压下，一时间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反瞒产私分”竟至演变成了强制征粮、逐家搜粮、拆房掘地找粮，随意捆、绑、打、吊农民，以赤裸裸的酷刑强行从饥民口中夺粮的一场疯狂的暴

力运动。

为了逼粮，河南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一连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并致死一人。光山县动用冻刑，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 13 个孤儿被赶到山上冻死。在潢川县委召开的逼粮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被打者一人当场死亡，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甘肃通渭县陇阳公社书记李生荣逼粮中打过 53 人，打死逼死 12 人。四川荣经县调动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挨家搜粮，有妇女被吊起来脱下裤子抽打下身，一些人被活活打死。正如信阳地区一位老干部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罗山县彭新公社有 17 名预备党员，16 个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

“反瞒产”是大跃进中最暴虐、凶残的一幕，从 1959 年秋冬至 1960 年春，时间跨度约半年，为大饥荒中饿死、打死人最多最集中的时期，有史家称其为“饥荒大爆发”，全国几千万饿殍中超过半数（约 60-70%）死于这半年。

1960 年，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露馅后，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向省委第一书记、河南左王吴芝圃报告，在反瞒产私分中为向农民逼粮，光山县槐店公社即有 3528 被打，包括 231 名涉嫌瞒产或右倾的干部，当场打死 558 人，打后死亡 636 人，致残 141 人，逼死 14 人。打人方法除一般的拳打脚踢、捆绑吊打外，还使用了拔头发、割耳朵、竹签穿手、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捅阴道、活埋等数十种酷刑。

据中共信阳地委监委的报告：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 40 多个农民，打死 4 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 93%，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委员亲手拷打农民 92 人，打死 4 人。光山县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先后死亡，家里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致死，徐一家 6 人，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同其 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遭到残酷毒打致死；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其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姜湾一个村原有 45 人，死亡 44 人，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潢川县桃林公社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自己死后儿子没人管，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后，自己死去。

另据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秘书余德鸿记述：光山县饿死这么多人，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 100 多人。各级干部为了完成根本无法完成的高征购（有的征购量甚至高于总产量，农民不吃饭不留种子全部上交也不够）或外调粮而昧着良心残害农民，源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和对身家性命的自保，以及大搞整人的运动造成的人性沦丧和极度残忍。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一场“反右倾”运动横扫全国，一举打了 300 多万“右倾分子”——大多是不愿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干部。邓小平 1960 年 5 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从而挟持党人，将已经造成惨重灾难的大饥荒进一步推向恐怖的高潮，种种令人发指、禽兽不如的暴行，终于把农民们保命的口粮搜刮一空，集体食堂也普遍停伙。河南唐河县还扒出农民棉被、棉衣、棉裤里的老棉花，来完成棉花征购任务。

地狱的大门打开了，恐怖的死神大张着双翼扑向束手待毙的广大农民，许多农村开始了成批成片的大规模死亡，多少社队十室九空，多少家庭死绝断户，神州大地鬼哭狼嚎，许多地方呈现出难以思议的末日惨景。

全国最先创办人民公社也最先曝出大规模非正常死人的信阳地区，以活活打死、逼死 8 万多人（其中打死 6.7 万人）的暴行，将农民活命的口粮收缴殆尽，不长时间即饿死 100 多万人。据河南大饥荒研究者李素立“死绝村”调查披露的史料，“1959 年冬、1960 年春，信阳地区……死绝 5 万多户，村庄毁灭 1 万多个”；“仅息县就有 639 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

庄有 400 多个”；商城县“死绝村庄 453 个”。其中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饿毙。另据 1960 年 6 月中央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信阳潢川县死亡人口中，青壮年占 54.7%，固始县死亡人口青壮年占 67.9%，淮滨县六大队死亡的 1464 人当中，劳动力占 54.2%。

贵州湄潭县在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4 月的反瞒产逼粮中，使用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酷刑，活活打死 1324 人，关押致死 200 余人，对干部戴上右倾帽子撤职并开除公职 1680 人，导致一年多时间饿死 12.5 万人（不含正常死亡 1 万多人），死绝 3000 余户。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当年受命对遵义各县所做的人口汇总，遵义地区总人口 1957 年底 370 多万，1961 年 310 余万，短短三年人间蒸发了 60 多万人。

甘肃通渭县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口号，组织人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找粮，把反瞒产私分搞成令人恐怖的一连串运动，使用酷刑 120 余种，批斗农民 10000 余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1169 人，以公社为单位集中劳改 1637 人。逼粮过程中，马营公社架起 12 挺机枪开斗争大会，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拷打群众 160 多人，当场打死 4 人，绑送劳改 66 人。年仅 35 岁的县长田步霄到农村调查后说了真话，主张给农民一条活路，被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整死。全县搜刮农民“瞒产私分”的保命粮 1100 万斤，致使三分之一的人饿死。鸡川镇东坡生产队几乎全部饿死，院子里全是死人没人埋，草都从骨头堆里长了出来。

甘肃大批农民逃到省会兰州要饭，很多人饿死在大街小巷、火车站，兰化、兰炼两大厂每天都要派出五六辆卡车去收尸。通渭县鸡川镇张锡珍回忆，当年拉着架子车到定西火车站后面丢死人，看到从沟口脚下到里面都是死人，男男女女，满满一沟，让野兽吃的半截子、胳膊、腿、烂衣服、烂被子，好大一个死人坑，就和电视上的南京大屠杀一样。另据大饥荒调查者依娃（美籍华人）记述：通渭县大牛沟大队党支书，强拉管辖下的山东省饿殍遍野，尸横村巷，原省长赵健民称仅惠民地区（现滨州市）就饿死 60 万。使 18 岁的三个未婚姑娘陪睡，并把不从的姑娘扒光衣服吊在房梁上，用擀面杖撑开姑娘的双腿，往阴道塞粗草绳，再猛然拉出来，反复多次，折磨致死。

早在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济宁地区就发生严重饥荒，农民挖麦苗、剥树皮充饥，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达 67 万多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 年 4 月，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地区调查时，给第一书记舒同（是一位反右和大跃进都左得可爱的书法大家）写信，谈到造成饥荒和死人的一些原因：很多地方将农民的粮、草、菜、锅等强行收缴归公；巨野、郓城县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各县都实行移村并村，大量村庄和民房毁灭……郓城县樊作运说，潘庄刘学进的女儿饿死后，为多领一个人的饭，刘家把小孩尸体捂在被窝里好多天，从他家门口经过臭味熏人。另据《往事微痕》引述：山东金乡县胡集公社一个大队党支书将饿死的儿子煮食，夫妻俩和女儿，围着肉盆落泪，支书抹着鼻涕眼泪动员妻女：我当大队支书都敢吃，你们怕啥？吃饱了就是立即拉出去枪毙，也比饿死强。

当年在曹操故里——安徽亳县（现亳州市谯城区）政府办公室和县委生活办公室主持工作的梁志远据笔记与活页记录推算，亳县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在 20 万人以上，有近 3 万户彻底毁灭。1960 年底，他带人在亳县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 127 户、575 人中两年饿死 239 人，占原有人口的 42%，死绝 18 户，占原有户数的 14%。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这里原有 68 人，除 4 人外流，全庄仅剩 18 人，两年饿死 46 人，死亡率达 70%。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的 11 个孤儿饿死了 10 个。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披露，1958 年凤阳县人口 402700 人，1961 年下降到 245262 人，短短三年净减员 157438 人，饿死者占总人口 39% 以上；全县死绝的人家 2404 户，消失村庄 27 个。改开之初按手印立生死文书率先搞承包的凤阳县小岗村，从 1959 年起共有 60 人饿死，6 户死绝，71 人逃荒要饭，到 1962 年春全村仅剩下 10 户，39 口人。原国家统计局干部杨德春记载：“安徽省太和县官集区赵寺大队，1959 年冬至 1960 年夏……全大队共死

亡 1709 人，占原有人口的 36.3%，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 41%。”另据管怀伦，《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 年饥荒调查》，该大队 12 个生产队，灾前 180 户 868 人，381 人在大饥荒中死去，其中 22 户死绝。

湖南澧县县委 1960 年 6 月上报文件中称：在反瞒产逼粮运动中全县农村干部摧残群众的手段非常毒辣，使用了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坐水牢、火烧、拔牙齿、滚雪球、逼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剃指头等 40 多种酷刑。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先后体罚群众 90268 人，扣饭 68868 人，打死 384 人，因打自杀 301 人，扣饭饿死 350 人，打残 1813 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 15996 人。有的一个人就打过 340 多人，打死 15 人。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干部潘启才规定打死人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强迫死者家属笑。

活活饿死、打死、逼死那么多人，难道真没有救命的粮食吗？毛时代国家征购的粮食都存放在各地的仓库里，但地方只能保管不能动用，只有中央才有权调配，因而许多地方宁可让老百姓眼瞅着粮仓里睡大觉的粮食而饿死，也不敢开仓放粮拯救灾民，这是以前历朝历代都没有的事。大饥荒中贵州江口县将近一半的老百姓饿死，几个公社书记带头抢粮库救命，擅自开仓放粮的江口县长在当局重兵镇压时饮弹自尽，虚报产量高征购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而死。四川古蔺县某粮站站长邹英杰不忍心村民被活活饿死，私自开仓分发一些粮食救济灾民被判处无期徒刑，文革中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甘肃通渭县今寺子赵家山，当年任大队干部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当时和政县、通渭县庄稼正长着上方就不断催粮逼粮，人们无奈把未成熟的青粮割下来在锅里炒干上交，把没成熟的苞谷在炕上烤干交公粮，这么一糟蹋自己就更没有吃的了，有人藏在枕芯里的荞麦皮和裤裆里的谷子面也被搜走。有人晚上在仓房里打了 11 只老鼠，煮熟后全部吃掉。一个叫赵由素家的人天亮时一看，炕上死了一大片，一夜就饿死了 5 人。

通渭县有个叫曹玉州的，把 5 个娃娃都吃完了，还把衣服剥下来卖了换东西吃。河南信阳是向农民暴力逼粮最残忍、活活打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但当时信阳国库全是满仓，存粮多达 11 亿斤，如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救济灾民，信阳饿死的 100 多万人全都可以活下来。当年任职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一位主动发放救济粮救了无数信阳人的命而被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最终冒险揭开信阳惨案黑幕避免了饿死更多老百姓的正直党人，去世前留下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遗言：“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老百姓为什么饿死不敢抢粮呢？因为谁都知道若抢国库难免一死，而且还要祸及子孙后代，没死的全都成了反革命亲属。

另有资料披露，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 12 个月，国家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至少有 403 亿斤，按当时的吃粮标准，至少相当于一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按历史上最常见的开仓放粮救灾，绝不会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当年信阳饥民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据说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曾任张树藩秘书的余德鸿回忆：1959 年……到了农历 10 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 6 具尸体，回到离我家 5 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 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 100 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余德鸿曾在其家乡淮滨县工作多年，任过副县长等职，他说淮滨县当年 50 万人，饿死的人不少于 30%。该县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 5 万人左右，共饿死 2.2 万人，占总人口的 40%多。其中吴砦大队（余德鸿家乡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52%。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 13 户人家死绝了 9 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 400 多人，饿死了 300 人左右。杨围

孜大队王庄生产队 207 人，饿死 107 人，其中死绝 6 户。……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淮滨县防胡乡余文海回忆：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 3 个孩子，高鸿文到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 3 个小孩全都煮了吃了。刚刚经过“民主改革”的西藏，也在大跃进中遭了殃。亲共的班禅喇嘛 1962 年写下 70000 字长信，向周恩来反映西藏遭受的灾难，包括：“收购过头……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毛泽东阅后勃然大怒，不久，班禅喇嘛遭受批判，1968 年投入秦城监狱，1977 年方才获释。

五、酷刑打压，索命罗网

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对中共高层讲：大跃进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大炼钢铁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并大讲死人“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人死应开庆祝会”，“死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解放后”最早提出、应用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被誉为“毛时代唯一的思想家”顾准，甚至认为发动大跃进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他在 1959 年 11 月亲历农村苦难时的日记中写道：“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

郑州大饥荒研究者郑兢业向笔者提供了他收集、整理的一系列大饥荒资料(本文有若干引用)，包括河南商城县档案馆收藏的 1961 年 1 月县委整风办公室成文的一份基层干部以酷刑残害农民的 45 个案例——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称社员陈祖更、徐正舟杀牛吃，把他们拉到大队部扒光衣服捆绑起来，架上干柴活活烧死；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猛打其脑门致头破血流当场丧命；余集公社马槽大队队长×瑞江令人将社员雷显生衣服剥光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活活折磨死；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支书把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嘴里将嘴撕成两半；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把雇农余培×15 岁的儿子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钩死；上石桥公社一姓潘的社员被大队支书刘炳荣将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致死；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把一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人抬起头朝下摔死；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把社员谢昌玉拉到厕所逼迫吃了一堆屎，谢于次日死去；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派两个民兵把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路致死；余集公社雷冲大队治保股长刘义民把社员花某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任牛甩动折磨，当场整死一人；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把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花大绑，推在外面淋雨带冻而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冻死；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队长陈恩建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到山上，用锄头猛砸头部，接着埋掉；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坑活埋，幸被人发现而得救；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在食堂打饭时，12 岁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活活烫死……

一个普普通通的县，短短时间即发生一系列丧心病狂残害农民的惨案，足见中国的大跃进已搞到了何等残忍、血腥、惨绝人寰的程度！

为了高举“三面红旗”，全国公安也搞起了杀、关、管、斗的大跃进。北京提出要把政治和治安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成都一个派出所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披露，安徽 1957 年逮捕 8000 多人，1958 年中央下达给安徽捕人指标 45000 人，全省实际逮捕 10 万多人，逮捕人数同比上一年猛增 10 倍。1960 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层层揪右倾分子、抓“小彭德怀”，安徽又一举逮捕 50000 多人。尹曙生说逮捕的人大多是无辜的百姓，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等说

了牢骚话，或为了活命吃青、分吃生产队的粮食，或外出逃荒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这些被拘捕的人员有近三分之一（31%）惨死在关押场所。

尤其是在反瞒产的暴力运动中，往往都有公安上阵甚至动用武装力量。信阳地区为向农民逼粮，仅由公安机关出面正式拘捕的即达 21000 多人，其中 800 多人死于关押。1959 年 9 月 17 日，遵义地委在湄潭县绥阳公社召开“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当地抓到 48 名饥民关押在供销社一间仓库里，除一名小瘦子晚上从铰链锁的门缝挤出逃生外，其余 47 人全被活活饿死在仓库。后来为捂盖子又把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押，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 36 人，并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附近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没断气的扔下去还在哇哇大叫。

大跃进年月种种惨无人道、疏而不漏的强力打压和穷尽古今的严密社会控制，强迫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加上食不裹腹的强烈饥饿，种种丧尽天良、视人命如草芥的践踏人权和犹如集中营的关押，如同天罗地网一样堵死了农民们以自救、互救苦海逃生的所有渠道——“反右派”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干部的嘴，没有人再敢对毛泽东统领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一场空前绝后的人为大饥荒从而毫无阻力地登场了——浮夸风、共产风、高征购搞得农民们一无所有；大举施暴的“反瞒产私分”抢光了农民们保命的最后一点口粮；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做饭吃，变相剥夺了农民们吃饭的权利；城乡各方严防死守不准逃荒要饭，堵死了农民们逃命的最后一条出路……

这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极权严管、暴力打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可怕后果。不少农村摆在百姓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两条“出路”：不是打死就是饿死！许多农村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草根吃光了，畜粪、死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别人的呕吐物或排泄物，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1959 年冬，河南淮滨县一个与邻村订婚的姑娘饿得站不起来，爬到未婚夫家，想讨口吃的，不料饿疯的未婚夫，用裤带把她勒死后煮吃。江苏宜兴县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卢洪生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挖出来吃。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回忆大饥荒中他和许多同学把煤炭当美食享用，小伙伴们和老师拿着煤块咯嘣咯嘣塞进嘴里嚼，以及乡亲们饿得吃泥土的情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活活憋死了好多人。”

军事评论员张召忠将军回忆其家乡河北盐山县大跃进年间树叶都吃光了，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他为填肚子甚至捡来别人扔掉的光骨头用斧头砸成碎渣当肉吃。当年西充当局召开三级干部会犒赏了一顿肉骨头稀饭，与会者们竞相争食，未及啃尽的骨头扔了一地，居民们闻讯纷纷抢食，住在附近的外婆前往捡了一筐，送家洗净再煮后让我美餐了一顿。

河南胡山林回忆：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方城县施庄村农民们争相抢吃大雁屎及大批饿死人的情形。他说村里每死一个人，自己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痕，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数那些道道，全村 196 人共死掉了 54 口。《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记载，依袍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男人，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那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木头。他侄儿惊问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结果就这么啃着床帮饿死了。

1957 年在云南屏边县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斌，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在红河州劳教所“改造”时，所经历的一些残酷整人和饥饿夺命的人间地狱惨景——为配合社会上开展的各种运动，劳教当局总是用大肆斗人、打人及逮捕人来制造恐怖气氛。红河州劳教所被逮捕的劳教人员中，有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食物的，有锄草不小心锄断禾苗或走路摔了跤将水桶摔坏的，有实在太累太困倒在地上起不来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漂亮女大学生右派肖×，难以容忍管教人员黄×的漫骂和性侮辱，要求他说话干净点，黄立即暴跳如雷，指着肖×的脑门大骂：“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妈的 B，烂婆娘，你还敢这样对老子讲话？老子今天就抹抹鸡巴甩你两巴掌！”接

着“叭”的一掌，重重打在肖×的脸上；然后汇报上去，劳教所立即召开现场会，对肖进行批斗、打骂，直到肖女晕倒在地，全身痉挛。经多日反复折磨，致肖神经失常，劳教所却说她装疯，组织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对其拳打脚踢，捆绑吊打，还把她悬空吊起荡秋千，继之又将她逮捕“法办”。已经神志不清的肖×在宣布逮捕她的大会上，还对着提绳子来抓她的公安人员傻笑，直到被绳索紧绑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劳教当局采取各种扭曲人性、泯灭良知的手段，迫使劳教人员就范。一位来自机关的大个子劳教右派饿得患了水肿病，体重从100公斤垮到30几公斤，饿得实在受不了，到食堂偷吃了一些冷饭，被带上20多公斤的大脚镣，关在仅有一米见方的一个地洞——劳教所特设的“禁闭室”里，既抬不起头，也伸不开脚，每天收工回来只能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另有两个劳教人员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室活活饿死，后死的一个竟将那已经发臭的先死者屁股上的肉啃吃了许多，嘴中还含着一口没有咽下去的人肉。

李斌回忆，在大跃进大干苦战的漫长劳役中，最悲惨的是严重饥饿的煎熬与折磨。每天临近早、晚两餐饭前，都会有人当场倒下，昏死过去。一个严重水肿病患者已经起不了床，管教干部硬说他耍死皮，强行将他拖起来出工，结果拖到路上便断了气。有一次我们奉命去抬埋一个天亮前就已经硬在床上的死者，邻床的一个病人还向我们讲了死者临终前的一些情况，而当我们死者抬出去埋了回来，向我们讲死者情况的那个病人又成了死者……最先死的还有一口用床板拼成的“棺材”，后来死的多了，谁死了就用谁的被子、垫单包裹着，抬出去“软埋”了之。

一时尚未死去的90%以上都得了水肿病，临近死亡仍被强制劳动，只要风稍大一点就有人被吹倒，再也爬不起来。为活命甚至有人吃粪便和别人的呕吐物。有一个水肿病患者已经病得不省人事，意外得到一碗救命的红糖稀饭，却因病重和干瘪的肠胃无法承受，“哇”地一声吐了出来，邻床的一个病人立即挣扎起来，趴在地上，用手将那堆呕吐物一把把抓起喂进自己嘴中。

被饥饿驱赶到死亡边缘的右派们，哪怕是掉在路上的一片黄菜叶，雨水中泡得发胀的皮条，食堂丢在粪草堆上的一个烂红薯，或是侥幸抓到一只老鼠、什么虫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吃了。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万××，被饿得几次昏死过去，一天在出工的路上碰见一条正在爬进石缝的麻蛇，立即上前一把逮住蛇尾巴，竭尽全力往外拽，只听“咔嚓”一声，麻蛇、被拦腰扯断，万××立即将那截血淋淋的麻蛇尾巴放进嘴里嚼起来……

香港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出版了9部中国现代史专著的荷兰学者，说他在查阅内地档案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书名《毛的大饥荒》）一书时，有三个意外的惊人发现——大跃进时期频繁滥用酷刑，包括对孕妇和儿童；很多人不是直接饿死的而是由于被强制剥夺了吃饭的权利而饿死的；一切灾难是由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冯客从研究分析揭秘的档案资料发现，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活生生把人民推入了死亡的绝境。他推算大饥荒罹难者不少于4500万，其中至少200-300万人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河南新县白雀园的逼粮现场会上，一名大队干部报不出交粮数字被用五匹马套住四肢和头部，当场实施了古代酷刑“五马分尸”。光山县收割庄稼时，多人被指偷吃麦粒遭毒打，一个寡妇连同孩子们一起被活埋；一个叫吴德荣的农民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熊湾，生产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撕掉其耳朵，很快即死亡；该队张芝英交不出粮食，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其当场死亡，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商城县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荣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活活折磨致死。湖南一个农民被逼着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吃，接着这位活埋孩子的父亲因极度伤心而死。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嵒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极偷杀了一只羊，被捆起来游街示众后吊在树上，老头不停惨叫求饶，没人理睬，直至死去；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红饿极弄死了一头小猪崽吃，被生产队长发现后开会批斗，活活打死；李尧大队饲养员宋和，偷食了一只死母猪，大队长翟某带人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吊起毒打后，游街示众，直至倒地而死。1959年11月，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已

停伙两个月了，全队社员为了活命，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 17 名参与杀牛的社员绑到大队部吊起来毒打一整天，其中 6 人被活活打死。

许多地方就是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打压，罗织草菅人命的天罗地网，使得广大饥民逃无可逃，只有死路一条。

广西环江县 1958 年 9 月放出水稻亩产 13 万斤的“粮食卫星”（可能是人民日报上最大的高产“卫星”），10 月又放出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在环江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挨户抄家，没粮或不交够量，就把人上捆，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拇趾，悬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就点火燃爆……环江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极，偷粮的 12 岁小学生，决定就地枪毙，杀一儆百。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肺。因枪枝老旧，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打响，小孩鲜血四溅，不治而亡。吉祥公社北宗大队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其父母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头、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

另据 1961 年春中共中央会同湖南省地县四级联手对湘潭县的调查，湘潭县被打的老百姓达 34466 人，当场打死 52 人，打后死亡 549 人，扣饭，饿死 400 多人，打后自杀 125 人，被打致残 332 人，打后流产的妇女 187 人，因被打和扣饭，外逃 12676 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似乎也没享受到多少浩荡皇恩，但 1960 年耗资一个多亿修建滴水洞行宫，还是为伟人家乡的 GDP 做出了贡献。若把建滴水洞行宫的钱，用于救济湖南省饿死的 200 多万人，他们全都可以活下来……

全国以右派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的命运都极其凄惨。据著名“五七战士”铁流等的著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北京清河农场、青海湖农场、四川沙坪农场、甘肃夹边沟农场等臭名昭著的劳教农场，都成了右派们遭受惊人磨难的死亡集中营。位于辽宁锦州的一个煤矿劳改大队，1200 名犯人在大饥荒中几乎死绝。青海劳改农场大饥荒中死亡 4000 多人就有 3000 多名右派，其中 1000 多名女性。1958 年 4 月 15 日组建的以右派为主的四川省公安厅“415 劳改筑路支队”，因饿死、累死、工伤、自杀、处决、判刑及逃亡失踪等，大量减员，到文革前，解散时全队 5000 多人仅有 2000 多人回归社会。

大跃进年间，在河南万胜山林场“改造”的 200 多名右派，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死的超过半数。1959 年冬季，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林场基建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强迫每人往返三趟（50 多公里山路），完不成就批斗、扣饭（第二天不准吃饭），当晚摔死、冻死、投水自杀死的右派即有 17 人。

在美国大骂美国出兵朝鲜的董时光博士，满怀爱国之情于 1955 年回国效力，在“帮党整风”中，因给其任教的西南师范学院党委提了意见，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改，1960 年在服苦役中，因极度饥饿去捡马粪中没有消化的胡豆吃，被诬偷吃马料，遭活活打死。

大饥荒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等。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各地大小官员更加有恃无恐。据大饥荒调查者杨继绳披露：当年仅信阳邮电局就奉命扣压了 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件；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全力追查写这封信的人；有一个党支部 23 个党员饿死了 20 个，剩下的 3 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血书求助。结果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

另据安徽亳县梁志远回忆，该县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甘肃秦安县城关乡刘春花回忆，她家 1958 年房子遭收走了，一家人被扫地出门，1961 年她不到 14 岁，被大队长强娶为儿媳，其父才

不再挨斗，并可在附近村庄讨饭了。

信阳位于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上，为了防止饥民逃荒或外出走漏消息，信阳南北两个火车站都严防死守，各县城四门均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守护，对司机也有堵截“盲流”的特别要求；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进行拷打并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堵截外流人员 19 万人，致收容人员大量死亡。潢川县设立收容所 67 处，收容外逃人员 9330 人，均遭到审讯、毒打、饿饭、强制劳动，致死致残 2195 人。其中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 10 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春，共殴打来往社员 40 多人，其中打死 12 人，并剥掉了 195 人的衣服。商城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戴云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为主设立的收容所，所设立“剥人厅”，落魄厅，凡被扣押的群众，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则抬到落魄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其间共收容 2900 多人，致死 120 多人。

1960 年 6 月，李先念来到他战斗过多年的鄂豫皖根据地信阳地区调研，看到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丧。面对生灵涂炭的革命老区，他无限感伤，多次落泪。2004 年，饿死、打死、逼死 25 万人的光山大饥荒幸存者吴永宽在村里自费立碑，记载“反瞒产”把农民逼入绝境后，他所在的 120 人小村庄（生产队）1959 年初冬半个多月就饿死 70 多人。他将收集到的本村 73 位罹难者名字刻在碑上，附上说明，成为了全国数千万饿殍唯一的纪念碑。

六、厚赠外邦，饿死家奴

著名女作家章诒和讲到一个心酸的故事：一位登门拜访的安徽作家带来一卷图纸，说自己要写的内容就在里面。图纸铺开是一幅农家村落平面图，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填有一二人、二三人姓名。安徽作家说这是 1958 年他的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他逐一指着说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侄子。继而抽出第二张、第三张图，分别是 1959 年、1960 年的。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标注的姓名却越来越少，最后一张图，除了一间小屋有一个人的姓名外，其他房间全成了空白，因为都在大饥荒中死光了，那唯一剩下的名字，就是侥幸活着走出来的就是他自己。

中国发生如此惨烈的大饥荒，照理上层领导应当带头节约开支、杜绝挥霍浪费并压缩对外援助，以便共克时艰、顺利度过，国之大难，尽量减少对人民的伤害。岂料饿死人最多的几年，既是中国中央领导修建行宫式别墅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猛增养“白眼狼”最多的时期。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记载：1959 年中国征购粮食 674 万吨，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1960 年征购粮食 510 万吨，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饿死人最多的三年，出口粮食超过了以前多年出口粮食的总和。

期间许多仓库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甚至有大量烂掉的情况，却还要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从农民口中夺粮，然后大量援助许多日子过得比中国好的国家，甚至出口粮食换回稀缺的外汇后再购买西方机器去大搞援外，以期“购买”一个世界领袖的名份。以致最惨烈的三年大饥荒中仅在饿死人最多的 1960 年，中国就援助朝鲜纺织厂、轴承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厂等 29 个成套项目，提供有去无回的 4 亿多元贷款并无偿送给朝鲜 23 万吨粮食（当年朝鲜人的生活比中国好得多）；后来又停止北京地铁建设搬过去修建平壤地铁，把刚刚建好还没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全套设备拆掉运到朝鲜援建新厂，并将仙境般的长白山天池（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的一大半及邻近的几座主峰送给了朝鲜，还把原本全部属于中国领土的鸭绿江一分为二，将邻近朝鲜的一半白白割让给了朝鲜。

大跃进中不顾人民死活对外“大撒币”，搞到了丧心病狂、骇人听闻的地步。1960 年中国分别向非洲的刚果、加纳等提供小麦、大米各 10000 吨的无偿援助，同时应埃及对以色列开战的要求提供援助。那些年援助仅有 200 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就达 10 多亿元，阿国人均获援 5000 多元（那时中国大陆极难找出拥有 5000 元钱的巨富；许多农民苦干一天的工分才值几分钱）；

援建化肥厂人家看不上中国货，就专门从意大利购买全套设备送过去，结果阿国堆在野外任凭风吹雨打、锈蚀烂掉，尽管这是以大量饿死中国人为代价送给他们的。中国大炼钢铁把上好的金属用品，如门上铁环、扣子、铁锅、铁铲、农具甚至妇女头上的发夹、宝贵的金属文物等等投入土高炉炼成废铁，却把最好的自己也最紧缺的优质钢材和水泥等大量送给阿尔巴尼亚，阿国生产建设用不完，就遍地建领袖雕像、修地堡工事。如此弹丸小国就建了几千座雕塑、13000多座钢筋水泥地堡。

原外经部部长，李强回忆，大饥荒中国人饿得尸横遍野时，中央却下令购买加拿大小麦后正航行在大西洋的轮船，转向开往阿尔巴尼亚。那些年对越南的各类援助更是高达 200 多亿美元，仅在大饥荒末的 1962 年，就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器。乃至翻脸后越南用来打中国人的武器大多还是“中国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字则是“中粮”。“血染的风彩”竟然是越南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而 1957 年毛泽东将海南岛和越南中间的白龙尾岛——浩瀚南海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主动送给越南，更使中国丧失了大片海域并使南海争端雪上加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勘定的表示南海疆域的 11 段线，也因之变成了残缺的 9 段线。长期打肿脸充胖子慷慨施舍，大肆贿赂收买妄图当第三世界领袖，乃至在中国援助的 100 多个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但借出去的债是不用还的。毛的“乐善好施”引得全世界都来中国“吃皇粮”，甚至有人戴了一枚毛像章，取悦于毛，就可以一次要走几千万，几个骗子，胡乱打个外国政党的招牌，就能长期找中国要吃要喝，要“活动经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几个小兄弟向中国要东西，更是像爷爷向孙子要东西一样理直气壮，甚至“你们有的我们要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没有就从西方买来送）。

1950 年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承认蒙古独立并答应全方位援助，不久即派出上万名工人为蒙古建学校、疗养院、招待所、各类工厂甚至还帮助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索要的纺织厂设备，就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大饥荒年间东德向中国索要大量肉食品援助的理由，竟然是东德还没有达到西德每人每年吃 80 公斤肉的标准，尽管中国城市居民（别说毫无保障的农民）即使在大饥荒结束经济好转后，才勉强达到每人每年三四公斤肉的供应标准。继之又于 1961 年 3 月送给东德 23000 吨大豆，使得东德一度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同时断然拒绝日本的战争赔偿，一口回绝美苏等国出于人道主义的粮食援助。当时苏联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 50 万吨食糖、300 万吨粮食以度荒，却被毛一口回绝：“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他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尽管苏方鉴于中国的大饥荒主动提出推迟还债或减免债务，毛却坚持，将 16 年还清的苏联债务，提前到 5 年还清。敦促国内把大量粮油肉蛋源源不断运到苏联加速抵债，在中苏边境还发生过苏联硬不要，中国却硬要给，而发生冲突的怪事，因为头顶“大救星”光环的毛泽东坚持要争一口气，并因此成全了“苏修逼债”的史话。

另据当年驻波兰大使回忆，当美国主动提出无偿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小麦援助以拯救中国灾民时，毛却慨然作答：还是由我们援助美国小麦大米吧。美国驻波兰大使听后“顿现窘态”、默默无言。

许多人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事实上中苏翻脸后苏联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中国缓解饥荒，因为用来购买这些军工项目的大批食品就不必出口了，还可以因为少上些有始无终的大型工业项目，而节省人财物力以度过大饥荒。并且“撤专家”发生在 1960 年 7 月，大量饿死人的惨案已经发生。

大跃进中大规模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毛泽东说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食品换购。与此同时，大量出口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包括用于购买，搞原子弹的设备材料。另外还有肉类、食油、蛋品等的大量出口。除了出口，当时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酒精，用作核导弹燃料。若将这些出口粮食救济绝境中的农民，或者少向农民搜刮些粮食，中国那几千万饿殍，一个都不会死。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没有任何国家如此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

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一场场野蛮、疯狂的瞎折腾，不但造成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导致粮食大减产，而且榨干了人的生命力，把农民们逼上了大规模饿毙的绝路。大饥荒年月搞成的原子弹，是建立在累累白骨堆上的。有资料披露，从 1956 年苏联正式签约帮助搞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起步，毛泽东时代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总共耗资 41 亿美元，按当时物价，如果以这些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小麦等粮食救灾，中国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人全都可以活下来。为了这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炸死的人的 100 倍。

从 1958 年开始，像儿戏一样将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 20 年，有时一天就打几万发。炮击金门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并将苏联绑上与西方国家对抗的战车而致苏方强烈不满，不但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两大主因之一（中苏关系破裂的另一大主因是苏联不支持毛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一发炮弹的价值相当于几百斤粮食，如此挥金如土令许多高层官员深感不解，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胆谏言：“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泽东无言以对，就指责黄右倾，不久即将黄克诚与彭德怀一起打倒。

当年慈禧太后在太平天国造反时欲引进外国兵力助剿，曾放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被西方列强打败后割地赔款却是迫不得已。“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了”、“当家作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却一直对“友邦”挥金如土，对自己的人民如同家奴。大饥荒年间若将大肆出口、援外的巨额钱财、食物救济中国灾民，或者少向人民压榨点血汗，少搜刮点民脂民膏，至少可以少害死整死很多很多中国人，甚至一个都不会饿死。原云南省主席、著名起义将领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并如实反映饿死人的情况，结果被打成大右派直至郁郁而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35 年遵义会议上把毛抬上最高领导位子起了关键作用的王稼祥，1962 年提出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认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惹得龙颜大怒，斥其为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气一点，对亚非拉援助要少一点），王稼祥遭软禁整得精神紊乱后离世，其妻朱仲丽被打成反革命，在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

另一个奇特的大饥荒“粮耗子”酿酒，也是一个拍案惊奇的冷幽默。1937 年，民国贵州省政府颁布政令，严禁在灾荒时期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否则严惩不贷。大饥荒中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为贯彻毛泽东把御用的茅台酒“搞它一万吨”（当时年产 200 多吨）的旨意，罔顾大量饿死人的灾情，向全省连发密电强制征粮酿酒，并投入 120 万元扩建茅台酒厂，中央也从四川调粮给茅台。1959 至 1961 年饿死人最多的三年茅台酒产量成倍飙升，三年总计产酒 2079 吨，耗粮 2260 万斤（5 斤粮产 1 斤酒），产量高出正常年份好几倍，却不知道在饿死那么多人的大饥荒中，这大量的“国酒”究竟被哪些人喝掉了。

大跃进这样足以令全人类耻笑一万年也要悲痛一万年的荒唐闹剧，因“反右”压制了一切反对、质疑的声音而兴起而泛滥成灾，“右派分子”们在大饥荒中的悲惨遭遇，更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从精神到肉体的一条奴役之路、毁灭之路。新华社记者戴煌回忆当右派后在北大荒“改造”的日子：100 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零下 38 度的天寒地冻，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只有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等简单食品养命。曾任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1958 年说服毛泽东放弃修建三峡大坝，从而减轻了大跃进危害，却因庐山会议赞同彭德怀意见而获罪，1960 年被流放黑龙江，每天凌晨 3 点就得下田干苦役，晚上 9 点才能收工，却只有少量野菜、豆饼充饥，幸被同为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相救，才没有像其他许多劳教右派那样饿死或冻死。

甘肃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活活饿死 3000 人、仅活着出来的 500 人，这是惊世骇俗的大惨案（已有《夹边沟记事》《风雪夹边沟》《回眸夹边沟》《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书籍及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大祭灵》等记载；譬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土窝子里饿死一个接一个右派，为了“改造好了可以回家”而活活累死的青年，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有

时一天就饿死四五十人……)；以及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大量劳教右派及少年儿童“小劳教”惨绝人寰的大死亡(已有不少回忆、采访文章和《大堡小劳教》纪录片等反映)，不亚于二战纳粹集中营的生命大灭绝，不仅是一部浓缩了的反右派和大饥荒的血泪史，也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右派”和“四类分子”(后来统称“五类分子”)们如同猪狗一样被肆意剥夺人身自由、生存权利的活标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被其兄傅作义动员回国效力，为支援大西北来到兰州，打成右派后送夹边沟，挖排碱沟腿部长浸泡碱水中大面积溃烂，1960年冬一天大雪，他爬到猪圈，想找点猪食吃，结果倒在猪圈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甘肃农大教授、留美博士沈大文，1958年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1960年春活活饿死。甘肃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文大业，饿得受不了找一种黄茅草做成像观音土的“粉汤”充饥，形成大硬块堵在肛门拉不出来，肚子越撑越大，五六天后活活胀死了。为支援大西北从东北到兰州的省建工局工程师牛天德，打成右派后送夹边沟，死于浮肿。19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师骆宏远，1958年秋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送往夹边沟，一次在地里干活被狼咬死吃掉了……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甘肃省医院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海归，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专程到农场看望亲人。1960年11月，35岁的董坚毅活活饿死，组长刘文汉按照董的遗嘱将他包扎后埋在一个雨水冲刷的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妻子顾晓颖又从上海来了，当难友们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时已不见踪影，最后在后沟里找到，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身上包的衣物已被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个没完，表示要和丈夫死在一起。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把骨头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了上海。

据《南方周末》采访报道，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人称“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1958年，四川日报记者曾伯炎打成右派后送这里劳教，他惊异地看见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被强迫“劳动改造”，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大跃进造成旷世大饥荒后，难以生存的沙坪劳教农场更处于时时饿死人的绝境中。劳教右派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翻地时抓住老鼠就吃，老鼠被吞下去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被活吃的蟋蟀还会咬人的舌头；大批劳教右派惨死于此。位于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几千名17岁以下小劳教(最小的仅9岁)，更是难以熬过饥饿的生死之关。白天，小劳教们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10余小时，稍有懈怠便遭到管理者的威吓和鞭打；晚上，小劳教们要集体学习、开批斗会，并使用了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等酷刑。这些小劳教，因超体力劳动、饥饿、疾病和遭受虐待而大量死亡。无法忍受强烈饥饿的小劳教们去附近偷粮食，被村民捉住后用火烧、剃下手指等，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吃毒蘑菇、生螃蟹和蚯蚓致残致死。劳教当局宣称这些小劳教都是坏人，要村民们不要同情他们。1960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200多个小劳教饿得受不了，集体去大堡镇，偷东西吃，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手电满天，枪声大作，合力围剿小劳教……一个姓蔡的组长回忆：“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小劳教)。”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认为，2600名少年儿童“小劳教”的惨死，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维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

戏剧性的是，1957年参与沙坪劳改农场选址的两名四川监狱局干部，都在“反右”中划为右派，送到了他们自己选定的沙坪农场劳教。

另据美籍华人张方晦回忆，1960年，他和病残的父母、未成年弟妹等500多名上海“闲散人员”，被强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哈萨克地区，在住地窝子的农场中经受饥寒交迫的地狱煎熬，成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夹边沟”，500多人饿死300多，死亡比例达到60%。几十年后，他对大饥荒的恐怖印象依然极深：人都变成了求生的野兽，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孩蹲下大便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就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往嘴里送。快饿死的人先是浮肿，接

着干瘦，整个脑袋只有拳头大，鼻子都没有了，塌陷下去了，只见两个黑鼻孔。两片嘴唇像晒干的桔子皮，牙床骨暴凸出来，胳膊腿皮包骨头，麻杆子一样。一个个大男人就这样死了，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无声无息从世界上消失了。1964 年，他因写文章反映这段大饥荒真相，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 1980 年才平反，后来求学去了美国。

七、天府饥魂，逾千万

维基百科记载：“目前中国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下册）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用“自然灾害”来掩盖人为造成大饥荒的弥天大罪，栽赃于老天爷，相当于把冤假错案从地上搞到了天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本文所称四川皆为重庆分治前的四川省），是大跃进大饥荒期间被暴政和饥饿吞没人命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的省，直到 1962 年还在饿死人。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 1962 年 6 月向中央反映，四川饿死人不少于 1000 万，最高达 1250 万。同年 7 月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萧风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调查，所写调查报告《四川情况》称：“（四川）人口，1957 年 7300 万人……（大饥荒）共减少 1200 多万人，减少 17% 左右。”

成都作家东夫著《麦苗儿青菜花儿黄——川西大跃进纪实》（本文有若干引用）也披露，四川饿死人数超过 1000 万。另据上海交大历史地理学教授曹树基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的专题研究成果，1959-1961 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 940 多万人；如果加上 1958 年和 1962 年的饿殍，四川非正常死亡亦在 1000 万以上。

和平年代短短几年一个省非正常死亡 1000 万人，相当于 150 个汶川大地震夺去的生命。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 1958 年秋冬，结束于 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据四川的史料及廖伯康等官员的回忆，大跃进年间涪陵地区至少饿死 300 万人，死亡人口逾三成；丰都县死于“肿病”的就有 10 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自贡富顺县超过 10 万人饿死；荣县人口减少 19 万，仅 1960 年的青黄不接就饿死 6 万多人。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长宁县任副书记的泸州市委书记、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回忆，当年轻有 20 多万人的长宁县饿死了 7 万多人。

另据《简阳县志》记载，该县 1957 年人口 1233232 人，1961 年 864034 人，四年净减少近 37 万人，在全国已经公布人口变化的县级区域中，死亡之多绝无仅有。

1959 年庐山会议后至 1960 年春饿死人最多的时期，四川巫山县在长江三峡的悬崖绝壁上铲出“毛主席万岁！”五个高耸入云的大字，每个字宽达 1000 平米，加惊叹号总共 6000 平米，耗费了极其巨大的人财物力，仅刷字的石灰浆，就用掉 20 万斤，为此，而累死摔死的右派就有 5 人。

涪陵地区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 1959 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还以“反瞒产”、“反偷盗”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造成农民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 1958 年有 420 户、1818 人，到 1961 年只有 344 户、1138 人，两年间人口减少 37.4%，劳动力减少了 40%。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 141 人吃饭，到 1961 年 1 月只剩 70 人，饿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 135 人，死了 65 人，其中死绝 8 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 11 人，死了 10 人，只剩下一个小孩。云阳县农果乡，忠德的娃娃和妻子饿死后，他也耗到了皮包骨头，饿到神志不清时，就躺在地上咬自己的指头，皮肤和几个指甲盖都咬掉了，咬得鲜血淋漓，嘴上牙缝都是血。有人问他为啥咬指头，他说：“我吃……我吃的是红薯……红薯。”当天就死了。

坐拥肥沃川西平原的温江地区（成都郊县），大跃进年间总人口从 494 万骤降至 433 万，净减少 61 万人，算上出生人口至少 80 万人被饥饿吞噬；其中大邑县每五个人就有一人饿死；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死亡率达 40%，一个土坡上 6 具饿殍无人掩埋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空。郫县总人口由 28 万锐减至 23 万，算上出生人口不少于 7 万人饿死。一个流浪艺人为活

命出逃，被公社劝阻，站头目下令打断了双腿，还砸烂了“狗头”。

另据温江地委 1961 年的调查，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推动大跃进时大驾光临过的郫县红光社，当年有 4020 人，到庆祝皇恩临幸三周年时仅剩 2750 人，已有三分之一的人真的进了毛泽东开创的乌托邦天堂。2008 年，成都严文汉先生和友人们带着摄像机到原红光社去拍摄有关资料，听当地老人讲，在成都西边大致西三环外，蜀西路附近，尚有大饥荒年月埋葬饿殍的万人坑。严文汉等前去实地了解，斯地正热火朝天大兴土木，继之公路、高楼林立，大批冤魂饿鬼们亦将永远深埋于城市钢筋水泥之下，乃至永远从世人的记忆中消失。

《西充县志》记载，西充人口大跃进中，净减少 59430 人，算上出生人口不少于 8 万人饿死（当年西充约 40 万人）。西充乡友谢明旭著书《断层里的歌》，内有亲历大跃进的许多形象、生动的记事：“田地、房屋、耕牛、农具、猪鸡鸭鹅都归集体所有，家家户户的粮食、灶具都搜出来成立公共食堂，大人小孩都在伙食团的大瓮子锅里领饭吃。没出三个月，搜来的那点东西耗尽了，人们除了吃树皮、野菜，喝小球藻、盐井水，害水肿病外，还要在鞭子的威逼下‘白天干、晚上干、背起太阳月亮干’，放高产卫星。到处路荒行人少，坟乱饥鬼多。”并记下了他二哥外出多年后于 1962 年第一次返家时，老父亲向其介绍的情况：“大跃进三年，水肿病抵不住，院子里饿死了几十个人。……更惨的是你大姐，五个孩子，最大的才 13 岁，1959 到 1960 年一年多就饿死四个。”

西充籍抗日名将、著名教育家，曾任民国四川省主席、第 29 集团军总司令的起义将领王缙绪，1961 年活活饿死在成都的看守所，并有六个儿子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一些子女直接饿死于大跃进。我的一位西充街邻宋老师打成右派送农村改造时惨死于大饥荒，其家人亦受牵连下放农村，后来其遗孀携子女迁回了原籍营山县。文革前我在西充中学入团后时常被派“外调”，跋涉许多乡镇调查了解申请入团同学家庭情况用作“政审”，要求不但要查其家庭成份、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有无杀、关、管、斗等，还要了解其亲属在大饥荒中是否有过死人，以防有因饿死亲人而有所不满的学生混进共青团。1959 年，四川实产粮食 1582 万吨，四川省公布的当年产量竟然高达 3500 万吨，结果上方按这个虚报的产量征购，49%的公粮征不够，就以“反瞒产”强行从农民碗里夺粮。宜宾市在“反瞒产”中捆绑吊打基层干部 2500 多人。结果，逼保命口粮，全市 16 万农民饿死近 4 万人，差不多每四个农民就有一个饿殍。仁寿县“反瞒产”大会把全县公社干部一个个叫上台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基层干部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说藏了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们仅剩的一点保命口粮被收缴殆尽，致使全县饿死约 20 万人。

除了浮夸高产、暴力高征购刮尽农民们活命的口粮，大办水利、大炼钢铁等，瞎折腾导致粮食收不回来烂在地里，造成大减产，砍树拆房，锅灶砸尽，收尽私产，毁灭农民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只准在公共食堂喝大锅清汤甚至不准逃荒要饭，自行逃命，从而把农民们强行推上绝路等饿死逼死人的全国性主因外，中央从四川大量调粮，李井泉为虎作伥媚上欺下，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回忆，四川 1958 年开始连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却连年增加。1958 年外调 39.6 亿斤，1959 年外调 49 亿斤，1960 年外调 68.4 亿斤，三年外调粮比前五年外调的总和还多。在大量外调粮食的同时，全川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一哄而上，仅仅修水库就上了 600 多万人。

大饥荒中全国农民对公共食堂深恶痛绝，李井泉却揣摸圣意，步步紧跟，创造性地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将所有生活资源集中到食堂，以极端残酷的手段禁止农民自己煮食。结果在 1959 年秋冬到 1960 年春的全国性饿毙高潮中，四川许多公共食堂停伙，或变相停伙达几个月，又不准农民自己煮食，终于把几千万农民逼上了绝路。1960 年 7 月 1 日，正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的四川人，被一个晴天霹雳震得目瞪口呆：四川粮票全部作废！由此“节省”下 4800 万斤粮食，当局从万县等地抽调大批民工拉肩扛运送出川。我的长兄王森从新疆边陲寄来 5 斤，全国粮票，老爹刚到食堂吃了碗面条花掉 2 两，找回的 4 斤 8 两四川粮票，恰好赶上全部作废。

据大饥荒调查者依娃，访天和记述，1959年，我在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政教系有个来自四川的20岁出头的男同学，每天把自己的馒头尽量省下，拿到兰州西站黑市上去卖，一个一块钱。当他攒下500块钱时，却把自己饿死了。他死后，我们从他的日记里发现了秘密，原来他家来信说没吃的，让他寄钱回去救急。一个学生往哪弄钱？他就把自己那点保命的口粮挤出来卖掉，把钱存起来，想着假期带回家，结果没到假期自己就饿死了。政教系，处理他的后事时，用他卖馒头的500块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我的另一个姓邵的同学则正好相反，他饥饿难耐中写信向家里要吃的，收到家里寄来的5斤粮票，就跑到十里店食堂，全部买了馒头、米饭，一顿就吃光了，结果活活撑死。

荣经大饥荒幸存者余习广记载，1960年春，荣经县四乡八野，尽是哭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由于死人太多，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一些死绝的村庄更是无人埋尸，臭气冲天，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1998年出版的《荣经县志》记载，该县1957年人口为123717人，1962年为69656人，五年净减54061人，减少率为43.7%，成为了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大的县。并因此发生了凤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持枪抢夺国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其结果当然是轻而易举被镇压。

乐山井研县廖沛林回忆，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饿死。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天天都死人，每天专事埋尸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死猪一样拖走，免得第二天再麻烦。1960年，他们200多人又派到江镇修水利，由于很多人饿得走路打晃，一天的路途两天后还有17人没有到，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到江镇工地后死得更快，从每天埋几具尸体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原来，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后来增加到十个八个一堆埋。

毛时代，以铁幕统治的极权制度和乾坤独断的皇权专制，以解放、翻身、社会主义、当家作主等动听的名义，进行的大开历史倒车的“革命”，确实是一条恐怖的贫穷之路、死亡之路。廖伯康回忆1961年担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团市委书记时到长寿县开展工作，看到的情景：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到处树木砍光，房子拆来烧了，农民们家徒四壁，住宅如同猪圈；私人财产被搜光，大冬天甚至没有床和被褥；锅和灶台砸了，不准煮饭冒烟，只有一个到集体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人口大量减少，强壮劳动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惨不忍睹……

时任泸州市委书记邓自力回忆亲历的大饥荒：“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另据1961年8月四川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的调查，渠县大峡公社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其中三个生产队就有13人因吃泥土致死。该报告称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人多坑少，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

四川崇庆县（现成都崇州市）县委农村工作组组长郑大军，详细叙述了大饥荒中农村搞“坚壁清野”、饥不择食及吃观音土等情景：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开伙是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饱肚子就四处巡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能冒烟。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

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许多社员吃过观音土，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快要饿死的人，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为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时，就活活胀死了。有效的救治方法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甚至蓖麻油，溶化泥也溶化胃肠粘膜，令你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人们掏山泥把山都掏光了。

与饥饿相伴的，是农村干部打人成风，对于农民任意实施罚跪、捆绑、吊打等酷刑折磨及搜查、没收财物等各种处罚，其中“扣饭”最为普遍，亦因此造成了大量非正常死亡。四川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144 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 124 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和逼死的 33 人。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六队 70 户人家，就有 64 户被扣过饭。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四川长宁县桃坪公社，伙食团长以上干部 441 人中，扣过社员饭的 212 人，打过人的 19 人，捆过人的 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 31 人。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 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给饭吃，饿死了 3 人。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害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队长说他装病，狠踢几脚，回家即死。邛崃县道佐公社三管区二中队 43 户社员，被管区主任汪齐松打过的就有 40 户，其中 6 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12 岁女孩汪木林，饿极，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胡豆充饥，因恐惧挨打上了吊。后据工作组调查，仅被汪齐松直接打死的即有 5 人，打后 1 至 2 月内死的 6 人，3 个月后死的 11 人，打残废的 2 人。

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4 月，先后吊打社员 18 人。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五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每晚加夜班。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 50 多岁女社员杨慈民被怀疑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埋了。

进出四川的“蜀道难”加上当局严防死守不准外出逃荒，是大跃进中四川大量饿死人的原因之一。当年进出四川的铁路只有一条宝成线，四川规定出川买火车票都必须得凭证明。由于各地严控“盲流”，普通老百姓极少有人能开上张外出的“证明”，想外逃出川又买不上火车票的不少饥民就千方百计混上列车，却难免在查票等各个环节被抓“现行”。有的人就从绵阳等地沿铁路步行，走过江油、广元、略阳，钻隧道，翻秦岭，跋涉两千里，一直走到宝鸡，然后再买火车票逃往新疆、内蒙等地。

极权统治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没有监督力量，没有纠错机制，坏人当道好人挨整司空见惯。1959 年，雅安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荣经调查饿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被打成“三反分子”；廖伯康等亦因向中央反映饿死人问题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些整人的事尤其是四川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是为虎作伥的四川王李井泉为首直接干的，但背后撑腰的黑手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强制推行者，是自称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以致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等党国大员，想保护向他们反映四川实情的廖伯康等党人都无能为力、无济于事。

八、空前绝后“人相食”

有研究表明，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民国时期，是中国自元、明以来 700 多年间自然灾害的集中爆发期，各种旱灾、洪灾、蝗灾极其惨烈，加上内战、日本侵略等连年战乱，中国农村极度贫穷饿死的人也相当多；而“新中国”成立后开初的十余年，则是 700 多年中极其难得的好年景、好气候，却不幸发生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人为大饥荒。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之一。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割死，即千刀万剐。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这个过程非常残酷、痛苦。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饥饿的痛苦、生存的本能会驱使其不择手段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动物性压倒了人性，一切常人难以想像的恐惧现象发生了。

中国古代大饥荒有“易子而食”的记载，大跃进的“人相食”却有许多是狠心杀死自己的亲人充饥，甚至敲骨吸髓吃尽骨渣。一些地方全家死绝、全村人死绝屡见不鲜，无力掩埋的尸体遍布荒野田间，死人被食、杀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间互食、食人者又被人食……安徽亳县的人吃人包括“父母吃儿女、儿子吃父亲、杀亲吃肉和杀人吃肉”等等怵目惊心的现象。当年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饿死5口。梁志远记述，亳县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全家4口人饿死3口，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亳县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王某的老婆将十来岁的亲生女儿杀死后煮吃；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将其亲生儿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观堂公社张庄张韩氏全家4人饿死2口，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打死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时时呼叫女儿的名字。亳县县委生活检查组长陆美，1960年3月3日向上级汇报，魏庄公社，蒿庄，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吃。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活人吃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有些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人饿死后，未及埋葬就被抢走了。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

另据梁志远回忆，亳县农村没有饿死的人，由于饥饿无力，不能掩埋饿死的人，在路旁、田间、集镇街巷、食堂门口、学校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薛竹园村，因没有劳动力抬埋，就用车运尸体的办法，把尸体拖往地里。双沟公社高范生产队，因无力挖坑，就把不少尸体投在田间的枯井里。1960年10月，梁志远在十八里公社，集南杨庄的肿病“治疗点”上看到，浅埋在河坡上，“露头露脚”的尸体，就有7具。

由于饥不择食，亳县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数以千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一家5口全部死亡。1959和1960年的新粮接口季节，饥饿过度的农民，因暴饮暴食而死亡的不在少数。张集公社北曹大队早庄生产队，1960年5月15-24日10天之内，因暴食青麦、生麦、就撑死了10人。安徽无为县听说有刚死的人，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都是饥饿的原因。”

原甘肃省妇联主席李磊《悠悠岁月》及有关调查披露，大饥荒时，甘肃临夏发生大量人吃人现象，全市10个公社，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红台公社”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锦光9小队的马希顺家，吃了病人的尸体，全家11口人，全部死绝。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多人。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多具尸体。“红台公社”李家庄、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社员马一不拉夫妻把14岁的女儿杀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虬藏公社社员马阿卜都，临死时嘱咐女儿：“我身上的肉没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另有一对夫妻商量先吃掉两孩子保命，等以后有粮食了再生。他们先杀死吃了一个娃，觉得有力气了，又吃了第二个。为了避免中毒，他们挖来野菜和娃娃的肉一起煮食。干部到他们家发现娃娃的头和脚还煮在锅里。

1960年春，甘肃陇西县一个小伙子打死母亲，把剔下的肉腌在坛子里，藏在地窖慢慢吃，地窖里冒出的腐臭味呛着了邻居方才事发。通渭县鸡川镇苟堡乡谢振翼回忆：社员牛宗祥剁了人肉在家煮食，被公社书记知道后搜去倒在山沟里，同村一饲养员天黑后把倒掉的熟肉捡回一脸盆，暴食后胀死。据“依娃采访”记载，通渭县新景乡白杨林一个妇女，外出把自己的小女儿关在家里，小孩饿得受不了，跑出门。村里有人骗她吃馍去，骗去杀死吃掉了。岷县马乡，桥沟村，一个妇女全家饿死，她饿得神经失常，将邻居家的娃娃哄来家，杀死后用脸盆煮食。和政县一位老爷爷，饿极了，杀死自己的小孙子吃掉了。甘谷县大庄乡有个老妇趁儿子、儿媳外出杀死孙子吃人肉，案发后判死刑枪毙了。通渭县白杨林一对夫妻饿得把自己女儿打死煮食，

却没有给两个儿子吃，结果这对夫妻死了，没吃上人肉的两个儿子倒活了下来。

另据沙青，《依稀大地湾》记载，通渭县大饥荒中一农家饿死得只剩下父亲和两孩子，一天父亲把女孩赶出去，女孩回家后看到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弟弟却不见了。几天后，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爬到灶台添水生火，目露凶光，招呼女儿过去，吓得女孩躲到门外大哭，哀求：“太太，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没人给你做活了……”该县鸡川镇上店子村一户男人将自己女儿拖到外面捏死，然后拿回家剥开煮食，她的母亲毛巧妈，边吃女儿的肉，边哭说：“吃我自己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呢！”

原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回忆、记录了该县大饥荒中人吃人的大量惨况，还有一些令人心酸的“故事”。“鸡川公社某村”，一家人，丈夫在外地工作，寄来十多斤粮票救急。这家女人用粮票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多日不出，村里人发现异常后翻墙进去，看到几个孩子早已饿死，这家女主人却不知所踪。直到十多年后才揭开谜底，原来这位女人抛弃儿女，背着面独自逃命，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死吃掉了。另据一位干部讲述：当时我们家有 6 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就悄悄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捣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我活了下来弟妹们却都饿死了。一年后父亲从洮河工地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以后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终于把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 30 多岁。

“依娃采访”记述：甘渭县，“鸡川四堡”，一个叫何顺祥的半大娃从食堂打来一碗稀汤，他妈妈与之争食，他把妈抱到土崖下摔死了，结果被警察抓走，关到 18 岁枪毙了。通渭司家川的一个饲养员，从活驴身上割下一条腿，还没煮熟就开始吃，结果肠子胀破而死。通渭，陇阳乡周店大队，一个老妇出嫁的女儿回来看望妈妈，饿极的老妇在半夜掐死自己的女儿，将其尸体剁碎储存，天天以自己女儿的肉，维持生命。和政县三十里铺马家河大队一位 50 多岁的老阿娘，吃了自己一家 5 人：先吃了饿死的丈夫、3 个儿子，最后砍死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尔依努煮食。和政县，城关镇，后寨子大队，“阴洼村”一个男人，将自己的小娃娃用破被子捂死，因没有力气下炕生火煮熟，就生着啃吃自己的娃娃，最后还是饿死了。通渭县陇阳乡周店村一位老奶奶，竟然一共吃了全家 7 口人，先吃了饿死的 6 口人，最后又把家里唯一活着的小娃娃割死吃掉了。

另据甘肃省秦安县王堡乡罗店村，“王碎狗老太太”回忆：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她家里饿死了 8 人，她天天和妹妹在地里挖野菜吃。本村有饿死者因为埋得浅，尸体被狼，扒出来吃掉了，王碎狗挖野菜时挖出来一条人腿，抓在手里就啃，她记得上面已经没有血色了，只有干干的皮。秦安县冯坪村一个外地逃荒的人饿昏在路上，另一个人在他还没有咽气、腿还在一伸一伸时，就下手刮肉吃。秦安县杨湾里有个老师路过通渭县牛家坡，在河湾里被人拦住杀掉刮肉吃，家人得到消息赶来时，见到的只是一副骨头架子。

安徽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王冠群载文回忆，该县林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1960 年 1 月将自己 6 岁的亲生女儿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以杀人罪判处死刑。亳县法院原秘书尚振华回忆所经办的一个吃小孩的惨案，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吃掉自己的死孩后，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死于狱中。《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 1960 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 63 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 8 岁男孩小青勒死煮吃了。另据安徽亳县农行离休干部王体忠回忆：1960 年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吃人肉成风，该村王某的前妻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就被干部抓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会场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肉味竟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将一盆人肉抢得精光。湖北利川县一个 9 岁小孩难忍饥饿折磨，自己搓了根草绳吊死。河南信阳李世平一家，和一个叫王振宇的争抢新坟尸体发生冲突，黑灯瞎火中王振宇倒地身亡，李家人不再扒坟，把王的尸体抬回家后立马割肉下锅，被村干部发现后，李世平被打死。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记录了

其母在大饥荒中的遭遇。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 7 个人。”“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家族饿死 6 个，全村饿死 100 多人。”

河南信阳地区有的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有的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就吃了 200 多具尸体。河南永城酇阳公社何全德夫妇吃人肉被发现后，公社书记授意由公社社长、武装部长等，将二人骗到公社，用砒霜将其毒死以灭口。据“李素立调查”，在商城县、余集工作的雷前修，听说全家人都死了赶回家去，途中天黑时被人杀死，割肉抛尸。上石桥大队的一个算命瞎子因为长得胖，在上石桥东岗被人杀吃了。商城退休教师汪流凯回忆：他有个姓黄的表弟，到在外的哥哥那里找吃的，哥哥等了两天没有见他，后来在上石桥西边的灌河河滩上发现了他被杀的尸体，屁股、大腿上的肉被人割走了。当时商城天黑了没人敢走路，两人行路，没人敢走前面，因为后面的人随时都可能把前面的人杀了充饥。

另据“李素立记载”，河南永城，荒北何庄，何派澜老汉说：我们庄，当时有 287 人，死 152 人，剩下 135 人。我们庄的何玉超，三个儿子，杀吃两个。杀了老二老三，要杀老大，老大跑了。又要杀吃他娘，他娘跑到我家，说儿子要杀我。后来不知他娘上哪去了。商城县、双椿铺，有个叫胡名新的木匠，去古城找表哥，半夜里被表嫂和表侄杀死，做成了腌肉。第二天队长发现他们家有肉，就上报说他们杀牛，结果发现不是牛肉是人肉。息县项店公社陈登常将他 6 岁女儿掐死煮吃，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 20 年，死于狱中。原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父母都饿死了，她实在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竟将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吃了。这个案子报到张树藩手里，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批准将这女孩抓起来。他说抓来关起还有牢饭吃，看能否活出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了。自古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大饥荒中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十分惨烈。据《墓碑》书载，1960 年 3 月，四川灌县（现成都都江堰市），“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一个潘姓妇女的丈夫死亡后，当晚深夜她带上锄头、菜刀、背篓，挖开丈夫的坟，将尸体弄回家，自己把肉吃了，把骨头冒充熊骨售卖，一斤 1.5 元，共卖 11.75 斤。四川大邑县安仁九管区女社员刘元芳，1960 年 4 月把 8 岁亲生女和 9 岁亲生儿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原因是这两个孩子偷了社里的豌豆角二斤五两，当天中午，事务长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因为吃不到饭做活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逼得走投无路，最终把自己两孩子整死。另据当年崇庆县县委农村工作组组长郑大军发现后所作的调查，该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间，发生大量千奇百怪的人吃人现象。全队总计 82 户 491 人，83% 的家庭有过吃人史。尤其是女孩成了被吃的重点，虐杀并吃掉 7 岁以下女童 48 人，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女童的 90%。心狠下得去手的，就爹娘亲手干；不忍直接杀死亲骨肉的，就同别的父母换着下手。被杀吃的女孩个个皮包骨头，为了多吃几口，有的把骨头砸碎，在石臼里捣成骨粉吃，丁点不剩。一个叫莫二娃的因虐杀吃掉亲女，又吃掉邻队，两个男孩，案发后被判处死刑。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载文披露，1961 年 4 月 23 日，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报送了一个《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 1959 年以来，共发生 1289 起（人吃人“特殊案件”），其中阜阳专区 9 个县发生 302 起，蚌埠专区 15 个县发生 721 起，芜湖专区 3 个县发生 55 起……合肥市 3 个县发生 201 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 1144 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 36 起，其余 1108 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中国大饥荒期间发生的人相食惨剧，足以让人类历史上任何与饥荒有关的惨案相形见绌。倘若稍微有点把老百姓当人看的人性良知而及时刹车，采取点救助措施，大跃进造成的人为大饥

荒何以能持续四五年之久？何以会造成惨绝人寰的人相食悲剧！？

大跃进中干部的腐败和特权极其突出，贯穿于各级官场。一边是普通老百姓食不裹腹、大批饿亡，甚至人相食，一边是大刮“干部特殊化风”，大肆侵吞民脂民膏。据甘肃定西地委扩大会议 1961 年 1 月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用专车从甘肃最好的兰州饭店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 1960 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 339 斤、油 23 斤、鸡蛋 260 多个，以及火腿、鸡、罐头、水果等。河南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出入都有五六个卫士随从，去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一次就摆了 24 个菜。而据杨继绳的采访调查，大饥荒中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干部们尅扣农民口粮大吃大喝，还把小春剩余的 2000 斤种子私分了，致使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后来又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享用。长宁县“桃坪公社”12 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就有 9 人；全公社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 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达 68%；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 年为父亲祝寿，竟办了 20 桌酒席；碾盘大队 53 名干部，1962 年 1-8 月就多吃多占粮食 1661 斤。社员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们却经常私下“打平伙”（聚餐），搞“加餐运动”。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因毛泽东视察而闻名的郧县红光管理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 200 多斤。过春节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 150 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 90 多斤，还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 年元旦后杀了一只重 130 斤的猪，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死人累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独柏管区党支书游福群这对恋人，却利用职权擅自拿走吃掉了 60 斤。古蔺县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五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一次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即宣布“扣黄的饭”。黄说了句：“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将黄按倒在地，拿大粪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屎。广东南雄县始兴公社上至公社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公社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另据河南商城县委 1961 年的一份调查，该县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干部经常多吃多占，有一天食堂会计黄盛年与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二人当即把这小孩捆绑捂嘴，“装进罗筐”，半夜时摔到水塘里淹死。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在食堂烙馍吃，被刘保山的 6 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女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这种大规模、全方位的权力腐败，无不是以牺牲大量生命为代价的，以致大饥荒中普通农民大量饿死，却极少有干部或食堂炊事员家里有饿死的人。甘肃通渭县大牛沟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但凡村里来了干部，她就一直紧跟着，等那些干部一解完便，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据说干部有粮食吃粪便里有营养），从而活了下来，成为大饥荒的幸存者。临夏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郭昌华回忆：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人找人屎吃，她把路边那个大粪吃了，就死掉了，那个女的也就 20 来岁。

九、人居、生态全遭殃

多年来无节制的资源消耗，水土流失、河湖干涸、土壤恶化、水质变坏、沙漠化、沙尘暴、温室效应、空气污染、雾霾弥漫、食品药品问题频发等等，像一把利剑高悬在中国人头上。一些人把中国的生态环境毁坏完全怪罪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远远忽视了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造成生态、人居灾难的历史渊源、严重后果。

中国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大破坏，在野蛮掠夺、坚壁清野“大跃进”的胡作非为中，达到了最高潮。那年月在毛泽东一道道无人敢违逆的旨意下，不但把“与人斗”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得昏天黑地，而且把“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与天斗”、“与地斗”搞得风生水起，

对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极其惨烈。那年月为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梦呓，强迫人民像牲口一样无休无止的干活——没日没夜大搞“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改天换地”；大举毁林、填湖“开荒造地”；停工停产，荒废农田，强制千军万马“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不惜民脂民膏，大搞一波波荒谬绝伦的“发明创造”；搜光农民们赖以生存的私人财产，包括砸毁灶台、锅碗不准自己做饭吃；甚至大举拆毁民房，活生生把许多农民变成居无住所的“野人”，或多家多人挤住一处的“囚徒”。一系列野蛮、疯狂的瞎折腾，不但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能力，而且因乱挖滥伐、水土流失、树木砍光、房屋拆毁而造成生态和人居环境大破坏。

“大办水利”作为大跃进的“开篇大作”，上亿人被强制投入到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下苦力，累死饿死多少人还导致泥石流滑坡、河流淤积和洪水泛滥。搜光金属用品“大炼钢铁”，拆掉农民的茅屋和土墙做肥料，或铲光地皮，用柴草“熏土造肥”，再“深耕十丈”放卫星，毁灭了自然资源和农民财产，进一步造成了人居、生态环境破坏。1958年举国“除四害”几乎将麻雀灭绝（当年全国消灭麻雀20亿只；北大全校停课停工三天专灭麻雀，取得消灭麻雀502只的战绩），1959年全国即发生麻雀作为害虫“天敌”覆灭后的大面积虫灾。大凡可以抓到的，“蛇虫蛙鼠”等小生物，悉数成了饥民们的美食。无不都付出了破坏生态平衡、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我小时候亦曾参加全民上山吼麻雀，下乡参加“大办水利”、春种秋收等各种劳动，映入眼帘的是茂密的林木、青山绿水，但在大跃进后再下乡，看到的只是一望无垠的荒山秃岭。

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强制并村居住，把山上树木和农民住房砍光、拆光、烧光，短短几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森林毁灭和人居环境破坏。1959年4月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调研时向上书面反映，“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山东寿张县短短时间即强拆民房53000间，挖掉祖坟38000座。广东南雄县为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强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并用炸药和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拆除前要求群众一天搬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被拆掉住房的群众住牛栏、粪寮，痛苦不堪。河南临汝县扒光村庄50个，群众被迫迁村130个，扒掉民房21966间，荒芜土地54950亩。刘少奇1961年春返乡视察时记录，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1415间房屋，经历大跃进的横祸后只剩下破烂不堪的621间。上海奉贤县1958年11月在消灭棉花红铃虫的工作中，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全部烧掉，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大办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同意，对尸骨也不做善后处理。

四川荣县大举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遭拆房被迫搬家。仅有20多万人的郫县拆毁房子12000多间，仅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公社合兴分社就毁灭房屋2768间。为沿灌公路搞一条“高产带”，数千间农舍一夜之间强行摧毁，几十上百农户如同囚犯般挤住到一处。许多地方拆房子时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砸门撬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人外出一趟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只能伤心痛哭。由于大量民房被强拆，有的社员一年搬家七八次，各种财产、牲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集中住地拥挤不堪，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有的公婆儿媳同居一室，在这一间房子内还要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大跃进年月我看到的西充城郊鹤鸣新村、烽火新村、刘家嘴新村等，也都是1958年拆毁农民住房，强制集中居住，乱砍滥伐树木修建的。

一系列鞭子驱使的苦役和疯狂的蛮干，毁尽了田园也榨干了人的生命力，严重破坏了人居、生态环境。大跃进的大破坏加上持续多年大搞“以粮为纲”的毁林开荒、填湖造地、弃牧开垦、围海造田和“向自然开战”、“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与天地宇宙为敌的“战天斗地”，致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急剧恶化，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

1957 年，以“圣人出，黄河清”等颂扬毛泽东的理由，将黄万里教授等反对人士打成右派而强行上马的三门峡水库工程，耗费了巨大的人财物力而造成黄沙堵坝、渭河水倒灌、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几十万人移民的血泪史，几经改建、反复折腾几十年后依然面临着无法解脱的顽疾。

1958 年，湖南省组织大批农民迁移到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建立许多大坝围堵洞庭湖水，使得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变成了“三百里洞庭”。新疆罗布泊曾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1958 年尚有 5000 多平方公里湖面（相当于五个西充县大），由于大跃进对上游河流的野蛮开垦而没有河水再注入，到 1962 年，整个罗布泊即完全干枯，很快成了荒漠戈壁。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草原之一，却在 1958 至 1962 年开荒 20 万公顷，仅仅两三年后，最肥沃的草原牧场伏沙、露出，形成流动沙丘，逐渐掩埋草场。辽阔大草原的“风吹草低见牛羊”，许多成了“风吹黄沙无牛羊”。1958 年，甘肃省搞“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 1400 公里、翻越 800 余座山岭的大水渠，试图把洮河水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 17 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而卧，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拼命折腾了三年，无数民工葬身工地，还加剧了甘肃省的大饥荒，结果一滴水没引来，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大破坏。

兰州是一座两山夹抱、黄河中流的西北名城，1930 年代尚有树木茂盛的“林泉幽闲”“林木葱郁”之景，由于大跃进时期的乱采滥伐，兰州的植被急剧减少，留给人们的只是绵延横亘的荒山，给人民生活 and 城市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曾以山清水秀闻名于世的“陇上小江南”、大熊猫栖息地甘南舟曲县，其森林资源在大跃进时期遭受掠夺性破坏，加之持续进行大面积开荒、毁林，导致水土严重流失和生态环境的超限度失衡，加剧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直接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安全。以“植物王国”和动物、森林资源丰富著称的云南省，大跃进期间遭受严重的生态和资源破坏。1969 年起，云南又组织 10 万人从昆明西山开采、运输大批土石方搞“移山填湖，向滇池要粮”，活生生填埋 3.5 万亩滇池湖面，建农场，严重破坏了昆明地区的水陆生态。滇池农场建成后年年亏损，财政补贴 1000 多万元，依然无法养活农场，拖到 1982 年被迫停办。

北大荒农场先后接受京津沪等地下乡知青 100 万人，这些兵团知青挥动原始的锄头、铁锹，冒着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战天斗地建“粮仓”。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内陆湿地，短短十几年北大荒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内陆湿地濒临消失。广东生产建设兵团数万知青和农垦职工在浅海垒起石头堤坝，“削山填海”，使“海滩变良田”，然而一场黑潮冲毁堤坝，卷走房屋，死亡数百人，还欠下了一笔生态账。

湖北省从大跃进进到 1970 年代，湖泊大量消失，产林县大幅减少，成林、过熟林蓄积量下降了 50%。由于上游森林植被锐减造成水土流失、水库淤积等原因，1975 年 8 月河南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 56 座水库（大多是大跃进中以打死饿死多少人的代价修建的低劣水利工程）在特大暴雨中垮坝，千里中原一片汪洋，至少 8 万人丧生洪水。

一系列逆天理败人伦的愚蠢蛮干，从大跃进进到文革末期不到 20 年，中国的沙漠化面积超过 1949 年以前的历史总和，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300 万平方公里。据中国社科院报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四省区 1960 年至 1962 年新垦荒地 1000 多万亩，新疆 1949 年以来所开垦的 333 万公顷耕地，大多是以前的优质牧场，由此造成了牧场和森林面积锐减，成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五灾”俱全、“四料”奇缺的重要原因。

历来生态环境良好的四川省，1958 年前森林覆盖率 33%，到 1980 年已剧降到 13%，短短 20 年森林资源毁掉了一大半，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其惊人。西充县大跃进中的森林毁灭是我亲眼所见，以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1970 年代我离开西充去外省谋生后，听说西充没柴烧，甚至烧红苕干做饭。若不是大跃进后赤地千里的洪荒，“苕国”人谁愿意把自己千辛万苦制作、用以度荒的红苕干当柴禾烧呢？一些西充老同学反映 1970 年代的生活之苦，甚至同大跃进——大饥荒有得一比。

西充县城，两河汇一河，穿城而过，传说当年张献忠君临西充时感叹“一城包三江，必定出帝王”。后来张献忠战死于西充凤凰山，绝了“出帝王”的美梦，但那宛如腰带的“三江”直到 1950 年代还是我等孩童戏水的绝好去处。然而自从大跃进砍树、拆房、挖祖坟，烧光、搜光、刮光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后，三条小河逐渐成了水量骤减的死河，1970 年代起成了令人生厌的臭水沟。直到 2000 年后痛下决心进行大力度的“两河治理”，方才基本上消除了死臭现象，新建了河岸景观，改善了人居环境。

我离开西充前夕，大概是 1970 年，久卧病榻的老母想吃水果，我干活下班路过街边小贩处买了一个广柑，称一称说，要 3 毛 3 分钱，我掏遍腰包找出 3 毛 2 分，差了 1 分钱，小贩就硬是不卖，气得我差点动粗才买到手。那时的 3 毛多钱不是小数，一个广柑卖这价钱不可谓不贵，盖因为大跃进中林木毁光水果成了稀有之物。

那年月四川各地的生态环境损害都极其厉害。一年夏天我在川大校门口的锦江边洗脚时，忽然感到脚底莫名发痒，一看竟然有条寸多长的蚂蟥钻进脚底肉里，幸好赶紧用毛巾捏着拔了出来。当时成都府南河成了藏污纳垢、排泄各种生活和工业污水的大动脉，河边垃圾随处可见，河水的污染相当严重。接着又拆掉皇城修毛氏“万岁馆”，把御河、金河改建为防空地道，并截流三道河，填埋蒋家堰、砖头堰……经过“填湖埋河的建设”，白家塘、王家塘、莲池街、水碾河、小河街以及半边桥、青石桥等许多叫河、塘、池、桥的地方，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名字。“水润成都”的城市景观成了绝唱，成都也逐渐变成了“尘都”。“水绿天青不起尘”、“花重锦官城”的生态美景成了远去的历史。

毛时代，中国社会接连不断的震荡与破坏，导致了中国人民连绵不绝的痛苦和灾难，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大破坏，则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农村极度的贫穷与落后。与外界完全绝缘后被暴政和谎言成功洗脑的中国人，还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中等待自己去解放。1960 年代中苏论战时说苏修污蔑中国人两口子穿一条裤子，其实这“两口子穿一条裤子”或“大姑娘没裤子穿”，确实是当年中国农村贫穷到极致的实情。

公安部老干部晏乐斌回忆 1960 年冬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时，到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的经历。水城后来隶属六盘水市，也是 1977 年我考上大学前生活工作过的三线基地。晏乐斌说那年冬天他自带行李住进水城尖山坝公社嵩枝管理区总支书记杨书记家里，发现杨书记一家三代七口人挤在 30 多平米的简陋土房内，到晚上睡觉时他带去的被子已被这家的姑娘打开钻了进去。而当这个 18 岁的姑娘极不情愿地让出被窝站起来时，竟然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杨书记说她们母女俩就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当妈的穿了裤子女儿就只有赤身裸体了。他说女儿没床平时就睡柴草堆，恳求晏乐斌和自己女儿同挤一个被窝，晏乐斌无论如何不答应，钻进柴草堆里熬过寒夜，离开时还脱下一条裤子送给这家人。

直到改革开放真正开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后，以“大跃进”为最烈的毛泽东时代生态环境大破坏后，毫无承载力和再生能力的土地、河湖、山川竟然如此脆弱，如此经受不起开发利用，很快呈现出塌方式的生态崩溃。改开以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可谓不大，并且依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邪路”，但毕竟有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年间自然生态、人居环境大破坏，进一步导致贫穷、落后、饥饿、死亡和当奴隶下苦力，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在讨论生态环境和污染问题时，但理当有所区别、客观看待的。

1960 年 7 月 26 日，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像拎小鸡一般拎进中南海。女子来自湖南衡阳，名叫刘桂阳。当问到“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时，青年女子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脚镣还在地下打滚、挣扎，声泪俱下地哭诉：“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

了，一些人家的门都灭了。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我

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着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正在北戴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

1960年上半年，大饥荒中饿死人最惨烈的时期，神州大地，暴增饥魂，鬼哭狼嚎，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这个湖南辣妹子的哭诉如同当头棒喝，震动了中共高层，不知是否震动了铁石心肠的毛皇帝？

饿殍遍野、百业萧条，满目荒凉、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形势，终于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放下面子，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做出让步，同意了李富春、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际上就是“调整”政策），暂时同意了刘少奇等不再搞大跃进并解散公共食堂、退还农民私产、允许承包土地、尽快恢复正常的主张，各地农村无法无天的胡闹有所收敛，饿死人数大量减少，全国形势逐渐好转。至1962年初，毛认为“让步”已够，遂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全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提出重新开始大跃进及大幅提高征购量，引发与会者普遍不满、大倒苦水，反映出大量骇人听闻的惊人灾难，迫使毛不得不放弃再搞“大跃进”主张，并继续降低粮食征购。长达几年，饿死、打死、逼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开始收场，除李井泉领会圣意顽固坚持致使四川1962年仍在饿死人外，全国总体上较快走出了大跃进造就的地狱。

十、旷世大难的演变和反思

政治高压的恐怖，中邪发疯的盲从，鞭子驱使的苦役，猪狗不如的打压，排山倒海的荒唐蛮干，铺天盖地的吹牛撒谎，扫荡殆尽的人权、私产和思想、说话的自由……终于逼出了一场旷古绝伦的大灾难、惊世骇俗的大饿毙。

中国那场非正常死亡——打死、逼死、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由于大多死于偏僻的农村、各级各方严密的封锁、疏而不漏的社会控制、所有媒体不敢报道等原因，几十年来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以至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到文革前最后一年1965年，人民日报每年10月1日的头版特大新闻，竟然全是《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其中1960年“盛大招待会”的报道称：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佳宾满座”，“四千多中外人士欢聚一堂，相互频频举杯”，会场“喜气洋洋，全场欢声不绝，掌声雷动”，“完全变成了一座……欢乐之宫”。

1960年光是饿死、打死、逼死等非正常死亡，就超过了日本侵华十倍，屠杀中国人民的总和，不知这国难年份的“盛大招待会”的欢乐气氛是如何营造出来的？难怪那些年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声称他们最盼望的事，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去大饱口福、大快朵颐。

1960 年饿死人最多时，毛泽东曾作秀“半年不吃肉”，却只是不吃猪肉，据官方出版的毛《遗物事典》记载，1960 年代初，毛泽东享受的各式牛羊鸡鸭鱼虾美食就有七大系列至少几十道佳肴，还要从香港专购澳大利亚麦片，从武汉、长沙专机空运活鱼。毛出行的德国进口豪华专列犹如移动宫殿，到行宫一住下来整座山都要清空，如坐飞机则中国所有的飞机都要停飞。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历经十多年全国采访和查阅档案资料，写就反映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近百万字巨著《墓碑》（本文有若干引用），为那场被深深掩盖的人类大劫难留下了一部恢宏的历史实录。不少中国人认为，大跃进几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造成了天文数字的超大规模死亡，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异数，无论是其人祸的惨烈程度，还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多，绝对空前绝后：前无古人，也不可能再有后来者。

然而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超大规模死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周恩来还亲自下令并监督销毁了各省报上来的关于人口减少了几千万的资料。上世纪 80、90 年代各地修编县志等地方志时，当地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及非正常死亡数据不准入志，各地现存的有关大跃进-大饥荒档案资料至今保密，不许查阅。

我也感慨“解放了”“新社会”“当家作主”等等虚幻的欺世盗名的概念长期被人喋喋不休地念叨时，大饥荒那数以千万计的冤魂饿鬼们若九泉有知，当会作何感想？1959 年反右倾时，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等，因采取了一些救灾救命措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要跳洛河。郟县转业军人杨心田给工作组干部提了意见，遭毒打被迫外逃，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抓回来，被斗争后没几日就丢了性命。1961 年，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联合几位党员干部写出《现在形势怀感》等文章，提出“初期社会主义”理论及如何发展农业经济的真知灼见，受到中共西安市委、陕西省委、中共西北局的高度评价，却引起毛皇帝龙颜震怒，杨伟名和妻子被逼服农药自杀……毛泽东时代，残忍血腥的皇权专制，迫使全体国民三呼万岁跪地为奴，包括一千党国大员也如同家奴、动辄得咎，与“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主人翁”“为人民服务”的说教，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

直到 1976 年，毛死、妻囚后，枷锁迅速打破，思想冲出牢笼，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许多历史真相的逐步揭示，大跃进、大饥荒的惊人灾难方才渐渐浮出水面。三四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即习惯说的饿死人数量，据许多学者查阅档案资料、采访幸存者和当事人回忆等进行的各种研究，得出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数据，有 2000 多万 3000 万的，也有 4000 万 5000 万乃至更多的。而据 2005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同意有限制解密的大饥荒年代“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755.8 万；如加上这个统计，未计入的 1958 年及部分省级、地区数据，这一权威的“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肯定不少于 4000 万。据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包括中国披露的比较高的也比较一致的数据，全世界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人口为 1000 多万，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人口为 4000 万，到 5000 万。二战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长达七八年时间，而中国一个国家在和平年代的短短三四年，却造成了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亡总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了 100 个南京大屠杀，相当于 150 个唐山大地震或 500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死亡。

而据陈玉琼、高建国发表在《大自然探索》的论文，1949 年之前的 2129 年中，中国共发生 203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总共造成了 2992 万人死亡。这是洪灾、旱灾、风灾等各种气候灾害造成的死亡总人口，自然包括因灾饿死的人。中国现代史上“新社会”短短几年大饥荒饿死的人，甚至超过了以前 2000 多年饿死人口的总和！

另据 1947 年 2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从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的八年抗战期间，全国军民战争死亡总人数为 572 万多人，其中军

人 1328501 人、平民 4397504 人。和平年代短短几年“大跃进”饿死打死逼死的人，竟然相当于八年抗战全国死于战争总人口的 7 倍！（93 岁离休干部张瑞月评语：572 万乘以 7 是 4004 万人，而真实地饿死打死逼死的人是 9600 万人。）

袁隆平曾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大跃进—大饥荒刺激：“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饿死者）倒在田坎地头，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的啊！”

如何搞农业生产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1949 年后，被毛泽东折腾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直至搞得尸横遍野、亿万生灵沟壑中。那些年美国以不到 5% 的农业人口养活了全国还大量出口粮食，中国农业人口超过 80% 却老是吃不饱饭。那时长期时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保吃饭，各行各业都要支农包括我自己上中小学时就不时下乡无偿效力，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吃饭的城市居民们被赶下乡“义务劳动”，更是年复一年的家常便饭。这种全国人民搞饭吃却总是吃不饱饭的怪现象，到改革开放对人民“松绑”后顷刻烟消云散，包括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好多农田抛荒依然从未缺粮甚至还为粮食卖不出去发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场大饥荒完全是由剥夺人民生存权利的人祸造成的特大惨案。而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看，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超高速发展，在“复辟资本主义”后并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是“千百万猪头落地”，回想那年月对于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和谎言洗脑，真的要笑掉大牙了。

由于高度集权的、事实上的皇权专制，经过 1949 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直至 1957 年至少 50 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全民遭“封口”，堵塞了一切言路。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统治者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来源，不容易听到真实的情况，更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从而使得高度垄断的极权制度很难具有纠错能力。而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具有纠错机制，具有监督力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所以诸如苏联的乌克兰大饥荒、中国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朝鲜持续多年的漫长大饥荒，都没有在民主国家发生过，包括印度这种非常贫穷的人口大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饿死人的持续性、大范围的饥荒。早在 1958 年，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逐渐暴露，不少地方就已发出饿死人的信息，其中云南省当年 38 万多人患浮肿病，死亡 39 万人。到 1959 年 4 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 15 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 2517 万人。这些省市的报告毛泽东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毛亦因之提出纠偏，但毛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他提出及力主的“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不敢正视他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总是夸大大跃进的“成绩”，总把“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绝不能怀疑“三面红旗”，影响自己的主张和威望。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挺身而出，如实反映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希望认真纠错时，由于违反了毛只愿对大跃进的一些细枝末节纠偏、绝不能全局纠错从而有损大跃进、人民公社和自己的威望，致使毛歇斯底里勃然大怒，不但把彭大将军打落马下，而且使 1959 年春天的一切纠偏措施来了个急刹车，使 1958 年的那种错误政策进一步泛滥开来，从而使原本打算降温的大跃进更加疯狂，大饥荒亦因之猛烈加剧，并持续到四五年之久。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灾难，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灾难。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裹胁全党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冲冠地发下毒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表达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将大跃进进行到底的决绝与固执。1959 年庐山会议从发现问题，想纠正的原意，转变为变本加厉扩大错误“继续跃进”，维护了极权制度，强化了皇权专制，起到了杀鸡吓猴、迫使中共高层面对国之大难也不得不盲从的恶劣作用，使得偌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好大喜功、狂妄自大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由于一党独裁变成了一人独裁，毛的行为失去了任何制约，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

纠错目的，而且以“反右倾”继续放大错误，1959年上半年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进而将大跃进推向无底深渊，推动中国加速往火坑里跳，造成了远远超过庐山会议之前的生命大灭绝。尤其是1959年秋冬至1960年春的短短半年时间，由于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暴力逼粮、酷刑打压，所造成的打死逼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绝对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哪怕是任何大规模的战争中短短半年时间所能造成的人口死亡。而从社会背景和制度根源上看，建政之初，以掠夺方式杀害了200多万“农村精英”，优秀种田人（地主等）的暴力土改，以镇压反革命名义和朝鲜战争掩饰实施的大屠杀，枪毙了诸多国军抗日将领、社会精英人士，加上以取缔会道门和迷信组织名义对宗教信仰的残酷打压，摧毁了几千年的农村人文生态，毁灭了传统的国民性，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堕落，从而为暴政和暴民的泛滥成灾首开先河；三五反、三大改造、反胡风、肃反等运动，接连不断整人害人，制造冤假错案，大搞暴力统治和政治倒退；迫使人民终生为奴的统购统销户籍、粮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消灭个私经济大搞穷过渡，从而把“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全民枷锁制”、“全民空有制”；加上从物质到精神各个角落的严密控制、全面专政与穷尽古今的政治高压、思想改造、反复洗脑……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够将人类的彼此相残，发挥到如此恐怖的极致。这也是这场使全人类笑掉大牙，却又无比悲痛的大跃进、大饥荒，之所以能没有阻力、顺利发生。出现各种丧失人性、互相残害，不断打死整死饿死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1960年代四川资阳县一位汪姓男子结婚，却拿不出什么招待客人，新郎为摆脱尴尬随口说了句玩笑话“我们最好成立个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党”，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和到场贺喜的亲友，悉数被捕，全部以“成立反革命党派”治罪，新婚夫妇双双判处无期徒刑。

1959年7月，大规模饿死人发生之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张凯帆听说其家乡——渔米之乡无为县，“左祸猖獗”，民不聊生，来到无为调研后，提出解散公共食堂、退还社员房屋和自留地、允许农民养鱼虾充饥等救灾救命措施。无为人民庆幸终于能够活下来了，许多地方也看到了一线逃命的生机，变相剥夺老百姓吃饭权利的公共食堂，在安徽省顷刻垮掉了80%。岂料毛泽东龙颜大怒，痛斥张凯帆“投机革命”、“大闹无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钦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安徽的代理人，并株连到全省各级干部，仅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干部就有28741人，张凯帆家人亲属被整死20多人；农民稍有不满意就被逮捕甚至遭枪杀，以致监狱人满为患。致使大跃进的祸害急剧膨胀蔓延，安徽不幸成为大饥荒死亡率最高的省，绝对死亡数仅次于四川。无为县总人口1957年底982979人，1960年底662557人，三年净减少320422人，总计饿死30多万人，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南京大屠杀。如果不是毛泽东将一党独裁搞成一人独裁，如果张凯帆的救灾救命主张能获得起码的尊重，而不是有违旨意就往死处整，如果彭德怀等正直党人，反映人民疾苦和极左祸害的“为民请命”，能获得人性的对待，至少不亚于正常的君臣关系（且不说民主），而不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丧尽天良、心狠手辣的流氓习性、挟私报复打翻天印，从而不顾人民死活，将已经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进一步推向恐怖的深渊，何以会使大规模饿死人的旷世大祸，持续四五年之久？何以会造成庐山会议后，中华大地惨绝人寰的生命大灭绝！

1957年由“帮助整风”转变为反右派和1959年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而挨整的反右倾，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大搞流氓政治的典型表现，并直接导致了大跃进恶风劲吹、群魔乱舞、危害不断升级，不但造成了超大规模的饿毙，还造成了对于社会人伦、道德意识、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大规模、深层次的破坏。“大跃进”的弥天大祸发生后，由于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算，毛泽东对饿死几千万人的旷世大难毫无悔祸之心，反而担心迷信破产、大权旁落和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追究大规模打死、饿死人的责任，从而在最惨烈的非正常死人事件发生后，先是把责任推给“自然灾害”和下面干部，接着高高祭起阶级斗争大旗，扬言大跃进的祸害和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破坏”或“资本主义复辟”，必须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大饥荒找替罪羊；接着大举反攻倒算，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对刘、

邓等推行的缓解饥荒、走出困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横加指责、轮番发难。大跃进前期紧跟毛的路线造成大量饿毙、后期良心发现，支持农民，生产自救的安徽第一书记，曾希圣，遭到毛的整肃；忠实执行毛的指示，造成9万多人饿毙的，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深感内疚，不堪“坏人当道”，举家自杀……延至大饥荒刚刚结束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从党国官员们不太注意的“文化”方面着手，开始全力反攻，大搞个人崇拜和愚民政策，一门心思算计将发展经济、收拾残局的刘少奇，及其支持者搞下台，并换上老婆江青等自己的人，从而把“党天下”搞成“家天下”，以彻底掩盖饿死几千万人的弥天大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为害更广更烈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

人性的感知并不总是与善恶是非成比例的。惨死一人两人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愤怒、同情和舆论的关注，惨死成千上万的人却可能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被漠视。冤魂不能总淹没在“大数据”里，血海泪河不能永远冻结成冰冷的数字。因而，灾难之后若没有对于真相的揭示、冤魂的祭奠及对于责任的追究，便难以有精神的复活、罪恶的鞭挞及深刻的反思，类似的悲剧依然有可能重演。极力隐瞒、掩盖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没有清算其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匡扶正义及进行必要的追责，终于使得方向性、政策性、制度性的严重错误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持续灾难，付出了更大更深更广的代价。

任何国家与民族的记忆，尤其是以暴力和谎言酿造的苦难历史，都不应该遗忘、篡改或抹去。以采访土改、反右著称的谭松先生坦言：“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乃是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苏俄十月革命100周年时，纪念苏联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大型雕塑“悲伤之墙”在莫斯科揭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并致辞：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未来的时代，了解并记住我们历史上这一悲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我完全赞同“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这句话，我们的义务就是“不忘记”。“记忆本身、评价这些黑暗的历史事件，所持的立场，清晰和明确，将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大的警示。”

然而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大跃进、大饥荒被深深掩盖的真相？究竟有多少人能想象到那惊天地泣鬼神的野蛮和苦难？究竟有多少人认同“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能原谅”这个朴素的道理？……那死于惨绝人寰黑暗时代的几千万罹难者、天文数字的冤魂饿鬼们，几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又能从哪里找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同胞树的什么碑立的什么传或有过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又有多少直接或间接整死饿死他们的人，表达过哪怕一丁点儿忏悔或说明过他们无端堕落进地狱的原因，从而还历史一个公道，以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并让活着的中国人认真总结这一沉痛的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以有利于现代中国的健康发展 and 民主进步呢？这也是本文回顾大跃进、大饥荒的惨痛经历，希望人们不要遗忘那样一段痛苦的历史，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祈愿六十年前惨死于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所有冤魂安息！

（2018年8月初稿于成都。经多次修改、补充，2020年8月定稿。全文68000字）

～全文完～

本电子书，是非赢利性参考资料。本着交流学习的目的，仅供读者试阅，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并请下载后一天内删除，如喜欢本书，建议读者购买以支持正版！

《生命大劫难》93岁离休干部张瑞月读后感

《生命大劫难》这本书，写的真好。它真实的再现了毛泽东个人专政时期录像机似的录下了历史本来面貌。饿死、打死、逼死、折磨死、人吃人的场面，都历历在目。各种因饥饿死的人，都有姓名、住址、死法。人是死了，历史还在。毛泽东能造假，历史不能造假。这本书好就好在句句是真话、字字是真事。以“真”反“假”，真必胜。到任何时候，真历史，打败了假历史；真孙悟空，打死了假孙悟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假孙悟空，就是对人民实行皇帝个人专制

的杀人魔王毛泽东。不把毛泽东死死地钉在耻辱柱上，写在教科书上，就不是真实的历史。

好了，我对《生命大劫案》这本书打双“赞”。但任何好书，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我给这本书也提点小小的建议：毛泽东大皇帝个人专政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本书总是用几千万的概数代之，几千万包括两三千万和九千多万人。这就使毛泽东的罪行相差三倍多。但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死了几十年了，他的罪行已经捂不住了，部分曝光了。

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我告诉读者一个准确无误的数据：196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是：73000万人。饿死的（非正常死亡）9600万人。饿死的占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13.15。

这个准确数据是谁透露出来的，是公安部干部晏乐斌同志首先透露的（晏乐斌在《生命大劫案》书中也提到过他，他不但有政治头脑，还是正人君子）。为了保持数据的真实性，我把晏乐斌同志的大作，及我的读后感引于后，作为《生命大劫案》读后感的补充。

《全国大饥荒年代》 作者晏乐斌

1959年至1962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各执一词。官方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批人死亡”。可是死亡人数总是秘而不宣，从未公布过。民间学者、专家经过调查，有各种版本的死亡数据。如：

金辉先生发表在1998年第10期《方法》月刊撰文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400多万人。”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经历10年调查、访问，查阅各地档案、史志，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饿死3600万人。”辛子陵在《千秋功罪》一书中表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饿死37,558,000人。刘源、何家栋在《你所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代价。”李志绥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500万至5000万人”。署名“京夫子”著《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记载：“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7000万人”。冯客教授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说：“他查阅了10个省、几十个县的1000多份档案和国内外的有关资料，采访了100人，估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5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干部、民兵打死和折磨死的”。

民间这些学者、人士的调查统计和推算、估算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之后，官方也不得不于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书中羞羞答答的承认：“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一千万人”，还在向全国亿万人民说谎，还在遮遮掩掩。何时执政者不再欺骗人民啊！

今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离休的局级干部、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统计处副处长的赵文奇同志告诉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关注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考虑到各地上报饿死人的情况都不准确，上报时都要经过党委一把手点头批准才允许上报。他要求公安部对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视，一定要将非正常死亡数字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弄清楚，要我们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将全国实有人口计算统计准确，死亡人口搞准确，特别是对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搞准确的指示精神。为此，成立了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杨尚昆亲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兼任副主任，我们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全力投入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处长白建华、我（副处长），工作人员王维志、沈一民参加。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至计算统计时间。我们按照杨尚昆主任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组织指挥，领导全国的人口普查，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重点省还派出工作组去具体指导、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都抱报来了人口数据。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人口73000多万。随后于当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自治区没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我们都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来，再次对各地报来

的人口数据，进行核算，以 1957 年、1958 年和 1963 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 1959 年至 1962 年 4 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 年至 1962 年全国共有 9600 万非正常死亡数。

赵文奇同志告诉我这一数字之后，我感到十分惊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数字？我开始有些怀疑，是否有虚假。5 月 11 日和 14 日我两次碰到赵文奇同志，问他此数据是否可靠？他说，绝对可靠，是各省、市、区报来的统计数，又经过各地同志的核算和推算，这个数据是应该信得过的。他说，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档案馆，有案可查。同时，赵文奇同志还说，1964 年 9 月初，于桑副部长要我们（有白建华、我、沈一民）同他共四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进行了汇报。杨主任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作了肯定，认为就此数据作为依据。

（以上两段内容经赵文奇同志审核——笔者注）

从现在已解密的档案和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来看，造成那几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

一、虚报浮夸。分明亩产小麦、水稻几百斤，却虚报浮夸成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最高的广西融江县水稻亩产高达 13 万斤的天文数字。

二、高征购。毛泽东 1958 年 8-9 月到河北徐水、河南遂平县视察，问县委书记：“你们生产了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遂平县委书记刘国忠回答：“粮食多了不要紧，我们支援别人，支援外国，支援非洲。”这就出现了本来没有产这么多粮食，一虚报引出了高征购，拿不出粮食，就只有将社员口粮、种子、牲口用粮食拿去交征购任务，河南、四川、安徽、甘肃、河北、山东、贵州、广西、湖南、广东等省出现了秋收后饿饭。

三、反瞒产私分。公社、生产大队交不出粮食，195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瞒产私分的指示》。反瞒产私分运动一经在全国农村开展，各级干部、社员就遭了殃，批斗吊打、逼死人命等违法乱纪遍及全国各地，仅河南信阳专区基层干部在反瞒产私分，搜查群众 60 多万户，吊打社员 30 多万人。

四、1958 年全国粮食丰产不丰收。由于上面瞎指挥，人员被调去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

五、大办食堂初期，敞开肚子吃，吃饭不要钱，浪费严重。

六、围堵拦截外出求生存、逃荒的饥民。饿死人严重的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四川、贵州、甘肃、广西、广东等省区，宁让饥民饿死在村里，也不让他们外出逃荒求生存，对他们进行围堵拦截，当盲流对待。全国家喻户晓安徽《凤阳花鼓》反映明代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有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独裁、专制的封建王朝还让饥民外出逃荒求生存，号称“社会主义新中国”，号称“救人民出水火”的中国共产党人，竟不如专制独裁的封建王朝，真是草菅人命。

七、外购粮食，拿去支援外人。1959 年，1960 年我国城乡人民出现大饥荒，大量浮肿病人，大量饿死人时，我国政府用外汇向加拿大购买数万吨小麦，用船运回国途中，中共中央突然下发命令，令运粮船只转舵向亚得里亚海，将购买的粮食去支援“反苏、反修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

八、打肿脸充胖子，搞两弹一星。毛泽东等人，宁愿让亿万中国人饿饭，患浮肿病，饿死人，在 1958 年至 1960 年调出几百亿斤粮食去换取外汇，发展两弹一星，去争取什么“面子”和“志

气”，显示“中国的实力”。有人评论，晚二三年去发展“两弹一星”不行吗？

上述这些倒行逆施的作为，当时国人没有人敢吭声，真是咄咄怪事。

（注：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得公开发表） 2012年5月15日

晏乐斌撰写的《全国大饥荒年代》 93岁离休干部张瑞月读后感

我读罢《全国大饥荒年代》，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惊！不相信真的饿死 9600 万人。我初读京夫子撰写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书中说：饿死 7000 万人，我也不相信是真的。我出版的《风雨人生录》中，采用的是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上的数据：饿死 3600 万人。

我为什么用杨继绳调查研究出来的数据呢？我很崇拜他。他是个很有学问的新华社名记者，著名作家，退休后，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赵紫阳在软禁中，几次召见他畅谈。我和他有一面之交，我请他看过我出版的《风雨人生录》初稿，并请他为本书提了词。

现在看来，我错了。当时，毛泽东虽死多年，但毛饿死人的罪行仍在捂着，不能揭发，更不能批判，这是停滞社会的表现，也是腐败、落后民族的表现。

知识界人士、学者专家们，得不到国家支持，只能以个人名义，从各个渠道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每个学者专家调查的深度、广度不同，统计方法各异，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全国大饥荒年代》列举了七位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饿死人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相差一倍多。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算是科研成果的话（饿死 1000 万人），那就是比京夫子提供的数据低七倍。这显然是故意造假，继续欺骗老百姓。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科研成果，而是毛粉们继续骗人的把戏。是向社会公布的伪数字。这个伪数字，比真实数字小 9.6 倍。毛泽东全靠杀人骗人维持着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

《全国大饥荒年代》中，列举了造成大规模饿死人的根本原因有八条。请读者仔细看看，仔细琢磨琢磨。谁有这个绝对权威？做出了这八条决定。用不着逐条批判，就随便说几条就行了。

一、虚报浮夸。毛泽东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大力神化自己。毛泽东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这种反科学的鬼话忽悠农民。让广大农民相信胆量就是产量。另外毛用党的力量和行政力量，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保驾护航。于是，虚报浮夸成风。明明亩产小麦、水稻几百斤，却虚报浮夸成几千斤、几万斤，广西融江县水稻亩产 13 万斤。虚报浮夸的公社书记、大队长，升官、受表扬。虚报浮夸数字小的公社书记、大队长受到严厉批评，甚至丢官罢职。更甚者还有被打成“小彭德怀”、反革命的。毛泽东这样一搞，公社、大队、小队都怕受处分，丢了官帽，无不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这一损招，粮食产量疯了似的往上长。毛大皇帝，内心大悦。

二、高征购。毛泽东要跟农民秋后算账，毛泽东说：“你们产了那么多粮食（虚报浮夸的数量），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报上来的数字呀！现在，政府征购你们百分之几十的粮，你们就拿不出来。这里头肯定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就叫‘瞒产私分’。征购粮食的任务必须完成，就是用强迫命令也要完成！”。

三、于是毛泽东在 1959 年 9 月 21 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瞒产私分的指示》。毛泽东的反瞒产私分指示一贯彻执行，仅河南省信阳专区干部、民兵搜查老百姓 60 多万户，吊打社员 30 多万人。如果有人问：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就是毛泽东个人专政时期，河南信阳专区的样子。

四、好了好了，毛泽东的罪行，罄竹难书。我只补充两点：

1、1958 年是个丰产年，但不丰收。因为毛泽东发动 9000 万青壮年土法炼钢，收秋时不许青壮年回家收秋，粮食都烂在地里。58 年四季度，农民就开始饿饭。

2、我不同意《全国大饥荒年代》的作者第六条的观点：围堵拦截外出求生存逃荒的饥民。我认为，全国大饥荒不是天灾造成的，而是毛泽东个人专政造成的。如果是天灾造成的饥荒，可以用逃荒的办法解决。《1942》这部电影，说的是河南大旱，颗粒不收，饿死老百姓 300 万人。蒋介石闻之，马上下令：

1、开仓放粮，拨 8000 万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2、组织灾民到丰收地区就食。坐火车不要钱。灾民逃到西安、陕西就食的 1000 多万人。蒋介石还撂下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赶紧采取措施救济灾民，我真成了‘独夫民贼’了。”

旧社会还有个歌谣：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来。南北二京都不收，黄河两岸渡春秋。灾民们有逃荒的自由，逃出灾区就有活下来的可能。

这和毛泽东时代饿死人的情况不同。毛泽东时代饿死的人，百分之百是毛大皇帝造成的，与老天爷无关。天灾是小范围受灾，大范围正常年景或丰收年。因此，灾民逃出灾荒区就能活下来。

毛皇帝制造的灾荒，是全国 9600 万平方公里，无论深山再深处，密林再密处，都饿殍比比。中国大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毛祸，就有饿殍。（丰收地区饿死的人，不少于灾荒地区饿死的人，这是毛泽东毫无人性，有目的有计划的饿死人的大劫难。农民吃食堂，不许在家做饭，这是消灭家庭。农民拆房并村，夫妻分男女营夜宿，这何异于太平天国换皇帝暴乱。毛泽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谦谦有礼的求教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给党提意见，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念其诚，把治国安邦的好意见，一股脑都倒出来了。毛泽东说：“蛇出洞了，要一网打尽”。按《炎黄春秋》提供的数据是 317 万右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给人民使用的“阳谋”这一招。毛泽东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然后“高征购”，这很像是第二次给人民使用的“阳谋”招术，饿死 9600 万老百姓。

毛泽东给中国人定的口粮指标：大城市居民吃八成饱；中小城市居民吃半饱；农民吃二两粮，有时还不到二两粮。有的地方把十两称，改为 16 两老称（详见纪录片《刘少奇 44 天》，刘少奇的亲姐夫，就是这时候饿死的）。

全中国人都吃不饱，灾民到哪里去就食？要饭要到谁家，谁能把自己还吃不饱的口粮给灾民吃？自己饿死救灾民。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那么高的风格，反正我没有。所以，逃出去也是饿死。这就造成了一家人一家人饿死、一村人一村人饿死的惨状（详见杨继绳撰写的《墓碑》）。

再者说，还有理论政策上的问题：粮食、吃的东西，是生活资料，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许公有。毛泽东在这里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生产的粮食都收在毛家粮库里，“公有”了。毛泽东每发展一次马克思主义，不知要饿死、杀死多少中国老百姓。粮食公有，这是极其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说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未说过生活资料也公有制的话。马克思说的“公有”，指的是“自由联合体”公有。毛泽东说的“公有”，指的是国有、党有、全民有、集体有，以上四有，都受“毛有”管着。不管有多少个“有”，最后落实到毛有上。

毛泽东避而不谈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不同。只谈“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政策是极其反动的统制人民的政策，毛的真实目的，是卡住人民的“嗓子眼”，让人民永远当驯服的奴隶。奴隶们你听着！你们听话不听话？不听话不给饭吃。毛时代，只有钱票买不到粮食、食品，还要配上粮票才能买到粮食、食品。买其他生活用品，如香烟、火柴也要票证，毛泽东时代发给老百姓的票证至少 100 种，老百姓离开这 100 种票证就无法生活。所以，无论毛泽东怎样压迫你、剥削你、残害你，你也无法造反。因为你一天也离不开毛泽东，离开毛泽东就是死路一条。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下大力量把老百姓严格的控制起来。在中国彻底消灭了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公平、公正、宪法……。百分之百、万分之万的复辟了帝制，把中国历史倒退到奴隶社会，再加上法西斯主义。毛泽东是权大无边的大皇帝，毛泽东就是王法、就是真理，哪个人敢说个不字，立刻推出午门斩首！毛泽东杀几个老百姓不算点事。就是杀三个元帅，杀一个国家元首，就和碾死几个蚂蚁一样。中国人民，面对这样凶恶的杀人魔王，人人都胆颤心惊和公鸡打鸣似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西方有位哲学家（注：大概叫罗素，记不清了）说：一个人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罪恶。毛泽东权大无边，罪大如天。正对上号。

现在毛大皇帝见了阎王，老百姓才敢在私下里说说心里话。有的还毒毒地点头骂道：“罪大恶极的杀人魔王毛泽东！终于恶贯满盈，一命呜呼了，乃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毛死后，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上升，一百种票证全部消灭。尽管中国仍然是年年有天灾，再也

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更不要说人吃人的事了。这也充分说明中国饿死 9600 万人，完全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与他人无关。与党无关。

可是，毛泽东时代，饿死人数，数出多门，哪个数据最正确？我认为，每个专家学者都认为自己的科研成果、饿死人的数据最正确。实际上，在绝对独裁专制的国家里，个人搞调查研究，没有条件把饿死人的真实数据搞清楚。首先说毛大皇帝就不允许搞清楚。数出多门，以乱视听。这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1964 年，国家动用了公权，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国家成立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兼任。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任务有二：

第一：一定搞清楚全国总人口数是多少？

第二：一定搞清楚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搞人口普查工作的人员，按照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要求和统一表格，认真填表上报。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唯恐数字有误，有扩大或缩小之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又把各省市自治区搞人口普查工作的人员，调来北京进行核实。核实无误后，于桑副部长带领公安部人口处处长、副处长向杨尚昆主任，做了汇报：全国人口总数是：7 亿 3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 9600 万人。杨尚昆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非常满意，对非正常死亡数据做了肯定，认为今后，就以此数据作为依据。

我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晏乐斌发表的《全国大饥荒年代》经得起实践检验，我信服了。我认为毛泽东饿死 9600 万中国人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不刊数据。因为这个数字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动用的人力资源多，调查的广度、深度大，调查的方法科学，最可信。全部资料，就尘封在公安部档案馆里，有案可查。不许发表。

请问读者，如果饿死 9600 万人是造谣，没有真凭实据。我想，借给作者晏乐斌一万个斗胆，他也不敢造这个谣。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脸上抹黑，是要杀头的。

我认为，杨尚昆的一生，对中国人民作了不少贡献（详见《杨尚昆日记》），其中最大者，莫过于肯定了毛泽东个人专政时期，饿死了 9600 万中国人！

这是多大的罪行？！中国历史五千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朝历代饿死的人加在一起，也没有毛泽东个人专政时期饿死的人多！

93 岁离休干部张瑞月 2203 年 2 月 20 日于北京

第三章：习近平高层内部讲话及读后感

习近平高层内部讲话：

目前有三大问题，肯定让中国走上不归路。民众信仰问题——民心问题。

人民大众和统治者，必须找到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老百姓相信，官场也行。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国家就能形成合力，这个国家是任何强大的外敌不能战胜的。

问题就在于，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是发展了，却把一个民族的信仰搞丢了。一个国家，从统治者到普通大众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这是最可怕的。

毛泽东是人民心目中的太阳，毛泽东死了，金钱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太阳。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必然出问题。都为了钱，官场就会腐败，买官卖官。都为了钱，教育也会腐败，高学费、低质量，一个大学就会变成文凭批发部。都为了钱，医院就不在实行人道主义，就会见死不救。都为了钱，企业就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残害大众。……这就是 30 年来唇彩的最大问题。当今所有的乱象，皆出于信仰的丢失。金钱主导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全民族共识。原因在于四高问题——高物价、高房费、高医疗、高学费。

你有辆宝马，我骑个自行车，我不嫌丢人。你穿世界名牌，我穿 30 块钱的衣服也不自轻。当时，你让我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那不行了！因为后者是我作为一个动物的低级要求。

人只有满足了低级需求，才有可能去追求高级需要——服务社会，追求远大理想。一个国家的 90% 的人群，都在为低级需求而终身奋斗，那么就不去追求高级的，因为没有条件追求。主要应该是这样的。

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今天的某些既得利益者，罔顾党和国家的三令五申，连几千年的治理国家理念也不要了，让广大劳动者为低级需求而毕生奋斗，这样，国人的精神境界如何提高，社会道德何以净化？民族创造力何以谈起？

今天的中下层人民，之所以看中金钱，是因为他们的确离开金钱不能活。是现实把他们逼成这样了，逼着他们把钱当做价值观的全部。

为人民服务，让百姓吐气，让民族扬眉，让贪官却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也是立国之本，我们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理论，但根子不能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国家没根子，人民不就乱了吗？

如果另搞一套理论，能得到 90% 的中国人民认可吗？中国人民都不认可，光你主流媒体喊叫有啥用？大家的心还是散的。对不对？奇怪的是，某些人另搞一套理论还不算，还骂毛泽东，骂毛泽东思想，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些做法，就是让中国人民信仰危机的根子。网上写篇文章，一有怜民的、针砭时政的、推崇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马上删了。可那些袁腾飞公然骂毛泽东，一个大中国确没有人处置。这不奇怪吗？

发展方式问题——民生问题

《泰坦尼克号》一部美国的大票，当年拿走了 3.2 亿票房。可知道，中国当年的总票房才 14.4 亿。一部电影，就拿走了中国票房收入的五分之一。可怕不？中国共 500 多家出版社，可年总收入还不及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一家出版社的总收入。你能说文化行业不挣钱么？

还有，耐克、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三星……这些世界级的品牌，人家在本国搞产品研发，用这个品牌到全世界挣钱。

十几年来，我们干了什么？扒房子卖地！房价高入云天，让本国的中下层人民一辈子甚至几代人为开发商打工。许多做实业也不干了，加入炒房大军。

全民炒房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制造业危机：劳动密集型企业多，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大学生失业、民族没有创新力。文化落后，知识分子不算人。搞得不少知识分子也要钱不要良心，为开发商叫嚣。这几年房价高涨，与那些不要良心的大学教授到处忽悠大众不能说没有关系吧？

30 年来，我们主流媒体海吹：“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 高居世界榜首“云云，可 30 年来，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学家。为啥？人家老外不承认！因为你中国是不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郭一平当县长，把一个地方的好地卖光了，郭二平当县长，只能卖农村土地，郭三平，郭四平……他妈的，要这样干，要不了 30 年，土地没有可卖的了，土地一卖就是 70 年产权，那子孙后代吃什么？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 2000 次战争，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吃的了逼老百姓造反。

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危害之大，用屁股想都能想明白。人家发展高科技和文化产业，创造品牌，挣全世界的钱。我们就这样，用高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掠夺本国的中下层人民。这种发展方式，就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方式。

十几年来，有多少经济学家今天说房价要涨明天要降，早在 2008 年我就说，这些都是闲扯淡。只有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取消，高房价永远不会完结。谈房价本来就不是经济学家的事儿。高房价是政治这双手在左右着，国土局、地税局、银行这些开发房地产的关键部门，那个不是政府直接管的？

再说，房价涨落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房价与普通大众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也不是问题的关键——要是房价降到百分之九十的人群，用五六年的收入能够买得起的话，那么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还有多大意义？

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放弃卖地财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官场腐败问题——民主问题

腐败和反腐败，这不是最重要的。最终要的是，铲除生产腐败的土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雷锋同志还活着，并且做了高官，在这个几乎人人得而腐之的土壤环境下，你能保证他一定不会成为贪官？你现在把中国的官杀完也不行，因为新上来的还是会成为贪官。

让纪委监委、检察院查处这没有错，但如果连他们，也腐败了，不就和贪官沆瀣一气了吗？再说仅凭几个工作人员，管少数的贪官，还能管的过来，如果贪官到处滋生，他们有力回天吗？近几年来，纪委、检察的工作力度一再加大，可贪官却越来越多，不正证明了这种担忧吗？

铲除生产贪官的土壤环境，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让人民选举、监督官员，也就是传说中的一人一票吧？对官，人民能罢免，对管官的官，人民也能罢免，让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权贵手中，以人际关系和金钱美女构建的官僚机构。

如果人民不能直接选举罢免官员，那么，能直接的，真正的选举人民代表也行，如果这些代表不作真事时，人民还能撤换他。而不是名曰，人民代表，实为官员选定，人民代表有名无实。看看现在的代表有几个是真正的工人、农民、战士啊？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作为动物的人，都离不开阳光、空气、水。作为社会的人，都离不开民主。民主，不分民族和国别，民主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目前看来，中国式的民主理论上没有错，但实际上却被官员操控了。有些人说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可能是担心中国地大域广，不容易操作、驾驭，一旦民选会造成争斗分裂——这种考虑，也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排除某些人以此为借口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打掩护。假设确实人人能投票的民主暂不适合中国国情，何不在某省某地以政府层级现行试点，以五年或十年为期，逐步实行呢？

没有真正的民选，所有承诺都靠不住——正如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你不能不怀疑任何一个官员都是贪官一样。官让民选，官才能重视民生、民意，才能死心塌地的为人民服务；官让官定，官只能倾心仰上、媚上，民众信仰问题只能行贿受贿，唯官是从。孙赐良认为，比腐败更严重的是，官场集体脱离人民，腐败是官场集体脱离人民的结果。这个是对的。

所有的腐败，皆因脱离了人民，害怕人民，“维稳”人民。只有还政于民，才能遏制大面积腐败。说其他的都是忽悠。说反腐败，都是假把式，解决不了根子问题。这些年越反越腐败，根子就在于离开了人民。实际上，实行民主，也不光是解决官场腐败问题，也是解决官员素质问题。现行体制只能是让庸官上，能官下。让你找个女朋友，以漂亮为标准。你光从自己线上的人来找，这么小的面积，能有多少漂亮的？如果你要百里挑一呢，那机会就更不大了。

看看现在的地方官，除了卖地还会干啥？说句不服气的话，现在的市长，谁都能干。只要有毛病，会卖地就行了。看看现在那个年轻美女，官员一上台，几乎百分之百的受到公众质疑，为啥？大多是一选一，全票通过。人大代表一万人，不顶提名的那一个幕后操纵者。再看看，那些落马的大小贪官们，又有哪一个不是人大全票通过的。

习近平高层内部讲话读后感

习近平高层内部讲话，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信仰问题；二是民生问题；三是民主问题。二、三问题讲的极好，我敢肯定，民众会从心里赞成、拥护的。因为二、三问题所讲内容，都是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完全是为民众利益着想的。

毛主席本人决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允许别人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两个主席就有这么大的差别。这说明中国社会在进步。

毛主席一天24小时想的是：如何才能让他当终身皇帝；让他的家族后代当世袭皇帝。没有时间想如何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包括让人民享受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的权力。毛泽东决不能让人民享受这些权力，人民有了这些权力，毛泽东就不能当终身皇帝、家属就不能当世袭皇帝了。他也就不能搞个人专政了）。

习主席讲的，三个问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得是：为人民办好事、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只有民众信仰问题和老百姓想法有出入。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只要让民众自己选定自己的信仰（不强迫），就行了。

您看，民主国家总统候选人是许多人，他们在竞选演说中，是互相揭发批判别的候选人缺点错误的。选民听了说：“候选人都有缺点错误，我选谁呢？最后，还是把票投给缺点错误少的候选人了。”

民众的信仰问题，是个大问题。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做了这项工作：毛主席是用暴力强制民众信仰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思想。强迫民众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强迫人民信仰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思想，不是成功了，而是失败了。毛时代，坚决不喊毛万岁的是要杀头。为了活命，人民才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这可不是年岁的岁呀！绝大多数人喊的是“破碎的碎”。

因为只要你不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就不会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有这样的事。你想呀，喊毛主席万岁的人，不都是白痴、傻蛋。部分人，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饿死的或冤杀的，他能喊毛主席万岁吗？可是不喊杀头，谁愿意被杀头呢。那么只能从心里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碎！万碎！万万碎！”

可见，习主席讲的，第一个问题——民众信仰问题，虽是治国安邦最最重要的问题。但信仰必须是自愿的，不能强迫。必须让老百姓自己选定自己的信仰，老百姓自会根据最高统治者（皇帝）实行的政策，对照自己的利害得失，选定自己的信仰。官员也一样，他也会根据最高统治者（皇帝）所实行的政策（比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专制主义社会。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暴力社会主义制度。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还是公民说了算的制度，等等），对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利害得失，选定自己的信仰。

老百姓和官员的信仰一致，实行起来，顺风顺水，皆大欢喜。如果信仰不一致，老百姓信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民主宪政政治制度，是公民说了算的社会。官员信仰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极权主义、帝王思想、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制度。

一个人说了算，皇帝说了算，就是把自由、民主、宪政彻底消灭了，把公民的权力彻底消灭了，中国就要乱，一乱就要维稳，维稳，就是白扔钱，就是无效益投资。中国就永远好不了！

官员和民众的意见常相反，这是个大问题。大官要微服私访，下到社会底层，听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

评价一个老百姓，用很简单的两句话，就给他盖棺定论了。如张三死了，凡知道他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张三是好人呐，虽活了80多岁，还是觉得，走早了，真可惜。李四死了，凡知道他的人，异口同声说，这杂种操的，尽干坏事，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早就该死。就这么简单。

评价皇帝就复杂了。毛泽东死了40多年了，少数人（注：这部分人多是既得利益者，都是大官或其子女。这大官可来之不易，在毛泽东夺取政权时期，都是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毛泽东当皇帝后，这些大官又都做过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亲笔写的检讨书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何如何正确。自己又如何如何错误。大官们都写了同样的检讨书。存放在机要秘书张玉凤的保险柜里，这就把大官们和毛泽东死死地绑在一起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详见《毛泽东控制大臣的罪恶手法》读后感。

大官们都说：毛泽东好极了，是人民的大救星，就像红太阳。多数人说，毛泽东坏透了，是人类最大的、最残暴的杀人魔王（毛一生为了当皇帝，杀两亿中国人，详见后文）。

我不应该说毛泽东的坏话，因为我也是个小小的既得利益者，我是离休干部。在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阶段，1946年，我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根据地参加了革命。那时，我是从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的，谁说毛主席不好，我敢和他玩命！为什么我这么爱毛主席呢？我听了毛主席的“言”，而且认定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会说骗人的话，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经过几十年对毛泽东的言行对照，发现他的言与行、说与做，完全相反。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上当了，受骗了。毛泽东一生，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全部都是坏事！毛泽东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一生奋斗和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当皇帝”。是个倒退历史的

人，这种人决不可能为人民干一件好事！。

所以，我现在不但是多数派的观点，而且是反毛的急先锋，过河卒子，不能后退了。我认为毛泽东当皇帝 27 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举其荦荦大端，粗说四件大罪：

（一）、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在中国只有毛泽东大皇帝具有绝对权威，手握生杀大权，可以随便杀人、关人，奸人。无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法律能制约他。

只有毛泽东这样的皇帝，才能产生出绝对独裁专制制度，只有这种制度，反过来又强化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现在的统治者，让臣民们信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看这很难实现。老百姓和毛泽东思想是相反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皇帝想的是“皇帝宝座如何万年牢”，臣民百姓想的是提高生产力、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包括人民享受人权、自由民主权利、以及普世价值观等）。

鲁迅说：“封建专制皇帝有两个错觉，一是长生不死，二是死了不烂”。因此，毛泽东生前问过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美国到底有没有长生方剂？（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死后天安门就出现了“毛主席纪念堂”。

帝王还有一桩“剪不断理还乱”的继承王位问题。故张玉凤提供的毛主席死前，提出的政治局领导班子名单顺序：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这两个领导班子的第一名都是毛远新。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朝鲜金家王朝，金胖子永坐皇帝宝座，已历三世。当然，金胖子也和秦始皇一样，也想达到万世万世。

毛泽东和金胖子是一丘之貉。毛泽东思想和金胖子思想，骨子里都是家天下思想。这种思想，只想到本姓本家的权力和幸福，不会想到百姓的福祉。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毛泽东还是为自己建了 61 处顶级别墅，根本想不到人民正在冻饿而死。

毛泽东思想从来不把人民当人看，而是当鸡、鸭、猪、狗、牲口、奴隶、螺丝钉、驯服工具看。对人民实行的政策，是四死（穷死、饿死、累死、斗死）政策。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厉害七倍多，三光政策杀死中国人 2000 万（注：杀伤和杀死是两个概念）。毛泽东的四死政策，杀死中国人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其中：活活饿死 9600 万人，毛发动的大小 56 次政治运动，杀死 4700 万人（详见 20161206 叶紫撰写的《毛泽东时代的 56 次运动》）。

希特勒用 700 万德国人的生命，杀死 5000 万外国人。列宁、斯大林杀苏联人 6000 万人（其中：列宁、斯大林为建立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杀苏联人 4500 万，二战牺牲 1500 万人）。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杀日本人 851 人（其中：百团大战 302 人，占 35.5%；平型关大捷 167 人，占 19.6%。共 469 人，占 55.1%。其他为反围剿、反扫荡，游而不击逃跑时，打死日本人 382 人，占 44.9%）（详见《日本靖国神社在华战亡人员名单》）。

但毛泽东当皇帝后，和平时期，杀中国人一亿四千三百万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杀日本人的 16 万 8 千倍（注：如果不包括彭德怀、林彪两位元帅抗拒毛泽东不准和日本人打仗的死命令，不准主动出击，打死日本鬼子 469 人。应改为：37 万 4 千倍）。

毛泽东不杀日本人，专杀中国人。毛泽东说：“日本人是他的大恩人、大救星（详见后文《毛泽东雷语大集结》）”

毛泽东高举的三面红旗，实际上是架在人民脖子上的三把刀。毛泽东在位 27 年，平均每天冤杀 14510 人。

请读者仔细想想：毛泽东饿死人的天文数字，如果不是真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绝不敢在他的《全国大饥荒年代》一文中说出饿死九千六百万人的出处：

这是 196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的《全国第 2 次人口普查》，以国家名义、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下大力量作的人口普查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全国人口普

查办公室》主任，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兼任《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杨尚昆，要求这次人口普查，一定要把全国实有人数弄清楚，要把非正常死亡数字弄清楚。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省份，还派去工作组，具体指导、帮助。当各省市、自治区报来调查统计数字后，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又把各省市、自治区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干部，调来北京，作进一步数字核实工作。数字准确无误后。于桑副部长率领公安部人口处主要干部，专门向杨尚昆主任作了汇报。杨尚昆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表示满意。人口普查结果：

全国实有人数是7亿3000万人。

非正常死亡人数是9600万人（注：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占当时总人口的13·15，这是多大的罪行。）作了肯定。认为今后就依此数为依据。

人口普查的资料档案，就尘封在公安部档案馆内，不准公布。

以上是毛泽东饿死9600万人的真实数据，真实历史是无法消灭的。无论毛泽东有多大权力，他可以让他的“毛粉们”再杀几亿人，也改变不了真实的历史。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56次政治运动，共冤杀4700万人。从哲学观点看：没有比较就没有大小，没有比较就没有好坏，没有比较就没有善恶。

美国也发生过内战，史称南北战争。美国内战不是为了争皇帝宝座，而是为了解放黑奴，南北政见相反，打起了内战。美国人死伤115万。结果，北方胜，南方败。

马克思说：“南北战争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从内战性质讲，美国内战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战争”，无论哪方胜，哪方败，都不会出现一个皇帝，只能出现一个民选总统。北方要解放黑奴是正义的，是进步的，所以北方胜，南方败。

但北方对南方并不赶尽杀绝，而是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仇必和而解”进行调和。内战结束后，南方军政人员，没有一个被抓起来劳动改造的或枪毙的，都让他们回家，过公民生活去（详见电影《乱世佳人》或小说《飘》）。

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民主党也没有被解散，仍然和代表北方利益的共和党平起平坐，竞选总统。

南方军人放下武器，都成了美国公民。并允许高级军事将领出国定居。在内战中有战功的南方高级将领，还可以在國內铸铜像。

这是美国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典范。中国传统哲学是非常强调“和”的。“和”能容异，在政治生活中是必须有的要素。毛泽东是非常强调“同”的，“同”不能容异。故必须大规模杀人。敌人都杀光了怎么办，就让自己阵营中的人顶上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就是这么顶上去的。

这就不能不使我想起民主国家制定宪法的法律规定：制定宪法必须有“反对党”参加起草工作，没有反对党参加起草的宪法无效。蒋介石搞得宪法，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参加了制定。毛泽东搞的宪法，没有反对党参加，所以无效。再说，毛泽东从来也不承认宪法，他说：“傻子才相信宪法哩！”

毛泽东在“红墙大内”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种封建法西斯土匪作风，也传染给皇后江青，江青也大言不惭的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谁敢把我老娘怎么办！（详见《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一个国家，皇帝、皇后都是“和尚打伞”。没有任何法律、任何机制监督他（她、）制约他（她），这个国家还能有好吗？不成为一个极端恐怖、杀人如麻的土匪国家才怪呢！

毛泽东兼职秘书、中共中央委员李锐说：毛泽东罪恶滔天。

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朱德秘书陈友群说：1950年，中宣部拟定的五一口号，毛看后，在口号最后，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这条口号。

张爱萍将军说：“毛言必秦始皇”。

老革命家，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彭真说：我坐过 6 年国民党的牢，又坐过中共 9 年半的牢……他的结论是：“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杨开慧说：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流氓，生活上的流氓，道德上的流氓。

湖南衡阳县，三代贫雇农女儿刘桂阳，1960 年 7 月 26 日上午，双手各举一块硬纸牌，一块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

这些知名人物对毛泽东的评价，难道都是错的吗？否！这些评价，句句真实，字字正确。

毛泽东说彭真是假毛泽东思想，打入天牢九年半。毛泽东死后，共产党给彭真评了反、招了雪。这说明毛泽东本人也不知道毛泽东思想为何物？民众只能根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及其社会效果，科学地判定毛泽东思想是帝王思想，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思想，是极权主义、个人专政思想。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他在宪法、党章之上，不受任何法制、任何组织制约。他给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的、为他造神的大臣们乱扣帽子。说关就关，说杀就杀。冤杀、冤关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

毛泽东冤关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就有习仲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习仲勋到底犯了什么罪，打入天牢十六年。听说毛泽东给他扣的帽子是“利用小说反党”，可是这本小说，老百姓都没有见过，怎么会反党呢？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习仲勋，是毛大皇帝打入天牢的，谁敢为他鸣冤叫屈。直到毛泽东死后，才允许家属探监。当习仲勋，见到亲生儿子时，问：你是近平还是远平时？全场人（包括狱卒）无不泪下。

如果毛泽东能和宋美龄同寿（106 岁），罗瑞卿、彭真、习仲勋等，必死于天牢。

陶铸死后，有一天，陶铸女儿陶斯亮和其母曾志聊天。陶斯亮突然问母亲，我爸爸没有犯任何错误，毛伯伯就把他杀了，您怨不怨他？曾志一时语塞，无以为答。停片刻，曾志说：我不怨他，因为我们信仰一致。

曾志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我不知道。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谁敢说真心话。就算她说的是真心话，曾志也不对。

因为，信仰和思想一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他做出事来，才能断定他的信仰是真是假；他的思想是对是错。

举个例子说：少林寺的和尚和能仁寺的和尚，都是信仰释迦牟尼的（信仰一致），可是两个寺的和尚所作所为，截然相反。少林寺的和尚是普救众生，尽做善事；能仁寺的和尚是普害众生，尽干恶事。

你曾志和毛泽东信仰一致。可是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和您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这就断定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真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真极权主义、真不穿龙袍的恶霸皇帝。

我认为毛泽东为了永远当皇帝的个人私利，把你丈夫杀了，你应当反对，才是正义。

陶铸，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读过他的《松树风格》，陶铸不但写了《松树风格》，而且他本人就是松树风格。您们夫妇都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同流合污，混为一谈。

如果马克思能活到毛泽东在世时，一定要用力提起毛泽东的耳朵，大声吼道，我的书你是怎么念的！都歪到姥姥家去了！都念反了！马克思绝不会提起你们夫妇的耳朵说这些话。

毛泽东一生杀的共产党员要比蒋介石杀的共产党员多得多。尤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比蒋介石杀的更多。蒋介石悬赏要杀的高级干部中，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杀掉。待蒋介石跑到台湾后，毛泽东像“罐里捉鳖”一样，轻而易举的把他们都杀了。

请读者仔细想想，饿死九千六百万人，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是造谣，是抹黑毛泽东。我想，借给晏乐斌十个斗胆，他也不敢造这个谣。给毛泽东造这么大的谣言是要杀头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当皇帝 27 年，活活饿死老百姓九千六百万人，的确确是真的。毛泽东发动的大小 56 次政治运动，冤杀四千七百万人，更是真的。叶剑英说：仅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

杀两千万人、斗一亿人。叶剑英是什么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话能无真凭实据吗？这说明毛泽东杀害中国人一亿四千七百万，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数字。再加上毛泽东夺取政权期间，国共双方死的人，至少是五千七百万人（这是根据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说：“我们的政权是 2800 万人头换来的，这些小兔崽子们（闹学潮的学生）要夺权，咱们就这上头见，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这说明毛泽东一方就牺牲了 2800 万人”）。

毛泽东是胜方，死的人应该少；蒋介石是败方，死的人应该多。所以评估双方共死五千七百万人，比较合适（待中国改制后，历史会给一个准确数字）。

请读者仔细想想，只是为了在中国把“蒋皇帝”换成了“毛皇帝”，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也没有进步，仍然是封建专制法西斯社会。中国人民的灾难，就由旧社会的 8 层地狱打入到 18 层地狱，白白死了两亿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呢？还是奇耻大辱呢！

我还是对毛泽东想不通，你毛泽东原先是一个地痞、流氓、无赖、土匪，没有说过一句真话。后来，你成了一个大阴谋家、大军阀、大党阀、大毒梟、大汉奸（详见《毛泽东给汪精卫的亲笔信》）、大卖国贼（详见严家伟又名叶青先生撰写的《道真言实：世界史头号罪人——人不反毛，天理不容！》）。

中国人民不知道你是用马克思主义骗人，相信了你的假话。你毛泽东欺骗了 5000 年来老实诚恳的中国人民，还是把你推到至高至尊的皇帝宝座上，你应当报恩呀！做个好皇帝。怎么反而这么仇恨中国人民，想尽一切毒计、损招，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作了有人类以来，最坏的、冤杀人最多的恶霸皇帝。

日本鬼子是侵略者，你反倒非常感谢他们。你毛泽东当皇帝后，1062 名日本战犯中，1017 名分批释放，只有 45 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 8——20 年徒刑，无一死刑。你对 242 名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抗日名将全部处死，其中：上将和辛亥元老 5 名，中将 78 名，少将 159 名。何以对日本侵略者这么爱护（注：日本人不就是帮你当上皇帝了，你就这么爱护他），对抗日的中国将领就全部杀掉。更可恶的是，也把共产党的抗日名将彭德怀杀了。杀彭德怀的理由之一，毛泽东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说：“你发动百团大战，不是爱国，是爱国民党的国，是帮助蒋介石打日本人”（见李锐著《庐山会议纪实》）。历史资料证明，毛泽东既反对搞平型关大捷，更反对搞百团大战。在电影中，毛说：百团大战打的好，有条件再搞一两次。那是给毛泽东作秀，神化毛泽东。毛泽东说：“日本人占领的地盘越多越好，许多人想不通。后来，知道了只有在日本人占领的地盘中，我们的游击队才能进去，才能发展，这才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给他的 3 万部队，从延安出发时下的命令是：“一分抗日，二分磨合，七分发展。”一分抗日：就是敌进我退，东边有日军，就往西边跑，尽可能争取敌我不碰面、不交火，保持实力。二分“磨合”，就是给国民党政府要军需，要枪炮子弹，以壮大实力（因为，蒋介石已同意毛的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戴的帽子上，是青天白日帽徽）。游击队军需要的多，国民政府给的少，这就需要讨价还价，扯皮磨合。七分发展，是每个村庄都要建立党组织、村政权、农会、民兵、妇救会、儿童团。

经过八年游而不击战争，毛的军队由 3 万人发展到 100 万人，毛泽东所谓的解放区，发展扩大了一百倍。

这就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三国志》式的，三足鼎立局面。日本一国，势力范围是沦陷区城镇；毛泽东的共产党一国，势力范围是沦陷区农村；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国，势力范围是中国的半壁江山。这三国，互相利用、互相斗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灭顶之灾。共军配合日军打国军的事，屡见不鲜。国军也打过共军（如《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是他利用国军的刀，杀了项英）。14 年抗日战争，打不败建立在中国的日本国，而是美国出兵才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日本这一国。

日本人说：“一个日本人打不过一个中国人；但一个日本人能打过两个中国人”。中国人问，为什么？日本人说：这两位中国人都想当皇帝，日本人不用打他们，他们俩就打起来了，待到一死一伤时，我们再出手一击，我们就胜利了。

毛泽东不杀日本人，只杀中国人的罪行，中国统治者至今还捂着，不让人民知道，还在继续欺骗老百姓。

有人说：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已经死了，不能再杀人了，可以公布毛泽东的罪行了。

可是在中国还不行，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搞了个“毛党一体”的大阴谋。本来是毛泽东个人的决定、个人的罪行，但在党的会议上，毛以变相强迫的形式，让与会者举手通过。这一举手，就变成党的决定、党的罪行了。这是毛泽东常用的最毒的阴谋诡计。毛泽东让与会者举手，谁敢不举手，谁愿意步马克思主义者陈少敏的后尘呢。所以，许多老党员认为：公布毛的罪行，就是“公布党”的罪行，批毛，就是批党。这个绝对错误的理念，已经在党内维持了40多年了，历届新领导，都“不敢越雷霆一步”。都在维护毛的形象，也就是维护党的形象。

我认为，毛泽东的“毛党一体”的大阴谋，必须打破。毛泽东强迫与会者举手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应当严格地和毛泽东切割开来。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全部罪行，要由他个人负责，与党无关。

毛泽东是个人，不是党。几千万共产党员才是党。几千万共产党员，没有一个愿意饿死老百姓的，饿死自己或饿死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的。只有毛泽东及其家族成员，为了世世代代当皇帝，才愿意饿死近亿老百姓，用饿死鬼的口粮，换取71亿美元，放了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保护谁呢？保护毛泽东永当皇帝，不是保护中国。世界上，97%的国家没有原子弹，有原子弹的国家也没有侵略它们，也没有占领无核弹国家一寸土地。

毛泽东知道，美国不会侵占中国一寸土地（详见《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民主颂”）。

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不要说侵占中国土地，就是中国跪在美国面前，要求和美国合并（无论是联邦制，还是邦联制），美国都不会答应中国的请求。

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地广、人多、素质低、生产力低下、官是贪官、民是愚民（掉了脑袋不知道是毛泽东砍下来的；亲人饿死了，不知道是毛泽东夺了亲人的口粮饿死的）。美利坚合众国决不会和这种落后民族、落后国家、丑陋的中国人合并。

说美国要侵略中国，完全是毛泽东的愚民政策和欺骗宣传。

毛泽东是巧妙的利用了假马克思主义（假革命）、假抗日、假土改才夺取了政权的。“三假”缺一不可。

（二）、毛的三反罪行：就是反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三反罪行的阴毒手法有三：

1、明目张胆的反马克思，和马克思对着干：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把太平军说成是“魔鬼的化身”，还说“只有在中国方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见《马克思全集》15卷548页）。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装神弄鬼、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做法是全盘否定的。

而毛泽东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战争。”（见《毛选》162页）。还说“太平天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见《毛选》619页）。又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见《毛选》1474页）。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洪秀全争皇帝宝座的暴乱全盘肯定，和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反。

2、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美丽的灵魂，只剩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青面红发、巨齿獠牙的外壳。难怪外国人访问毛泽东时，赞美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真美，美极了。毛泽东答道：共产主义并不美，但它很厉害，就像一尊威力极大的大炮。毛泽东并不爱共产主义，他爱的是这尊大炮。因为这尊大炮能为他平天下，当皇上。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美丽的灵魂是什么呢？有答案：马克思逝世后，美国《新世纪》主编给恩格斯去信，要求恩格斯提供能够概括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杂志的导语。

恩格斯在回信中提供的是马克思同他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注：原稿是《共产主义宣言》，后被列宁改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追求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乃至一切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社会。而毛泽东当皇帝后，剥夺了每个人乃至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犯、言语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毛时代，人人都“讳”自由二字，追求自由是犯王法，轻则劳改，重则枪毙。

3、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行篡改马克思主义之实：

毛泽东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红旗反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毛泽东首先篡改了马克思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划分阶级，是按资产占有多少划分的。毛泽东划分阶级，是按“思想先进与反动”划分的。毛泽东美其名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资产可以用量化划分阶级，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划分阶级呢？毛泽东有办法界定思想的先进与反动：叫做“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如张三新社会生、新社会长，是公社社员，靠工分吃饭。其祖父、父亲是地主。张三表现一般。那么，毛泽东就给张三打上一个“地主”阶级的烙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地主儿子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反动思想，故世袭地主。李四也是新社会生、新社会长，表现一般，其祖父、父亲是贫下中农或城市贫民，李四世袭祖上阶级烙印。如果李四半路表现不好，有反毛的言论。立马撤销其世袭的阶级烙印，重新打上“反党”或“反革命”等等不一的阶级烙印。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以此类推。

在毛泽东时代，每个人的阶级烙印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少数人，随其政治表现的变化而变化，不平等的社会待遇，也是与生俱来的，同样随着政治表现的变化而变化。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社会环境，都想通过政治表现好，而改变自己的阶级烙印和社会待遇。人人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人是有自我保护本能的，人在这种极其恐怖的政治环境中，都本能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籍以祈求平安、无殃、无祸，进而追求，改变自己的阶级烙印和社会待遇。在“文革”中，这种“追求”发展到顶点：儿子告父亲是叛徒，女儿告母亲，是特务。毛泽东把人都变成了兽，人性变成了兽性。毛泽东这些破坏文明的野蛮做法，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消灭的干干净净，这和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假若毛泽东问一个人：你是跟着我毛泽东干革命呢，还是跟着马克思干反革命呢？这个人必然回答，我当然跟着万岁干革命呀！万岁是红太阳，是大救星吗！假若毛大杀人魔王问到我，我也必然这么回答，我也是人，也不愿死呀。

（三）化民为己有，是窃国大盗的罪行：

中国五千年历史，共出了六百位帝王（见《帝王纵横》），个顶个都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者，奴也。

可是谁也没有做到，只有大独裁者、屠夫民贼毛泽东，这个恶霸皇帝百分之百做到了。中国的全部财富，统统都是毛泽东个人所有了。无论地面上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如粮食）；地面下的全部矿藏，都是恶霸皇帝毛泽东个人的。

毛泽东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在农村，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公有制就是毛有制）。贫下中农在“土改”中，分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自己原有的一点土地，统统归毛泽东个人所有了。每个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庄园，公社书记就是毛泽东派到这个公社的管家。每个农民，种的都是毛泽东的地，当然就是毛泽东的佃户、杨白劳了。佃户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准存在佃户家，而是直接送到国家粮库（国家粮库就是毛家粮库）。然后，毛泽东用统购统销政策，把粮食都买下来，农民的口粮，再返销给农民。但统购的价格稍低，统销的价格稍高（统购统销价格，皆由毛定），农民又遭到毛泽东二次盘剥。

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政策，大明朝时代的六必居，就改为“毛记六必居”了；大清朝时代的同仁堂，就改为“毛记同仁堂”了。总而言之，上至国家企事业，下至修鞋补带剃头的，只要和钱发生关系的单位，一律成了“毛记”

单位。这就使中国的所有财富，统统归毛泽东所有了。

有人说，没有任何文字契约说明中国的全部财富是毛泽东个人的。可是中国的全部财富，都由毛泽东个人支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有权是支配权、处置权、使用权、出卖权、赠送权构成的，中国只有毛泽东有这些权，全民全党都没有这个权。毛家大院有多大？9600 万平方公里。

有人说，毛主席不贪污，他没有办法贪污，全国的财富都是他个人的，自己贪污自己的钱，等于左兜的钱，放在右兜里，毫无意义吗。

毛泽东不是不贪污，而是“盗勾者诛，窃国者王”。

（四）、沦“人民为奴隶”：

中国五千年，都是封建专制社会。多次改朝换代，都是换皇帝暴乱，其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一丝一毫没有改变。这，不能称为“革命”，只能称为换皇帝暴乱。这种暴乱，马克思称之为“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见《马恩全集 15 卷 548 页》）。只有国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打倒了帝制，建立了民选总统制。民选总统制，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立马就有袁世凯复辟了帝制，当了 83 天的洪宪皇帝，失败了。继之辫子兵张勋复辟帝制，失败的更快。再继之蒋介石复辟帝制，作了 28 年皇帝梦。失败后，跑到台湾去了。唯有大独裁者毛泽东，杀两亿中国人，才百分之百彻底复辟了帝制。毛把中国社会，由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倒退到奴隶社会了。

“中国农村是奴隶社会”，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我是重复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的话。1977 年，万里出任安徽省第一书记时，见到农民没粮吃、没衣穿，都在奄奄一息，流下了眼泪，才说了这番话的（详见《人民公社兴亡录》第二册 614 页）。

评价一个帝王，不要光听其言，一定要观其行。就说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吧，这是多么美妙而动听的言辞呀！可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就是百分之百害国害民了。毛泽东只许他一个人“为人民服务”，不许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陶铸、万里、赵紫阳等为人民服务。人民欢迎这些人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就能吃饱肚子，不挨饿。老百姓顺口溜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专利，他独霸了为人民服务，别人不许问津，只许照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模式办。中国人民最怕毛泽东饿死人的“为人民服务模式”，可是他非为人民服务不可。谁反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模式”，谁就是反革命、反党。

为什么人民这么怕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呢？因为民众都明白了，都有了经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就是把老百姓管的死死的，老百姓只能老老实实的做毛的驯服奴隶、驯服工具、螺丝钉，否则不给饭吃。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模式，无非是让人们为他劳动，为他生产，要星星当月亮，月亮当太阳。劳动要军事化：男的像杨宗宝，女的像穆桂英，老的像老黄忠；吃饭集体化：人人吃食堂，户户砸锅炼废钢。毛泽东的为“为人民服务”模式，可算是给人民服务到家了。他教导人民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低标准，瓜菜代”。

1959 年 9 月 21 日，他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瞒产私分的指示》发动农村干部、民兵，用吊打农民的酷刑，夺取了农民口粮，卖了 71 亿美元，买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放了第一颗原子弹。

农民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毛泽东残酷地压迫、剥削、残害人民，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而是把人民当能劳动生产的动物看。

像这种天字第一号，罪大恶极的恶霸皇帝，人不反毛，天诛地灭。当今掌权者，硬要民众崇拜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思想，我看这事很难办成。毛泽东本人办了 27 年，平均每天杀一万多人，都没有办成，何况后继者了。因为这么做，是反社会潮流、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普世价值观的，是要把全人类打入 18 层地狱的，绝不会成功！

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请看，300 年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独裁专制、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国王、皇帝、酋长、头人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再看现代社会，90%以上的国家是公民说了算的国家。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屈指可数了。

请读者看看互联网上的“民主进程时刻表”：

1900 年，全球只有 3 个民主国家；

1912 年，13 个民主国家；

1945 年，50 个民主国家；

1970 年，90 个民主国家；

1992 年，120 个民主国家；

2015 年，180 个民主国家；

而今只剩下几个“绝对独裁专制国家”，还在“垂死挣扎”，支撑着门面。不久的将来，独裁专制国家都要扫进垃圾站。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力是无可奈何的！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比任何核武器力量都大，握有生杀大权者，你能奈何它吗？！你能力挽狂澜吗？！

请权贵们仔细看看，独裁专制国家的所谓“领导人”，哪有一个好下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会停止运作的，还在继续消灭独裁专制国家。公理一定战胜强权！人类一定战胜魔鬼！民选总统一定战胜专制皇帝！公民社会一定战胜臣民社会！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能战胜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动的人，必身败名裂，成为专制皇帝的殉葬品，和皇帝一起成为历史的罪人。

“天道”在运行，天道不是迷信，是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2019-3-10 日，89 岁老翁张瑞月作于北京

第四章：毛泽东雄文《民主颂》读后感

2016-12-26 微读精选

作者 毛泽东 原载：《新华日报》1943 年 7 月 4 日社论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恒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

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马克吐温、惠特曼、爱默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克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此文完）。

毛泽东的《民主颂》，充分证明了毛是人类最大的谎言家

我读罢毛泽东在 70 多年前写的这篇社论文章，更坚定了我对毛泽东的认知是完全正确的：我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有人类以来，最大的政治骗子、谎言家和阴谋家；是最凶恶、最残忍、最霸道的极权主义分子、是决心要当皇帝的匪类。

毛泽东写这篇社论时，还住在延安窑洞里，成败未卜。把他要当皇帝的终极愿望，深深藏在心里，绝不露出来。希望美国能支持他夺取政权，就用谎言歌颂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把华盛顿、林肯当图腾看，当师表和圣人看。可是毛泽东夺取了政权、当上皇帝之后，立马原形毕露。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是绝对的封建专制法西斯社会制度。

这种斯大林式的法西斯极权制度。对内：决不给人民百姓半点民主、半点自由。必须用暴力强行把中国人打造成毛泽东个人的驯服奴隶和驯服工具。用暴力把人打造成驯服工具，这种工具人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追求、没有愿望的。只知道毛泽东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保卫毛泽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毛泽东低头劳动，不计报酬。工资 17 年一贯制，即 17 年不长工资，（王岐山说：“17 年不长工资是毛主席四大仁政之一”。用这笔钱补贴了购买放原子弹技术）。谁说工资低，生活苦，必打他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右派言论。人民百姓的生活极度困苦，人民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毛泽东指示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低标准，瓜菜代。据一向为毛泽东代言人的作家韩素音说：“城市家庭妇女，最高不过 1200 热卡量，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苦役犯，每日热卡量是 1300 到 1700。毛泽东对人民百姓实行的政策是“四死（穷死、饿死、累死、斗死）”政策，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得多。在毛泽东时代，谁也不敢说吃的东西热卡量太低、吃不饱。这话不说出来则已，说出来的人，轻则劳改，重则枪毙。

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思想，只要有一点自己的思想，立马推出午门斩首。不要说平民百姓，就是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后 2 人是毛泽东害死的，不是病死的）、彭德怀、贺龙、林彪这样的大人物，也是因为具有独立思想，才死于非命的。

毛泽东竟专制到：“毛泽东思想都给你们想好了，用不着你们再思想了，如果你们再思想就是犯罪，就是找死。”为了保命，中国人都变成了不能思想、不能说话、只能做劳动生产的工具人。毛泽东根本不把中国大陆人当人看，而是把中国大陆人当鸡鸭猪狗牲口看。冻死饿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宰杀多少人他也不在乎。

对外：1943 年毛泽东还说：“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可是 6 年后，毛泽东刚刚当上皇帝，就拿美国开刀了，大骂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列宁给“帝国主

义”下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后期必然发展成侵略性的国家，这就是帝国主义。

接着，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联手，对大韩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联合国令美国率领联合国军反击侵略军，中美两国厮杀起来。结果，美国人战死 33000 人。中国部队死伤人数至今保密、无法确定。但有四个数字可供参考：1、中国官方允许出版的书上说：志愿军死伤 50 多万人；2、莫斯科档案馆资料说死伤 100 多万人；3、朝鲜流氓政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的烈士碑，是 240 个台阶，每个台阶象征着一万名志愿军。那就是毛泽东动用了 240 万军队，参加了侵略大韩民国的战争（详见：2015.7.28 日法制晚报《金正恩悼念中国烈士》）。4、郭国汀译著《流氓匪首毛泽东》目录（可在网上查到）第 18 “抗美援朝”战争真相中记载：朝鲜军民死亡 300 万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死亡 200 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死 45 万人，伤 50 万人；联合国军，美国军队死亡 33000 万人，英国死 1000 人，其他 14 国死 4000 人。

中国只有改制后，才能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宣布：我们胜利了，我们制止了侵略战争（注：侵略者是从 38 线以北突然侵略韩国的，停战条件是：侵略军还回到 38 线以北原地。）

毛泽东公开讲话，一贯是瞎话大王，没有说过一句真话。说与做、言与行完全相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口口声声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实际建成的是一个极其恐怖地威虎山土匪国家。毛泽东就是威虎山上的座山雕，他把“八大金刚”拉进他私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来，帮他统治中国人。

中国有史以来，总共出了 600 位皇帝，个顶个都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者，奴也。可是谁也没有做到，只有屠夫民贼毛泽东这位大皇帝百分之百做到了。中国的财富都是毛泽东个人的。无论地面上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一分一厘；地面下的矿藏，都归恶霸皇帝毛泽东个人所有。

有人说，没有任何文字契约说明中国全部财富是毛泽东个人的。可是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由毛泽东个人支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有权是支配权，处置权、使用权、出卖权、赠送权构成的，中国只有毛泽东有这些权，全民全党都没有这个权。

毛泽东住的毛家大院有多大呢？9600 万平方公里，**护院的御林军**几百万，枪口都是对着人民百姓的。1958 年末至 1962 年初，中国饿死 9600 万人，哪一个饿死鬼，敢去毛家粮库要粮食？去必死在御林军的枪口下。

毛泽东在中国是权大无边、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想杀谁就杀谁，不管功臣不功臣；想奸谁就奸谁，不论姑娘与媳妇。这就是毛泽东封建法西斯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实。

中国虽有共产党，可是几千万共产党员都是毛泽东的奴隶、驯服工具、螺丝钉。他们和老百姓一样，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发言权。不过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给了党员举手权，叫你举手你不举手，你就自我感觉死期到了。如：老党员陈少敏同志，1928 年入党。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就是这个老革命、老马克思主义者，在开除刘少奇党籍大会上，没有举手，就死于非命了，杀害陈少敏者谁？毛泽东也。

这是毛泽东又一大阴谋：本来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恶决定，可是他在党的会议上，让党员举手通过，谁敢不举手呢。这样，就把他个人的罪恶，让全体与会党员分担了；把他个人的罪恶，转移到举手党员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事件，他个人做了罪恶决定：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又全部在党的会议上用举手通过的方式，转化为党的罪恶决定。毛泽东这个大阴谋，蒙蔽了许多正直善良的老党员，他们认为这是党的决定，错误人人有份。这些老党员，自觉不自觉的都上了大阴谋家毛泽东的当了。

毛泽东杀共产党员，要比蒋介石杀共产党员多得多。中国人在毛泽东暴力统治下，远不如美国早期的黑奴，因为美国黑奴能享受人道主义待遇。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人道主义。毛泽东搞阶级斗争，全国有 7 处，把他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八、九十岁老人和出生几十天的婴儿统统杀光。毛泽东说：“对阶级敌人有一分仁慈，就是对无产阶级最大的犯罪”。

把阶级敌人都杀光了怎么办？还杀谁呢？毛泽东有办法，让自己队伍里的人顶上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陶铸、彭德怀、贺龙、林彪等，就是这么顶上去死的。

毛泽东为了当终身皇帝，甚至为了家族当世袭皇帝，不惜制造阶级，制造阶级斗争。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消灭的干干净净，谁看谁都像阶级敌人：父子反目，母女互批，夫妻离异。整个社会都没有了道德底线。把人性都变成了兽性；把人都变成了兽。

毛泽东当皇帝 27 年，只做了 4 件事：

1、草菅人命：27 年，亲自发动 56 次政治运动（详见《毛时代五十六次运动·doc》），冤杀无辜百姓 4700 万人，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杀死 2000 万人。毛时代饿死 9600 万人，这个数字绝对正确无误（详见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著《全国大饥荒年代》，这是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就尘封在公安部档案馆里）。毛泽东 27 年共杀中国大陆人一亿四千三百万，平均每天杀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人。这还不包括夺取政权双方死的 5700 万人。中国五千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农民战争。除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统统是换皇帝暴乱。

2、奸淫妇女：没有人能统计出毛泽东一生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作家京夫子在他的名著《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稍有梳理，也是挂一漏万。毛泽东奸淫妇女是有选择的，他就奸三种人：美女、少女、名女。有的美女要求自己清白做人，不愿留下坏名声，如：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分别是毛泽东的俄语和英语翻译和老师，毛泽东百般调戏未果，即在饮食中下迷药，然后强奸之（详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不成年的少女，他也奸污了不少。他第一次奸污的少女，是韶山冲人，那时毛还未步入社会，也是个青少年。因为是初次云雨成奸，始终难以忘怀。故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派汪东兴到韶山老家，把被奸污的少女接到庐山，意在叙叙旧，重温鸳盟。见面后，始知物是人非花落去，不见当年美娇娘。少女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满脸道轨。伟大领袖毛主席只和她说了些家常话，知她生活很苦，给了她钱，然后命人送回老家。

此事本来做得非常机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皇后江青知道了，于是江青大闹“忠义堂”。这桩“公案”，才成了公开的秘密。

3、化民为己有：

在农村，毛泽东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由互助组、农业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包括贫下中农在土改时分的地富土地和自己原有的土地），统统收为己有，美其名曰公有、集体有。每个人民公社，毛泽东都派一名钦差大臣，名曰公社书记，实为毛泽东私人管家。因为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公社书记全权统治公社社员。农民生产的粮食，不能送到自己家中，而是直接送到国家粮库（国家粮库即毛家粮库）。农民送到粮库的粮食，国家是按统购统销的价格（毛家自定的价格）给钱的。农民的口粮，再用统购统销的价格买回来。但统购的价格稍低，统销的价格稍高（还要带口粮指标），农民又受了毛泽东二次盘剥。

在城市，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城市工商业，包括几百年的老字号，如大明朝的“六必居”、大清朝的“同仁堂”。以及城市建筑、设施、学校等等，总而言之，城市和农村一样，一切的一切，统统都是毛泽东个人的了。就这么说吧：全中国的财富，一土一石一草一木；银行的一分一厘，地面上的全部财产，地面下的全部矿藏，统统归毛泽东个人所有，因为支配这些财富，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全民全党说了不算；毛泽东管着全民全党，全民全党管不了毛泽东。毛泽东这位开国大皇帝及其后任皇帝江泽民，白白送给周边临国：苏联、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土地，不小于三分之一国土。致使中国版图由过去丰满的“海棠叶”形，变成现在的“瘦公鸡”形。这样白送国土，以求周边临国，高呼毛主席万万岁的做法，是哪个，人民百姓给他的权力！毛泽东的权力，不是天授，也不是法授，更不是人授，而是自授。他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刀，谁不承认他的绝对权威，就推出午门斩首。所以，毛泽东的权力是他大规模杀人杀出来的权力。

4、沦百姓为奴隶：这是极权主义皇帝毛泽东的终极目的，中国大陆人都成了毛泽东的驯服奴隶。但他到死还不满足，还想用列宁、斯大林的两把刀子征服世界，用暴力社会主义奴役全人

类（毛美其名曰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的滔天罪行，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中国不把毛泽东彻底否定，和希特勒一样，被祖国永远地死死地钉在耻辱柱上、写在教科书里，中国永远好不了。也必然遭到天诛地灭、人神共诛、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反击！毛泽东的幽灵被消灭在中国大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势不可挡！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享受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生活，不会太远了。

冷在“三九”，三九过后就是春天。 2017年-1月-10日张瑞月作于北京

第五章：毛泽东控制百姓的罪恶手法

（原文是伯爵撰写的盘点毛时代控制国人的方式。读者张瑞月改为“毛泽东控制百姓的罪恶手法”）

（一）·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 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口粮食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工作，做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贱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个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是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是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 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 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或“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己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己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减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泽东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已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 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1、“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2、“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3、“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己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了最高领导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已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4、“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有过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时刻被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 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口粮票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

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信息闭塞）。

• 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多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 个人崇拜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毛泽东控制百姓的罪恶手法》读后感

毛泽东是人类最大的极权主义暴君，为了防止百姓造反，他精心编织了《控制百姓的罪恶手法》。毛泽东当皇帝后，就用这种控制手法，把中国人都铸造成了没有思想、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工具人。他从来就不许人民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都给人民“想好了”，人民照办就行了。如果你要再思想，那就是犯罪！轻则劳改，重则枪毙！。彭德怀就是犯了“再思想罪”，他上了《万言书》，和毛泽东思想有出入，毛把他杀了。像彭德怀这样举世闻名的大人物、抗日英雄。因为他还再思想，就被杀了，何况猪狗不如的人民呢。杀了大人物，吓的老百姓尿了裤子，再没有人敢吱声了。可是，“毛主席万岁！”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口号，这种声音是必须有的。老百姓必须天天喊，月月喊，年年喊。不喊者，也是轻则劳改，重则枪毙，谁敢不喊呢。结果，毛主席万岁震天响，这是毛泽东做梦都希望得到的社会效果。

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全部是愚民政策，报刊全是欺骗宣传。毛时代，谁也不敢说真话，百姓都是重复毛的“愚民政策和欺骗宣传”。如果有人说真话，那就是反革命。比彭德怀的下场头

更惨。故林彪元帅总结说：“谁说真话谁完蛋”。中国人全部说的是假话，伟大的祖国还能有好吗？毛泽东用愚民政策和欺骗宣传这两手“绝活”，把人民玩于股掌之中。许多善良的中国人，都被装进了铁桶里，只能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红太阳、是大救星、神化毛泽东的声音。别的声音一概听不到，久而久之国民都成了傻子。脑袋掉了，不知道是毛泽东砍下来的。自己或亲人饿死了，不知道是毛泽东把他们的口粮抢走后，才饿死的。只相信毛泽东欺骗宣传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气象专家分析了气象资料说：三年困难时期的气象正常，不能列为灾荒年。毛说：“人祸是农村革命不彻底，国民党特务钻进了农村党组织，掌了权造成的”。把饿死人的罪行，推给老天爷和农村党组织。如果毛泽东不从农民口中夺粮，卖给外国 71 亿美元的粮食，用这笔钱放了第一颗原子弹，一个农民也饿不死。毛泽东用《谎言说一万遍就成了真理》的骗术，欺骗了中国老百姓。中国饿死 9600 万人（占当时人口的 13.15%），百分之百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任何人（包括“四人帮”）不应分担他的罪行。

有人说：“三面红旗是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与会者都举了手的，错误人人有份，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头上呢”。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当皇帝后，已成为滥杀无辜的阎王。毛在会议上举了手，谁敢不举手？不举手者，必死在毛泽东的屠刀下。谁愿意步中央委员陈少敏后尘呢（注：陈少敏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高层会议上没有举手，毛泽东就把他杀了）。毛泽东指鹿为马，说马者升天堂，说鹿者下地狱。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必然都说是马，没有一个愿白白送死的。我是反毛急先锋、过河卒子，是没有退路的人了。如果我是与会者，我也会举手。人愿生不愿死，是人的共同愿望。共产党员也是人，也不愿白白送死。罪在决定高举三面红旗的毛泽东，被迫举手者无罪，而且万岁！

还有一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举手的人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自愿的。如党搞的土地改革，人类都同意土地改革，何况共产党人了。土地归种田人所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既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又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耕者有其田”精神。所以人人都同意把地、富的土地转移到无地少地的农民（注：毛泽东称贫下中农）名下。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许多国家都完成了土地改革。会种田的农民都成了土地所有者。

只有毛泽东的土改，是“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假土改。土改最初几年（注：夺取政权期间），毛泽东把土地分给贫下中农所有了，诱骗贫下中农子弟上前线，在毛泽东的“人海战术”中，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毛泽东才夺取了政权，当上了皇帝。

如果在土改问题上，只是方法错误（暴力土改），杀了一百多万无辜的地、富分子。终于把地富分子所有的土地，改为贫下中农所有了，人民还可以谅解。但毛泽东当皇帝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的全部土地都改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全国土地都成了毛泽东个人所有了。全体农民都成了毛大皇帝的佃户，佃户生产出的粮食，不能存在佃户家，而是直接送到所谓的国家粮库（即毛家粮库）。佃户的口粮，再通过“统购统销”政策，返销给佃户。佃户又遭到毛泽东二次剥削。

这是毛泽东在土改宗旨上作了“手脚”，好事变成了坏事，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土改从根本上、宗旨上反其道而行之，是历史的倒退。是由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耕者有其田，倒退到帝制、倒退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每个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庄园。公社书记，就是毛泽东派到这个公社的老院公。几亿农民都成了毛大皇帝的佃户、杨白劳。毛大皇帝比旧社会黄世仁、刘文彩压迫、剥削农民更凶恶万分。1958 年 4 季度——1962 年 1 季度，饿死 9600 万佃户杨白劳，罪大恶极！

毛泽东当皇帝后，非常强调皇帝是金口玉言，国家事无巨细，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毛大皇帝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让人民下地狱的；他想出的每一个国家政策，全都是让人民下地狱的。如农村公社化，8 亿农民都成了杨白劳。57 年反右，317 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注：右派就是反革命）。毛泽东建立的户籍制，把每个人都变成了螺丝钉，固定住。毛泽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卡住每个人的嗓子眼。你老百姓听话不听话？你喊我万岁不喊我万岁？不听话、不喊

我万岁不给饭吃。我是皇帝，说句土匪常说的：“反正你们这些无枪的打不过我这有枪的”。你们能奈我何？！

毛泽东的金口玉言，是反党章、党纲的。在党组织之上，党是小鬼，毛主席是阎王。如党的18大代表大会决议，是个实事求是的好决议，大意是：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已胜利完成了使命，党的工作重点应及时地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不搞个人崇拜，等等。八大决议，是党员代表们集体做出的决议，不但受到几千万共产党员的拥护，叫好！也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叫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他下“圣旨”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圣旨”谁敢违抗。抗旨者，杀无赦。结果，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代替了八大决议。中国人民在毛大皇帝铁血统治下，又回到了地狱。

还有：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三个战争贩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目的是消灭韩国，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的大臣们，没有一个同意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的。只有周恩来这个“骑墙”老手，表态不明确，他说：出兵朝鲜我同意，不出兵朝鲜我也同意。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摸不准毛泽东的心意时，总是说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毛泽东说周恩来是“狡猾的知识分子”，坚决不让他进入“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后，毛下圣旨：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毛下的出兵朝鲜的圣旨，是从“一箭双雕”考虑的：解放军中，有一百多万国民党的投降兵（说好听点，又叫起义兵）。毛泽东总怕这些国民党兵造反，心里不踏实。把这些投降兵送到朝鲜打美国兵，借美国兵的枪，杀掉国民党投降兵。这不是名正言顺、正大光明的事吗。同时，也给毛泽东除掉一大隐患，何乐而不为呢。

再说国民党的投降兵，大多是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兵。投降后，听到毛泽东“堂而皇之”的正面宣传：说什么“你们弃暗投明了”、“革命不分前后、起义后就是革命同志了”、来到“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兄弟加同志了，一家人了”。这些美妙而动听的言辞，字字都印在投降兵的心坎上，好像自己也是革命者了。贫下中农出身的起义兵，有的接到家书说：“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于是这些可怜的起义兵们，无不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起义兵们完全相信了毛泽东的弥天大谎、欺骗宣传。在朝鲜战场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骁勇异常。灭了美国的威风，长了中国的志气。经过三年鏖战：美国战死三万三千人，中国军队死伤一百多万人（莫斯科档案馆数据）；朝鲜军民死伤三百万人，停战了。停战条件是：朝鲜军队从38线以北发动的侵略战争，还回到38线以北原地。美国宣布，我们胜利了！制止了侵略战争！

毛泽东力排众议，使用皇帝的绝对权威，伙同斯大林、金日成，发动了朝鲜侵略战争。结果，既没有得到韩国的一寸土地，白白死了几百万人，花费了大量战争费用，还落了个侵略者罪名。朝鲜政权保存下来了，可是在和平时期，又饿死二百多万朝鲜人。这是毛泽东的功呢，还是毛泽东的罪呢？请读者自己裁定。

到了给毛泽东“定性”的时候了：毛泽东一生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全部都是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他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当皇帝，是让“历史倒退到奴隶社会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据考证，晚上奴隶主是把奴隶锁起来的，怕他逃跑。毛泽东不用这种笨办法。毛是用粮票等百十种票证把奴隶控制起来，你逃跑了就得饿死。这是毛泽东真正的发展了奴隶社会！也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做的第二大“贡献”。

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帝王思想：“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臣者奴也）”。基于毛泽东是这种“基因”造成的思想，他的每一个动机、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出发点、每做一件事，都和他巩固皇帝宝座联系在一起。这就必然是“逆潮流而动”，是极其反动的、反革命的、反人民的、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毛泽东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极权主义思想，是个人专政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毛泽东是历史罪人，毛泽东只杀中国人，不杀日本人。毛泽东在“二战”中共杀的日本人：八百五十一人（详见《日本靖国神社在中国战亡名单》）。

可是毛泽东夺取政权时，国共双方共死五千七百万人。毛泽东建国后，冤杀和饿死的中国人是一亿四千三百万人。中国的皇帝，由蒋介石换成了毛泽东，社会制度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极其反动、极其野蛮、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法西斯社会”。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是骗人的鬼话。只是换了个皇帝，而且是五马换六羊，越换越不强。等于中国人民前门打跑了索命的小鬼，后门进来了杀人的阎王。中国人民又从蒋介石的八层地狱，直接下降到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正像名画家，画的一只仰面朝天的王八，胸口上压着一个巨大石碑。这王八口吐人言说：“身是翻过来了，可是不如从前舒服了。从前我驮着这石碑还能走动走动，现在动弹不了了。”

请问：亲爱的读者先生，这是革命吗？否！这是典型的反革命（真正的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革命后全民受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反革命是换皇帝暴乱。换皇帝后全民受害，饿死的人更多，快要饿死的人，吃已经饿死的人的现象更多！）。伟大的俄罗斯政府宣布：俄国十月革命是反革命。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早晚也会被中国人民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以上毛泽东的诸多罪行，不是我编造的，详见郭国汀译著《流氓匪首毛泽东》，就一目了然了。

毛泽东死后，中国历代接班人都不敢旗帜鲜明的批判毛泽东，难道这些接班人没有受过毛泽东戕害吗？否！都受过。为什么不带头批毛呢？这是中了毛泽东生前的阴谋诡计：毛在生前就把自己、共产党、大臣们死死绑在一起了（详见张玉凤保管的“保险箱内的绝密材料”，这些绝密材料都是大臣们自己写的检讨书，其内容千篇一律，都是说：毛主席如何伟大正确，自己如何错误。今后，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永远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这些检讨书，不管是违心写的，还是真心写的。其社会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大臣们已经和毛泽东绑在一起了，是一伙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毛泽东死了，我接了班，我怎么能批毛呢，这不等于自己批自己吗。老一辈接班人死亡了或退下来了，新一辈接班人是老一辈接班人提拔的，新接班人听老接班人的。所以，毛泽东死了四十多年了，他的头像还吊在天安门上，还在不停地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毛泽东一伙人向全世界、全人类挑战。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罪人，其头像长期吊在天安门上，这是干天诛地灭、人神共诛的事！中国政要们应好好地反思，走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路，不要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神化毛泽东，继续利用毛泽东思想骗人！我敢预言：毛泽东绝对不会流芳千古，只能是遗臭万年！不要看现在，毛泽东的尸体还释放着臭气，不久的将来，必有人消毒干净。希望中国政要们要带头觉醒！带头猛醒！带头消毒，与时俱进！千万不要做历史罪人毛泽东的殉葬品，那将是历史的悲哀！

88岁耄耋老人张瑞月，作于2018-11-25日

第六章：毛泽东控制大臣的罪恶手法

（原文是知名作家单少杰撰写的“毛泽东整人手法相当高明：有两大杀招”。

读者张瑞月改为“毛泽东控制大臣的罪恶手法”）

（一）、北京学者单少杰是研究毛的知名作家。2006年单少杰撰写长文《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文章以大量史料提出毛泽东是否惧怕历史的问题，并分析指出在中共建政之后，尤其文革期间，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两大重要手段：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

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由此而追问笔者：那么，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长时间思考并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拥有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毋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民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多少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

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泽东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1) 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 1955 年 10 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 248 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等“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

在这 248 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 月 23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 月 26 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 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

留待日后算账。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鹅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

直到十六年后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送老领导最后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

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泼妇骂街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囚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军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军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2）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着。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

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这位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意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参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

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毋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3）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帐，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便与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整段辩护词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一句是“基本正确”，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

说，其正确的方面是其“质”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邓小平的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成了执政党给“反右派斗争”定性的“最权威的说法”，成了官方定论。

不过，这个“最权威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扩大化”？这个“扩大化”究竟扩大化了多少呢？

按执政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中，竟有五十四万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别或维持原判。能被执政党“坐实”为“右派”者寥寥无几，其中全国知名者仅数人。显然，用这个涉及寥寥无几的人的“罪名”，来为那个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这就如同把一张只有三五个“黑点”的白纸硬说成是一张“黑纸”一样，已近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这不仅违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减法常识，也违反了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质量互变规律的学说。

在这段辩护词中，邓小平还做了一些论证，一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论证。

论证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

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是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显然，邓小平这是在搞双重标准：只疾言批评“右派”对“三大改造”的否定——限于言辞的否定；而并不妨碍谈自己也将对“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诸行动的否定。

另外，邓小平还曾坦承：自己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义的理路，邓小平的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的认识，不足以使他能够十分确定地断言：赞成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误的。可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个他“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却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确定的结论：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就应予以“反击”，再据此咬定五七年“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显然，在这看似完全确定的结论里，是有许多臆断成分的。

论证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

“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就把他送交国际法庭予以惩处。

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话，就把他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或批斗他，剥夺他的人格尊严；或开除他，剥夺他的工作权利；或流放他，剥夺他的居住权利；或拘押他，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将他拘押致死，剥夺

他的生命权利。而这一系列的“剥夺”，正是邓小平所断然肯定的那个“反击”的实际内容。

论证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

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便“前进”到“大跃进”中去了，进入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已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

一个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另外，还有一个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运作程序，若是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就必须正式推翻有关这场运动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并获，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这一结论，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全会一级组织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

一会彰显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所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二会迫使邓小平为此而必须说上一些认错的话、道歉的话。

显然，这前一方面的后果是邓小平极不愿意看到的，这后一方面的后果则是邓小平极不愿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规避的。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赵紫阳还说：他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

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在笔者看来，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

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

他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

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其二，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涉身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史实进行掩饰。因为，为毛泽东掩饰，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掩饰。毛泽东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详情，他们也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详情。他们与毛泽东已近乎结成某种保密同盟，尽管他们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一点。

1959年出席庐山整彭德怀会议者计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参与整人者，即对被整者多多少少做过诛心之论者，当有一百五十余人。到了1978年彭德怀案获得平反时，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彭德怀的人还健在着，但其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详说庐山整人会议的真相，详说自己曾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维护毛泽东形象、也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体失语。

所幸在被他们参与整治的人中，还有一些幸存者，并且在这些幸存者中，还有胆气犹存且笔锋犹健者，还有一个叫李锐的人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一版、二版、三版，将当年“庐山会议”上的许多隐情、许多嘴脸，逐次暴露得越来越清晰。

结果，庐山上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虽为其间的整人者所掩饰，却为其间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宁说所指控。史网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锐写出这本书曾获益于胡乔木：一是成书前曾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二是成书后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此公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得很“左”，遭人诟病，被戏称为“左王”；但在支持李锐写出“庐山会议”史实这一问题上，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应予肯定，否则有失公允。胡乔木毕竟出身学堂，并长期从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还怀有着中国书生通常都怀有着的那种敬畏历史的情结。

1987年出席那场所谓的“民主生活会”的中共高层官员当有数十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者都或多或少地作过揭批胡耀邦的发言，都程度不一地伤过他的心，致使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于会后不禁“号啕大哭”。如今，仍有不少当年参和整过，胡耀邦的人还健在，可其间很少有人肯站出来，详说当年“民主生活会”的真相。他们大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为主使整人者掩饰、也是在为参与整人者即他们自己掩饰的沉默。整人者几乎再次集体失语。

与“庐山会议”的隐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会”的隐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后），自14:40至20:20，历时5小时40分；第二次长谈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历时7小时整。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

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1989、4、19），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笔者在看到此文发表前的原打印稿时，除了惊异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内容外，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即胡耀邦为什么要将这些私密且怨愤的话告诉李锐，告诉这样一个先前与自己交往并不多的人？

如李锐所言，“耀邦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胡耀邦与李锐两人出身不同，一个出身“红小鬼”，主要从事军队工作和党团组织工作；一个出身“一二·九”，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胡耀邦与李锐两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八十年代后虽有接触，但主要限于“工作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没有历史渊源”关系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倾诉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笔者看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有一点胡耀邦已明说，即看重李锐的为人，视李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故可与之交心。还有一点胡耀邦未明说，即看中李锐手中的笔，以及这支笔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视李锐为“史笔”，希望能借此“史笔”而将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记录下来，载入史籍，留待后世公论。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后评价的，毋宁说也是抱有春秋史观的。他既畏惧于历史，“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也寄希望于历史，“希望有个平反结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曾将这有关“史笔”的想法征询李锐先生本人。李锐先生当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也的确把他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

毛泽东的上述手法，即通过让手下人都参与整人而使他们日后“失语”的举措，在今天也能见到与之相类似的版本。

中国世纪之交，第一刑事大案，当属张君，集团案。该集团有一帮规：“杀人入伙，歃血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过让入伙者“手里沾点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说出集团内情。他若是要揭发别人，也就等于揭发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别人于绝境，也就等于置他自己于绝境。

例如，张君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伙，就对他说，“搞个人来给你杀，你敢吗？”李金生答道，“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过要我杀人试我的胆量，封住我的嘴嘛！”2000年8月20日，张君指令李金生枪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铁心加入张君的团伙，成为其骨干成员。

又如，张君为了能把其情妇全泓燕拉入伙，也让她“手里沾点血”，让她于2000年5月的一天，枪杀了一个“身着白色T恤衫的二十几岁的矮个男人”。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后，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

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

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

目。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 1983 年至 1984 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苹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助毛整人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

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

不过，他老人家并不总是浸泡在这污泥塘中，有时还会爬上来坐在岸边，一边喝着茶、抽着烟，一边半是欣赏、半是监督地看着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戏打闹的。

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他看着看着，还会不时发出喝彩声和呵斥声，喝彩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最欢的人，呵斥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不太欢的人。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后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

200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笔者在拜会年近九旬的杜润生老先生时，拜识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

秘书姚监复先生。中午，姚先生请笔者在其单位食堂就餐。席间，他谈了许多他亲闻亲见的事。姚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恩来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责。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了一九八九年后，这一情况愈益严重。传媒几乎不登有关“文革”的深度报道，学界竟然有学者因研究“文革”问题而遭拘禁。

这似乎再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种怪现象：过去，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抗日，另一方面又制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怀因打“百团大战”而遭本党恶意指控，并为此而备受折磨；如今，又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制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学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开幕三十周年、闭幕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在吴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见一位来自中央文化监管部门的司长。他告诉我们，上面有“话”：今年要严格控制有关“文革”的报道。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以白纸黑字的文件形式下达的，而是以电话通知的口头方式传达的。

这位司长透露出有关“上面”的两点信息：一是“上面”很蛮横，竟要封杀历史，封杀“文革史”；二是“上面”很胆怯，敢做不敢当，不敢留下有关蓄意封杀“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们似是知道封杀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面卖力地做这件事，另一方面又尽量地少留做这件事的记录。可问题是，不仅他们封杀不了历史，而且他们试图封杀历史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历史，也会成为封杀不了的历史、欲盖弥彰的历史。毋庸置疑，他们将会为此而遭到历史的双重鞭挞：一是鞭挞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二是鞭挞他们还要试图掩盖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此文完）

（二）、《毛泽东控制大臣的罪恶手法》读后感

单少杰其人，真良史也。竟敢在当世揭穿毛泽东两大整人杀招，敢说真话、实话，实在难得。毛的一生，就是伪造历史、欺骗中国人的一生。有多少善良的中国人受了毛的骗，上了毛的

贼船（其中也有我）。毛在世时，握有生杀大权，他竭力美化自己、神化自己。让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都写神化毛泽东的文章，不写者——“右派”。所以，毛在世时，其骗术大获全胜，国人莫敢不服。全国到处都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救星！可是，毛泽东到了晚年，才想到人总是要死的：“我万岁之后”，如何也能让中国人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大救星呢？他苦思冥想，想出“伪造历史”的两大损招。

第一大损招：毛大皇帝命令手下所有的大臣，都跳进污泥塘里，变成了泥猴。谁看谁都一个模样，谁也别嫌谁脏，反正大家都犯过错误，没有一个干净的！

然后，毛大皇帝任命某大臣为批斗某某大臣的小组长，这位小组长必须召集全部大臣，批斗某某大臣的错误。全部大臣也必须跟着小组长摇旗呐喊！狠斗狠批！对被批斗的大臣造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和氛围。批斗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关呢？

1、每个大臣都要做一次批斗别人的小组长（注：这时，小组长就是被批斗的大臣的跨夫，被批斗的大臣就是小组长的胯下之夫，当然也是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了。因为小组长是毛泽东任命的）。

2、做过胯下之夫的大臣，必须亲笔写下了“言之凿凿的检讨书”。检讨书的写法，必须是“毛八股”格式：过去，我没有严格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工作，犯了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今后，我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作为我的座右铭，认真学习，精心体会。我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大救星！今后，我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毛主席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毛泽东晚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伪造历史”上，全部大臣每人都都要做一次，毛泽东和小组长的胯下之夫，并写下非常虔诚鄙薄自己的检讨书，这一伪造历史的罪恶行为才算完成。

毛泽东为什么要伪造历史呢？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大阴谋：毛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要烂的。死了、烂了就不能证明我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了。这全部大臣写的伪造历史的检讨书，是万年之后都存在的。它们可以证明我毛泽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们还可证明我毛泽东是中国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

如果你毛泽东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都是你想象的哪样的傻蛋、糊涂虫，他能成为历史学家吗？绝对不能。尽管你比赵高还赵高，你不但能指鹿为马，还能指臭虫为马。你毛泽东说臭虫是马，谁敢说不是呀。若有人说是臭虫，不是马。你立马就把他推出午门斩首了。你毛泽东能欺骗当世，你欺骗不了“历史”。因为一个人的历史，就像一个人的脚印。一步一个脚印，都给你记录在案了。除非你没有走这一步，只要你走了这一步，再想抹掉，万万不能。不管你毛泽东再杀多少人灭口，你这一步脚印的罪行是抹不掉的。

比如：你毛泽东命令刘少奇带头批斗彭德怀，刘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毛和刘斗死了彭德怀（注：刘少奇曾告诉他的卫士说：……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党性极强的人。可是在庐山会议上，便遵照毛泽东的私下指示，硬把彭德怀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毛又命令周恩来和四人帮批斗刘少奇，并令各自提出一个处置刘少奇的方案来。结果，周恩来比四人帮提的处置刘少奇方案还厉害，必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注：周死后，其妻邓颖超要求胡耀邦将周恩来提的处置刘少奇方案销毁，以保留周的正人君子形象）。待到毛泽东命令邓小平带头批周恩来时，周恩来已得癌，开始尿血。医生建议马上手术，毛不同意。拖到癌细胞扩散到全身了，毛泽东才同意了，为时已晚。时人都说，周是毛害死的。邓小平在被毛泽东下放到农村工厂、劳动改造时，周恩来极力相救。我在电视上，亲眼见到一个镜头：周恩来躺在手术车上，两个大夫推着，当走到手术室门前时，周恩来突然高呼：我要下不来手术台！我要求邓小平接我的班！他比我工作能力强得多、身体好得多！

尊敬的读者先生们，请仔细琢磨琢磨单少杰这个大学问家写的文章：以毛泽东为首的毛朝大臣们都是些什么人？说句粗话，在毛泽东长期威慑教化下，把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大臣们，强制改造成：“狗咬狗一嘴毛、黑吃黑一窝匪了”。连一点点革命道德、同志道德都没有了，远不如蒋家王朝大臣们讲义气。为了迎合毛泽东心里，什么无中生有、伪造历史、见不得

人的事也干得出来。马克思主义者能这么干吗？毛为了当皇帝，一生杀两亿中国人，罪大恶极。

（注：两次世界大战才死九千万人左右，几十个国家参战，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炸弹、毒气弹、细菌战、原子弹。几千万人上阵厮杀，还远不如毛泽东一个杀人魔王杀人多）。毛的大臣，好的都被毛杀光了。活下来的，官越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鲜；官越小者众。如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随即被捕。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五分钟后，被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注：我这小小的底层老百姓，只知道这么多。万毅和钟伟是生是死？不知道的事，不能瞎写。但我在毛泽东治下生活了80多年，对毛泽东的为人，还是基本上了解的。他是“顺者昌逆者亡”的刽子手，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毛泽东在全部都是以莫须有罪名和无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杀了国家元首刘少奇和三个元帅：彭德怀、贺龙、林彪。请亲爱的读者想想看，万毅中将、钟伟少将还能活多久？

但亲爱的读者不要灰心丧气、暗暗哭泣。万毅、钟伟是永远死不了的。因为孟子讲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讲的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义是相通的，也和文天祥的“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和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都是相通的。所以万毅、钟伟是永远死不了的。只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小撮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历史罪人，别看他们还在杀人，但早已被人民扫进垃圾站了。

但是，我还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怪现象想不明白，如毛让他手下所有大臣都当过毛泽东的胯下之夫，又让所有大臣互相当过跨夫，和胯下之夫。这不是毛泽东把大臣们不当人看吗？玩于股掌之中吗？猫玩耗子吗？可是绝大多数大臣不吐怨言，乖乖听命。还山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些英雄豪杰，在长征路上和长期内战中，打倒老皇帝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的战争中，出生入死、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没有了。全都成了一窝子不仁不义的怕死鬼，都成了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背信弃义、互相抹黑、无中生有、伪造历史的高手。

毛泽东让大臣们这么一闹的结果，毛朝所有大臣都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罪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个毫无缺点、顶天立地的神。这是中国历史吗？绝对不是。这，全部都是伪史。请读者仔细想想，拥有几千万共产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好人”，那就是毛泽东。这本身就是伪史。

但大臣们为什么不群起而攻之，反而集体失语。我长期研究这个怪现象，我的研究成果是：毛泽东杀人太多，太残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帝王，能杀这么多人。这就使还活着的大臣们吓破了胆，尿了裤子。毛让大臣们跪着，大臣们不敢立着；毛让大臣们说一，大臣们不敢说二。这都是毛大皇帝大规模杀人立起来的威严。大臣们见毛，如鼠见猫。毛的这种杀人不眨眼的威严，在毛蒋争帝的暴乱中，毛胜蒋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毛说：蒋介石杀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注：这个口号并不真实，据我知道的，陈赓大将曾被蒋介石捕获过，蒋介石念师生之谊，还是把他放了。）这说明蒋介石错杀的共产党人中，还不到1:1000。可是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右派）的政策是，“宁错杀十万，不放过一个”。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抓了317万右派（注：用的是《炎黄春秋》上的数据）。毛死后，经甄别，没有摘右派帽子的仅几十个人（注：这几十个人也应当摘帽子，中国根本就没有右派这种反革命。只因57年抓右派时，毛主席是统帅，邓小平是副统帅。现在邓小平接了毛主席的班。必须留下几十个右派，不能摘帽子，以证明反右政策是正确的，只是有扩大化的错误），这个扩大化错误，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几几乎接近百分之百都是冤杀、冤案。如果，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同级的杀人魔王。储安平等民主斗士，等不到毛泽东杀右派的时候，早被蒋介石戴上“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的小红帽杀掉了。

以上说的是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怕史，故制造了不少伪史。

第二大损招，是在生活道德方面，单少杰先生，并未揭发出多少毛泽东残害无辜的罪恶行为。

据我知道的，杨开慧在家中墙缝里留下的亲笔资料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和道德流氓”。

毛泽东在生活流氓方面，也是怕留下历史骂名的。欺骗手法也相当高明——“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毛泽东的流氓手法是：首先把手下大臣们都变成西门庆，变成色狼。毛泽东这一损招的现实功效是：你大臣们也别说我毛泽东好玩三女（少女、美女和名女），你们比我也不强，你们也好玩女人，彼此彼此，大家一样。你为了保住你的光辉形象，你首先就要保住我光芒四射的伟大形象。君臣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必须“官官相护，心照不宣”。

毛泽东的具体做法是：先命人从香港买了大量原版《金瓶梅》，军级以上干部，每人发一套。然后，又令周恩来传出毛泽东的“口谕”：“你们和黄面婆（老伴）不要离婚，她们在战争年代有功，但随时可换女秘书”。流氓皇帝这一口谕，大官的女秘书就遭了殃。

流氓皇帝首先作了示范：毛泽东称帝后，并没有和江青离婚，可是分居了。江青要见毛主席，必须先通过机要秘书张玉凤请示毛，毛同意后才能见面。

强奸小秘，毛也作了示范：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和章士钊女儿章含之，都是毛泽东的秘书，同时又是毛泽东的俄语、英语翻译和老师。毛泽东百般调戏未果，即在饮食中下了迷药，然后强奸之（详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还有，毛泽东霸占了张玉凤这个有夫之妇后，二人又生一子，孩子模样酷似毛泽东，谁看了都说是龙种。但毛泽东决不让自己的儿子姓毛，而是姓张（母姓）。这是为了保住“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可是“天道”不允许：“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是不会骗人的。毛泽东和张玉凤生下了儿子，现在已是公开的秘密，人所共知的事实。

毛泽东在道德流氓方面，更是惨无人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判毛泽东说：毛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陈云批判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毛有罪，日本侵略中国14年，只杀了一个共产党将军，那就是左权将军。毛泽东在文革中杀了多少共产党将军，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毛泽东光杀元帅就是三个、杀将军就和碾死臭虫一样。这可都是毛泽东任命的元帅、将军呀！

毛泽东对手下人，用你这个驯服工具的人时，就吹捧你、提拔你。《毛泽东选集》最初版本上，印有“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的代表”。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不用这个驯服的工具人时，就彻底否定，斩草除根。

毛泽东在冤杀共产党要员时，毫无革命道德，同志道德，心狠手辣，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既然杀了你，就彻底否定你，决不下平反昭雪、死灰复燃的余地。

毛泽东杀刘少奇，只是因为毛泽东主观上怕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给他戴上子虚乌有的四项政治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在党的会议上，强迫共产党要员们举手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更可恶的是：将不举手的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常委、资深的优秀共产党员陈少敏同志也杀害了。杀鸡给猴看，向共产党高层要员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威。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要党的高层要员举手，就必须百分之百举手（注：毛在共产党高层会议上和赵高一样，别说可以指鹿为马，就是指臭虫为马，也能一呼百应）。因为不举手的，有一百杀一百，有一万杀一万，就这么残暴！

毛泽东利用彭德怀给他打天下时，就写下了有名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在战争年代，彭德怀救过毛泽东三次命。功大不如救驾！结果，毛泽东还是给彭德怀戴上“莫须有”三顶政治帽子（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把他杀了。其次，林彪、贺龙、陶铸，等等要员，都是冤案。他们都是为毛泽东打天下时、出生入死的大功臣。都是被蒋介石悬赏捉拿的人，但一个也没有杀掉，毛泽东当皇帝后，统统代为杀之。做了卸磨杀驴、念完了经打和尚、天地难容、人神共诛的事。人不反毛，天诛地灭。

古之帝王，最残暴者，莫过于秦始皇，可是秦始皇没有杀一个灭六国的功臣。可见毛泽东浑身上下，没有一个“道德细胞”，全是地痞流氓，无赖土匪，大军阀、大毒梟、大汉奸（见毛泽东给汪精卫的亲笔信）大卖国贼（让外蒙独立，送给苏联当卫星国）、大政治骗子、大阴谋家的细胞。

毛蒋争帝战争，不是革命战争，更不是解放战争，而是换皇帝暴乱。在暴乱中，双方共死五

千七百万人。毛当皇帝后，打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发动 56 次政治运动，冤杀四千七百万人；在大跃进运动中，活活饿死了九千六百万人。三数之和，整整两亿人。这都是铁的事实，无法更改的历史。

毛泽东一生的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当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如果“天”不生毛泽东，这两亿中国人或幸免一死。

更可肯定的是：不论谁当共产党主席（如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就算是毛泽东死前提名的接班人名单上的张玉凤，接了毛主席的班）绝不会发生饿死九千六百万中国人的大惨案。

因为共产党员，99.9%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正直人，都是想让人民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愿意饿死老百姓的。更没有一个愿意饿死自己和父母子孙的（饿死的人中，约 95% 是吃原粮的农民。农村共产党员约占农民的 6%，也就是饿死的农民中，有 6% 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一直认为毛泽东杀的共产党员要比蒋介石多得多）。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为了当终身皇帝和家属后代当世袭皇帝，饿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

我认为毛泽东一生，主观上尽干坏事，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就说毛搞的土地改革吧，最初几年，是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这是对的。但用暴力土改，方法是错的。

台湾、日本、印度等国，也都搞了土地改革，政府给少地无地的农民，发放无息贷款，把地主富农的土地买下来，变成了农民的土地，至今仍然是农民的土地。这是历史在前进，这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

毛泽东更反动的是：把许多好事实变成了坏事：毛当皇帝后，把耕者有其田改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每个公社就是毛皇帝的一个庄园，公社书记就是毛泽东派到这个公社的老院公，这是历史的倒退，倒退到奴隶社会了。

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毛泽东罪恶滔天”。我认为不彻底否定毛泽东，不把他死死地钉在中国耻辱柱上，写在中国教科书里，中国永远好不了。

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而用毛泽东绝对独裁专制的极权主义思想统治中国，中国永远是帝制王朝、是臣民社会。臣民社会就是君是主人，民是奴隶的社会。不彻底否定毛泽东，中国永远成不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民主社会，民是主人，公民选出的总统，是为公民服务的。服务的好，下一届总统选举时，公民还可以再选他当下一任总统。若为公民服务的不好，干了坏事，公民有权弹劾他，令其下台。民主国家的总统，公民令其下台者，屡见不鲜（注：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搞了婚外恋，被记者曝光。公民们要弹劾他，克林顿在电视上三番两次向全国公民赔礼道歉，请求任期满后下台。还有台湾陈水扁总统，因贪污罪被判刑入狱）；绝对独裁专制国家的第一把手任期满后，都是垂帘听政者，如邓小平、江泽民，臣民无权问津。

民主国家的总统，绝对没有毛泽东大皇帝那么大的权：愿意杀谁就杀谁，不管功臣不功臣；愿意奸谁，就奸谁，不论姑娘与媳妇。若有反对毛泽东残害功臣和妇女者，一并推出午门斩首。毛大皇帝就是这么残暴，就有这样的绝对权威。

所以，只要天安门上还吊着毛泽东的头像，这就标志着毛泽东的罪恶思想还统治着中国，中国仍然是帝制国家，仍然是“绝对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

可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发展趋势，势不可挡；帝制国家越来越少，形单影只，屈指可数。

上世纪初，只有以美国为首的 3 个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地球上 90% 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只有 10% 的国家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中，有的也有了民主国家的成分。地球上只有两个是“绝对独裁专制国家”，就是朝鲜和中国。然而朝鲜也在向民主国家转型，将来的金正恩，也有可能和蒋经国一样（因他二人都学过“洋文化”），紧跟潮流，自我革命，自我反思。在这方面，蒋经国有句名言：“过去我们国民党，用暴力实行独裁；现在，我要用暴力实行民主！”结果，台湾实行了总统制和多党制。总统：多党竞选，全民直选。民进党两次执政，国民党两次下台，成了反对党。全人类，不会忘记蒋经国先生对人类的贡献。他一定和戈尔巴乔夫这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一样，名垂青史！

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用举手方式通过（实为强迫通过）的罪恶手法，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邪教（毛为了掩人耳目，邪教又名：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极少数、一小撮中的一小撮、祸国殃民的坏人。如康生、柯庆施等大坏蛋，但权大无边，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玩弄在股掌之中，成了橡皮章，印把子握在毛泽东手里，尽干坏事，故名邪教）。我敢断言，将来的中国历史，肯定会做出最公正的裁决：毛泽东时代，凡举手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违法的。举手的人，除极少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外，99.99%的人，都是为了保命违心举手的，决议不能算数。什么“抗美援朝”这样的侵略战争、反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统统都是毛大皇帝一个人决定的。然后让大臣们举手通过。毛泽东举了手，谁敢不举手。不举手者，杀无赦！

中国几千万善良的共产党员，才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双手沾满了人民的、共产党员的鲜血，他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员，除了毛泽东在党内私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小撮坏人外，其他共产党员都是好人。但也都是只有举手权的毛泽东的奴隶。中国共产党也是受毛泽东专政、奴役的好党。所以，我只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我出版的三本书中，有一条红线，就是：“反对毛泽东！拥护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杀人魔王毛泽东的受害者。

毛泽东做梦都想把中国共产党和自己强行捆绑在一起，给人民群众灌输了“毛党一体化”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就是党，党就是毛泽东；打倒毛泽东就是打倒中国共产党”。这是绝对错误的理念。但在党内流行了几十年，无人敢反对。这就把毛泽东个人的弥天大罪，硬要共产党员人人有份。这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罪名，不能算数。

毛泽东老年，最怕的是：改变了他用阴谋诡计，给自己建立起来的伟大、光容、正确的形象。他苦思冥想，想出两大骗人绝招：

1、毛泽东个人干的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每一件坏事，都在有关党的会议上，做出了会议决定。把毛泽东个人的罪恶决定，移植到党的会议决定上。毛活着的时候，做这种祸国殃民的决定，非常容易。故“毛党一体”的阴谋诡计，一帆风顺，畅行无阻。

2、现在，毛对自己的形象应当踏实了吧。不！仍不踏实。于是毛想出永远保住他光辉形象的第二绝招：就是让每个党的大臣，都对毛干的坏事表态。留下大臣们亲笔写下的检讨书，作为历史见证。大臣们的检讨书千篇一律，万篇同音。无非是歌颂毛泽东、神化毛泽东的话。说他是大救星、红太阳，功高盖世，万古流芳。接下来就是检讨自己的错误缺点。做自我批评：如何如何跟不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错误。今后，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毛主席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这些检讨书，都是绝密档案，保存在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保险柜里。作为永久性的、铁证如山的证据。

毛认为在一万年后的任何年代，亮出当代大臣们的检讨书，铁证在此，谁敢改我的形象，谁敢拆我的牌坊！

毛泽东这个婊子，用暴力建立起来的牌坊，一旦暴力失效，牌坊必然倒塌。原形毕露，双脚朝天。人民自会拿起刀笔，刻在中国耻辱柱上，写在中国教科书上。

刘少奇怕“史”，说出来了。刘对毛说：“死了那么多人，人吃人，你我是要上书的”。

毛泽东也怕史，可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他说出来的话，是不怕“史”的地痞流氓话。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万古流芳，但我不怕遗臭万年！”。这句流氓话，好像是大实话，也和毛泽东能对上号。实际是更深一层的骗人鬼话。毛是非常怕“史”的，很怕自己的形象，一旦“有誉于前而毁于后”，那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

毛泽东青壮年时期，是用假马克思主义（即假革命）、假土改、假抗日做武器打天下的。因为这三假武器，欺骗性极强，老百姓一时真假难辨，大多数人上了毛泽东的贼船。跟着毛泽东这个痞子干了“革命”。毛泽东当了皇帝以后，人民百姓才知道上了当，但为时已晚，人民百姓已成为毛泽东的奴隶。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还要天天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

岁！

毛泽东打天下，用得是“阴谋诡计”和“欺骗手法”。实践证明，毛泽东在这两方面，都是天下第一。

所以，在夺取政权时期，毛泽东振臂一呼，横扫群雄。顽敌授首，天下归一。有人认为毛泽东是大军事家，否。他既不是军事家，也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哲学家。他是人类最大的阴谋家。比赵高这个大阴谋家，不知要大多少倍。

中国历史，不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彻底切割开来，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正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就是伪史。因为中国人民的灭顶之灾，都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和党无关。甚至和四人帮也没有关系：江青在法庭上对法官高声嚷道：“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咬谁！”。这说明连江青这样的皇后，都无权咬人，更无权杀人了。江青杀了那么多人，都是以毛泽东大皇帝眼色（或首肯）杀的。江青不过是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的刽子手，毛泽东不下斩令，刽子手焉敢杀人。所以，文化大革命杀 2000 万人，斗一亿人，罪在毛泽东，不在四人帮。

总之，毛泽东一生不断的创造伪史（如长征中的红军飞渡泸定桥、文化大革命中的 516 反革命组织，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毛都能易如反掌的欺骗了他的美国朋友斯诺，使他坚信不疑。斯诺上当受骗了。但历史不认可，历史是骗不了的。）

毛泽东根本不懂历史是不能造假的：人是可以欺骗的，历史不可欺骗，也欺骗不了。你为了当皇帝，杀了两亿中国人，这两亿尸体就摆在中国大地上。你就是大罗神仙，也无法抹掉这段罪恶历史。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无假的，历史是公正的。

中国历史，已经把你写在“历史罪人录”上了，谁也无法救你。你自己编造的伪史也无法救你。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历史举手投降，认罪伏法！

2018-10-1 日- 88 岁读者张瑞月作于北京-向 69 周年国庆献礼！

第七章：原载《报刊重点文摘第 61 期》十二、毛泽东“雷语”大集结！

89 岁离休干部，读者张瑞月，对“雷语”的批注（以下简称注）：毛泽东“雷语”，就是毛泽东骗人的黑话。骗人黑话均用黑体斜字，以示这是土匪皇帝黑语录。

在毛泽东时代，毛大皇帝语录就是最高指示，它的权威在宪法、党章以上。毛大皇帝残害人民的黑话，党、政、军必须执行、照办！

1、“知识越多越反动”。

注：若这条骗人黑话能成立，马克思、恩格斯是顶级大知识分子，知识最多。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最大的反动分子了？这能令人心服口服吗？

再说，你毛泽东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你虽没有上过大学，但你自学能力强。你童年就能写出很好的《咏蛙诗》来，最后两句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是多大的“霸气”！历史上自学成才的人很多，有走“正道”的，有走“邪道”的。秦朝赵高也是自学成才的人，但无论在学识、官职、权力、治国才能方面，远不如丞相李斯。可是赵高是阴谋家，李斯是政治家。结果，赵高把李斯丞相五马分尸了。在你毛泽东这一朝，你和彭德怀都是自学成才，但你是阴谋家，可以“指鹿为马”，把彭德怀这个人民军事家杀了。还有大学问家梁漱溟，也没有上过大学，但在大学担任教授多年。是正人君子，以建设新农村为业。他说：农民生活太苦了，在九天之下。你毛泽东闻言大怒，斥曰！在农民问题上，你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意思是说，我毛泽东最了解农民。结果：把名教授梁漱溟软禁在家，闭门思过。你毛泽东亲自指挥农业生产，饿死 9600 万人。

你毛泽东无法否定你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因为你出版了五卷《毛泽东选集》和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印刷量比《圣经》还多，达到了人类人手一册。这还能说不是大知识分子吗。但大知识分子中有好人和坏人。你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黑话，只能和你对上号，对你这号人，是名副其实的真理！

真理者，放之四海皆准之谓也。你毛泽东这句黑话，只能检验你个人是对的。检验别人是错的。这就不能称之为真理，只能称之为“匪理”。

你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最怕人有知识。人有了知识，就能独立思考。有独立思考的人，就能识破你欺骗老百姓的鬼话。因此，不好忽悠，不好驾驭，不好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当驯服的奴隶。所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人有知识、有学问。

毛泽东不让人有知识的恶毒手法是：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毛下令每个单位都要办个“721大学”，半年毕业。毕业后是半文盲，能读几段毛主席语录，能写毛主席万岁，就算大学毕业了。毛决不能让工农群众知识多了，知识多了就反动了。工农只是个能劳动的活机器、螺丝钉，驯服工具，能生产出东西来就行了。毛泽东要奴才不要人才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国古代出了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孔子。孔子一生，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现代中国，又出了个自封的思想教育家毛泽东。这两个思想家谁是谁非呢？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我们是批孔老二起家的，我们不能再把孔子请回来”。

可是人类不这么看：全世界的现代国家，几乎都有孔子学院。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找不到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没有“721大学”。人类的共识，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最后的判决。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注：农村赤脚医生都是毛认可的华佗、李时珍。都在拿农民的生命开玩笑。农民得了癌必死无疑。如农民得了肺癌，先让赤脚医生看（药费报销），给点止咳药，吃三个月不见好。赤脚医生写个转院单，介绍患者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卫生院也没有x光设备。仍然是对症下药，吃止咳药。又治三个月，不但无效，反而病情加重。卫生院介绍患者到县医院治疗，药费可报销一部分。县医院有x光设备。经检查，扩散了。大夫对家属说：“病人平日喜欢抽烟喝酒，就给他买点好烟好酒吧，时间不多了。扩散了，我们大夫也无能为力”。

有人说，可直接到县医院去治病，不用赤脚医生转院。不经转院的患者自费，谁治得起呀！

民主国家，全体公民治病不收费。哪个医院有真华佗、真李时珍、有x光设备，就到哪个医院治病。有这样的医疗制度，就是得了“癌”，也能早发现控制住。可是毛泽东不许实行民主国家的医疗制度，毛泽东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民主国家治病不收钱的制度，毛泽东决不实行。必须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假华佗、假李时珍、残害老百姓的医疗制度，治死多少人，毛也不在乎。反正毛泽东本人不让赤脚医生治病。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注：理工大学生，能给毛泽东生产核武器，核武器能保毛泽东永坐皇帝宝座。理工大学，学制不缩短，课程不减少。尤其是搞核武器专业的，花多少钱也要保证办好。毛时代，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排在前五名。人民生活水平排在九十名以后，饿死九千六百万人，是世界之最。

毛泽东何以重视大规模杀人武器、轻视人民生命呢？！这不是灭绝人类罪吗！在大规模屠杀人类方面，列宁、斯大林、希特勒与毛泽东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小鬼见阎王了。在大规模屠杀本国人民方面，毛泽东也是世界之最。毛泽东为了实现当皇帝的终极目标。毛、蒋争皇帝宝座，28年内战中，双方共战死5700万人。蒋介石败走台湾，毛泽东夺取了政权，当上了皇帝。毛马上发动大小56次政治运动，巩固政权，冤杀4700万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饿死9600万人。三数之和是两亿人。毛泽东当了永久性皇帝，给中国人民各个阶级，无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红五类、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叛、特、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代表是刘少奇）、知（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撂下了两亿人尸体！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丝毫没有改变，没有进步，仍然是封建专制法西斯社会制度。甚至比蒋皇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说：“新社会和旧社会差不多。”不是差不多，而是反差很大。蒋介石当皇帝28年，冤杀多少人？毛泽东当皇帝27年，冤杀多少人？可比吗？可说是一比一万！毛泽东这个皇帝比中国旧社会最坏的皇帝蒋介石冤杀的人多万倍。

4、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注：民主国家已经按照马克思的教导，消灭了城乡差别，农业大学办在哪里都一样。只有专

制国家城乡差别还很大。中国大陆，农业大学当然要搬到农村去。可是中国台湾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农业大学办在哪里都可以。毛泽东大概从来没有到农业大学参观过，农业大学内，也有许多试验田。也可以叫卫星田，不过农业大学的卫星田，最高亩产一两千斤。决比不上毛泽东强迫农村公社书记报给中央的卫星田亩产量高达万斤、几万斤、几十万斤，可惜都是“假大空”。实际亩产几百斤。这简直是“瞎胡闹”，不但糊弄不了外国人，也糊弄不了中国人。就因毛泽东强迫农民报假高产这一损招，饿死老百姓 9600 万人。但毛泽东心宽体胖，脑满肠肥。毛泽东并不在乎饿死多少人，他说：“社会主义社会，谁也没有搞过，还能不犯点错误，缴点学费？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我决不下‘罪己诏’”。毛泽东当皇帝后，已经变成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他竟把近一亿人的生命比作“缴一点学费”。真是旧社会一百个杀人魔王，也比不上毛泽东这个最凶恶、最残忍的杀人魔王杀人多。如果说，请求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毛泽东第一次耍“阳谋”，抓了 317 万右派；那么这是给农民耍的第二次“阳谋”。是强迫农民报高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结果，饿死 9600 万人。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注：1969 年，我下放到平谷县靠山集公社红石坎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毛泽东下了最高指示：“在农村，贫下中农要管理学校”。北京市平谷县靠山集公社红石坎大队书记不敢怠慢，立马任命一名在旧社会给地主扛活的刘老头为红石坎大队小学校长。刘老头坚决不干，理由是不认识字，干不了。大队书记给他做政治思想工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教育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占领。”红石坎大队小学的教育阵地，你这雇农出身的老长工不去占领，还能让资产阶级去占领吗？刘老头没有办法，勉强接受了小学校长的职务。可是没有几天，公社通知小学校长到公社开会。这位新任校长，一听报告，就傻了眼，根本听不懂。想记下来吧，又不会写字。会后，他气冲冲的回到红石坎大队，找书记说：“我说我干不了吧，你非让我干。我去开会，我根本就听不明白讲的是什么，想记下来吧，又不会写字。在会上，我傻呆在那里，正个像一个大白薯！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站起来走了”。

以上说的是农村占领教育阵地的情况。在城市，毛泽东派去了军宣队、工宣队管理大学。工宣队、军宣队都是半文盲。首先遵照毛主席最高指示，把教授们轰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然后，把工宣队、军宣队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旧故交调来大学任职。教授的房子，都分配给新调来的人居住。新调来的人都不能登堂讲课，这就成了“停课干革命”的局面。这是毛泽东又一次的“瞎胡闹”。其结果，是大学的职工人数大增，在校生和大学职工人数的比是 1:1。这又是一个世界之最。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知识断代”。这个知识断代的损失，是国家和人民承担下来了！毛泽东为什么千方百计不让人民有知识呢？因为毛泽东思想认定：知识越多越反动！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注：这条语录是欺骗知识青年的：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在城市生活，首先要安排工作，最低工资也要二三十元。中学生要长大，要结婚，要住房。再有就是城市人，口粮指标高。一个城市人的口粮指标，相当于三个农村人的口粮指标。毛泽东养活不起这么多城市人口，怎么办？毛泽东就想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这条骗人的损招。陈独秀说：“革命是神圣的事业，不准坏分子用所谓革命玷污这神圣的事业。”像毛泽东这个坏分子的所谓革命，统统都是反革命。就像俄罗斯政府公布的：十月革命是反革命一样。革命本来是好东西，经毛泽东一掺和，就变成了坏东西。如 40 年代，在延安搞的开荒种田、大生产运动，本来是件好事。军队开荒种田，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多好的事呀。可是毛泽东掺和进来了，开荒出来的地，毛泽东命令王震将军全部种了罂粟，其收获制成大烟，卖给国统区，残害中国老百姓。其罪行比英国大烟贩子颠地还厉害！颠地只是贩卖大烟。毛泽东是种植、生产、贩卖、开烟馆一条龙残害中国人。毛泽东一生，搞得“好事变坏事”实在太多：如土地改革是件大好事，应当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改为是贫下中农的土地。可是毛大皇帝把土地改革，搞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这就和土地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了。整风运动也是件好事，同志们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是件好事。可是毛大皇帝，利用整风运动，铲除异己，搞

宗派活动，杀了不少好同志和共产党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好事。可是，毛大皇帝搞成了“毛花独放，毛家独鸣。有些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就上了当，自己“放”了、“鸣”了，统统被打成了右派。共打了 317 万右派（详见《炎黄春秋》）。这 317 万高级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是搞创造性劳动的。应扬长避短，发挥他的专长，给国家创造出高水平生产力来。毛说：“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反而说右派就是反革命，把他们都轰到农村修理地球去了。这就是毛泽东搞的“扬短避长”。两个右派也不如一个老农的劳动成果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谁杀了伯乐？毛泽东也。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注：不经考试，怎么录取学生？不经考试，不知学生学习的好坏。怎么毕业？大学生是龙蛇混杂、贤盗不齐、地痞流氓、正人君子、愚蠢透顶、聪明过人、秀才举人、文盲白丁，同聚一堂。老师是从小学一年级讲起呢，还是从大学一年级讲起？绝对废除考试制度，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瞎胡闹”。废除考试制度，这只能达到毛泽东不让人民有知识的目的！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注：这一条黑语录和上一条一样，其目的就是不让人民有知识。如果教育部门不按最高指示办事，强行考试。考生可以作弊，可以交头接耳，可以冒名顶替。

总之，这是毛泽东千方百计不让学生学到知识。人没有知识，就只能当毛泽东的驯服工具、当没有思想的活奴隶。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注：毛泽东承认自己是绿林大学的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故此，毛在红墙大内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绿林大学就是土匪大学！土匪当了皇帝，握有生杀大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中国还能有好吗？除非打倒皇帝，实行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多党竞选、全民普选总统，中国才有救。土匪当皇帝的国家，永远好不了！全国人民永远是土匪皇帝的奴隶，奴隶永远生活在十八层地狱！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注：就算《红楼梦》里比你说的有好几十条人命，再多出十倍来，才有好几百条人命，就算五百条人命吧。你毛大皇帝杀两亿中国人，比《红楼梦》里贾家的罪行大四十万倍。你毛泽东所谓的新社会比你所谓的旧社会，更不拿人当人看！而是当鸡鸭猪狗牲口看。你草菅人命的罪行，中国人民总有一天和你算清这笔账！你毛皇帝是压迫、剥削、残害人民的一方，人民是被压迫、被剥削、被残害的一方，这也是阶级斗争，是更悲惨更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国人民不把你毛皇帝斗倒在地，再踏上一亿只脚，中国人民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注：这个“你”是王海荣）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再回去。

注：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学生遵守校规，学习才能有序。如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学，老师在讲课，学生在睡觉，鼾声如雷；看小说的看到妙处，哈哈大笑，拍案叫好。请问，这是教室吗？这简直是天桥杂耍场、野店。老师无法上课！再好的学生，也得不到老师的真传。更成不了高材生，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注：12 条和 11 条黑话一样，就是学生要和学校、老师捣乱。捣乱的目的就是不让

知识。中国人若都有了知识，那可不得了，都反动了，皇帝宝座就不稳了。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中国人有知识。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注：1957年抓右派，文科毕业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搞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又好指点江山，说自由民主社会好，独裁专制社会不好。因此，划右派的最多。工程技术人员和理科毕业的知识分子，是搞自然科学的，划右派少些。尤其是搞核弹、导弹的都是重点保护对象，不抓右派（个别有政治背景除外）。只要他老老实实搞核弹，为我所用。我毛泽东就保护他（她），给他优厚的物质待遇。不惜出卖9600万饿死鬼的口粮，放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全靠核弹、导弹保护他的皇帝宝座吗！

做毛泽东的子民很难，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毛泽东手里。考大学的人，都是19岁左右的孩子，哪里知道考核物理专业的，今后会升天堂；考文科专业的，今后会下地狱。谁也不是毛泽东肚里的蛔虫，全凭碰大运。又像做大梦，梦见什么算什么，全不由己。毛时代，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和民主，人的命运都由毛泽东定！

14、和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注：有理扁担三，奴才相。你毛泽东的英雄气概哪里去了？你是皇帝，也拍洋人的马屁！中国人有理扁担三，洋人无理反敬为上宾。这有失人格国格！你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动不动就劳动改造、推出午门斩首！你在洋人面前就低三下四，称洋人爹，亲口称斯大林慈父，你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根据你做人的品质，你一旦被敌人捕获，立马就变为叛徒。你为什么就不学习中国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骨气呢。

15、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注：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这句话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其实，只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竭尽全力推行的“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才是受难者，才是奴隶。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民主和自由，没有人权，没有人道，没有法制，没有发言权。人民和鸡鸭猪狗一样，被大量屠杀和饿死。人民无地方投诉，因为专制国家的法院院长都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独裁者派去的，不是人民选的，只听命独裁者的。听独夫民贼的，对人民杀无赦。

16、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伟大的斯大林万岁！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他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注：有人说斯大林是毛泽东的父亲，我还不信。现在，毛泽东亲口叫斯大林慈父，叫洋人慈父，真下贱、无耻！你毛泽东一直在无耻的吹捧斯大林。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死后，你还给斯大林定性为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可是，原苏联人民反对你的定性，已经把斯大林钉在耻辱柱上，写在教科书里了。你早晚也要和你的慈父一样，被中国人民钉在耻辱柱上，写在教科书里，遗臭万年！

17、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注：若说以马恩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我相信是真理。因为马恩提倡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正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正在被全人类所接受。列、斯、毛所提倡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骗局，正走向死亡。人类知道这个大骗局不是为人民谋福利，而是为人民造灾祸。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注：详见《俄罗斯政府公告》：十月革命是反革命……）。若说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是天大的谎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用暴力社会主义社会篡改了马恩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列、斯、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和急先锋！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完全相反，因此，人类先把苏联消灭了，改制了。下一步就是消灭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

社会。因为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是强迫人类下地狱的！必须打倒！

18、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追求的终极理想社会。这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压迫、消灭阶级剥削，完全是出于公心。毛泽东讲阶级斗争，是为了统治人民，拿阶级斗争当枪使。对每个臣民而言，你听话不听话？不听话——阶级敌人，轻则劳改，重则枪毙！毛泽东完全是利用阶级斗争学说，压迫、剥削、残害人民的，百分之百出于私心。毛泽东想用此法，永远当皇帝。用阶级斗争学说欺骗、忽悠工农群众，支持他永当皇帝！

19、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注：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言。这句话应改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更拥护，凡是敌人干点有人道、人性的事，我们就坚决反对。”举例如下：蒋介石搞党国制，你也搞党国制。蒋介石搞枪杆子里出政权，你也搞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搞独裁专制，你搞绝对独裁专制。你说蒋介石不抗日，跑到峨眉山上观虎斗。你更不抗日，你下的死命令是：一分抗日，二分摩擦，七分发展（注：光游不击，不许你的部队主动出击和日本鬼子打仗。只许千方百计绕到鬼子后方，和国军闹二分摩擦、搞七分发展。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14 年，蒋介石的军队打死日本鬼子 318883 人；毛泽东的军队打死日本鬼子 851 人，详见日本靖国神社，二战在华战亡人员名单）。从打死鬼子数量上看，你毛泽东远不如蒋介石抗日。蒋介石打死的鬼子是你毛泽东打死鬼子的 375 倍。毛泽东反而说蒋介石不抗日，毛泽东抗日。这说明毛泽东是最不要脸的瞎话大王，他欺骗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故：赵紫阳秘书鲍彤（中共中央委员）愤然说：“我 30 年代，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延安参加了共产党。如果那时我就知道，毛的党国比蒋的党国更独裁、更专制、更黑暗、更反动。我就不参加共产党了，我就参加国民党了。”

1942 年，河南省大旱，颗粒不收，饿死 300 万人。这纯属天灾造成的。详见电影《1942》。蒋介石闻之大惊失色说：如果我们不赶紧救济灾民，我真成了“独夫民贼”了。故采取紧急措施如下：

1、马上拨给河南省主席培基 8000 万斤救济粮。

2、疏散灾民，动员灾民到陕西、西安丰收地区就食，灾民坐火车不要票。河南灾民到丰收地区就食的大约 1000 万人。

旧社会灾民有个歌谣：‘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来，南北二京都不收，黄河两岸渡春秋’。蒋介石统制时代，灾民有逃荒的自由。蒋介石这个敌人，有时也有一点点人道、仁慈的表现。你毛泽东就坚决反对，派民兵荷枪实弹，阻止灾民逃荒。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 9600 万人，完全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与天灾无关。气象专家分析，三年困难时期，气象均属正常，老天爷无罪。中国这么大，旱涝地区年年有，大部分是丰收地区。毛时代，是“江南无日月，中华无青天”的时代。毛祸，全国无处不受灾，无论灾荒地区还是丰收地区，饿死人、人吃人的严重情况是一样的。饿死 9600 万人，完全是毛泽东从农民口中夺粮造成的。丰收地区饿死的人，比灾荒地区饿死人一点也不少，这就证明与老天爷无关，完全是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造成的。毛泽东所谓的“三分人祸”是农村革命不彻底，国民党特务钻进了农村党组织搞的破坏。这更是胡说八道、莫须有的罪名。另外，严禁灾民逃荒，把逃荒者打伤、打残、打死者不计其数。其实，逃出去也得饿死，因为人人都有口粮指标，自己还挨饿呢，哪有粮食给逃荒者。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就出现了一些全家饿死、全村饿死的惨状。（详见杨继绳著的《墓碑》）。

有人问：中国最后的两位坏皇帝，谁更坏呢？我答道：在抢夺百姓财富方面：蒋来如篦，毛来如剃；在大规模杀人方面：蒋杀一，毛杀万；在倒退历史方面，毛泽东是天下第一，无人可比！

20、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注：毛很少读马克思的书，也读不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人人为我，我为我”。夺取政权时期，毛泽东鼓动贫下中农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把地富的土地、房子分给了贫下中农。然后毛泽东放出风来说：地主、富农的后台是蒋介石，蒋介石要打回来，你们分的房子和地都要交回去。你们还打死了地主、富农的人，你们的命也难保。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送子女上前线，彻底打倒蒋介石，你们的房子、地就牢靠了。

于是贫下中农中了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子女们踊跃参军。毛泽东兵源充足，用“人海战术”打跑了蒋介石，自己当了皇帝。如果你毛泽东初衷不变，贫下中农分的地主、富农的地，其产权永远是贫下中农的，那你毛泽东做得对，虽然是暴力土改，打死一百多万地富，我也赞成。但你当皇帝后，很快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国有化就是毛有化。你毛泽东发给贫下中农的“土地证”，全部收回，和烧地富的地契一样，一烧了之。从此，无论地主、富农、贫下中农都成了你毛泽东的佃户、杨白劳！

“造反有理”也要看怎么个有理法？二战后，日本、台湾、印度、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土改的性质和你毛泽东不同，效果也就不同。日本、台湾等国家是民主土改、和平土改。时至今日，土地所有权，仍在无地、少地的农民（毛称之为“贫下中农”）名下。

因为民主政府给贫下中农做工作说：你们是种地高手、生产粮食的能人。这是你们的长处、优势。可是你们没有地，种的是别人的地。这就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给国家、给自己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地不能尽其力，人不能尽其才。这不符合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政府发给他们无息贷款，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你们种上了自己的地，当然打粮食就多了，慢慢还清无息贷款。农民大悦。说：“土地改革万岁！”

民主国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日本、台湾用政府发给农民的低息贷款买的地主、富农的地，至今还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没有一个成为“毛世仁”的佃户的。

光买土地的农民大悦还不行，政府还要让卖土地的地主、富农也大悦。政府给地主、富农做工作说：你们地主富农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应当发挥你们的长处，到欧美先进国家深造，回国后开工厂、办企业、当经理。你们不会种地，是门外汉。你们要扬长避短。把土地卖掉，到国外深造。这样做，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政府的政策对头，既解放了人，也解放了“地”。所以在20年里，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

对照毛泽东搞的“暴力土改”，贫下中农得来的土地容易，失去的也快。现在，毛泽东名下私有土地是9600万平方公里。不过，都是暴力抢来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还要退还给国民。毛泽东个人专政27年，千真万确饿死炎黄子孙9600万人，真是吓煞人也！中国人民迟早要和毛泽东算清这笔账！

2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注：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死两千万人（叶剑英语）。还要进行多次，多次是多少次呢？姑且算十次吧，那就是毛泽东还要杀两亿人。幸而毛泽东恶贯满盈后，死了。暴政，人死、政息，中国再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说明社会在进步、在发展。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暴力政治正走向死亡。

你毛泽东独霸皇帝宝座，不许全民选总统，你的私字还小吗，你为什么不斗私！你私字最大，你不斗私，让老百姓斗私。老百姓已经是你的螺丝钉、驯服工具、驯服奴隶了，哪里还有“私”呢。如果你硬说老百姓还有私，那就是肚皮内的五脏六腑是私有，除此之外，就是你毛泽东发给老百姓的那点仅能维持生命的东西，哪里还有私呢？你霸占了全民的财富，不归还，为什么不斗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就是建立毛有制。

批修：你毛泽东说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竭力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你顽固地坚持暴力社会主义社会，和马恩对着干。你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修正主义。这说明你才是最典型的、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你把真马克思主义“修正”成假马克思主义，你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你让老百姓斗私批修，老百姓终有一天会明白过来。他们不斗私批修，

而是要“斗毛批假”。你毛泽东这一辈子，在公开场合，没有说过一句真话，都是骗人的假话！人不斗毛批假，天诛地灭！人不斗毛批假，死在毛泽东屠刀下的两亿中国人能合上眼吗？！活活饿死在毛统制时代的九千六百万人能合上眼吗？！炎黄子孙后来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为这些冤魂、饿死鬼们报仇雪恨！

22、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 100 倍啊（也许毛泽东详细计算过，确实不小于秦始皇杀的人 100 倍）。

注：毛泽东知道杀人能立威，经常和秦始皇比杀人。自己承认比秦始皇杀人多，何止高于秦始皇百倍。秦始皇时代，全中国人口是 2000 万人。秦始皇这个杀人魔王，一生最多杀百分之十的中国人（秦始皇不能把中国人都杀光，杀光了谁养活他和他的军队呢？，谁给他建阿房宫和地下宫殿呢？所以，奴隶不能杀光，最多杀百分之十左右，以立威。我认为这么评估比较合理。）也就是秦始皇一生杀 200 万人，占当时秦帝国人口的 10%。毛泽东一生杀中国人是两亿。毛泽东杀人是秦始皇的 100 倍。毛泽东又说：“太谦虚了，何止 100 倍啊”。这就不好说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金口玉言”，他不说数，谁敢乱言。毛泽东随意草菅人命，杀这么多人，这就给毛主席立了大威。无论大小官员和老百姓，一听到毛主席这仨字，就本能的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这仨字，简直是监察御史惊堂木拍在办案桌上，跪在毛主席脚下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哪个不胆战心惊，莫敢仰视，立马大嗓门山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致使毛泽东强烈感到：“杀人能立威”，这是个办法！毛泽东一生的“天职”就是杀人立威！让老百姓山呼万岁！毛泽东亲自写了“我的自我评价”，大意是：“我成就了秦始皇和马克思。秦始皇和马克思为我所用，又成就了我毛泽东（这句话怎么讲？我的理解是：用秦始皇大规模杀人的办法，建造了暴力社会主义大厦，用马克思主义搞了暴力社会主义大厦的装修。结果，把中国这座假社会主义大厦，搞得非常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里边坐着毛大皇帝，墙上挂着秦始皇和马克思的头像。）”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最后说：谁能抓住秦始皇和马克思为我所用，谁就是我最好的接班人。换句话说，谁能用秦始皇大规模杀人、用毛泽东篡改了的假马克思主义骗人，谁就是我最好的大太子。

毛泽东死到临头了，还在教太子们，如何用秦始皇杀人，如何用假马克思骗人。秦始皇和马克思必须双管齐下，缺一不可。我毛泽东的成功，就是证明。

23、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人、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注：在红墙大内，你的 1 组内有没有花木、花盆。这是不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取消？反而用高级花木技工，给你搞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金鱼游泳。过着封建士大夫、资产阶级公子哥的生活。大宋王朝包拯说：“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不可‘严以对人，宽以待己’”你还不如一个封建士大夫包拯呢。

更不如封建社会穿龙袍的皇帝诚实，穿龙袍的皇帝说：“朕有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但一生未见过皇帝面的美女，至少占一半。

你毛泽东这个不穿龙袍的皇帝，为了掩人耳目，在后宫不留这么多佳丽，而是你宠幸完了的佳丽，就让她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你下令每周必办两次舞会，选天下美女来伴舞，凡你看中的，就给你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点头示意。今晚，这个美女就“陪王伴驾”了。

你到外地视察，所到之处，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敢不献上当地的美女、名女、少女呢。你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把上海的名女加美女，上官云珠带到你的别墅游泳池旁。你见上官氏美若天仙，风情万种，龙心大悦。马上招其下水，就在池内戏水调情。少时，你轻挽上官氏腰部，也忘了龙行虎步的走法，而是用西门庆的小碎步，亦步亦趋的进入了你的卧室。

往下当然是“千般颠倒，万般擗颠、兽性大发”了。你当皇帝 27 年，被你糟蹋的良家妇女，何止三千！

更可恶的是：你这个不穿龙袍的皇帝，竟敢和土匪一样，欺男霸女。在青天白日之下，就把张玉凤这个美女，抢进中南海一组，作了你的“压寨夫人”。张玉凤和其夫刘新民生有两个女儿，过的是和谐而甜蜜的生活。丈夫听说妻子，被毛泽东皇帝霸占了，欲哭无泪。因为毛时代，中国是封建专制法西斯国家，不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中国法院院长是毛大皇帝派的，不是选的。到法院告毛大皇帝霸占了他妻子，法院必判他个反革命罪，轻则劳改，重则死刑！刘新民想到人大常委会告毛，可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是毛大皇帝派的，不是人民选的。刘新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张玉凤也有难言之苦，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儿子，模样和毛泽东一样，谁看了都说是龙种。可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伟大领袖的形象，继续欺骗老百姓，不让他的儿子姓毛。毛泽东的一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生，是欺骗老百姓、蒙蔽老百姓的一生。

毛泽东在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面，欺骗手法，比穿龙袍的皇帝高明的多，巧妙的多。

许多老百姓还以为毛是个不近女色的明君呢。中国改朝换代几十次，哪个皇帝也没有取消妓院。只有毛当皇帝后，马上取缔了妓院。因为毛大皇帝用不着去妓院嫖妓，而是把美女招到龙床上就行了。可是忠厚、老实、善良的穷苦老百姓呢？一辈子娶不上媳妇的大有人在。在旧社会还有个《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呢。你这不穿龙袍的皇帝时代，成千上万的卖油郎找不到一个花魁女。你毛大皇帝的政治制度又纪律严明，乱搞男女关系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这可是大罪呀！谁敢乱搞男女关系呢。那么，这些忠厚老实的卖油郎们，如果死在毛大皇帝前头，只能对上帝说：对不起，我没有娶上媳妇，又怕毛大皇帝打我个“资产阶级思想犯”，为了保命，我只能“原封不动”的还给您，皇天大老爷！

现在不同了，毛大皇帝死了。社会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环境也宽松了许多，这是社会在进步。但是毛大皇帝的形象还要维护，挂牌上税的妓院，还是不许办的。不过“暗门子”不少。有些二十多岁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就走了“暗门子”这条道。什么美容美发业、按摩保健业、洗浴休闲业、大小娱乐厅、饭店、旅店、小时店。等等。这些单位就成了地下妓院。如老板手眼通天，和官面上拉上关系，这些单位就成了半明半暗的妓院。总之，现在中国妓女之多，是世界之最。追其根源，罪在毛泽东，生产力低下，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毛泽东这个不穿龙袍的皇帝，不搞生产，不提高生产力。专搞阶级斗争绞肉机运动，27 年共发动了 56 次政治运动，专门破坏生产力。抓右派运动中，共抓了 317 万右派（见《炎黄春秋》数字），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 63.4%。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不发挥他们的专长，反把他们劳动改造了，大量知识分子饿死、累死。致使生产力低下，虽然毛大皇帝死了，不能再破坏生产力了。可是毛大皇帝留下的这个破烂摊子，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女青年找不到工作，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要比民主国家，低得多，生活不了。这就迫使，女青年走进地下妓院。这种社会现象，罪在毛泽东！

我看过一份材料，1953 年，日本、台湾都比中国大陆穷。经过 27 年的实践。日本和台湾不搞阶级斗争绞肉机，而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日本生产力仅次于美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但日本、台湾、美国也有妓院，其妓女不是被生活所迫，而是个性解放的自由职业者。民主国家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官员不许去妓院，老百姓可以去。这和专制国家成了鲜明对比，专制国家的官员嫖妓报销，老百姓自费。这也是毛泽东土匪政治的后遗症。

24、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

……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注：毛泽东善于发动群众运动。在文革中，毛把群众分为两派，这两派都自称是左派、造反派，天天喊毛主席万岁！可是这两派又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这就打起了派仗。初是口水仗，后是拳脚仗，再后是枪炮仗。在武斗、打派仗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发现了坏人，把“西纠”

定为反革命组织，取缔了（西纠是反对江青的）。)

毛是支持打派仗的，至于武斗死了多少人，毛是不在乎的。他说：“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因为两派都忙着打派仗，忙着喊毛主席万岁！至于谁让他们打派仗的？谁让他们连珠炮似的喊毛主席万岁的？两派都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这就使毛泽东稳坐皇帝宝座了。

25、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注：东欧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失败了。因此改了制，由绝对独裁专制制度改为自由民主制度了。由帝制改为多党竞选全民直选的总统制了，由臣民社会改为公民社会了。这是社会革命，致使社会进步了。毛泽东杀了七十多万人，阶级斗争搞彻底了。帝制保住了，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制度保住了。可这不是革命，是反革命。社会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这是毛泽东大张旗鼓地杀七十多万人的成果。

26、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注：这一条和上一条一样，其思想是杀人越多越万岁，毛泽东越能稳坐皇帝宝座。但从历史上看，凡是用多杀人巩固皇帝宝座、巩固政权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毛泽东认为杀人越多越能保住皇帝宝座。这种思想，就不可能把人民当人看，只能把人民当驯服奴隶、驯服工具看、当鸡鸭猪狗看。你的大太子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反对你，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反的对。在政治路线上拥护你，拥护错了。邓小平说：“杀20万，稳定20年”。用多杀人稳定社会，绝对错误。多杀人，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在政治上，改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才是治本。光治标不治本，就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了。人民总有一天会觉醒过来，看清毛泽东杀人越多越稳定，杀人越多越万岁的政治路线，是害国害民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是伟大的领袖，而是伟大的刽子手。毛泽东的一生，不是干革命，而是干反革命！

27、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注：“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可这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呀！两派都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在那里厮杀，你毛泽东还高兴，还在那里观虎斗，叫好！

为什么打派仗？大概这两派也搞不清楚，瞎打、胡打呗。谁让他们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们打的。北京用冷兵器，不能算打。四川开枪开炮才算打。总之，能大规模杀人才算打！反正中国有的是愚昧无知的奴隶，打死多少奴隶，奴隶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死的？是谁让他们互打互杀、死在绞肉机中的？中国奴隶真可怜！但我相信，可怜的奴隶们，总有一天会在铁桶中想明白的，是会破铁桶而出的。出来后，定会勇敢的向前苏联人民学习！打倒压迫奴隶、剥削奴隶、残害奴隶的皇帝专制制度！自觉的走前苏联人民之路！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大力宣传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看这话很快就要实现了。

28、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注：这第28条黑语录，只说了两句话。前一句好理解。后一句：“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这就百思不得其解了。毛泽东可能考虑到上海人口多，故多杀几批，才能镇住。那么全中国当时是6亿人，该杀多杀呢？杀人也下指标，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

这三个“其乐无穷”的黑话，毛泽东说过多次。我想，他的用意是藉此欺骗群众，发动政治运动，也让群众“其乐无穷”起来。这完全是个大骗局。

首先说与天斗吧：这个“天”字，皇帝和老百姓有不同的理解，老百姓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敬“天”，是相信“天”保护民、不饿死民。

毛泽东说：“蒋介石搞的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我非让‘天’再生出一个太阳来！”中

国就成了“天有二日，国有二君”了。这就是“毛、蒋争帝”的内战起因。蒋介石出兵，打的是国家旗号，名曰“戡乱、剿匪”。毛泽东出兵，打的是“革命”旗号。革命是个新名词，来到中国还不到二百年。比戡乱、剿匪这些老掉牙的名词，欺骗性更强，更有鼓动性和进攻性。故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组建了几千万革命小将红卫兵，自任红卫兵司令。把杀人权由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到红卫兵组织，让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也参加到滥杀无辜运动中来，让几千万红卫兵小将们，也享受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事”。给红卫兵有杀人权，还有第二层用意：你们民主党和右派们不是要求大民主吗，我就给你们大民主。几千万红卫兵有骂人权、打人权、抄家权、关人权、杀人权，这还不是大民主吗？就算是美国这样的顶级民主国家，也做不到像中国这样的大民主。

民主也是一样，到了毛泽东嘴里就产生了异议：毛泽东说：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以此推论“革命”、“鸦片”，都有双重性，它既能救人，也能杀人。最根本的问题，要看用它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名医用鸦片是治病救人，毛泽东用鸦片是杀人害人。毛泽东在延安时，生产了大量鸦片，害死了不少中国人。毛泽东是用神圣的“革命”二字为人民造福，杀了多少人。孙中山、陈独秀用神圣的革命二字，是为人民造福。造福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来的（列宁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强奸了马克思主义，硬把马克思主义修正成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既拜马克思、恩格斯为师，又拜列宁、斯大林为师。因为，马恩是创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祖师爷。列宁、斯大林是建成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

毛泽东清楚的知道，人类有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倾向。若想当现代皇帝，必须“巧妙地利用”人民这种向往和追求的倾向。他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金字招牌”，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举得高高的，喊的响响的。目的是利用“金字招牌”当皇帝！但毛泽东又清楚地知道马、恩、列、斯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马恩为首的第二国际，是用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也就是用多党竞选、全民直选的方法，选出任期总统来，领导国家。总统权力有限，必须在宪法内行使权力，违宪的总统下台，甚至治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出不了皇帝，更出不了暴君”。这对毛泽东来说，不能当皇帝，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意义。他绝不会拥护第二国际的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另一派是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第三国际，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暴力手段，实现暴力社会主义社会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1、消灭民主。2、消灭自由。3、消灭法制。4、消灭人权。5、不用任何法律程序，直接使用暴力复辟帝制。暴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出皇帝、不出暴君的。

列宁搞无产阶级专政时，他的导师普列汉诺夫，就规劝列宁不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说：无产阶级人数众多，无法专政。若搞无产阶级专政，必先选出个领袖来，代表无产阶级实施专政。但选出的领袖是个人。个人专政，必出暴君！列宁不听。实践证明，普列汉诺夫说的是真理。第三国际的国家都出了暴君、复辟了帝制，倒退了历史！这是最严重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的每个细胞都想当皇帝。封建专制皇帝，都是一个人说了算、顺者昌、逆者亡的暴君。这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一头扎进第三国际怀抱里，叫斯大林慈父，这是必然的结果。

列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和毛泽东的慈父斯大林，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红旗反马克思主义的高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篡改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篡改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进而把斯大林主义篡改成毛泽东思想。经过这一连串的篡改，真马克思主义被彻底消灭了，都变成假马克思主义了。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民主和自由，建立的是公民说了算的社会。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不经过任何法制程序，直接使用暴力，搞暴君说了算的社会制度。这两个核心，形成了水火不能同炉的两个“国际”。第二国际只能全民选出任期的总统；第三国际只能出皇帝暴君。

毛泽东之流下定决心，要在现代社会中当皇帝，就必须以“假”乱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造谣说：第二国际出了“修正主义”，第三国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马克思搞阶级斗争，首先强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至少亲口说过三次：“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人问恩格斯，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回答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是多党、多组织、多团体、联合革命的形式。简言之，这就是民主革命的形式。这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国明明是皇帝毛泽东个人专政，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以假代真吗。

毛泽东当皇帝后，所办的事几乎百分之百是以假代真。比如旧社会叫皇帝，穿龙袍。新社会叫“主席”，穿便衣。可是新社会穿便衣的主席比旧社会穿龙袍的皇帝权力大万倍。西方民主国家的皇帝，要受宪法监督，国会监督，教会监督，公民监督。所以西方国家的皇帝，就不能随意“草菅人命，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勇士的奇遇》这部电影，就说明这个问题。皇帝要强奸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打皇帝一个耳光，跑了。皇帝也没有搞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诛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强奸的妇女打毛泽东一个耳光，必死无疑）。

中国旧社会，穿龙袍的皇帝，也有人监督，那就是“宗人府”（注：又名“宗人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皇帝的叔叔、大爷、至亲、甚至太上皇。如果皇帝所作所为太不像话，都是滥杀无辜的胡作非为。“宗人府”有权制止他。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不穿龙袍的便衣皇帝毛泽东。他废除了宗人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受红卫兵山呼他万岁时，就对身边的小红卫兵说：“我爸爸若活到现在，也得接受群众批判”，以表示他大义灭亲，他爸爸和百姓一样，也得受批判。百姓和百姓平等是假平等，百姓和皇帝平等才是真平等。毛泽东霸占了有夫之妇张玉凤，并给毛生了个儿子。直到毛死后才让张玉凤回家与夫团聚，这叫那一门子平等呀？毛时代，中国就没有平等，没有人权。

毛还独霸了“为人民服务”这个事业，只许他用“四死政策为人民服务”（四死政策“穷死、饿死、累死、斗死”）。毛泽东用“四死政策”为“为人民服务”，已经杀害了一亿四千三百万人）。不许大臣们用“强国富民、一个人也饿不死”的政策为人民服务。如有人胆敢用强国富民、一个人也饿不死的政策为人民服务，毛必打他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反党、反革命的罪行。

毛身兼三职——共产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公然向全民宣布：“全中国，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都归党管”。党归谁管？当然归毛主席管。这就使毛泽东权大无边，为所欲为了。毛泽东当皇帝后，亲自发动56次政治运动，把中国铸造成了一台杀人威力极大的“阶级斗争绞肉机”，绞死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其中饿死九千六百万人。这是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绝对准确无误。档案材料，就尘封在公安部档案馆，不准外传）。中国共产生了六百位穿龙袍的皇帝，这些皇帝杀的人加在一起，也远远达不到一个穿便服的毛大皇帝杀人多。

毛泽东这个暴君杀这么多人，还要看看“哪个虫儿敢作声！”他万万没想到，竟有那么几个虫儿，凭着自己打天下的汗马功劳，对“主席”劝说了几句。这就被“主席”推出午门斩首了。被斩的，都是世界闻名的大人物、大功臣，又是“保错了皇帝”的可怜虫。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陶铸、张闻天，等等。

这些大人物远不如后起之秀，反毛大英雄林立果，他要为国为民铲除杀人魔王毛泽东。他比大人物雄心壮，胆气豪。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精神。结果，他和荆轲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叫人民泪沾襟。

毛泽东这个政治骗子，只能用“与天斗其乐无穷”这种骗术，忽悠老百姓一时，不能忽悠老百姓一世。

以下，再说说“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真实用意。毛泽东最怕人闲下来，想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否是“瞎胡闹、瞎指挥”？是否是“运动群众”？毛是不让人民有时间想这些问题的。

他发动全民土法炼钢，钢产量一年翻番。强迫九千万青壮年，不分昼夜炼废钢（土法炼出的

钢，都是不能制造农具的废钢)。1958年，风调雨顺，是个大丰年，毛不让九千万青壮年回家收秋，粮食都烂在地里。造成了丰年不丰收的恶果，1958年四季度，农民就开始饿饭。毛泽东又搞了高收购、反“瞒产私分”运动。结果，饿死9600万老百姓。

毛泽东坚持大跃进，继续不让人民思考他的假大空骗术。接着又发动了“全民办水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毛表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搞了300亿立方米土石方的水库，才死3万人。毛说，这是用群众运动搞水利工程的榜样，死人少，挖土石方量大。在毛泽东忽悠下，全民办水利运动中，共移动土石方量，相当于950条苏伊士运河的土方量（详见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76页）。苏伊士运河的土方量，约为3·2亿立方米。这就是说，毛泽东用“群众运动的野蛮施工法”，挖掘3040亿立方米土石方，按毛泽东称赞吴芝圃的死亡定额计算，死3040万人。毛泽东不用科学方法搞水利工程，而用群众运动搞水利工程。结果，凡按毛泽东野蛮施工方法，搞的水利工程，都是“豆腐渣”工程。1975年，在短短几小时内，河南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暴雨中崩库，淹死24万人（官方说：8万5千6百多人）。1999年检查水利工程，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工程，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这也是毛泽东高举的三面红旗，给人民带来的“福利”。

最后说说：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一条很简单，人民容易看清楚。毛泽东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选得是“先当土匪后当皇帝”专业。毛泽东的生活轨迹：学生—土匪—皇帝。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知道的事。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的一生，是与人斗的一生。毛泽东喊过陈独秀万岁！后斗倒了陈独秀。他多次喊过蒋介石万岁！后斗倒了蒋介石，自己当了皇帝。毛泽东你已经当了皇帝，就应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吧。不！你还要继续大规模杀人。你把剥削阶级都斩草除根了，下一步，还斗谁、还杀谁呢？你有办法，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你根本不提你亲口说过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这句话），伪造出党中央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就是刘少奇。你怕大人物、大功臣造反，你和他们斗，把他们杀了不少，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陶铸等，统统杀光。你最怕的是人民造反，要和人民群众斗。要大规模杀人民群众。你当皇帝27年，发动大小56次政治运动。你亲手制造了“阶级斗争绞肉机”这种杀人武器，杀了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平均每天杀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人。

你的大臣们在和蒋介石斗争时，因为蒋介石杀共产党的口号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1:1000）”。你的大臣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因此他们才成了你的大臣、重臣。你当皇帝后的口号是：“宁错杀十万，不放过一个右派（右派就是反革命。1:100000）”。你毛泽东比蒋介石错杀人厉害一百倍。这就把你的大臣们吓破了胆，尿了裤子。全部大臣，都成了你毛泽东的胯下之夫，并不反抗，还争先恐后地喊你万岁！胯下之夫们，不知为耻，反以为荣。你杀大臣就像碾死臭虫一样，毫不手软。你罪大恶极，人不反毛，天诛地灭。

29、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注：这条黑语录，肯定了农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是农村革命的中坚力量。在农村土地革命中，地痞流氓为毛泽东当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在农村开创根据地时，正经农民都不敢和毛泽东的队伍接近，说他们是土匪。就和日本侵华时期，农民说“鬼子进村了”一样，赶紧躲开。可是，地痞流氓最勇敢，不躲开。一见土匪进村了，迎上去，表示欢迎。土匪、地痞本是一家人，见面后，自然是情投意合。毛泽东最初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地痞流氓。后来扩大组织，吸收了一批真正农民。再后来，党支部见地痞流氓匪性难改，为害地方，清除了一批地痞流氓成员。（详见名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打击了地痞流氓。但毛泽东是真正的地痞流氓总头，他坚决反对在农村清除地痞流氓。故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赵树理杀了）。

30、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注：这条黑语录毛大皇帝说的很清楚。他建立的政府给国家、给人民办十件事，其中：只有

一件是好事，国家和人民都得到了好处。九件是坏事，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坏事。国家和人民都得到了灭顶之灾。可是，你办的这九件坏事，决不允许“见书见报”。你办的那一件好事，就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必须出书见报。久而久之，你残害人民的九件坏事，人民就淡化了，忘记了。但天天讲的那件好事，人民就记牢了。你就是用这种欺骗老百姓的手法，忽悠人民。阴谋诡计说一万遍，就成了真理。结果，你毛泽东成功了，胜利了，当了终身皇帝！

你这个欺骗老百姓的皇帝，如果在欧美民主国家，独立法院，早把你抓进监狱了。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你建立的，按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打天下者坐天下。法院院长是你派的，不是民选的。见了你都尿裤子，他还敢抓你吗。他喊你万岁还怕来不及呢。这是毛泽东所建立的绝对独裁专制法西斯社会制度和欧美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完全相反的地方，有本质的差别。所以，毛泽东建立的政府，绝对出不了民选总统、民选官员。因为老百姓都是毛泽东的奴隶。毛泽东绝对不会给老百姓选举权的。

你毛大皇帝还有一种欺骗手法，就是把坏事当好事宣传。如：化民有为毛有。毛大皇帝，搞得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硬说成是“土地国有化”。还有，统购统销政策，明明是把老百姓所有的生活资料，统统化为毛大皇帝所有。老百姓买口粮，必须持有毛大皇帝发给的粮票和钱票，两票俱全后，才能买到毛大皇帝的粮食。你说说看，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到底是毛大皇帝的，还是老百姓的。

所以，你毛大皇帝建立的国家，是绝对的独裁专制、法西斯国家，你为了巩固你的皇帝权位，九件坏事不许见报，不让人们知道。只能用你做的一件好事，继续欺骗人民群众。

如果大臣们不听话，把这九件坏事抖搂出去：“**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是震慑大臣的话。天子一怒，伏尸万里。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坏事登在报上。”毛说：“有几十万个农业大队，一个大队有一条缺点错误，就是几十万条缺点错误，全登在人民日报上，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完蛋”。说真话、说实话，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完蛋。怎么办呢？如果直白了毛泽东的意思，那就是大小官员都说假话，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完蛋不了了。可是，用假话骗人，只能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第二天大家混过去了，第三天就很难混过去了……。

毛泽东为什么非常强调政治家办报，政治家脑瓜灵。不用毛泽东说破道明，就明白毛泽东内心的意思了：缺点错误不能见报。歌颂毛主席、神化毛泽东的才能见报。

你毛皇帝建立的政府办十件事，九件是坏事。你就应当下《罪己诏》，怎么反诬下属登在报上，你比土匪还土匪。毛泽东这一发威，文官武将都被毛泽东的杀人刀法镇住了。为了保命，都争先恐后山呼毛主席万岁！这就使毛泽东残害老百姓的气焰高出万丈。

如果文官武将联合起来，拒绝接受毛泽东让他们干的九件坏事（和抗日时期毛泽东给他的部队下的死命令，不许和日本人打仗。彭德怀和林彪就不听毛的死命令，硬主动出击和日本鬼子各打了一仗，共消灭日本鬼子四百余人）。毛泽东若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打倒政府，或找红军去，就让他去，毛必死在农村。

因为，今非昔比，不要怕毛泽东了。如果毛泽东真的走投无路跑到农村去。农民一定扒了他的皮、吃了他的肉，抠出他的眼睛泡烧酒喝！农民见了毛泽东，肯定要大喝一声：你毛泽东别忘了，你饿死的9600万人中，绝大部分是我们农民呀！饿死的农民中，绝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农村的共产党员占农村人口的6%。你饿死的共产党员，比蒋介石杀死的共产党员要多得多。

我这个笔者，虽是个地主崽子，也要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愤愤地问你毛大皇帝一句：你这一生究竟给贫下中农带来了什么好处？你霸占了贫下中农分的地主、富农的地和他们原有一点土地。你成了拥有96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地主，全部农民都成了你的佃户。你压迫剥削佃户比黄世仁大万倍。

我有个远亲，是东鹿县城关人，按辈分我叫他舅舅。贫农出身，共产党员，1946年土改时，任农会主席。在土地革命中，贡献不小。分了地主、富农的房子和地。贫农有了自己的地，种

地又是行家里手，打的粮食就多，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不料毛泽东和袁世凯一样，当了皇帝。我这位贫农舅舅沦为毛泽东的佃户杨白劳了。因他一辈子是重体力劳动者，吃的多。所以，1960年饿死了。他的冤枉和彭德怀一样。毛泽东利用他们时，就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不用时，就把彭大将军折磨致死。用我舅舅这样的小人物时，就封他为农会主席，分田地，斗地主，多次送本地贫下中农子弟参军，上前线。不用他时，就饿死他！

毛泽东还要找红军去，就让他找去，红军见了毛，一定会说：你杀了三个红军元帅，那么多名将军。如果我们还跟着你干革命，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会是三个红军元帅、那么多红军将军的下场头。我们不上二次当，还是先把你这个流氓大皇帝杀了吧！（注：在杨开慧卧室的墙缝里，找到了杨开慧亲笔写的对毛泽东的评价：说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道德流氓。）

31、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除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注：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害国害民的事情，搞什么样的群众运动，都预先推算出一个百分比来。不管这个百分比对不对？一律要求臣民们为此目标而奋斗。为完成此目标，不许用唯物的“实事求是方法完成。必须用唯心主义办法、大胆的怀疑完成。”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必须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捉不到这么多老虎，就“大胆怀疑”，只要用毛泽东的这一“大胆怀疑”，准能超额完成捉老虎的任务。

因为人民在群众运动中都有了经验，人民的语言又是这么丰富，群众给群众传递消息说：“张三被‘打成’反革命”了，群众不说：“张三是反革命”。因为群众明白，张三本来不是反革命，这一“打”，就成了反革命。群众知道毛泽东说的“大胆怀疑”和“打成”是一个意思。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重证据，不重怀疑。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是重“怀疑”、重“打成”。所以，毛泽东搞的56次政治运动中，他预先推测出残害人民的罪恶指标，都能用“怀疑”和“打成”这两个法宝超额完成。以示毛泽东的伟大正确，进而神化了毛泽东。

32、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注：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说：在一场世界大战中，死4亿中国人，换来一个大同世界是值得的。这句话是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亲口对赫鲁晓夫说的，有档案可查。原话大意是：第三次世界核大战必然要在中国展开。那时，我们把美国的主力部队，吸引到中国内地。请苏联向中国投放原子弹，一举全歼美国主力。中国死4亿人，换来一个大同世界是值得的。

这就等于说，用4亿中国人的生命，换来毛泽东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值得的。这是他当中国皇帝后的奋斗目标。他还说过：太平洋并不太平，因为太平洋不归我们管。归我们管了就太平了。毛泽东这么大野心，想干什么呢？他想全人类都跪在他脚下，山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人类有这样一个野心家、专门杀人的阎王，人类还能有好吗？！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彻底消灭这种野心家、这样的阎王。人类才能过太平、安定、幸福的日子。否则，人类必然成为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的奴隶。愿人类早日觉醒起来。彻底铲除毛泽东这类杀人魔王，确保人类过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也就是欧美国家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

33、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注：这是杀人魔王毛泽东在核战争中，预先估算的死人百分比。全人类死三分之二，剩三分之一，这个仗为什么还要打呢？按照毛泽东思想说，这个仗必须打。不打，有毛泽东思想的人，就不能当世界皇帝，不能奴役全人类。顽固坚持毛泽东思想统治世界的人，必须发动核战争，当上世界皇帝，奴役全人类！所以，全人类必须团结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彻底消灭想用毛泽东思想奴役全人类的人。

34、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注：据说：毛泽东请外国朋友参加茶话会，谈到核战争死多少人的问题。一个外国朋友和毛泽东开玩笑说：核战争无论死多少人，你不能死。毛泽东问，为什么？外国朋友说：你死了，

全人类找不出像你这么坏的人了。毛闻言抚掌大笑，和外国朋友一一握手说：“太了解我了！太了解我了！”凡是大恶大奸的人，只若听到说到他心眼里去的话，不但不怒，反而大笑。如《三国演义》中，有个相面的，给曹操相面后说：“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之抚掌大笑而去。毛泽东就有这个本事，所以他当了皇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比毛泽东学问大的、本事大的有的是，但他们只能当大臣，不能当皇帝。因为他们在这个“奸”字上，在“阴谋”二字上，是毛泽东的拉拉孙。毛泽东玩大臣于股掌之中，就像猫玩耗子一样。大臣们还在睡梦中高呼毛主席万岁呢！大臣的头就掉下来了。毛泽东高就高在：大臣的头掉了，并不知道是毛泽东砍下来的。难怪台湾人写一本书，书名叫《丑陋的中国人》。

35、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注：这一条和以上 33、34 条一样，毛泽东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而是把中国人当鸡鸭猪狗、苍蝇臭虫、草芥肥料看。只要能保住毛泽东开国大皇帝之位，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

36、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注：这一条和 21 条是一样的：21 条是清洗政府中的流氓分子。36 条是清洗军队中的流氓分子。毛泽东当然一概反对。因为毛泽东是老流氓，是流氓的祖宗，清洗他亲爱的子孙——小流氓，当然心痛的不得了，哪有不反对的呢？！

毛泽东在换皇帝暴乱中，他看准了地痞流氓不怕死，勇敢，可以利用一下。他教唆地痞流氓不要到地主、富农家里抢粮食，而是到地主、富农的地里，割去长熟的庄稼。名曰“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带领“秋收起义”的地痞流氓，投靠了井冈山上的土匪。井冈山的大寨主叫袁文才，二寨主叫王佐。毛泽东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土匪见土匪，当然是一拍即合。称兄道弟，拜了把兄弟。毛泽东又介绍两位寨主入了党。于是就做起“打土豪，分田地”的买卖来。买卖越大，成了气候。然后，势力发展到江西瑞金，在瑞金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为苏联的一块飞地）。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到此，毛泽东才开始搞唯我独尊的宗派主义、清洗党内异己分子。首先杀掉了袁文才和王佐，说他们是“AB 团”成员。

AB 团，历史上有过这个反动组织，但毛泽东大杀 AB 团的时候，绝对没有一个 AB 团。AB 团已成了历史。这是“毛借杀 AB 团的刀，消灭异己夺权。”

毛泽东是个大阴谋家，比赵高指鹿为马还厉害。用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一直用到他生命终结。如说刘少奇是叛徒，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把他们都杀了。毛泽东才当了永久皇帝。

37、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注：无论晋朝史学家陈寿写的《三国志》，还是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都写的是三姓中国人争当皇帝。可是毛泽东的蒋、日、我《三国志》，把日本侵略者也算成一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建国，凡是中国人都应当反对。除非你是汉奸，欢迎日本侵略者，到中国来建国。而且让日本侵略者占地越多越好、越爱国。毛泽东这一国，绝不反对日本这一国多占地盘。若是反对日本人多占地盘，就是帮助蒋介石打日本人，就是爱蒋介石的国。

有人问，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不都是毛泽东这一国打的吗？这两仗毛泽东都反对打，而是前线将军们违抗命令打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吗。这两仗都打胜了，共消灭纯日本鬼子四百余人（详见《中国现代史词典》）。这两次胜仗，毛泽东又贪天之功，毛泽东在电影中作秀说：“百团大战打得好，有条件时，再搞一两次”。毛泽东绝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写电影剧本的人神化毛泽东、歌颂毛泽东之笔。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批了彭德怀一辈子。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彭德怀说：“你发动百团大战，不是爱国，而是爱蒋介石的国！”（详见《庐山会议纪实》）。

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比汪精卫还大。如果毛蒋合作，同仇敌忾，共同抗敌，联合美国，美国出枪，中国出人。不屑八年，定会打败日本。可惜，毛泽东这个大汉奸，不和蒋国合作，反而和日本人合作。毛泽东通过潘汉年这个“两面地工”，和日本鬼子暗送秋波，传递毛泽东的

汉奸声音。因此，毛国不破坏“日国”铁路、公路。“日国”不进攻延安，不轰炸延安，只轰炸重庆，进攻重庆。毛当皇帝后，怕潘汉年走漏消息半点，把他劳改致死。

38、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注：毛泽东的这条黑话，充分说明毛泽东在14年抗日战争中，完全是假抗日真汉奸的行为。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不和日本侵略军碰面，绕道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扩充八路军。这是长征时就用过的假抗日办法。毛泽东在长征时打的旗号是“北上抗日”。红军去抗日，由江西瑞金出发，应当直奔东三省有日本鬼子的地方去抗日呀！怎么直奔没有日本鬼子的四川西藏、陕甘新疆去了。哪里有日本鬼子就上哪里去打鬼子，这叫真抗日。哪里没有日本鬼子就上哪里去，这叫假抗日。你毛泽东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不抗日，你还命令你的部队：待到“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这是假抗日，真和日军合作，当日本汉奸，阴谋夺取蒋介石政权。

39、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注：这39条黑话，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其祖国是苏联，不是中国。这说明毛泽东不但是日本汉奸，还是苏联汉奸，毛是名副其实的双料汉奸。这不是别人给他扣的帽子。而是毛泽东自己的言行成就了他！蒋介石不抗日，把半个中国让给了日本人。你毛泽东更不抗日，把整个中国让给了日本人。然后，再借苏联的力量打回来。你毛泽东是苏联的儿皇帝，你怎么能肯定老子那么听儿子的话呢？如果真打回来了，用你的话说：“解放了全中国”。你怎么能肯定苏联老子不学“西太后”呢？把你这个儿皇帝废掉，换上一个比你更孝顺的儿皇帝，或换几个岁的小皇帝，垂帘后边坐着斯大林呢。你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骗不了人民。

40、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注：这第40条黑话，是毛泽东给他领导的武装力量下的死命令。也是毛泽东抗日的总体方针。分析一下毛泽东的总体方针：“一分抗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阎锡山的解释是“游而不击”。我的解释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和日本鬼子碰面，绕到鬼子后面，壮大武装力量。待二战结束，武装夺取蒋介石政权”；“二分应付”，有的资料说是“二分磨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协议；两党共同抗日，毛的武装力量（两个师）改名为中国革命军第18路军，佩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由国民政府供给。毛泽东的军需要得多，蒋介石给的少。双方扯皮，这就需要“应付”、“磨擦”；“七分发展”，指的是毛的武装部队不和日本鬼子碰面，而绕到鬼子后方去。绕到后方干什么？建立农村党组织、村政权、农会、青救会（民兵组织）、妇救会、儿童团。这些组织都是为战后夺取蒋介石政权作准备的。所以，毛泽东所谓的抗日是假抗日，真汉奸。真要夺取全国政权当皇帝，这是毛泽东的终极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欺骗了国民党人，欺骗了共产党人，欺骗了全中国人民，欺骗了全世界人民！

41、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注：第41条是最不要脸的黑话，毛泽东终于摘下了抗日的假面具，亲口说出了心里的活：“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大恩人、大救星”。日本皇军侵华期间，实行了“三光政策”，使用飞机大炮、毒气战、细菌战，（杀伤中国人民3500万人，其中死2000万人，江泽民语）。皇军是毛泽东这个共产党

人的大恩人、大救星。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大日本皇军帮助你当了皇帝吗！你为了当皇帝，就勾结大日本皇军，当汉奸，帮助皇军杀伤 3500 万中国人。你想当皇帝、倒退历史的罪行大如天！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给你毛泽东算清这笔账。

42、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注：这一条是毛泽东继续撒谎，说什么：“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这纯属骗人的鬼话。翻看中国历史，除了孙中山领导的昙花一现的“辛亥革命”期间，是“人民夺取了政权”外，都是谁打下的天下谁当皇帝的历史。毛蒋争当皇帝的内战，不是革命战争，更不是解放战争。而是争当皇帝的暴乱。蒋介石当皇帝时，已经把中国人民打入 8 层地狱了。因此，按毛泽东的说法就“闹起了‘革命’”。毛泽东打跑了蒋介石，自己做了皇帝。就应当把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稍微向上提那么一提，比如由 8 层地狱提高到 6 层。也算是你毛泽东大皇帝比蒋皇帝好那么一点，人民也没有白跟着你干“革命”。不！蒋介石这位皇帝，就是坏透了的皇帝，“毛皇比蒋皇”更坏百倍。你把人民一下子打入 18 层地狱了，活活饿死 9600 万人，你亲自发动 56 次政治运动，冤杀 4700 万人。你杀人之多，是世界之最！蒋介石和你毛泽东比，蒋是小鬼，毛是阎王！

我看过马克思写的关于“内战”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赞扬美国的“南北战争”，说它是“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因为美国南北战争，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都不能出现“皇帝”，只能出现“民选任期总统”。革命战争结束后，生产力大大提高，全民受益。另一篇文章，是批判“太平天国”的文章，马克思说：“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的产物”。洪秀全这个魔鬼在南京称帝，杀人无数。毛泽东这个魔鬼在停滞社会里应运而生，在北京称帝，27 年杀死、饿死一亿四千三百万人。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封建专制法西斯社会。生产力大大下降，全民受害。

中国一共出了 600 位帝王（详见《帝王纵横》），这 600 位帝王饿死和冤杀的人加在一起，也没有毛泽东饿死和冤杀的人多！不把毛泽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写在历史教科书里，遗臭万年，天诛地灭！人不反毛，天理难容！

43、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注：这一条继续强调日本侵略中国是好事，日本侵略军杀 2000 万中国人是好事，日本鬼子，在南京屠城，杀 30 万南京居民，也是好事。按照毛泽东思想说，只要毛泽东能当上皇帝，杀几亿中国人都是好事，都无所谓。

44、1972 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注：这一条是：大日本皇军帮我夺取了政权，我毛泽东当上了皇帝。我如何感谢大日本皇军呢？我不要你们的战争赔款！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二鬼子国家，也要了日本战争赔款。只有毛泽东不要日本战争赔款，不要唐山大地震各国的人道援助。因为日本战争赔款和唐山地震各国捐款都不要，这对毛泽东的物质生活毫无影响，他还是和西太后的生活水平一样，因为 2 人都是皇帝吗。这两个大灾难，都让中国老百姓买了单，老百姓过得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牛马生活。

45、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注：消灭麻雀，这是毛泽东专制老百姓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吗。毛泽东不能让老百姓有一刻的空闲，要不断地发动全民运动。全民扑麻雀，就是运动全民的典型。如果全民不天天运动，不劳动，就会变坏，就会反现实，就会造反。毛的对策是：全民扑麻雀，全民炼废钢，全民办水利，全民办公社，全民办交通，全民大跃进。反正想

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坐在煤球筐里，像煤球一样不停的运动。使他们无时间想造反的事。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大跃进一来，人就顾不上犯罪了”。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是重复的毛泽东原话，但不全面，后面还有半句：“低标准，瓜菜代”。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关心人民生活呀！实在是太关心人民生活了，关心到无微不至的程度。甚至教导人民吃什么，怎么吃法。可是人民群众并不买毛的账。人民群众说：你这个办法，已经强迫我们实验过了，结果，饿死了9600万人！你关心人民生活，就像你“为人民服务”一样，谁愿意接受你的为人民服务呢？因为你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你对人民实行的暴政——四死政策（穷死、饿死、累死、斗死）。你的“为人民服务”谁能接受？可是不接受就斗死你。

46、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注：这46条黑语录，是改薪金制为供给制。这是毛泽东原有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思想。因为供给制比薪金制更能铁一般的控制臣民，皇帝宝座更牢固。毛在50年代就想在中国实行供给制，考虑到中国太大，问题太多。后改为先在儿皇帝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做个试点。毛指令儿皇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实行供给制，取消城乡差别。波尔布特这位儿皇帝遵命照办。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用暴力实行了供给制，取消了城乡差别。取消城乡差别的办法是：用暴力把城市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农民的生活水平：把城市人轰到乡下去种地，实现城市农村化。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夸奖波尔布特说：“你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仅一击不再有阶级存在”（详见郭国汀译著《流氓匪首毛泽东》）。

细想，毛泽东的话也对，柬埔寨经过这“仅一击”，全体臣民都成了波尔布特的奴隶，人人都是平等了，怎么会出现阶级呢？不像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没有搞“仅一击”，就出了“红五类”、“黑九类”这么多阶级，天天在毛制阶级斗争绞肉机中，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可是，柬埔寨搞了暴力的“仅一击”，问题也不小。击死了国人三分之一（200多万人）。其中，有大量的中国华侨和越南侨民。中国当然不去营救侨民，毛泽东还大加赞赏波尔布特呢，怎么能去营救侨民呢。这就激怒了越南政府。它和柬埔寨反对派联手，出兵柬埔寨，营救越南侨民。并把波尔布特赶出城市，当了土匪。这时，毛泽东已死。如还有口气，必出兵柬埔寨，营救儿皇帝波尔布特。中华儿女死于柬埔寨者，又不知几多。后来，波尔布特求救于大太子邓小平，未果。波尔布特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身亡！

自此，柬埔寨人民（包括中国华侨）彻底解放了，享受到自由民主的社会生活。从反皇帝、反暴君、反绝对独裁专制的事业中，评价柬埔寨民族和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远远不如柬埔寨民族觉悟高、反抗性强、富有强烈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我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的一员，实在感到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为何中华民族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分不出绝对独裁专制制度和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哪个好，哪个坏呢？！结果，柬埔寨民族得到了解放，中华民族下了地狱。

47、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注：毛泽东的“雷语”，一共说了66条。这66条可分为“三部曲”：第一、说的都是地痞流氓土匪黑话；第二、说的都是假大空骗人鬼话；第三、由47条以下，说的都是失去人性的疯话和屁话。这些疯话、屁话，不值得批判，因为毛泽东说的是没有人性、没有人格的话。读者一看，就知道是疯话、屁话。

中国人你还养不起呢，已经饿死了9600万人。你还要搞地球委员会，……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只要是认识这几个字的人，就能知道这是疯话、屁话。

48、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注：同上。

49、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注：只要毛泽东思想还在中国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道德。因为道德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没有道德，毛泽东也不允许道德存在。毛泽东把杀人权、关人权、抄家权……，统统下放到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打死人白打，这哪里还有道德可言呢？这简直是土匪国家。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最有道德的人，就是抗日大英雄彭德怀，他拒绝大汉奸毛泽东不许和日本人打仗的命令，私自发动了“百团大战”，主动出击，打击日本人。结果，毛泽东把他杀了。罪名是：你发动百团大战不是爱国，是爱蒋介石的国，是帮助蒋介石打日本人（详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

50、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注：同上。

51、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这 51 条要批判几句。如果毛泽东说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能成立的话。由 1958 年 4 季度到 1962 年四季度，中国农民已经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吃饭不要钱）了。可是历史记载，就在这四年中，饿死 9600 万中国人。像你毛大皇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吃饭不要钱。那么，希特勒办的“劳动集中营”，也吃饭不要钱！按毛的说法，抓进“劳动集中营”的人，也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希特勒不但无罪，应该万岁！谁愿到你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活呢？除非你使用暴力，谁不愿意过“共产主义生活”，枪毙！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吗！马克思决不会这么表述共产主义社会。

52、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注：全是漫无边际的疯话、屁话。你毛泽东搞得是暴力社会主义社会，你是皇帝，臣民是奴隶。你是强迫奴隶为你劳动、劳动出来的财富全归你所有。这种暴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是臣民社会制度，其生产力永远赶不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力。你别说两三年就能赶超英国，就是你搞得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消亡了，也赶不上英国的生产力。因为你毛泽东的社会制度，是只搞阶级斗争，不搞发展生产力的。英国是只搞发展生产力，不搞阶级斗争的。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就不同。生产力不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就不同。

英国人看病，只拿身份证就行了。只要证明你是英国人，你就和英国的女王、首相平等了——治病不要钱了。中国只有你毛大皇帝一个人治病不要钱。离休干部也得交挂号费和自费药钱。更不要说你的几亿农奴了。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能和你毛大皇帝平等的，因为皇帝是专制人民的人，人民是被皇帝专制的人。你愿杀谁，就杀谁，你愿奸谁，就奸谁，奴隶无法和你平等。

53、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注：同上。

54、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注：同上。

55、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注：毛泽东从不相信法律能治国。他是法律无用论者。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治国理论，这理论也很简单，就是不给老百姓犯法的时间。具体做法是搞大跃进这样的群众运动。实行四死“穷死、饿死、累死、斗死”暴政。这样一来，效果还真不错。不要说无时间犯法了，就连想一想，为什么不让人吃饱的时间也没有了。人们想的是：我再数一遍粮票吧，似乎粮票少了一两？若果真少一两，明天我只能吃四成饱了。这么累的活，吃四成饱，离饿死、累死就差不多了。

现在，青年人不相信有饿死的人，这也很正常。因为毛泽东时代他们还没有出生。我是 89 岁的老人，是从毛泽东时代死里逃生过来的。哎呀呀！毛泽东时代厉害呀！现在，我还庆幸我不在 13.15% 的饿死鬼内。毛时代，一家人一家人饿死，一村人一村人饿死（详见杨继绳著《墓碑》）哎呀呀！惨不忍睹！吓煞人也！

毛时代，饿死 9600 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农民中的党员占农

民人口的 6%。一百个蒋介石也没有饿死这么多农民，也没有饿死这么多共产党员。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贫下中农出身的人贡献最大，牺牲的人最多。可是农民的生活最苦，上毛泽东的当、受毛泽东的欺骗最严重。

但也有觉醒过来的贫下中农。1958 年末季，一天中午，在中南海北门外，站着一位三代贫雇农出身的女青年，他叫刘桂阳，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她双手各举一块硬纸牌，一块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这是惊天动地的反革命事件。便衣警卫和拎小鸡似的把她拎进了国务院北门警卫室，上了手铐脚镣……（详见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第 363 页）。这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也消灭不了的！。

56、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注：凡是按群众运动，不是按科学方法搞生产的，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的生产方式，就是蛮干、胡干的生产方式，焉能不多死人。死掉一半人，也要发动群众蛮干、胡干！毛泽东时代万物奇缺，只有人生产过剩。用毛泽东的原话说：“死一半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过若干年，就能达到原来的人数”。这就是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的治国理论。

57、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你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注：这是领袖主持的党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吗？你毛泽东就是流氓土匪，动不动就操大臣的娘，大臣受不了这个侮辱，反问你一句。你就推出午门把大臣斩首了。这是领袖所为吗？简直是土匪所为！我在我出版的《风雨人生录》中就说过，毛泽东没有皇帝之才，更没有皇帝之德。干的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坏事。动辄就操大臣的娘，这是什么语言？纯属土匪语言吗。你的行，你的言，怎么能教化好子民呢？！你教唆红卫兵，砸烂公检法。把杀人权，下放给红卫兵。红卫兵打死人白打，抄家白抄。可是古董字画，稀世珍宝，必须先交到你的大特务头子康生家，鉴别后，再送到中南海一组，请土匪皇帝选留。这只能说明毛泽东虽然当了皇帝，但匪性未改，仍操旧业，干杀人越货勾当！

58、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注：你毛大皇帝发动全民炼废钢，和打麻将靠手气毫无关系。这是科学和反科学的斗争，也是科学和愚昧的斗争。

民主社会的总统，自知自己不是万能的神。炼钢要靠冶金专家，他们是内行，能练出大量好钢来。可是你毛泽东统制的中国，是封建专制法西斯国家，你自然而然觉得自己是万能的神了。你板着脸孔说：“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霸皇帝发了话，内行专家们谁敢吱声。于是，在炼钢文化上，纯属文盲、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毛泽东，上一线指挥炼钢了，让炼钢专家们靠边站了。他亲自出马，亲自指挥九千万青壮年，日夜不停的土法炼钢。他认为他的手气好、运气好，一定能练出好钢来。结果，练出来的都是“豆腐渣钢”，做农具都不能用。全国各地炼出的废钢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北京市炼出的废钢，听说是运到西山，一个死山环里，污染空气去了。

1958 年风调雨顺，是个五谷丰登的年头。可是毛大皇帝只让九千万青壮年炼废钢，不许回家收秋，粮食都烂在地里。农民在 10 月份就开始饿饭。谁知毛泽东这一外行领导内行；这一“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死多少人？要白白浪费多少亿人民币？中国人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难道还让毛大皇帝下“罪己诏”吗？毛大皇帝说：搞社会主义，还能不犯点错误吗？犯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是交点学费而已。我永远不会下“罪己诏”。交这点学费，是几千万条人命呀！毛泽东！到底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尊敬的读者，要赶快觉醒呀！要赶快猛醒呀！不能让毛泽东这个杀人魔王再继续杀人了！

59、9000 万人上阵炼钢，比 6000 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

9000 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注：59 条是强权说法，阎王说法，不值得一批。但有一点，毛说：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这是百分之百的谎言。提高了还饿死那么多人，提高了还凭一百种票证供应生活品？这说明不是提高了，而是把建设速度大大降低了。降低了才饿死了 9600 万人。9000 万人炼废钢，不许回家收秋，粮食都烂在地里。有人问，农民为什么不硬回家收秋呢？农民可没有那个胆，农民都知道，不听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有一万杀一万，有千万杀千万呀！

60、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注：这第 60 条讲的是玄学，故意让读者看不明白。只有毛自己才能解释清楚。这近似于街头算命先生说的话：“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算命的人说：我不是哥仨，我是哥五个。算命先生说：对呀！孤独出去的那一枝是哥俩呀。加在一起，你是弟兄五个的命。毛泽东怎么说怎么有理。你要再和他辩论，就把你推出午门斩首了。毛主席永远正确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不信，你就打开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保险箱，看看所有顶级大臣们亲笔写的检讨书，千篇一律的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我是绝对错误的。今后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这就是所有大臣亲笔写的同样鉴定书（供词），既鉴定了自己，也鉴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用大臣们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供词，就能欺骗历史吗？真是愚蠢透顶。连我这当世的小小老百姓，你都欺骗不了，何况历史了。你毛泽东用暴力强迫大臣们写检讨书救不了你，只能加重你的罪行。你一辈子当婊子，牌坊是建不起来的。

61、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是应该学。

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你讨好斯大林，你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斯大林过 70 岁生日时，你亲口叫斯大林“慈父”。苏联大兵占领东北后，大肆强奸妇女。东北妇女都剃成光头，女扮男装。那时都说苏联的玉米面比中国的白面好吃。哪个时候，谁敢说苏联的屁不香，谁说谁完蛋。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认为，全世界都知道，社会主义阵营五大巨头是马恩列斯毛。前四个都死了，现在我是老大了。于是，毛、赫斗争开始，中苏斗争开始，一直斗到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毛泽东先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后又改嘴说：“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毛泽东先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后来又改嘴说：“……资本主义好的也是应该学”。

毛泽东一贯是翻手为云覆手雨、出尔反尔的人。做毛泽东的臣民实在太难，反毛的说法，死罪！赞扬毛的说法，罪死！

在毛时代，要想保住性命，必须做到只会说两句话：“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大皇帝的御用玩物、御用机器人。毛泽东叫它干什么，它就得干什么；叫它说什么，它就得说什么，它没有自主权。所以说，只会说“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就行了。别的话不会说，准能保住性命。我则行之。

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天下。不要说个人的权力，没有一个人比毛泽东权力大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也比不上毛泽东权力大。举个例子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几千万中国共产党员选出来的代表，做出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受到全党、全民的热烈拥护。全国人民都雀跃欢呼：八大决议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是全国人民欢呼雀跃的太早了。中国有一个人反对八大决议，这个人就是独夫民贼毛泽东。他动用他的“绝对权威”，把八大决议改为他个人的决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国人民刚刚看到一点曙光——幻想从八大以后，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奴隶了。毛泽东这一改八大决议，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又回到毛制的“阶级斗争绞肉机”中，过地狱生活去了。

有人问：毛泽东的权力有多大？比天大，比地大，比党大，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大。

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毛泽东个人，会有这么大权力？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遗留下来的：“谁打下的天下谁当皇帝的制度”，在毛泽东思想里落了户，生根发芽的结果。

还有人问，不听毛泽东的话行不行？那可不行，谁不听话谁就得掉脑袋。你别忘了，毛泽东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呀！他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刀，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用暴力杀人。杀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很好的实例。

还有人问，什么叫个人专政？很简单，毛泽东就是个人专政。谁不听他的话就把谁，推出午门斩首，没有任何法律、任何组织、任何人能制止他草菅人命。他大规模杀人，就是个人专政。

62、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注：这是毛泽东向全体臣民发威。臣民们不是要民主吗？要话语权吗？我全给，有话说出来，有屁放出来。这叫引蛇出洞。等到青蛇、白蛇、花梨蛇、都出来了，我再一网打尽。反正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没有枪，打不过我武装到牙齿的几百万御林军。土匪好说这种话，反正你这些没有枪的打不过我这有枪的。毛泽东认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使用国家军队消灭几百万、几千万没有枪的臣民，那不是谈笑之间的事吗。

63、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注：同上。

64、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注：毛泽东又在这里装神弄鬼，显示他的知识渊博。这时，他已经忘了他说的第一条黑话：“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套云山雾罩、神乎其神的话，不就是忽悠老百姓，要老百姓承认你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吗！其实，用不着说那些卖弄知识的废话。就直白地告诉读者说：这就是在中学里讲的“物质不灭定律”。中学生都知道这条定律，你也忽悠不了他们。

65、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注：同 62 条。

66、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注：毛说穷是好事，你毛泽东为什么不生活在“穷”中？你反而生活在“富”中。你毛泽东是绝对独裁专制的大皇帝，全中国的财富都是你个人所有、个人支配、个人处置。你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美国华尔街老板的财富，全部加在一起，也没有你毛泽东富。你对外说：“穷是好事，越穷越革命。”那么，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过穷日子，富了就不革命了。刘少奇、彭德怀穷，他们就靠你发的工资生活，家无存款，外无私产。因为穷才革命，越革命越穷，是恶性循环。他们革命一辈子，还是个穷光蛋，反被你打了反革命，推出午门斩首了。你原来也是个穷光蛋，因穷才革命。你不是越革命越穷，而是越革命越富，是善性循环。现在，你是人类首富，光别墅就有六十一处。按你的理论：越穷越革命，富了就不革命了。可是你是人类最富的人，你又是“最革命的人”！这不是矛盾吗？你说的和你做的总是相反，百分之百的相反。

老佛爷西太后这位女皇，每饭必摆上一百道菜，叫做一吃二尝三看。你毛大皇帝的绝对权威比西太后大万倍，吃的热卡量也不会低于西太后，你二位怎么也没有长出两个脑袋四条腿来呢。农业社员们，都想吃热卡量和你毛大皇帝一般多，他们不怕变成两个脑袋四条腿的怪物，可惜你不让他们吃那么多热卡量，反而把他们饿死了 13.15%！

你饿死 9600 万农民（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和你算清这笔账。你老用这些“鬼吹灯”的话，忽悠人民，欺骗百姓。头两次还有效，老用就不灵了。我建议你，把你的“骗人术”稍微提高那么一点，不然就骗不了人了。

最后的结论是：现在人民百姓都知道你毛泽东是人类最大的政治骗子、最大的阴谋家、最大

的杀人魔王！罪大恶极的毛泽东，你等着吧！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把你的原形暴露在光天白日之下！历史是最公正的！绝不会宽恕你！

2019年8月22日作于北京

第八章 毛泽东的绝密文稿《我的自我评价》(2014-08-12)

东兴同志：

此件留党的后代接班人阅之，是我对自己的评价。你们现在谁也不准看。密封保存，在我死后，仅允今后每任党主席军委主席在正式继位后过目，任何其他人都不得传看。切记！（注：中国权力金字塔全在党主席手里，军委主席次子，这两个主席，必须牢牢抓住。谁把这两个主席抓在手，谁就是皇帝。国家主席是办事员，狗屁权力都没有。国家元首刘少奇，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随便处死，谁敢说个不字。这就是皇帝的绝对权威。皇帝的绝对权威有多大？他想杀谁就杀谁，不管功臣不功臣；他想奸谁，就奸谁，不论姑娘与媳妇；大小官员他任免，条件是忠不忠于皇帝个人。重用的是江青、康生、柯庆施之流。据说，美国州长犯了罪，总统无权免他的职，只有这个州的选他为州长的选民才有权罢免他。中国是帝制，只有这个不穿龙袍的皇帝才有权罢免他。国库的钱，就是皇帝的私有钱，皇帝可随便送人。60年代一年之内，就白送给阿尔巴尼亚人每人5000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人每个家庭都成了万元户。中国人饿死无数。为什么毛泽东这么爱阿尔巴尼亚人呢？就是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喊毛主席万岁嗓门最高，频率最大。只要皇帝还在中国存在，中国人民永远是奴隶，永远不能当家作主。）

毛泽东1976年8月9日。毛泽东病床口授，张玉凤记录，章含之整理成文。

我要死了。万岁是你们强加给我的。（注：毛泽东死到临头还在说谎骗人：一九五〇年“五一”节，宣传部拟定的“五一口号”，送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在最后加了一条，亲笔写的：“毛主席万岁！”白纸黑字，有案可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效应是：谁喊毛主席万岁嗓门高，频率大，入党当官的机会就越大。坚决不喊者，杀头！老百姓不愿被杀头，迫使想出生存的办法，就是在心里把万岁的岁，改成破碎的碎。高喊毛主席万碎！万碎！万万碎！以解心头之愤。）

孙中山对喊他万岁的人说：我是打倒万岁的，现在，你喊我万岁，是不是也想打倒我呀？你打倒我，也得让我明白一下，我犯了什么罪？喊万岁的人低下头，无以为答。孙大总统又说：“看来你是初犯，今后改了就行了。如果今后你再喊我万岁，我就要起诉你！从此，再没有人喊孙大总统万岁的了”。我其实只要活到一百岁，中国的事情就会搞定。我既无此天年也无此天命，还是抓紧搞定了大局。（注：这个大局是什么？就是“太子”，谁当皇帝？这就是大局。毛泽东死前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两个版本，第一名都是毛远新。其他人都是二传手。把毛天下改为家天下，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大局。）周恩来朱德终于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无大顾忌了。（注：朱、周是毛泽东心腹大患，故走到毛前面，毛就无顾忌了。朱德留下的遗嘱，简直是讨毛泽东檄文，呈现出大英雄朱德的光辉形象，万古流芳；周恩来的遗嘱，呈现出他虔诚的反思：在多次“历史关键时刻”失去了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原则，违心的为毛泽东吹喇叭、抬轿子，铸成大错，悔之莫及。）大局已定（注：朱、周已死，“大局已定，”下一位皇帝是毛远新，其他都是二传手，是暂时利用一下。）。我会死，我也不会死。（注：我会死，毛确实死了，不能再杀人了。“我也不会死”。这五个字大有来头，就是毛泽东想要万古流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类历史已进入文明社会，人民是主人。你硬把历史倒退到秦始皇时代，这就是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怎么能成功呢？只能落个遗臭万年。毛泽东的罪大恶极也在这里，用暴力把历史倒退到秦始皇时代，你当当代秦始皇，罪莫大焉。人不反毛，天诛地灭。）

我对你们讲这些，并不需要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只要你们听清楚我的话，照原样原意记录下来，让我后面的接班人看。这个接班人是谁，我也拿不准，或许是江青到远新，或许是邓小平，或许是华国锋。无论他们是谁，都只准许在正式继位，搞定了之后才能看我这份遗嘱，你们和其他人一辈子也不准再接触这份遗嘱。（批注：毛把这份遗嘱说的神乎其神，玄而又玄。诸葛亮写的锦囊妙计，是亲手密写的，故能保密。你已失去写字能力，言语不清，无人听懂。只有

你霸占的有夫之妇的压寨夫人张玉风能听懂。你必须先用能听懂你的话的张玉凤，翻译成汉语。然后，再用被你强奸过的秘书章含之整理成文，这焉能保密。绝对独裁专制国家，多是人亡政息。阎王死了，小鬼当家。你的遗嘱，已到百姓家，无密可保。)

你们无论是谁，接了我的班，都一定要碰我，要找我的茬。这个原因，是你们都不可能是我。但是你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根本上打倒我，不是我，虎死不倒威，而是我留下的虎皮虎骨，你们一定要用。(注：你想当当代秦始皇，罪大恶极。历史要找你的茬，历史要打倒你。你的“虎死不倒威”，文明社会不能用。阎王在世时，内心深处，最放不下的是皇后江青、太子毛远新，能不能顺利接班？结果，现实回答了你。你死后，不到一个月，党天下就把江青、毛远新收监入狱。在经济上你用的是计划经济，党天下改为市场经济；政治上你是高举三面红旗的，党天下全部砍掉；你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40多年了，党天下一次也没有搞。你在位27年，搞了大小56次政治运动，开动你自制的“阶级斗争绞肉机”，冤杀和饿死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党天下只搞生产，不搞政治运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直线上升。我认为，现在要搞一点“忆苦思甜”活动，忆毛天下时代的苦，思党天下时代的甜。让人民也说说心里话。)

世界有个中国，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秦始皇帝。(注：你的说法是秦始皇以前，地球上没有中国，因为有了暴君秦始皇，才有了中国。这和《词源》上的解释完全相反。《词源》上说：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世界有如今，也是因为有一个人：马克思。(注：你所说的马克思，是经过你改头换面的马克思，是用来骗人的假马克思。你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在中国名著中，就有真假包公、真假李逵、真假孙悟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的。因为真马克思尽干好事，干了坏事，自我批评，认错改正，坏事变好事。假马克思尽干坏事，没有干过一件好事，还是坚持错误的冠军，焉能不露出你的狐狸尾巴。)中国能够在世界有如今，就是因为有我毛泽东，我毛泽东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不是机密，我多次公开讲过的。(注：你毛泽东不但不能比马克思，你也不能比秦始皇。秦始皇灭六国，全靠将军们出生入死，视死如归，才统一了天下。秦始皇当皇帝后，一个灭六国的功臣也没有杀。你当皇帝后，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杀国家元首刘少奇和有战功赫赫的三个元帅。杀老百姓就和杀鸡鸭猪狗牲口一样，你自称杀人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在当时，废分封，置郡县是有进步意义的。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秦始皇所代表的封建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所以它有进步意义。你想当当代秦始皇，搞个人专政，个人迷信，是历史的倒退，罪莫大焉。)

秦始皇称帝，骂名千古。连我们的郭沫若都是骂秦始皇出名起家的。可是骂来骂去，秦始皇就是千古一帝。从汉武到清朝，没有一个中国皇帝不敢不敬他。没有他，中国不成其为国，我毛泽东也没地方出现。嬴政他一生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听任后世咒骂，功罪千秋评说。他对于中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对于中国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国民族之传承，其业伟哉雄哉，谁也不能抹去他。他所创建的帝国基业，从汉武帝到我毛泽东都要继承。他对后世的中国和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没有一个人敢不承认。中国历史没有他，无中国之称。世界历史没有他，无世界之谓。我毛泽东称颂陈胜吴广造反，不但不废始皇基业，还要继续强化，秦砖汉瓦，不是打碎扫除，而是破而立之。中华之一统，复秦汉之大统，我在韶山念私塾时就立下此志，无继此志者，无德无才无成也。(注：这一段，就像希特勒站在世界之巅，高声朗读《我的奋斗》！更像大独裁者毛泽东发高烧说胡话训人：“中国历史没有他，无中国之称；世界历史没有他，无世界之谓。那么秦始皇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没有中国和世界了吗？这不是瞪着眼说胡话吗。历史从未否定秦始皇的功，但“焚书坑儒、求长生不老药，无论如何也是罪！”历史是不会骗人的，历史是最公正的。)

为什么到了慈禧太后光绪他们搞不下去呢？维系秦砖汉瓦万里长城的泥浆不行了。儒家那一套就等于是在砌万里长城的石灰米浆，过时了。要用洋灰，就是水泥。康有为谭嗣同搞不清什么是水泥。袁世凯蒋介石用错了洋灰。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洋灰，这是最合适中国秦砖汉瓦的真水泥。这个洋灰的奥妙，在于我们不但可以首先用来搞破坏，搞起来就等于烈性炸药，把旧宫殿炸它个稀巴烂。但是，炸完之后，它就是最合适最有效的快干永久水泥，用来重新建造我们新的秦砖汉瓦长城阿房宫。这个主义最高明之处，就是在于此：一个造反革命，一个专政，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两个都为我所用。

过去的许多帝王其实也跟我一样，既推崇陈胜吴广，也敬慕秦始皇，比如朱元璋。可是没有一个中国的帝王，在坐进金銮殿之后还可以继续推崇甚至宣传鼓励陈胜吴广，他们连《水浒传》都要禁。我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但一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两重属性，造反和专制，可以用来炸碎旧世界，也可以用来建设巩固新世界，而且能够在我们打下江山坐了金銮殿之后，继续这种造反的炸药功能。这就是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义。你们没有一个真正懂。江青也是半懂不懂。

估计邓小平会比江青要懂得多一些。他很不喜欢我。我理解。他一个儿子就是因为我搞文化大革命断了腿。可是美帝把我儿子炸死了，我还是喜欢尼克松。（注：从这几段开始，毛泽东想说心里话，但不可明言，只能会意。故弄玄虚，用“云山雾罩”的秦砖汉瓦说谜语，这是故意让接班人听不懂，让他们猜的。像绝顶聪明的人，如江青、邓小平都是“半懂不懂，估计邓小平比江青要懂得多一些。何况愚昧无知的老百姓了，就更不知所云了。这就像徐福在东海仙岛上得的天书，谁也看不懂，只有李斯丞相，能看懂一句话——“灭秦者，胡也。”这才把万里长城连接起来，死多少人不在话下。

那么，毛泽东心里的话，是什么呢？很简单：“用秦始皇大规模杀人以立威，谁见了皇帝都要跪下山呼万岁！；用马克思巧妙骗人以立信，假话说一万遍，就成了真理。威和信并用，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秦始皇马克思都为我所用，就能永当皇帝。我毛泽东就是个例子。）

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我，无论江青还是邓小平，还是你们后来的好几代，你们无法打倒我。有本事你们打倒秦始皇，把中国变成我年轻气盛时说的割据独立变成欧洲？马克思主义，你们也打不倒。哪怕在苏联倒了，我们中国也不会倒。秦始皇成就我毛泽东，我毛泽东要成就马克思。马克思只有在中国秦始皇的土地，可以永远不死。你们谁能够把秦始皇和陈胜吴广都同时抓到手里，你们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我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注：毛泽东想流芳千古，这是痴人说梦话。历史在发展，不能倒退。毛泽东的全部罪行，早晚大白于天下。纵观你的遗嘱，只谈了权力二字，也可以说，只谈了皇帝如何统制臣民的权术。中国人民渴望得到的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宪法、普世价值观……。只字未提。也未涉及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这说明你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只当鸡鸭猪狗、能劳动生产的机器人看。天生你毛泽东，你的天职就是杀人、骗人。你在夺取政权时，28年内战中，敌对双方死了5700万中国人。你当皇帝后，在位27年，发动大小56次政治运动，冤杀、饿死一亿四千三百万人。你一生共杀死、饿死老百姓，绝不会小于两亿人。你的罪行，历历在案，谁也抹不掉。清算你的罪行，只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第九章 一段论

毛泽东死了40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不可告人的真实历史，由“禁区”逐渐走向公开。国内外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国内最出名的是“三段论”和“两段论”。这是两位马克思主义者、资深的革命家、老共产党员陈云和陆定一写的评价毛泽东的文章。

“三段论”的名言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两段论”的名言是：以“反右运动划线，由反右到十年浩劫，整整20年，毛泽东都是有罪的。”

两段论者，还有一位名人，中共中央委员、毛主席秘书李锐评价毛泽东说：“功高盖世，罪恶滔天”。

另有几位虔诚的老共产党员，集体写了一本书，书名：《历史重新评说》，因为是集体创作，笔名：民声。此书，上呈党中央和胡锦涛。建议党中央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要重犯毛泽东个人专政和个人迷信的严重罪行。这书是以毛泽东生命划线的，其名言是：“前半生该夸，后半生该杀”！

我研究毛泽东、琢磨毛泽东，已有多年的研究成果是“一段论”。一段论是以思想划线的。结论是：“彻底地、全盘地否定毛泽东”。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能只听其言，主要的是观其“行”。言能造假，行不能造假。毛泽东干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在哪里摆着哩，挪不走，抹不掉。我认识毛泽东是从“行”上开始的。“行”是思想支配的结果。评价毛泽东，就是评价“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通过“行”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好读线装书，毛泽东承认：“他读的线装书比读的马恩列斯的书多万倍”。《资治通鉴》，毛泽东读了17遍。标标、点点划满了全书。

好读古书，是现象，通过现象看本质。他看这么多古书，下这么大辛苦，其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学习揣摩封建帝王夺取政权、驾驭臣民、统治百姓、巩固皇权的权术。毛泽东思想不是从马恩书里来的，而是从中国古书里来的。

彭真在党内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这句话，前半句是对的：“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半句是骗人的鬼话。毛泽东信仰、追求的是要当“当代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不会产生出皇帝来，因此，毛泽东绝不会信仰、追求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张口“革命”、闭口“革命”，用假革命把三座大山打倒了。但打倒的是三座大山的躯体，“灵魂”可全部跑到毛泽东的脑海里去了，一丝一毫没有受到伤害，反而受到毛泽东的“核保护伞”的保护，在良好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因此，这三座大山摇身一变，就成了“毛泽东思想”这座喜马拉雅山。这山是什么材料造成的呢？是“社会帝国主义、纯种正宗的封建主义和皇帝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这座喜马拉雅山，把旧社会三座大山的精神，继承、发展到了极致。

对外，侵略大韩民国；对内，实行了“毛泽东个人专政、绝对独裁、朕即国家、对人民群众实行的是‘四死政策’”，人民百姓下了地狱。

古书里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这是中华民族万古不变的封建法则和传统。传至毛泽东这一帝（当代秦始皇），封建帝王的权术、谋取皇位、愚民政策、阴谋诡计、残害百姓。这一切惨无人道的权谋，都成了毛泽东的座右铭，永志不忘。且能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残害百姓集大成者，花样之繁多，手段之残忍，无出于上者。

例如：夺取政权，利用“三假”，即假马克思主义、假抗日、假土改。为什么说是三假，假在哪里？真马克思主义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假马克思主义是搞暴力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是水火不同炉的两个社会制度；假抗日是不和日本鬼子碰面，千方百计绕到日本鬼子后面去，建立村政权，建立农会，建立党组织。鬼子在东，我在西，永不见面，怎么打鬼子。命令游击队，不准主动出击打鬼子。

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都是前线将军们反抗毛泽东的命令打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批判彭德怀说：“你发动百团大战不是爱国，而是帮助国民党打日本人，你爱的是蒋介石的国”（详见《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一直批到死。

毛泽东利用两面特务潘汉年，传递毛泽东和日本人的口头协议：毛的游击队不破坏日本占领区的铁路和公路，可畅通无阻地去消灭国民党军队。但不能进攻延安、轰炸延安。双方执行了口头协议，所以，延安是和平环境。重庆战火横飞（建国后，毛泽东的汉奸行为，怕潘汉年走漏消息半点，把潘汉年抓起来，劳动改造到死。）。

假抗日的结果：14 年抗战，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在华战死的日本人名单：死于国军的：318883 人，死于共军的 851 人（这都是纯日本鬼子。伪军（皇协军），靖国神社是不计数的，那是中国人打死中国人）。其中，百团大战和平型关大捷占 55.1% 多，游击队在逃跑、突围时，打死日本鬼子的占 44.9%。游击队严格遵守毛泽东的命令，不和日本鬼子打仗。故没有一次是主动出击的。以毛诗为证：毛泽东写了那么多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没有一首是打鬼子的，都是打内战的。

毛泽东养这么多军队，不打鬼子。保持实力，准备打内战，夺取蒋介石政权。可是军队要吃要穿，经费从哪里来？毛泽东又生一计，从发动大生产运动中来。延安军队开荒种地，但种的不是庄稼，而是罂粟。罂粟制成鸦片，贩卖到国统区，残害中国人。这比英国大烟贩子颠地还厉害。颠地只是贩卖大烟，毛泽东是种植、生产、贩卖一条龙残害中国人。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其中，张思德不是烧炭窑崩了砸死的，而是熬制大烟窑崩了死的。张思德不是干革命牺牲的，而是为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反革命任务而死的。毛泽东为了当上当代秦始皇，不择手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假土改：最初，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下中农（地富也分地、分房），并发放“土地证”。土地证上盖上边区政府鲜红的大印，证明“土地证”上的这块土地，是张三这位贫下中农的私有土地。贫下中农哪里知道，这是古书里教给毛泽东的“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权谋。

贫下中农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土地，忽然喜出望外，梦想成真，真有了自己的土地，无不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从此贫下中农都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都愿意在家享清福，不愿意上前线打仗。

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发动了二次土改。在二次土改中，内部文件规定：地富要占农户的百分之多少，打死地富的数，占地富的百分之多少。把地富扫地出门，挖地三尺。地富不分房，不分地。这样地主富农大量死亡。

毛泽东对贫下中农宣传说：“你们分了地富的房和地，又打死了地富的人。可是地富的后台是蒋介石呀，蒋介石若打回来，你们分的房和地，甚至你们的命都保不住。保住胜利果实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打倒蒋介石，把地富的老根铲除，你们分的房和地，就永远是你们的了。”紧接着他又说：有三个儿子的贫下中农，两个儿子去前线。为了保住“胜利果实”，贫下中农子弟踊跃参军。兵源充足，毛泽东用“人海战术”打跑了蒋介石。自己当上了当代秦始皇。

建国后，毛泽东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实际是毛有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者，奴也。千万个地富都杀光，只留下一个特大号的地主毛泽东。毛家大院有多大？9600 万平方公里。毛泽东在三年多时间里，活活饿死老百姓 9600 万人，其中多是贫下中农。毛泽东这位大地主，比电影中的黄世仁凶恶万分、残忍万倍。

二战后，日本、台湾、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搞了土地改革。都是和平土改，一个人没有死。政府给贫苦农民发放无息贷款，买了地富的地。贫苦农民种庄稼是行家里手，生产的粮食多。卖了余粮，还清贷款。土地至今还是自己的。政府又给地富做工作说：你们有地，但不会种地，靠雇工种地，产粮就少。但你们有文化有知识，可把土地卖给会种地的人，到先进国家深造，回国后当企业家、厂长、老板。这样，土地改革是取长补短，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改革，是在国家、地富、贫苦农民三方都有利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毛泽东搞得是暴力土改，贫下中农得土地快，失去土地也快。无论地富后代还是贫下中农后代，都沦为毛泽东的奴隶、机器人、螺丝钉了。在中国彻底消灭了自由和民主，实行的是毛泽东个人专政。老百姓至少在 100 种“票证”中生活。人民群众一天也离不开毛泽东，离开毛泽东就得饿死。因为不在毛泽东控制下，不发给粮票。毛泽东不但控制人的肉体，而且控制人的灵魂，以防人民造反。

自从毛泽东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秦始皇，就对秦始皇崇拜的五体投地（详见《毛泽东遗嘱》），

为什么秦始皇对毛泽东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他羡慕秦始皇乾坤独断，权大无边。不要说见到秦始皇本人，就是见到他的“圣旨”，无论多大官职的人，都要跪下山呼万岁，万万岁！更不要说“三宫六院，佳丽三千（《百家讲坛》王立群讲《史记》说：秦始皇后宫佳丽是一万多人）。列屋而闲居，争妍而取怜”了，真是天上人间，其乐融融。因此，毛泽东头脑里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封建帝王的思想，每一个细胞都是封建帝王的细胞。

毛泽东从开始走向社会，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其初心就是为了当上“当代秦始皇”。为此，铤而走险，占山（井冈山）为寇。言必革命，混入共党（1920年8月，以陈独秀为首的8个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8人中没有毛泽东。以后入党的都有介绍人和入党手续，唯毛泽东没有。）占据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有土必豪，无绅不劣。地富游街，人格扫地。独秀批毛，分田过火。国共反目 内战开端。匪首泽东，暗下决心，生不为帝，死不瞑目。毛贼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几失性命（彭德怀救过他三次命）。为打天下，费尽担山力，施下拖刀计，奋不顾身，百折不挠。施展阴谋，诡计无穷。扫荡诸侯，终成帝业。

几千万忠实的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终生。毛泽东的初心和几千万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根本上就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不能代表党，不能和党划等号，必须严格地分割开来。

毛泽东之所以当上共产党的终身领袖，完全是一个大阴谋、大误会，错中错。他不可告人的内心世界，如：要当“当代秦始皇”，是说不出的。说出来的话都是假话，一句真话也没有。

他的阴谋诡计中，还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的放矢”。目的是使听者，支持他夺取政权。如他在延安窑洞里，接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时，就歌颂民主好，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可是在他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把黄炎培一家，六口人打成了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三死三疯。

他在延安接见美国访华团时，知道美国人崇尚自由，他又有的放矢了，就高度赞扬自由好。把华盛顿、林肯总统捧上了天。把美国社会说的锦上添花，似乎比共产主义社会都好。毛泽东想让美国人支持他夺取政权（详见1943年7月4日，他为新华日报写的一篇社论），大力歌颂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这都是毛泽东的大阴谋！

六年后，毛泽东当上了当代秦始皇，就和斯大林、金日成联手，发动了侵略韩国的战争，直接和美国打了一仗。郭国汀著《流氓匪首毛泽东》记载：这场侵略战争，朝鲜军民死亡300万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亡200万人，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亡45万人，伤50万人。联合国军：美国死亡3万3000人，英国死亡1000人。其他14国，死亡4000人。

双方死了那么多人，停战了。停战条件是：侵略军从38线以北侵略韩国的，还回到38线以北原地。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消灭韩国，统一朝鲜半岛。结果，一寸韩国的土地也没有得到，白白死了几百万人。这是毛泽东的功呢，还是毛泽东的罪呢？请读者自己定吧。

毛泽东打下了天下，当然是毛泽东坐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可是中华民族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老百姓不在乎哪姓、哪家坐天下，非常在乎坐天下的新君，对人民有没有“功德”。古代，周厉王止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谓之暴君。齐威王纳谏：“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国人谓之明君。中华民族是个非常重视“德业”的民族。

现在，看看毛泽东的德业吧。毛泽东夺取政权，牺牲了2800万革命同志（这个数怎么来的，是“六四”闹学潮时期，中央通知王震开会，在会上王震得知学生要闹事。怒发冲冠，他掏出手枪来，往桌子上一摔道：“我们的政权是2800万人头换来的，这小兔子们要夺权，咱们就这上头见！”

在夺取政权中，胜方牺牲了2800万人。按常理说，败方应当比胜方战死的人多一点，但无数据可考。姑且，按2900万人算吧？待历史学家考证出准确数字，以准确数字为准。

为了巩固当代秦始皇的宝座，毛泽东在位27年，发动56次政治运动，冤杀无辜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其中活活饿死九千六百万人（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此资料在公安部档案馆封存，不准外传）。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呢？因为毛花了71亿美元，放了第一颗原子弹。这71亿美元，是卖了9600万饿死鬼的口粮钱，买了放原子弹的技术，才完成的。

毛泽东说：“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就这一“其乐无穷”，饿死了 9600 万中国人。这说明毛泽东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而是当鸡鸭猪狗看。饿死人是有意。饿死近亿人事小，保住当代秦始皇的江山事大。

毛泽东这位当代秦始皇，一生至少杀死、饿死两亿中国人！

几千万共产党员没有一个愿意饿死老百姓的，愿意饿死自己和家属的。这就是共产党人和当代秦始皇的初心不同处。谁杀共产党员最多？毛泽东也。在杀共产党人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比，真是大巫见小巫、阎王见小鬼了。

毛泽东想上当代秦始皇，从何时开始的呢？从童年，何以为证，毛诗为证。毛泽东 16 岁时，在私塾写过一首《咏蛙》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是多大的霸气，这种霸气伴随了毛泽东一生。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需商量”。焚书坑儒，毛泽东作为一种伟大的事业肯定下来。因此，他又说：“有人骂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他说的还不够，还需要我们补充。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 460 个儒，我们坑了几十万个儒，超过他 100 倍。”

“惜秦皇汉武……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段文字只能说明，当代秦始皇有点瞧不起古代秦始皇。其实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为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是顺潮流而动，人类社会进步了。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了。所以，毛泽东比不了秦始皇。毛泽东是把封建制社会倒退到奴隶制社会，是逆潮流而动的，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因此，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是没有争议的历史罪人。

毛泽东的一生，是复辟奴隶制社会的一生。

他最初，搞的是毛天下，继而搞家天下。党天下是毛天下的御用工具，橡皮章。毛天下让党天下做什么，党天下就得做什么；让党天下说什么，党天下就得说什么。就这样，毛天下还不放心。

毛泽东深知毛天下已老，家天下当立。党天下的老干部，是建立家天下的严重障碍。故必须大规模杀一批党天下的老干部。为了杀老干部，毛处心积虑的创造出无数个新罪名，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如“右派、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集团”“二月兵变”“翻案风”“516”等。这是毛泽东“苦思冥想”，想出来的残害老干部的新罪名。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右派、右倾、走资派、反党集团、二月兵变，翻案风、516 等。毛泽东用这些不存在的罪名，杀了国家元首刘少奇和 3 个元帅彭、林、贺。周恩来、张闻天，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害死的。林彪元帅要刺杀毛泽东，是为民除害的英雄正义行为，功大于过，应该给林彪元帅平反。老一代共产党人，没有比林彪更了解毛泽东丑恶灵魂的。

毛泽东在遗嘱中说：“我其实只要活到一百岁，中国的事情就会搞定。我既无此天年也无此天命，还是抓紧搞定了大局。”这个“大局”是什么呢？就是选定华国锋为“二传手”，用江青“垂帘听政”（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问江青’）。江青将天下传给毛远新，即毛二世，毛三世……直到万万世。

我的“一段论”，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因为他打天下的初心，是为了自己当终身皇帝，家属当世袭皇帝。对人民百姓没有任何功德，只有灾难。毛泽东不是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人民的大灾星，大祸害。

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毛泽东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的思想是帝王思想，不够党员资格，死尸上再踏上十四亿只脚。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有这样，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才能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分割开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永垂不朽！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死后，中国共产党当家作主了，立马废除了残害人民的 100 种票证，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上升，过上了人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人民至上的结果。

毛泽东死时，我的月薪是 55 元，苦不堪言。现在共产党当家作主了，我每月养老金 15000 元，

提高了 272.7 倍，物价可没有长 272.7 倍。我的老年很幸福，我很知足。如果毛泽东能活到现在，“当代秦始皇”当到今天，其恶治老百姓的初心也不会改变。他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为了保住毛天下和家天下，不知要放多少个原子弹、搞几次“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死 2000 万人，斗一亿人”），我不饿死，也被毛杀死。

我非常赞同《百家评价毛泽东》的首篇文章中，将“毛主席纪念堂”改名为“中华先贤纪念堂”的建议。把所有毛泽东害死的老干部，全部请到中华先贤纪念堂里。永远接受人民群众的顶礼膜拜。

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知道毛泽东的罪行就这么多（本文未提到的，毛泽东早年，杀 10 万 AB 团也是罪行。不知为何至今未平反。AB 团，历史上有过这个反动组织。但是，毛泽东大杀 AB 团时，却是一个 AB 团成员也没有。全部是毛泽东排除异己，一统天下的暴行）。

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批评、斧正。

九十岁离休干部张瑞月，2021 年春节作于北京

第十章 盖棺定论

世间万物，从古至今，最难琢磨、最难了解的就是人。比如汉代王莽吧，他是满脑子想当皇帝的思想，可是他深深藏在心里，绝对不暴露出来，任何人也察觉不出来。他表现出来的是绝对忠于大汉王朝、忠于当朝汉平帝。为了向皇帝表忠心，他杀了亲生儿子和亲外甥，罪名都是不忠于大汉王朝。他又把亲生女儿送进宫去，做了皇帝的妃子。这时，他的权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可是他还是非常谦恭、礼贤下士。待到羽翼丰满、时机成熟时，公元 5 年，王莽毒死汉平帝，公元 8 年，王莽废汉称帝，国号新。你看王莽多么狡黠、奸诈、难测。所以，白居易诗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

古代人难以琢磨，现代人也如此。人间万事万物，没有比较，就没有大小、没有好坏。王莽虽恶（他才杀几个人），较毛泽东，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小鬼见阎王了。如果在 1949 年底，毛泽东的假面具还没有摘下来时，也就是真实的毛泽东还没有出场就死了，全体国民肯定誉他为中国的华盛顿和人民的大救星。

可是，天道公正无欺，灾星不能成为救星。故让他在和平时做了 27 年皇帝，无端杀害中国人 14300 万（合每天，杀 14·510 人）之后，灾星嘴脸和杀人魔王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才让他断了气。

历史罪人，遗臭万年是天道（天道不是迷信，是自然）。中国人民迟早要把毛泽东钉在耻辱柱上，写在教科书里。如果以皇帝宝座为本、以杀人为天职的皇权主义者，历史不把他死死钉在耻辱柱上，“天诛地灭、乾坤自焚”。罪恶满盈的毛泽东，天道必有报。

已经当了大皇帝的毛泽东难以琢磨、难以了解，追随毛泽东想当皇帝的人也如此。就说太子党头目之一薄熙来吧，官居重庆市委书记，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的发紫，因此权欲膨胀，想当皇帝。他在重庆市铸造一具中国最大的毛泽东铜像，在空中挺然、翹然。然后，大搞“唱红打黑”活动。所谓“唱红打黑”，就是“文革”的变种。唱红是要人民天天山呼毛主席万岁，为毛主席歌功颂德；打黑是钳住人民的口舌，不许发出不同的声音。简言之，就是实行绝对独裁专制制度。薄熙来想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又称皇权主义）统治办法，统治重庆市人民，以此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想借毛泽东的幽灵还覆盖着中国大地的力量，登上皇帝宝座。可惜事与愿违，党内斗争激烈，已达白热化程度。结果，薄熙来登皇帝宝座失败，身陷囹圄，几乎丧命。真可谓“朝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

薄熙来被打下马之后，似乎有一点明白，他在网上说：“毛主席是中国的‘土皇上’，中国事无巨细，毛主席说了算；我是重庆市的‘土皇上’，重庆市的事，事无巨细我说了算。中国各省

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土皇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薄熙来一语道破，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土皇上”统治着中国，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人说了算的皇权主义”统治着中国，皇帝说的话，是金口玉言，谁改一个字，就推出午门斩首。

薄熙来在监狱中，似乎感悟到一个人说了算的皇权主义不太好，这种感悟，只是“皮毛而已”。因为他身在其中，当事者迷，不可能觉悟太深。他们父子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皇权主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久在鱼肆而不知其腥”。根本不知道，皇权主义对中国人民、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规模杀戮和摧残的严重后果。

薄熙来和其父薄一波都是毛王朝的重臣，父子俩都是铁杆忠于毛的。可是又都被打下马来，做过毛王朝的阶下囚。

这种怪现象，在毛王朝中不是个别的，而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像罗瑞卿大将，那是绝对忠于毛主席的人，当他出差返回北京时，一下飞机，就被捉进秦城监狱，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放出来。但罗瑞卿已被打成残废，出狱后死在手术台上。最可悲、最可怜的是：这些受害的大官、大功臣，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本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事，可是对圈子里的人（当事人）就很难明白。因为这些蹲过毛王朝监狱的大官，都是毛主席钦点的重臣，一方诸侯、权重金多，他们太忠于毛主席、太忠于毛王朝了，忠到头掉了不知道是毛泽东砍下来的。

太子党的头面人物和他们的父辈，都是受毛泽东多年统治、教导的人。像毛泽东这样的地痞、流氓、无赖、土匪、大军阀、大汉奸（详见《毛泽东给汪精卫的亲笔信》和通过潘汉年，这个日我两面地下工作者，传递：日我两面“口头协议”：我的游击队不破坏日占领区的公路、铁路，可畅通无阻地直达日蒋前线，消灭蒋军。但日军不侵占延安、不轰炸延安。故延安是和平环境，重庆却是战火连天。

在日本靖国神社有记载，日本在华战死名单上：死于蒋军的 318883 人，蒋军牺牲 380 万人，近 12 倍日本战死者，牺牲的将军达 117 人，详见西尔泉著《380 万军人之死》。死于共军的 851 人。

平型关大捷打死日本鬼子 167 人，百团大战打死日本鬼子 302 人，两项之和，占总数的 55.1%。这两次大战，仅左权将军战死。这两次主动出击打鬼子，都打胜了，这都是前线将军们抗拒毛泽东严禁主动出击打鬼子的命令，才有这么辉煌的战果。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动出击打鬼子，说这不是爱国，是爱蒋介石的国，是帮助蒋介石打鬼子。毛泽东大部分游击队严格遵守毛的不主动出击的命令，在逃跑突围中打死日本鬼子 382 人，占总数的 44.9%。

在文革中把林彪、彭德怀变相处死，其中也有不服从军令的因素。毛泽东怕潘汉年走漏他的汉奸行为，抓起来劳动改造，直至死亡。

大贪污犯，盗钩者诛：刘青山、张子善是也；窃国者王，毛泽东是也。

别说你们一方诸侯的官，就是毛王朝最大的官，如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话语权、自由权。他们和西太后手下的小李子一样，只能乖乖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向毛主席回话时，也只能说“是”“是”，违者就有生命危险。皇权主义是毛王朝的权力体制，任何人都不能改变。

毛泽东的皇权主义有三大特点：

一是要取消法律，公检法靠边站，以红卫兵代之，红卫兵可随便杀人抄家，无法无天。

二是从政治上说，要绝对忠于毛泽东个人，不准忠于别人（包括马克思，忠于马克思的人，毛泽东杀的还少吗！），忠于别人就是极大地犯罪。这就造成了皇权主义，权大无边。毛泽东想杀谁就杀谁，不管功臣不功臣（彭德怀救过毛三次命，毛泽东的江山三分之一是彭德怀打下来的，毛还是把他杀了。）毛泽东想奸谁，就奸谁，不管姑娘与媳妇（毛糟蹋的良家妇女中，最悲惨的一例是张玉凤，她和毛生了儿子，但不能姓毛，只能姓母姓，叫张南子）。

不用任何法律形式，就给了金日成半个长白山；给了阿尔巴尼亚国民每人 5000 元人民币。中国人民饿死了九千六百万人，毛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搞过，还能不花点学费。

三是在经济上，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公有制就是毛泽东个人所有制。毛泽东是皇帝，有权处置在中国大地上的全部财富。

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绝不是社会制度的革命，而是换皇帝暴乱。是马克思、恩格斯扬弃的革命形式。毛泽东还在坚持，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这部哲学史批判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书中说：毛泽东是“仇必仇到底”斗争哲学。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又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叫“到底”？就是在敌我矛盾中赶尽杀绝，是“仇必仇到底”的真实目的。国民党军队，除一小撮跑到台湾外，绝大部分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包括起义部队）；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毛泽东了，应该说将革命进行到底了吧。不！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不能叫“到底”。毛泽东的“到底”，是从肉体上、意识形态上把敌人消灭干净。投降兵送到社会底层、劳动改造折磨死；起义兵送到朝鲜侵略战争中当炮灰。据说：在文革中，刘少奇曾向毛主席提出退休请求，退休后到延安或老家当个农民。毛泽东不同意，非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在反右倾运动中，哪一个公社书记，大队书记，胆敢不放假高产卫星者，必冠以“小彭德怀”右倾罪名。这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仇必仇到底”的哲学思想。这就造就了毛泽东最残忍、最不人道的行为逻辑。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只强调“同”反对“和”的。冯友兰说：‘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不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种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各种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也就是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毛泽东曾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按毛泽东错误的哲学思想搞政治斗争，不要说共产党有几千万党员，就是共产党只有两个党员，也一定斗得头破血流，一死一伤。

这就说明，毛泽东的理论学说，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你们父辈、子辈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学说是正确的。所以，你们父辈胆战心惊地过了一辈子；如果你们子辈不改弦更张、弃暗投明、弃恶从善，继续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学说是正确的，你们也要心惊胆战地过一辈子，不知何时何地被打下马来，捉进秦城监狱。

你看，毛泽东把阶级敌人都杀光了，没有敌人了，怎么办？毛泽东有办法（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就是最毒的办法，可是他忘了他亲口说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怎么共产党内有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是刘少奇呢？）：他在自己队伍里、在自己人群里找新的敌人，还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新敌人也要杀光。毛硬说：“彭、黄、张、周是反党集团”。在自己队伍里又滋生出新的敌人来了。

你怎么能怪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呢。阶级敌人就是越杀越多吗，总是杀不完吗。

在中国的古典哲学中，是非常强调“仇必和而解”的。中国古典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因为这是“客观辩证法”。这是中国哲学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各国都要走这条路。《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想，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的运用。

行文至此，使我想起地球背面的美国，它是个出了名的自由民主国家。它运用中国的哲学传统比中国运用自己的哲学传统还好，这也算是墙内栽树，墙外结果吧！美国历届总统的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截然不同。华盛顿和毛泽东都是开国元首。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了美国。他的元帅、将军们一致拥护他当国王，实行国王世袭制。华盛顿坚决反对，力主实行总统任期制。他说：总统任期四年，如果公民们认为我这一任总统，工作的很好，公民们还愿意选我当下一届总统，我可以连任一届总统。再下一届我就无权参加总统选举了，必

须回家为民，这是宪政国家规定的。美国总统退休为民是真的，是真当老百姓了；宪政国家决不允许退休总统搞“垂帘听政”。垂帘听政这种现象，只有在绝对独裁专制国家才能出现。

华盛顿的将军们一听，勃然大怒，说：你不当世袭国王，我们当世袭将军！华盛顿也坚决反对，他说：如果我们国家的军事将领，都是世袭将军，国家军队就不能打仗了，就要亡国。因此，美国人民非常敬仰华盛顿，节庆日子，人民都祝福他健康长寿！

再看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吧，他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了，毛泽东当了开国皇帝，他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威使人民群众山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更有甚者，毛在五〇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亲笔写下“毛主席万岁！”这条口号。

这不仅和华盛顿大相径庭，和孙中山也大不一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拍马屁的人，当面喊孙大总统万岁！孙中山对喊他万岁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孙中山说：“我是打倒万岁的人，你怎么喊我万岁呢？你也想打倒我吗？你打倒我，也要说说我犯了什么法呢？喊万岁的人无以为答。孙中山说：考虑到你是初犯，今后改了就算了。如果你再喊我万岁，我就要起诉你。从此，谁也不敢喊孙中山万岁了。毛泽东钦定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又钦定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什么牌子的革命家，自己说了不算。要根据自我表现，让全国人民说一说，选一选，是愿在资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生活呢，还是愿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统治下生活呢？回答肯定是愿在孙中山领导下生活。

1949年10月1日，毛大皇帝在天安门登基大典上就撒了两个“弥天大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请问毛大皇帝你对“共和”二字怎么解释？我没有听过你对“共和”“言”的解释，我经历过你对“共和”“行”的解释！孙中山一贯言行一致，他说：共和就是“民主、平等、博爱”（详见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国还有一位先知先觉的哲学家，就是《妄谈·疯话》的作者宣永光，他说：所谓共和，就是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贫富、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一律平等，这就是“共和”。你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你怎么做的呢？你首先把民主、平等、博爱在中国彻底消灭干净了，在中国一丝一毫都不存在了。紧接着，你强行把中国人民分裂成红5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干、城市贫民）；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叛、特、资‘走资派’、知‘知识分子’）。共14种人，他们的身份不同，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也就不同。毛泽东还唆使红五类肆意侮辱、批斗、杀害黑九类。如红五类学生宋彬彬打死老师、校长，不受法律制裁；又如全国共有七处红五类把黑九类全杀光的地方，无论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是出生三十天的婴儿，一律杀死（详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15页“幸存者自述”和《那个时代的我们》这本书中，记载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灭绝黑九类的惨案）。这就是毛泽东对“共和”“行”的解释。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哲学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应用。

再看看中国内战和美国内战是多么不一样：中国内战是为了争皇帝宝座打内战，毛泽东胜利了，上台当皇帝，蒋介石失败了，下台为贼，逃到台湾岛去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昙花一现的“孙中山辛亥革命”除外）。

美国内战，又叫南北战争。内战不是为了争皇帝宝座，而是为了解放黑奴，南北政见不合，打起了内战，死伤115万人。开始是南方为了维护黑奴制，首先对北方开炮，北方要解放黑奴进行还击。美国内战：马克思说：“南北战争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 and 革命的意义。”美国内战打的是“社会制度革命”战争，无论哪一方胜利，都不会出现一个皇帝。北方要解放黑奴是正义的，是进步的，所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

但北方对南方并不赶尽杀绝，而是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仇必和而解”进行调和。南方的军政人员，没有一个被抓起来劳动改造的，都让他们回家，过上公民生活，详见电影《乱世佳人》。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党——民主党也没有被解散，仍然代表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工作着。南方军人都投降了，都成了美国公民，允许南方最高军事统帅出国定居。在内战中有战功的南方军事将领，可以在南方铸铜像。这就是美国运用中国哲学传统的典范。中国的哲学传统是非常强调“和”的。“和”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这在政治生活中是必须有的要素。这，

我就想起民主国家制定宪法的法律，民主国家的法律规定，制定宪法必须有“反对党”参加起草工作，没有反对党参加起草的宪法无效。据说，蒋介石搞的宪法，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参加了起草工作。可是毛泽东搞的宪法，没有反对党参加，所以无效。毛泽东也不执行宪法。他说：“傻子才相信宪法哩”。

美国最初，也是只有一个党——共和党。后来，美国政治家们觉悟到只有一个党专政不好，就允许共和党内一个派别独立出去，1828年组成了民主党。这个民主党，和美国“共和党”是平等、平级的大党。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且长期和共和党轮流执政，台上的叫执政党，台下的叫反对党。两党是平起平坐的党。不像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的关系：共产党是领导党，8个民主党是被领导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是猫鼠关系）。

毛主席对8个民主党的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和你们8个民主党是长期共存的”，8个民主党的主席马上立正、猫腰、鞠躬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又说：“我们共产党和你们8个民主党是多党互相监督”。8个民主党的主席又马上立正、猫腰、鞠躬说：不敢！不敢！不敢！你看，美国的多党制和毛泽东中国的多党制，真和假是多么分明。

就这么说吧，在中国，只要毛泽东还有一口气，中国共产党，就绝不能受党外的党的任何监督。这是对党外而言；对党内就更厉害了，在党内毛泽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法律、任何团体、以任何名义监督毛主席个人专政。毛泽东在红墙大内经常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种封建法西斯土匪作风也传染给皇后江青，江青也大言不惭的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谁敢把我老娘怎么办？！（详见《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一个国家，皇帝、皇后都是“和尚打伞”，没有任何法律、任何机制监督他（她）、制裁他（她），这个国家还能有“好”吗？不成为一个极端恐怖的土匪国家才怪呢！极端恐怖国家，何谈共和？这不是弥天大谎吗？！

毛泽东登基时，撒的第二个弥天大谎，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做了27年皇帝，在中国大地上撂下了近一亿五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尸体，这近一亿五千万人是彻底站不起来了。活下来的人（包括我）都吓破了胆，呼啦啦一齐跪倒在杀人魔王毛大皇帝脚下，像鸡吃米似的不停的头点地，山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在毛主席脚下的人，不都是我们这样的小小老百姓，就是世界闻名的大人物，如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贺龙等，也和我们一样，跪在大魔头毛大皇帝脚下山呼万岁！意在请毛大皇帝刀下留人。毛大皇帝决不刀下留人，还是把他们都杀了（或变相杀死）。

经过毛泽东27年的统治实践和铁的事实，中国人在尸横遍野中定睛看时，中国大陆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人都趴下了。毛泽东也决不会让第二个人站起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吗。这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使然。毛大魔头把原来的阶级敌人都杀光了，就毫不犹豫的让中国人民顶上去，中国人民成了毛泽东革命的对象。

所以，我作为92岁的最底层的老百姓，奉劝毛后大大小小的接班人，不要打毛泽东的旗号了。他罪行太大，你们接班人，不能分担他一丝一毫的罪恶，要彻底和他分割开来。另起炉灶，走马克思老年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上，不要用“进口的”哲学思想建设中国；要用“国产的”、张载的哲学思想建设中国。要用中国的“仇必和而解”的哲学传统，建设我们最伟大最可爱的祖国。这样，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享受天年。你们现在的接班人（或将来的接班人）都不会和你们的父辈一样，不知何时、何地、何因就被毛泽东扣上一种或几种政治帽子，抓进秦城监狱。你们的父辈，都是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但他们的命运几乎都不好（极少数被毛泽东选进他个人私立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外），一生都过得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就是你们的父辈生活在毛大皇帝时代，封建皇帝是喜怒无常的，喜有赏，怒有刑。皇帝时代的大臣，都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虎吃掉。所以你们的父辈无时无刻不在颤栗中生活，都是毛泽东大皇帝的受害者。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接班人，应该团结起来“改

制”。改什么？改皇帝制为总统制；改独裁专制制度为民主宪政制度；改暴力社会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皇帝个人专政，为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专政。人民选举的总统，如犯法、违宪，按法律判刑，如台湾陈水扁总统。

改制后：你安全、我安全，大家都安全；你幸福、我幸福，大家都幸福；你不馐馐，我不馐馐，大家都不馐馐。

为了百姓苍生和你们这些大官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永远过平安稳定的好日子，就必须把毛泽东的绝对独裁专制旗帜放倒在地，踩在 14 亿只脚下。高举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建设伟大的祖国。我这个老白毛，实在不愿看到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接班人，和你们的父辈一样，在毛泽东害国害民的旗帜下、幽灵中馐馐颤栗的生活。为了让全中国老百姓和你们这些大官们，能充分享受到自由、民主、宪政的幸福生活，希望你们认真地考虑考虑我这耄耋老人的忠告。

92 岁离休干部自白 2022 年 12 月 25 日





作者简介

张瑞月，1930年生人，
河北省束鹿县人。著有《风
雨人生录》《联想思辨
集》《觉醒》。

电子邮箱: ruiyue163@163.com

微信号: 13269744066

电话: 01067025390

手机: 18510233862